[新加坡] 朱亮亮　著

一个新马华族家庭四代人纵跨一个世纪追求心中彩虹的故事



追虹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追虹

［新加坡］朱亮亮 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追虹 /（新加坡）朱亮亮著. —广州 ：花城出版社，2010.8
ISBN 978-7-5360-6021-0

Ⅰ. ①追… Ⅱ. ①朱… Ⅲ. ①纪实文学－新加坡－现代 Ⅳ. ①I339.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28338号

责任编辑：詹秀敏　张　懿
技术编辑：易　平
封面设计：张红霞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官侨彩印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石楼）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10.625　1插页
字　　数	220,000字
版　　次	2010年8月第1版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3.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母亲以88岁高龄

在2009年8月31日走完她苦乐参半的人生，

我赶不及让她好好地看一遍《追虹》，

是我此生不可弥补的最大遗憾……

目录

1. 落第的武秀才 …………… 1
2. 潮州城瘟疫 ……………… 11
3. 扎根赤道 ………………… 21
4. 白手起家 ………………… 29
5. 城南旧事 ………………… 37
6. 落叶归根 ………………… 47
7. 叛逆少女 ………………… 55
8. 文艺救国 ………………… 63
9. 新中国剧团 ……………… 71
10. 新马沦陷 ……………… 81
11. 铁蹄下的边佳兰 ……… 91
12. 逃亡苏门答腊 ………… 101
13. 缘系狮城 ……………… 111
14. 《南侨日报》 ………… 121
15. 燃烧岁月 ……………… 135
16. 驱逐出境 ……………… 149
17. 归国华侨 ……………… 161
18. 三剑客 ………………… 173
19. 王大人胡同 …………… 183
20. 毛主席的好孩子 ……… 195
21. 申请枪毙 ……………… 205
22. 引蛇出洞 ……………… 213
23. 北大荒噩梦 …………… 225
24. 大跃进 ………………… 241
25. 天门一边开 …………… 251
26. 向命运说不 …………… 257
27. 罗湖桥惊魂 …………… 265
28. 回巢 …………………… 275
29. “文革”·平反 ……… 287
30. 一封迟来的信 ………… 299
31. 重返北大荒 …………… 307
32. 后记 …………………… 319
附录
编年表 ……………………… 330
主要参考书籍 ……………… 332
刘氏家系图 ………………… 333
朱氏家系图 ………………… 334

1

落第的武秀才

那考官对刘正彬刚才的演出其实十分满意，再看看他高大威猛，一身铜筋铁骨，天生就是一块习武的材料，觉得让他出局很可惜。于是说：我再给你三支箭，只要有一箭射中就过关……

我曾外祖父那一箭要是射中了红心，就没有了今天这个故事。

公元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秋天。

中国广东省潮州城城南，一个专供人比武的校场外，许多脑后拖着一根辫子的年轻男子，站着的、蹲着的、或踱着方步的，都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目光不时投向校场紧闭的大门，等待着有人出来，高喊自己的名字。

校场里正进行着武秀才的考试。谁要是考上了，就算是有了功名，有了功名就有相应的官方优惠。以武秀才来说，可以见官不跪，少缴一些苛捐杂税。在那一群身强体壮浑身肌肉的小伙子当中，有一个浓眉大眼皮肤



曾外祖父刘正彬

意溪镇桂坑乡口



桂坑村刘家老屋

黝黑的高个子。他，就是我的曾外祖父刘正彬。

刘正彬，又名刘杏初，中国广东省潮安县意溪镇河内桂坑乡人。桂坑乡在潮州城的东北面，出了潮州城东城门过了韩江还得走两铺路[1]。桂坑乡口有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叫坪溪，溪上总游弋着几群浑身雪白的鸭子。溪中横七竖八地躺了些大石块，铺就一道过溪的桥。村口所在的溪岸边长满了枇杷、龙眼、荔枝和莲雾树。黑瓦灰墙的民宅，稀稀落落地点缀在一片浓郁的树荫里。桂坑乡附近平地不多，四面环绕着四五百米高的山丘。乡里只有几十户人家，以刘姓为主。乡里人平时忙于耕种，若非什么大事难得到府城去一趟。府城，是潮州城的别称，也就是今天的潮州市湘桥区。

刘正彬家里贫穷，父母替人种田过日子。他在家排行老大，底下还有两个弟弟，一家五口挤在一个只有一个小天井和两间小房的老厝里。刘正彬自小不务正业，喜欢在外游荡，是个名副其实的小混混，不得父母的疼

爱。不过，刘正彬喜欢耍枪弄剑，练武倒是练得挺认真的。

长大之后，刘正彬在乡间替人家打杂种田，凭着敏捷的身手和习武的底子，哪里有打架追债的事都少不了他一份。刘正彬早听说有考武秀才这么一回事，却始终没把它放在心上。这一年，刘正彬已经二十七八岁，娶了媳妇有了两个年幼的儿子。由于韩江时常泛滥淹没稻田，乡下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他突然想试试自己的运气去考武秀才。他想，试试看吧，要是能考上武秀才，说不定能在府城里谋个一差半职。

刘正彬从桂坑乡下到府城去赶考时，信心十足满怀希望，一心只想着一举及第光耀门楣。

中国的科举制度是朝廷选拔各级文官的考试制度，始于隋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一直延续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维持了一千三百多年。

文科举制度实施了近一百年，到了唐朝的女皇帝武则天时，又开创了选拔武将的武科举制度。武举考试经过唐、宋、明几个朝代的逐步修改和规范，到清朝时，考试内容包括了外场和内场两部分。外场一般考马上箭法、步射、拉硬弓、舞大刀和举重石。内场考试一般是根据兵书和经典著作出的问答题和论文题。

武科举与文科举的晋级步骤相似。武生先参加在县、府举行的童试，考中者为武秀才；接着参加在省城举行的乡试，考中者为武举人；武举人可以到京城参加

会试，考中者为武进士。

最后一关是殿试或者称廷试，经考试把新科武进士分成三个等级，称为“三甲”，一般由皇帝亲自主考。一甲是前三名，头名是武状元，第二名是武榜眼，第三名是武探花。二甲有十多名，二甲以下的都属三甲。过后，各级武进士被朝廷授予官职。清朝时，武进士近半成为军队里带兵的官，另一半成为皇帝的宫廷侍卫。

在中国历史上，武科举一共进行过大约五百次。相对于文科举，武科举较不受重视。尽管历史上许多骁勇善战的将军很少出身自武举考试，而许多中举的人，也并不热衷于到朝廷的军队里去带兵打仗，但是，每三年一次的武举考试，还是吸引了无数的年轻人前赴考场，即使是最初级的武秀才考试也不例外。

轮到刘正彬上场了。

首先是舞双刀，刘正彬舞得很好。接下来是舞长枪，刘正彬舞得更出色。到射箭的时候了，考官给了他三支箭，说三箭都必须射中红心才及格。刘正彬抹了抹脸上的汗水，吸了口气，让自己定下神来。

刘正彬拉满了弓，射出第一箭。“嗖”的一声，箭射中了红心。

第二箭，如愿以偿，又射中了！刘正彬喘了一口气，脑子里闪过一丝胜利在望的喜悦。只要这场外场考试及格，这武秀才可以说就考上了。虽说还有一场考学问的内场考试，但多年以来，由于参加武举的考生绝大

多数没读过多少书，考题也就变得越来越容易。到了刘正彬赶考这年，他听说到时就是考官问问几个关于兵法对策的简单问题，容易得很。

刘正彬拉开弓，第三箭射出。射偏了！他想，这下可惨了！

那考官对刘正彬刚才的演出其实十分满意，再看看他高大威猛，一身铜筋铁骨，天生就是一块习武的材料，觉得让他出局很可惜。于是说：我再给你三支箭，只要有一箭射中就过关。

刘正彬想不到考官如此仁慈，竟破例再给他三个机会，连声道谢！

刘正彬集中精神，射出第一箭，不中！

第二箭，还是不中！

第三箭，又射歪了！

考官面无表情地摆了摆手，叫刘正彬出去。刘正彬离开教场时，只觉得万箭穿心，羞愧得只想找个地洞钻进去。

刘正彬的武秀才梦落了个空。回到乡里，万念俱灰，觉得乡里的刘姓族人更看不起他了。原来，刘姓老祖宗五百多年前来到桂坑乡落户，生了三个儿子，后来，大房二房人丁稀少，三房却开枝散叶人丁兴旺，逐渐形成大房二房是朴房，也就是弱房，而三房是强房的形势。强房仗着人多势众常常欺负朴房，朴房的人连在田边种一点菜，强房的人都可以公然挖去吃，朴房的人

也不敢去讨个公道。刘正彬一家属于大房，朴房。

刘正彬思前想后，觉得没有颜面再在家乡呆下去，于是萌起了过番去南洋的念头。

中国广东省的潮州人跟南洋的关系源远而流长。

他们早在元朝（1276—1368）就懂得从事海上商贩活动，把中国的茶叶、陶瓷器和丝绸等卖到东南亚一带。清朝雍正皇帝即位后（1723 年），船头皆涂上红色的潮商“红头船商帮”逐渐形成，他们“来往东西洋，经营南北行”[2]。由于敢于冒险和具有诚信经营的商人品格，潮商逐渐在其他籍贯的商人中脱颖而出，足迹遍及东南亚，长期掌控着“汕（头）、香（港）、暹（泰国）、叻（新加坡）国际贸易圈”，形成以泰国为中心的近代潮人商帮。

刘正彬听说过一些穷途潦倒的潮籍浪子，没钱买船票，偷偷躲进红头船过番到南洋找生活的故事。他听说刚到南洋的新客生活很苦，多数靠出卖体力替人开荒开港为生，有人因水土不服或操劳过度而客死他乡。不过，他也听说过了番要赚一口饭吃似乎不太难，运气好的还能不时寄钱回家，买田买地。当然有个别特别有本事的，赚了大钱衣锦还乡，回到老家建大房子大祠堂的。

刘正彬算来算去，过番再苦，也有一线翻身的希望，大不了赔上烂命一条。主意一打定，刘正彬顾不了家里的妻小，托人弄了一张半价的船票，经过海上二十

几天的颠簸，就到新加坡来了。

刘正彬在新加坡并没有亲戚朋友，在一家小客栈住下后，却一直找不到工作。据刘正彬的孙子刘熙成说，那时候，刚来到新加坡的福建人，一般可以先投靠福建人的会馆。会馆有地方让新客栖身，有些还发一点零用钱，让新客买件衣服或剃个头。刘正彬没找到这样慷慨的潮州人宗乡会馆，没几天，他身上仅有的一点钱用光了。

一天，刘正彬正为工作发愁，有人问他要不要去一个叫边佳兰（Pengerang）的地方找工作，刘正彬一口就答应了。边佳兰在马来亚半岛柔佛州的东南角，跟新加坡只有一水之隔。如今，从新加坡到边佳兰，若走陆路就得经过柔佛州的哥打丁宜（Kota Tinggi），路途比较远；走水路从樟宜码头出发，十二个座位的小电船朝

边佳兰简图





曾外祖母蔡清娥

东驶去，经过德光岛，大约三刻钟就到了。

那时，边佳兰一带零零散散的有几个甘榜（村落），还有一些马来人散居在海边以捕鱼为生。刘正彬开始在那里替人家开芭、打杂，赚一口饭吃。不久，他攒了一点钱，又借了一点钱，就在边佳兰一个叫二湾的地方的海边买了一小块地，搭了间亚答屋，做起小买卖来。

刘正彬向附近的马来人收购他们从海上捕回来的鱼虾，然后挑了担子到甘榜里去卖。他的小店里除了卖杂货，也卖"罗惹"（Rojak），这种用好几样水果，如黄梨（即菠萝）、沙葛、黄瓜、虾头酱、花生碎，和着阿叁[3]水拌成的沙拉，直到今天都是一道美味的健康食品。

这段时期，据后来刘正彬跟子孙们说，他同一个叫惹惹的马来女人同居。这个女人颇有几分姿色，她知道

刘正彬在唐山有老婆，也不计较名分，过一天算一天。刘正彬后来还染上了鸦片瘾，喜欢抽一种廉价的鸦片。刘正彬更爱喝酒，有两个钱的时候，他会宠宠自己，喝三星牌的洋酒。

刘正彬总算没忘记老家的父母和妻儿，他久不久就给桂坑乡老家寄点钱去，算是尽了自己的本分。可是，刘正彬在南洋有了女人的事，不知怎么的，让来来去去的水客[4] 传到了老家，他的老婆，也就是我的曾外祖母蔡清娥知道了，气坏了，就不断托人写信要求丈夫把她接来马来亚。刘正彬一直把这件事拖着，说还没赚到钱，再等一两年，再等一两年。

终于，蔡清娥带着十二岁的二儿子刘振标，也就是我的外公，过番来了。那是 1909 年，刘正彬已经离家整整十年。

［注］

1 一铺路：约为 5 公里。

2 南北行：最初是指香港转运国内长江以南及华北两线货物的商号，及后营业范围扩充至东南亚、欧美等地。至于商品方面，包括参茸、药材、海味、椰油、糖、米、树胶及生粉等。

3 阿叁：南洋一带一种名为 tamarind 的树，其果实呈豆荚状，果肉极酸，去籽的果肉加工后做成块状，为烹饪用调料。

4 水客：乘船往来于中国沿海与南洋各地的商贩。

2

潮州城瘟疫

潮州城里当时有两万多人口，那年农历三、四、五这三个月里，一下子死了近一千人。据说，当时城里的棺材多得抬不完，后来，连抬棺材的人都受到传染，一个接一个倒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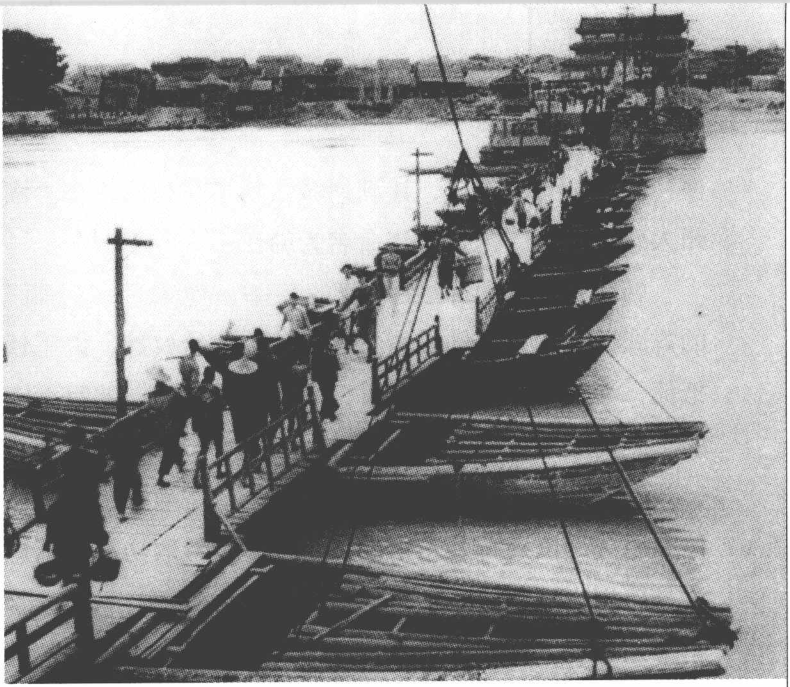
公元1911年，清宣统三年。在中国农历的干支纪年法中，1911年为辛亥年，这是中国历史上不会被忘记的一年。

这一年的10月10日，在湖北省武昌市爆发的反清起义成功，接着其他各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在之前发动过不下十次反清起义的孙中山结束海外流亡，回返中国。当年12月29日，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隔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清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于1912年2月12日退位，结束了满清对中国长达268年的统治。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带领中国走向民族自救，在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道路上，磕磕碰碰，屡败屡战。辛亥革命究竟算是成功还是失败，且由后人评说。但无论如何，1911年之后，统治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帝制宣告灭亡。两百多年来，中国男人脑后拖着的长长辫子被剪掉了。这一年，是值得中国人庆祝的一年。

然而，对中国广东省东边的文化古城潮州城来说，1911年是悲伤的一年。

潮州之所以被称为文化古城，一来，它历史悠久，在东晋咸和六年（公元331年）已经建制，叫海阳县，至今已有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二来，它的文化气息特别浓厚，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唐朝元和年间的刑部侍郎韩愈。



潮州湘子桥

公元819年，韩愈因向唐宪宗上呈了一篇反对狂热崇佛的《论佛骨表》，得罪了皇上，被贬到潮州当刺史。古代官员冒犯了皇上，除了职务连降多级之外，罪越大的，贬得越远。潮州距长安三千多华里，可见韩愈上书，确实是曾让皇帝龙颜大怒。当时，年过五十的韩愈虽然在潮州只待了短短的8个月，却为潮州人民做了几件大事。

流经潮州城旁的广东第二大河原来叫鳄江，韩愈来潮州之前，就知道潮州一带有鳄鱼危害百姓，而且“鳄鱼大于船”。因此他到潮州的第一件事，就是要铲除鳄鱼。韩愈借助“祭鳄”的形式，开展声势浩大的除鳄总动员，又组织了一批捕鳄能手，射杀驱赶鳄鱼，

使鳄江逐渐有了生机，让潮州城恢复了往日的繁华。潮州人感激之余，把这条江命名为韩江。

韩愈还开创了释放奴婢的善举，他采用“计庸”的方式，使拥有奴婢的债主必须计工钱给奴婢，以工钱抵债，当工钱和债款相当时，奴婢便须放归；差距太大的，则由官府出钱赎身。

韩愈到潮州不久，发现州学，也就是地方教育机构停办已久，以致百余年来没几个人赴京考取功名。韩愈于是启用当地一位进士赵德，委任他为海阳县尉，掌管军事兼主持州学。因此，虽然唐代的潮州只有 3 名进士，到了宋代，已跃升至 172 名。明清两代，潮州的进士、举人更是数不胜数，仅明嘉靖一朝，潮州府考中举人的就有 218 名、进士 145 名。

地方的读书风气盛，考取功名的人多了，当官的人也自然多起来。潮州明清两朝官宦人家的房子，多集中在古城区太平路西边的十条巷子里。这十条巷为酋巷、灶巷、义井巷、兴宁巷、甲第巷、家伙巷、石牌巷、辜厝巷、郑厝巷和庵巷。在这里，随处可见象征着当年屋主地位的门匾题字。祖先或本人当过官或考中科名的，门匾上写着“将军第”、“太史第”、“大夫第”、“骑尉第”、“观察第”、“通奉第”、“资政第”、“方伯第”、“进士第”、“探花第”、“解元第”等等；家族人才辈出，代代出有作为有文化的人才的，门匾上则写“儒林第”。



太平路上的牌坊（摄于2009年）

明清两朝，太平路上先后还建了四十多座石牌坊，有些是朝廷为表彰潮州官吏而立，有些则是当了官的族人为纪念先辈而立。50年代初，这些象征潮州丰富人文内涵的牌坊全被拆毁，直到2006年才重新修复。

1911年，这个有一千六百多年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古城，发生了一场大鼠疫。这场烈性的鼠疫迅速地蔓延开来，受到传染的人先是发烧、头疼，然后咳痰、咳血，两三天就死了。潮州城里当时有两万多人口，那年农历三、四、五这三个月里，一下子死了近一千人。据说，当时城里的棺材多得抬不完，后来，连抬棺材的人都受到传染，一个接一个倒下。当这场瘟疫肆无忌惮地摧残着这座文化古城时，住在城内兴宁巷和义井巷五间大宅里的朱氏族人也没能幸免。那年农历四月的短短11天里，原已人丁单薄的朱氏五房，竟死了三个人。

追溯起来，潮州朱氏的第一代朱山澄，大约是两百

多年前从福建莆田迁徙到广东澄海，再来到广东潮州城，落足于城里的兴宁巷，经营染布生意。当时兴宁巷里已经有了徐、丁、杨三大家族。朱氏初到时常被人欺负，后来，朱家有一个女儿嫁给了杨家，日子才比较好过。这故事听起来，让人想起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给吐蕃的领袖松赞干布一样，唐朝与西藏结为亲家，关系自然就融洽起来。以嫁女儿来睦邻和亲，原来是老祖宗智慧的累积。

朱山澄有好几个儿子，其中一个叫朱云如的把父亲的事业发扬光大，在府城东城门附近开了间“朱坤记”染布庄。据说，“朱坤记”生产的夏布质量特别好，细滑得可以做贡品。直到现在，我的堂姐们还记得几句早年流传在城里的顺口溜：“潮州朱坤记，枫溪柯成记，省城陈李济。”枫溪区离潮州市不远，柯成记当时是以生产瓷器闻名遐迩。省城指的是广州，陈李济一直到近代都是有名的药厂。

随着朱坤记染坊的生意日渐兴隆，朱云如开始在兴宁巷附近购置房产，扩张地盘。他先后买下了兴宁巷18号，20号和22号三间相连的大宅，以及面对着义井巷的两间大宅。

朱云如有七个男丁，其中排行第五的朱少云最杰出，曾经是个“三才贡”。这是一个相当于今日的绅士的半官方头衔，三才指的是才学、相貌和品德，也就是说朱少云不但满腹诗书，品格高尚，同时高大俊朗风度

翩翩。朱少云后来出任清朝的户部主政，又叫“观察”。

中国各个朝代，一般设有吏、户、礼、兵、刑、工六个部来管理百姓，户部管理户籍和财政，相当于现代的内政部加上财政部。户部主政大约是一个相当于今日公安局长和税务官的地方官吏。

据代代相传下来的口述历史，朱少云当官时，是个一丝不苟两袖清风的清官，既不会敛财聚富，也没有三妻四妾。他给子孙留下的只是兴宁巷 20 号大门门楼上方的门匾“观察第”三个字，以及一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还悬挂在 20 号大门上的两盏大红灯笼，一盏写着“户部主政”，一盏写着“朱”。

同一个时候，朱少云的三哥也曾在江西景德镇当过官，显示朱家第三代颇有几个人才。60 年代文化大革命时，兴宁巷 20 号大门上的“观察第”三个字被人销

兴宁巷 18 号朱家老宅



毁，朱家祖先曾经一度辉煌的痕迹，也就此消失了。

朱家接下来两代没有出过更显赫的人物，实际上，到了第五代，也就是1880年左右，已经是家道中落，生活十分困苦。这时候，朱家的子孙们都分了家。五间老厝虽然屹立不倒，里面的一座座院落，一个个大厅，和一道道廊道，在展现它昔日大家族气派的同时，也呈现出岁月的沧桑和破落。散住在里头的这一房或那一房的朱氏族人，各自忙碌着自己的生计，许多都互不往来，有的见了面，连招呼都懒得打了。

1911年的那场鼠疫，朱家五房死去的是一位寡母和她的两个儿子，老大朱禹涛和老二朱静峰。朱静峰也就是我的祖父，死时只有三十出头。瘟疫过后，五房的成人只剩下了大媳妇、二媳妇，和一个侥幸没染上鼠疫的三儿子朱荫卿。二媳妇林纯妙，也就是我的祖母，当时才31岁，有一个八岁的儿子朱其灿和五个月的身孕。

祖父朱静峰生前是一个店员，他和他的哥哥突然间染上鼠疫撒手西归，一没留下田产，二没留下生意，我祖母和她的大嫂顿失依靠。可我祖母倒不担忧往后的日子，还安慰她那只有一个女儿的大嫂说，要是我腹中的孩子出世是男的，我的大儿子就过继给你。生性乐观开朗的祖母，在瘟疫蔓延丧事连连的当儿，还为她的妯娌着想，惦念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我祖母林纯妙出身自一个书香世家，她的父亲是个穷秀才。祖母个子高大，面目清秀，虽然自小缠了双小

脚，但是行动敏捷，思想开通，很有男子气概。据说，祖母小时候在娘家，有一年冬天天气寒冷，到处结冰结霜，她爬上屋顶去玩，滑溜溜的屋顶让她上得去下不来，就在上面大喊大叫。家里人怕她冻坏了，丢了件棉袄给她穿，后来才叫两个大汉上去把她背下来。

潮州一带冬天一般并不寒冷，难得结霜下雪。根据尧宗颐教授所编的记录潮州地方历史大事的“潮州志”，清光绪十三年，也就是1887年冬天，潮州一带的确下过一尺多的大雪，隔年二月还下过大冰雹。我祖母顽皮爬屋顶的壮举，看来是确有此事。

我祖母长大嫁入朱家之后，有时看到子孙们爬上屋顶玩，不但不叫他们下来，还叫他们爬高一点。1958年我在潮州那一年，目睹了当时78岁高龄、面目慈祥缠着小脚的祖母，拿着梯子，稳步爬上屋顶采丝瓜的英姿。

我祖母虽然来自一个秀才家庭，但是她没读过书。她诞生于1880年，离清朝灭亡还有三十多年，是一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可是，祖母的算术很好，当时市面上的度量衡制度很乱，有什么司马秤、市秤、老秤，但祖母换算得很快，买东西时常把数目字挂在嘴上。当时的老秤并非十进制，一斤有十六两，买东西时摊主说一斤多少钱，顾客要马上算出几斤几两的价格还真的不太容易。

1911年潮州那一场大瘟疫夺走了我曾祖母和她两



祖母林纯妙

个儿子的命之后，起初，朱家五房唯一幸免于难的老三在生活上资助两位不幸的嫂嫂。但不久，老三打工的米铺倒闭了，就离家前往新加坡自食其力，也就顾不了别人了。我祖母于是开始帮人家洗衣，做针线活儿，或替族人做厨务来维持生计。

那年农历八月，祖母产下了遗腹子，取名其焯，也就是我的父亲。算起来，我父亲是潮州朱氏的第六代。在哺育自己孩子的同时，祖母也给别人当奶妈，潮州话叫“哺乳旁”。据堂姐们说，祖母一边乳房喂哺父亲，一边乳房喂哺另一个朱姓的孩子。那孩子有奶吃，祖母也有一点微薄的收入。

当然，祖母实现了她的承诺，立即把大儿子其灿过继给她的大嫂。

直到如今，我的堂哥堂姐们，也就是我伯伯朱其灿的孩子们，称自己的亲祖母为“阿婆”，这是一般潮州人对高龄老太太的称呼，而称呼他们的老姆，也就是老伯母为祖母，潮州话为“阿嬷”，那可是孙子对亲祖母的称呼。

3

扎根赤道

从开荒、烧芭、整地，到种下树种，外公外婆和曾外祖母靠着双手和简单的工具，种出了一片片排列整齐的树胶林……

1909年，我的曾外祖母蔡清娥带着12岁的二儿子刘振标过番来时，她的大儿子刘振荣并没有跟着来，因为二儿子从小比较聪明伶俐，比较得父母的疼爱。这也许印证了一句潮州老话，那就是：公嬷惜大孙，父母惜尾子。

蔡清娥个子矮矮小小，刘正彬高高大大，两个人外表上成强烈对照。但是蔡清娥性格刚毅，持家严谨，很能吃苦，在丈夫面前绝不是弱者。到了边佳兰之后，曾外祖母除了料理家务，也帮忙做生意。她常常削了一大堆黄梨，叫儿子拿到甘榜里去卖。她那懂事的二儿子于是把黄梨盛在一个藤篮子里，把篮子顶在头上，就到处叫卖去了。刘振标因此有了个外号，叫"黄梨弟"。

曾外祖母的到来给这个南洋的家带来了生气，渐渐地，她担起了杂货店里的主要工作，掌握了持家的大权。曾外祖父除了帮忙做点生意，也找人建了个奎笼（Kelong），天天下海划着舢舨去收鱼虾。

奎笼是南洋一带常见的一种建在浅海里的捕鱼设置。主体是高出海面的一方木板平台和一间小木屋，木屋旁顺着海水涨退的方向，插着两排每根长约20米的木桩，木桩最底下6米打入海底。木桩之间有横木以藤条绑牢。两排木桩呈喇叭形张开，木桩上系上渔网，鱼虾在涨潮时游入奎笼范围，退潮时就被困在特设的网里，出不去了。捕鱼人的工作，就是在潮落时前往拉网收网，一天可收获两次。



边佳兰的捕鱼人与奎笼（朱华华摄于20世纪60年代）

当时，杂货店生意慢慢扩展，奎笼每天的收获也颇为丰富，刘家的生活渐渐地好起来。可是，为了曾外祖父吃鸦片和喝酒的事，老两口常常吵架，而且吵得很凶。曾外祖父抽的其实并不是真正的鸦片，而是鸦片膏，俗称鸦片屎。鸦片屎是一罐一罐卖的，价钱比鸦片便宜，是一般比较穷的人和浪子抽的，抽多了会伤身。

曾外祖父被老婆吵得没办法，决定自己戒鸦片。那时戒鸦片很不容易，没有药物或其他的替代品吃。曾外祖父把自己关在一间小亚答屋里，叫人把他的手脚牢牢的绑在床板上，吩咐人家不要给他东西吃。他直挺挺地躺在那里，不断地呻吟、哀叫，就是没人理他。曾外祖

父已经下了狠心，如果鸦片戒不掉，死了也算了。几天后，曾外祖父没死，鸦片瘾竟然戒掉了。

刘家两老带着个儿子克勤克俭地过日子，跟马来人往来多了，也学会了说马来话。他们要是攒积了三两百块钱，就会向马来人买地。因为许多人到小杂货店买东西都喜欢赊账，有时，马来顾客欠的钱太多了，曾外祖母就会跟他们商量，再给对方若干钱，买下他们的一小片椰园。

我那有个“黄梨弟”外号的外公，没过番时在家乡读过一点书，上过六个月的学堂，到了边佳兰就帮着父母做生意，没机会读书。不过，外公人甚聪明，他勤学苦读，练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信也写得很通顺，每天晚上还用毛笔记账、抄账。直到今天，边佳兰老宅上厅的神台上面，还贴着外公当年写的大大的“神”字。



外公刘振标



外婆蔡春娇

成年后的外公，身材不高但健壮结实，国字脸上单眼皮的双眼炯炯有神，双耳大而长，会看相的人说他很福相。他常常剪一个平头，不苟言笑，给人一种精明干练的感觉。外公18岁那年，也就是1915年，跟着母亲回唐山老家娶亲。这门亲事是老早就订下的，对方是他母亲老家潮安县意溪镇埔东乡的舅舅



潮安县意溪镇浦东村蔡氏祠堂

的女儿，叫蔡春娇，还比我外公大几个月。

蔡春娇年轻时有一张清秀的瓜子脸，深深的双眼皮下，是一对略带忧郁的双眼，下唇微微突出，身材瘦削，有点弱不禁风的样子。

这时候，曾外祖父在南洋算是有了一点家业，常常寄钱回老家。他那留在家乡的大儿子刘振荣也已经成了家。曾外祖母携幼子回乡娶媳妇，即使算不上衣锦荣归光宗耀祖，也使刘正彬这一房所谓的朴房，最被人欺负的一房，得以扬眉吐气，在亲朋戚友之间抬起头来。这又应验了一句潮州老话：家无浪荡子，富从何处来？

我外公、外婆结婚之前，新马一带除了海产之外，还出产椰子和甘蜜（Gambier）。甘蜜是一种攀爬植物，叶子收成后，可熬煮成黄色胶状物，风干了以后可以做鞣剂以及药用的收敛剂。

那一阵子，大量种植树胶的技术刚刚从南美洲的巴西，由英国人带入他们的殖民地，包括印度、锡兰、马

来亚和印尼。有一个日本资金的大园丘，开始在边佳兰一带大事进军这种新兴的经济作物。我外公婚后，与新婚妻子和母亲回到边佳兰，去向附近的大园丘要了一些树胶种子，三个人搬到离海边较远的山上，建了间简单的木板屋，开荒种起树胶来。那片芭地的山脚下有一道泉水，长年涓涓不息，清凉彻骨，附近人家都靠这条溪水过活。

这期间，边佳兰头湾有一位姓张的老人家，年事已高无妻无子，临终前把自己在附近经营多年的一片地送给了外公外婆。俗话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从那一年起，每逢清明时节和农历七月十五，外公都要率领全家大小，带上水果三牲和香烛银纸，上山祭拜这位非亲非故而又有恩于刘家的老人。

从开荒、烧芭、整地，到种下树种，外公外婆和曾外祖母靠着双手和简单的工具，种出了一片片排列整齐的树胶林。树胶树需要五六年的时间成长，之后才有收成。开始割胶时，由于怕虫咬蚊叮，他们三人把自己先武装起来，穿上长裤长袖衣，头戴草帽加上布围巾，密密实实地包住脸颊和脖子。他们每天凌晨三四点开工，先在树皮上割出一圈圈斜斜的小沟，让乳白色的胶汁顺势流向系在树沟末端的小陶碗。每天清晨收集了胶汁，再经过几道工序，把它做成生胶块。

当时，树胶醋之类的东西还没出现，割胶人是靠椰水来让胶汁发酵凝固，然后用玻璃瓶压成一片片巴掌大

圆形约一寸厚的生胶。生胶运出来新加坡卖，每担能卖一百多元，一户人家每个月如果割两三百斤胶，就有好几百元的收入。

20 年代在马来亚，一个普通店员的月薪是十六七元；一个从中国大学毕业在中学教书的老师，月薪也不过五十元上下，因此刘家一个月有三四百元的收入，的确是利润丰厚，衣食无忧了。

割胶的人一天最忙的时候是天还没亮一直到午后，外公每天料理完了山上胶园的事，总得到海边的杂货店帮忙他父亲做生意，天快黑了才回自己的家。有一天，在回家的路上经过一处丛林，两旁都是比人还高的莽草，外公低着头走路，猛一抬头，一只老虎面对着他，两眼闪着青光。近距离面对着这么一只大老虎，外公吓坏了。幸好，他神智还挺清楚，口中不停地念道：大伯公，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大伯公……外公嘴里正念叨着，突然想起不知道什么时候曾有人跟他提起过，说老虎的眼睛是直视的，不会转弯。

外公一边继续念着：大伯公，你走你的路，一边慢慢地挪动身子躲到一棵大树后面。说也奇怪，那老虎见不到人影，竟然转身走了。我外公跌跌撞撞地回到家，心跳加速，脸青唇白，搞不清是如何拣回了一条命。这个故事一代一代地传到了我们这一代。

我外公外婆的第一个孩子生于 1917 年，是个女儿，叫刘婵卿，也就是我的大姨。同一年，曾外祖父和曾外

祖母也添了一个小女儿，取名玩香。两代人同时弄瓦，双喜临门。两个娃娃虽然一样大，可是辈分不同，我大姨得叫那个与她一样大的女孩做姑姑。后来，其他晚辈都叫她“姑仔”。

外公外婆的第二胎是个男孩。老一辈的人重男轻女，外公得了个儿子高兴极了。不幸，那男孩几个月大时，外婆要到屋外去干活，叫三岁大的大女儿摇着睡在纱笼里的弟弟。过了一会儿，屋子里闯进一只“毛桑”（musang），也就是样子有点像狐狸的果子狸。大姨吓得大叫起来，这一叫，惊吓了弟弟，那孩子大哭大叫之后发了好几天高烧。在那个年代，孩子病了，父母只会弄点草药给他吃，家里没有成药，山芭里也没有医生。没几天，那男孩就一命呜呼了。

1921 年，我外公外婆的第二个活下来的孩子出世，又是个女孩。取名丽娴，她，就是我的母亲。

4

白手起家

1926年，有同村的好事者劝外公纳妾，介绍了一位刚从唐山随家人过番来的15岁姓庄名银音的姑娘。据说，外公在点头同意之前曾“出坡”去相亲，也就是乘船到新加坡见了对方……

外婆生下我母亲之后，接着又生了好几个孩子。由于她身体本来就单薄虚弱，孩子往往先天不足，加上山芭里医药设施落后，孩子如果有什么病痛，只会求助于草药，结果孩子的存活率很低，几乎是生两个只活一个。

1925 年，刘家第一个活下来的男孩出世，取名熙成。二舅熙成自小体弱多病，右眼染上眼疾，也就是眼球不能转动自如，那时候一般人都说这是“疳积”，也就是肚子里有蛔虫所致。外公外婆不知道这病可以医，就听其自然，让这毛病跟随了成舅一辈子。

随着孩子一个接一个出世，刘家树胶园的面积渐渐地扩大，外公于是请了几个当地的马来人来帮忙割胶，自己不用再起早摸黑。不久，一家人都搬到二湾甘榜附近离海边不远的一片椰园里，建了几间亚答屋，挖了几口水井住下。二湾老家的水井，可能是离海太近的缘故，汲上来的水是褐色的，就像浓茶一样。外公怕褐水喝多了对身体不好，交待家人用井水梳洗浇菜，喝的水则安排人到离海较远的井去挑回来。

每天从胶园里收集的胶汁，都由胶工们骑自行车载到家里，然后在一个锌板屋顶的简单工棚里加工。胶工们用固定在地上的手摇绞压机，把已经凝固了的雪白胶块反复绞成胶片，每片大约半米宽一米长，这比当初用玻璃瓶来碾压快多了。过后，胶片晾晒在一根根捆绑于椰树间的长长的钢线上，把钢线都压弯了。远远望去，



边佳兰老家

就像一行行的白旗，只是不会迎风飘扬。

不久，外公到处拜师，学会了熏树胶的技术。他在住家的旁边，叫人搭建了一座约有两层楼高的锌板顶木板屋，屋子底层有一个可以烧木材和椰壳的水泥大灶，旁边还有些水槽以便冷却过热的炉火。木屋里密密麻麻地架起一排排的细木棍，就像是满屋子架满了晾衣服的竹竿。

生胶片屯集到一定的数量，外公会发动家里所有的劳动力，十几个人一起把生胶片用井水刷洗干净，然后一片片晾到熏房的木棍上。之后是生火熏胶片，一般七八天就可以把生胶熏成棕褐色的熟胶。熏树胶最重要的是火候的拿捏，要有专人伺候日夜烧柴的大灶。火候不够，胶片不熟，通透度不够；火势太猛，整间熏房可能毁于一旦。当然，熏过的胶片，价钱要比生胶片好得多。

外公后来也学会生产椰干。椰干作坊在住家的另一



老家树胶栈房

边，是一个有长方形屋顶，四周没墙壁的大棚。地面上用水泥建起一个面积比屋顶略小，有一人多高的大灶，大灶顶端铺以粗铁丝网。

专门剥椰子的工人用一支带长柄的利刀，刀尖朝上

剥椰制椰干



插在地上，然后十分利索地把椰子在刀尖上拨弄几下，剥去椰子的纤维外皮。再把椰子砍成两半，去壳，取出椰肉，然后扔到大灶上。灶上面的人把一个个碗形的椰肉倒扣在铁丝网上。之后生火，用小火熏上几天，椰肉就成为椰干了。椰干可以提炼椰油，是制造肥皂的好原料。

另一方面，曾外祖父掌管的奎笼，那时候总有不错的收获。鱼虾捕得多时，大鱼大虾挑出来运到新加坡的市场上去卖，小小的鱼苗虾苗就倒入一个大灶，煮熟了用来喂养家里的猪、鸡、鹅、鸭。自己家饭桌上吃的，都是卖不到什么好价钱的小鱼小虾。

刘正彬的大儿子刘振荣，也就是我外公唯一的哥哥，在 1925 年前后带着老婆和两个孩子从桂坑老家来到边佳兰，加入南洋的劳动队伍。在外公的领导下，刘氏家人连同好几位来自唐山老家的远房亲戚，加上在当地聘请的几个长工，每天的生活都围绕着树胶、椰干、奎笼，和一大群牲口转。后来，奎笼多建了几个，牲口也越养越多。椰园里的几间亚答屋，既是轻工业作坊，又是农场、渔场，日子过得忙忙碌碌。很快的，外公成了边佳兰一带数一数二的殷实商人。

这时候，外公外婆膝下只有两女一男，随着事业的扩展，家里显得有点人丁单薄。另一方面，刘家在潮州老家属于被人欺负的朴房的故事，被一代一代地传递下来。外公心里很不服气。哼，什么强房、朴房，你们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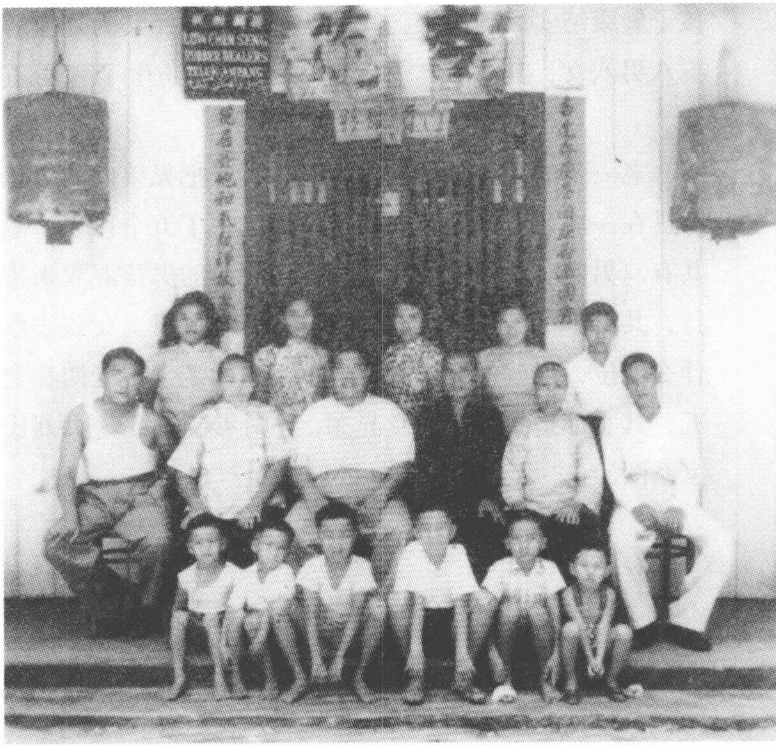
道不就因为你们男丁多嘛！外公心里开始有了自己也可以强起来的念头。

1926年，有同村的好事者劝外公纳妾，介绍了一位刚从唐山随家人过番来的15岁姓庄名银音的姑娘。据说，外公在点头同意之前曾“出坡”去相亲，也就是乘船到新加坡见了对方。这姑娘长相一般，但年纪很轻，身体健壮，臀部也够大。这一点，老一辈的人都很在乎，他们相信女人臀部大，生产时才能顺顺利利。

当时外公已经接过了掌门的棒子，爱喝酒的曾外祖父和娇小能干的曾外祖母都自认老了，凡事退居二线。外公纳妾的主意打定了，也用不着征求谁的同意，如果真的要表示一点民主的话，那就是禀告刘家上一任掌门人，我的曾外祖母。对这个能进一步开枝散叶，为刘家多添男丁的主张，曾外祖母毫无异议。

有一天，外公跟他那三个还不太懂事、脸上还拖着鼻涕的孩子们说：“阿爸要娶个阿姨来帮忙做家务。”他也对我那性格跟身体一样柔弱的外婆说：“我要找个人来为你捶背。”小孩子们可能不知道两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即使知道，也无权过问。我的外婆自然是心里不好受，可也没敢说什么。

二外婆庄银音入门之后，沉默寡言手脚勤快，过年过节时会帮助家婆做各种各样的传统潮州糕米果，诸如甜米果、唛咯包、红饭桃、糍壳米果，都做得十分专业，很得外公的欢心。嫁到刘家的第五个年头，二外婆



刘家影于 1954 年。中排左起：成舅、二外婆、外公、老伯、外婆、三姨丈黄俊瑞；后排左起：四姨丽梅、六姨丽华、五姨丽惠、三姨丽芝。

开始马不停蹄地为刘家添丁弄瓦。

我的几个舅舅们都记得，二外婆生孩子就如母鸡下蛋那样容易。她大腹便便时也从不休息，等到阵痛来时才拿着两个麻袋进入卧房，铺在地上，坐在地上生孩子。等到房间里传来婴儿的啼哭时，外公才从容地拿着一把旧剪刀入屋，为娃娃剪脐带。过后，被视为脏物的麻袋和剪刀都得扔了。二外婆几乎胎胎生产顺利，个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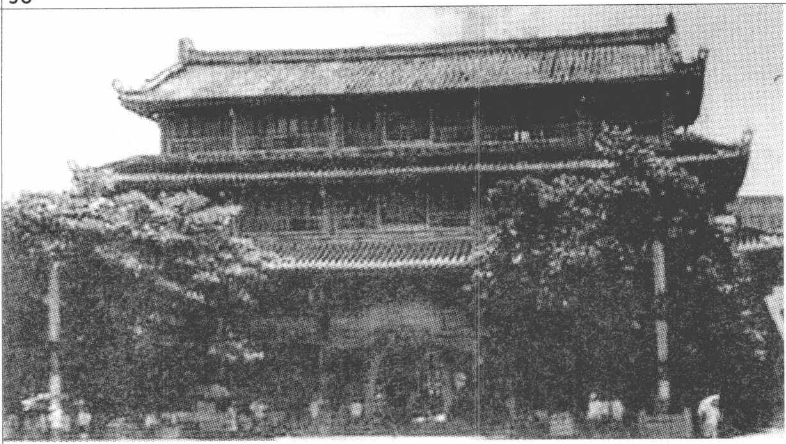
孩子健康结实。到头来，我的两个外婆，一共为刘家养下八男八女，其中我二外婆居功最大，共生了六男五女。

老一辈的人为孩子们排行时，喜欢把兄弟们的男孩都排在一块儿。刘振荣夫妇过番后又生了五个孩子，总共有三男四女。刘振荣和刘振标两兄弟的男孩混起来排行，共有 11 个男丁，也就是我有 11 个舅舅。女孩子没什么地位，也就各自排行。男丁当中的老大、老四和老五，其实都是我母亲的堂兄弟。（请参阅第 333 页刘氏家系图）

5

城南旧事

北伐后的中国是国民党政府当权，十分腐败。黄学良和父亲都公开地不满政府，没把国民党官员，甚至教育局局长看在眼里。当时的童子军的领带是蓝色和白色的，城南小学却是红色的。当官的责问为什么，校方答道，没什么，红色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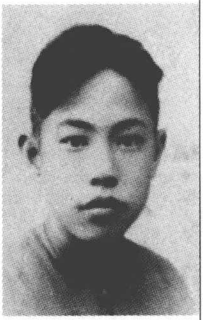


早年潮州城东城门

1911年那场灾难性的瘟疫过后，潮州城朱家老宅的一角，两个年轻的寡妇拉扯着三个孩子过日子。年纪稍长的寡妇是我的老伯母，她只有一个女儿；年纪较轻的是我的祖母，有两个儿子，朱其灿和朱其焯。朱其灿在弟弟出世后就过继给了老伯母，为的是让朱家第五代的大房，至少有一个男丁可以传递香火。

孤儿寡妇五个人的日子是一天一天捱过去的。妯娌俩除了帮人洗衣、做饭、养孩子之外，针线活儿更少不了。祖母心灵手巧，曾经为了赶货，一个晚上连裁带剪到手缝，做好13条裤子。

由于贫穷，家里养的几只母鸡生了蛋都不舍得吃，腌成咸蛋。大人告诉孩子们应该节俭，于是其中一个孩子提出一个方法，说，早饭吃咸蛋送粥，我们来比赛，看谁的咸蛋吃得最久。三个孩子认真地比赛，结果朱其焯，我的父亲，一个咸蛋吃了13天，得冠军。


父亲朱奇卓17岁影

生活虽然清苦，我祖母没让自己的孩子在教育方面输给别人。父亲的小学是在府城里的名校城南小学上的，他成绩好，很得老师的器重。1925年他小学毕业时，得到城里商贾颁发的“学田”奖学金，升上金山中学。当时，金山中学和韩江师范是府城里的两所最高学府。

父亲在金山中学上学时，开始接触左倾刊物。据他的老朋友蔡文玄（新加坡著名文人柳北岸）的回忆，那时，父亲和他班上另一个客家籍的同学都喜欢看一本上海出版的名为《向导》的杂志。图书馆新书一到，两人常常为争看《向导》而抢起来。那时父亲14岁，不但思想左倾，口才也了得，擅于演讲。蔡文玄曾当面笑言这两个抢书的小学弟是革命党。

蔡文玄当时在金山中学念高三，开始同父亲班上一个叫洪芳聘的女生交往，许多年之后，洪芳聘成了蔡文玄太太。

父亲长大后，自己改名为奇卓。他上高一那年，有一天，受邀回母校城南小学去演讲，给高小的同学们分析时局。

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政治局势十分混乱。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成功后，清朝



潮州城南小学（1994 年）

灭亡，孙中山受推举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四个月后，辛亥革命的成果被掌握兵权的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所篡夺，孙中山辞职，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

1913 年 7 月，袁世凯派北洋军南下，镇压了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1915 年底，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但在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在三个月后废除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年号。

1916 年中，袁世凯病逝，这时，早已分裂为多个派系的北洋军阀，各自划地为王，在外国列强的撑腰下，尔吞我并，争斗不已。

1925 年 3 月，孙中山病逝。隔年 7 月，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第一次合作，组成国民革命军，北上讨伐北洋军阀。革命军从广东和广西两省出发，主要对象是三支北洋军阀部队：一是直系吴佩孚，占据湖南、湖北、河南三省和河北的一部分；二是由直系分化出来自成一派的孙传芳，割

据着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三是奉系张作霖，控制东北三省、热河、察哈尔、京津地区和山东。

那天，朱奇卓在城南小学的课室里为同学们讲时事，有系统地分析当时的北伐局势。他认为国民革命军和北京军阀政府的较量，国民党最终会统一中国。这时，有一个人经过窗外，他就是当时的城南小学校长黄学良。黄学良在窗外听了半天，知道演讲的人叫朱奇卓。他心想：

这个孩子，我要用他。我刚好要请一个训育主任，他一定要懂得时事，他一定要能给学生灌输国民党的思想和北伐的必要，明白军阀一定要倒，不倒是不行的。

黄学良也是潮州人，比父亲长五六岁。他原来在北京念大学，后来因经济上有了问题，没念完，回到潮州当城南小学的校长。

当时，黄学良跟父亲并不算认识，过后，他通过的一位朱姓的同学去联络父亲。就这样，17 岁的父亲一边在潮州城北端的金山中学继续念书，一边在潮州城南边的城南小学当起了训育主任，每天城南、城北的两头跑。过了一年，父亲就成了城南小学的正式教职员。1994 年，89 岁的黄学良回忆起父亲初到城南小学的往事，许多细节仍历历在目，他说：

有一天，我去到奇卓的宿舍，见到他倒头闷哭，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说有一位郑姓老师，常常无缘无故地骂他，说，你小孩子，做什么训育主任！我安慰他，说不要紧，郑就是这样，他以为你高中没毕业，没有学

问。但是我相信你，你做给他看，他以后一定会佩服你的。正如我所料，不久之后，奇卓上台讲了几回时事，大家就对他另眼相看了。

1930年，父亲在黄学良的鼓励下到厦门大学升学，主修教育。父亲一直向往着上大学，对研究教育颇有兴趣，在厦大读书时可以说是如愿以偿，如鱼得水。

大学时期同学们搞聚餐，有人提议每人各自拿出一道家乡菜，材料应该是各地都有的，作为一种饮食文化的交流。父亲拿出的是“煎蛋包”，就是以猪肉碎调味，炒熟，加入打散的鸡蛋和葱花，煎成半月形。同学们吃了都赞好，这道菜因此成为父亲的成名之作。

不幸，父亲在厦门大学才读了一年多，在经济上支持他的哥哥，由于自己打工的公司倒闭而失业，在经济上无法再帮助弟弟。父亲不得不放弃学业，回到城南小学。这回他除了当训育主任，也教数学和三民主义，也就是国民党的党义。

城南小学在那个时期办得很出色，成为潮州的名校，据后来校友们的分析，这跟当时的校长黄学良，训育主任朱奇卓和教导主任许继章的领导有关。黄学良说：

奇卓后来很喜欢研究教育。就因为你父亲，坦白说，我也跟着他研究教育。后来，你父亲有什么主张、建议，我就顶过来，开会时我说是我的主意，事实上都是朱奇卓的主张。

当时，城南小学每天有朝会、午会和息会。朝会、

息会是升、降旗礼，由校长或训育主任或值班老师讲话。午会是学生回家吃了午饭回来，可以参加分组活动，有讲故事、打乒乓、音乐、下棋、猜谜等等。这些都是学生自己组织的课外活动，每个人都得参加，因此，学生的组织能力很强。

最特别的是让同学们搞学生政府。学生有自己的警察局、法院，也有警察、法官。如果同学之间有什么纠纷，先到学生政府去解决，处理不了才找训育主任，训育主任解决不了，才到校长室去。黄学良说：

校友们近年来常常问我，黄先生，你当年把城南办得这样好，能不能把你当年用最新的方法办学的心得写出来？我常常推辞，说当时非常好的制度，现在也未必需要了。

事实是，当年奇卓提给我，我顶起来，统统照办。所以我写不出什么，我最重要的是用人，用像奇卓这样的人。

父亲在城南小学教过不少学生，其中两个学生林盛传和林莹后来结为夫妇。林盛传夫妇在1994年接受我的访问时，对60年前的往事仍有清晰的记忆，他们说：

朱先生常常穿青蓝色阴丹士林长袍，身材高大，一表人才。他的教学方式比较和蔼可亲，因此，他的办公室，我们敢进去。

他很注重学生的写作，潮州当时有份《大光报》，他常常把学生的作品投到《大光报》，每周占一个副刊

版位。朱先生自己也常用“伙兮”的笔名，在报章上发表论文，杂文和小品。

朱先生还在学校举办演讲会、辩论会，辩题包括“知易行难与知难行易”、“学问与金钱”。他也曾经联系其他学校，包括汕头的学校，一起搞作文比赛。

朱先生还曾搞过话剧《小小画家》。他拿了这个剧本，让老师和同学们一起演，剧中有三个老师的角色，他自己演其中一个。

父亲从小性格耿直，是非分明，直话直说，不善于拐弯抹角委曲求全，即使是对自己家人、亲戚也不姑息。有几件小事让他身边的人津津乐道。

父亲在城南小学当训育主任时，一个姨妈的孩子也在城南读书。这孩子书读不好，又不听话，被父亲用戒尺打了手心。孩子回家向他妈妈投诉，说，给别人打也还罢了，给自己的表兄打，不应该。结果他妈妈来向自己的姐姐，也就是我的祖母告状。祖母责骂了父亲，但父亲说，我这样做没错，当老师一定要尽责任，否则对不起他父母，他长大了就知道这是对他好的。

北伐后的中国是国民党政府当权，十分腐败。黄学良和父亲都公开地不满政府，没把国民党官员，甚至教育局局长看在眼里。当时的童子军的领带是蓝色和白色的，城南小学却是红色的。当官的责问为什么，校方答道，没什么，红色光明。

年轻时的父亲对教书全情投入，当时，官定的儿童节

是四月四号，父亲会自己掏腰包买许多糖果，包括一种上面点缀着各色糖花的小饼干粒。糖果买回家，在他母亲和嫂嫂的帮助下装成一袋一袋，然后带去学校分给学生。

1934 年，黄学良离开了城南小学，父亲不久也跟着离开，到天津的汉江交通职工子女小学教书。一年后，也就是 1935 年 9 月，父亲又到了广东省惠阳县的惠阳女子师范教书。根据父亲保留下来的惠阳女子师范学校的聘书，他当时是“担任附小主任兼六年级级任教员，师范部一年级级任兼国文教员；每周授课小学部 26 小时，师范部 6 小时，月俸薪 91 洋元”。

父亲在外地教书时，每个月都会按时给祖母写信、寄钱。不识字的祖母只要看到阿卓的“批”（信）来了，就特别高兴，口里念着：老爷保佑！老爷保佑！1936 年，当父亲在惠州教书时接到家里的信，说他嫂嫂生了一对双胞胎，是两个女儿，父亲很高兴。不久，父亲趁学校放假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要看看两个小侄女。

父亲兴冲冲地来到他嫂嫂的房门前，要抱两个宝宝，祖母从房里抱出了一个。

父亲：还有一个呢？

祖母：让人抱走了。

父亲：什么？给谁了？抱去哪里了？

祖母：抱去育婴堂了。

父亲：为什么？为什么？嫂嫂不是送走过一个女孩吗？这次又来了！



潮州兴宁巷

祖母：我们养不起……

父亲：女孩也是人，现在什么时代了，你们快去抱回来，快去抱回来！

父亲从来没有对辛辛苦苦把自己拉扯大的母亲大喊大叫，但是，他对传统的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实在是痛深恶绝。祖母和伯母被他吵得没办法，叫人到那家教会办的育婴堂去把孩子抱回来。可惜慢了一步，那孩子已经被别人抱走了。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父亲一方面教书，一方面参加抗日活动，带领学生到街头卖花筹款，支援北方的抗日力量。不久，父亲到了离惠阳不远的香港，成为香港《申报》的记者，来到他一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捩点。

在后来的岁月里，他的嫂嫂又生过一个女儿，再次送给了育婴堂。父亲身在异乡，又逢战乱，也管不了家里的事了。

6

落叶归根

那个算命的来到家里，看了相，一算，说，老人家，你没有多少日子了，有什么没完成的心愿，快去做吧……

在马来亚的边佳兰，刘家两兄弟刘振荣和刘振标对每一个存活下来的孩子，不论是男是女，都一视同仁。这并不是说刘家不重男轻女，而是对于一个从事农渔业生产的家庭来说，女孩子也能顶上半边天，至少，在她出嫁之前是个忠心耿耿的劳动力。

1935 年初，64 岁的曾外祖母手脚依旧十分勤快，从早到晚忙个不停。有一天，她带着 10 岁的孙子，也就是我的二舅刘熙成到屋子后面的园子种菜。菜园里种满了黄梨、长豆和黄瓜。不一会儿，天空变色，乌云密布，雷雨交加，婆孙两人双手抱头仓皇跑回屋里。

祖孙两人浑身湿透，曾外祖母感冒生病卧倒在床，后来，感冒还没全好又重感了一次。当时，家里人已经懂得有大病应该到新加坡看西医，但是老人家一直没把感冒当一回事，吃些草药了事。结果小病变大病，大病变重病，拖了四个月，到后来实在不行了才看了西医，但已经太迟了。

那时，曾外祖父早已经与老伴儿分开来住，他在海边搭了间小屋自己过日子，说是天天下海方便，其实是省得听我曾外祖母向他唠唠叨叨，两老平时见面也难得说上一句话。那天，曾外祖父从奎笼捕鱼回来，听说老伴儿不行了，三步并作两步冲到她的床前，看到老伴儿一动也不动了，悲从中来，泪如雨下。一辈子的欢喜冤家，到这一刻还是十分不舍得的。

曾外祖母去世后，外公在边佳兰头湾的公司山[1] 上

为他母亲选了块风水宝地。出殡时十分热闹，各方人马都争着要来扛棺材，说是曾外祖母福气好，旺夫旺子，扛棺材的人都能沾上好兆头。当时有两帮人马轮流扛棺材，到了山上，谁来扛最后一段竟相持不下。于是，扛棺材的一帮人干脆把棺材放下，抽出长长的杠棍与对方打了起来，一时场面大乱。外公没想到办丧事竟然办出这样混乱的局面，害得母亲亡魂受到惊吓。外公只好大声请求各方退让一步，连声说：多隆！多隆！不要争了！不要闹了！最后建议两边各派出三四个人，一起扛完最后一程，事情才算摆平。

曾外祖母走了不久，一天，曾外祖父出海到奎笼收网。那天风浪很大，舢板飘摇不定，一个不小心，船桨不偏不倚打上曾外祖父的左眼，左边脸颊立刻肿了起来。回到岸上，他用草药自己乱敷了一通，也没想到应该出来新加坡找医生治疗。后来，弄到左眼完全坏了，眼球几乎突了出来，其疼痛的程度可以想象。

刘家的第一代掌门人曾外祖母去世时，外婆已经有了两男两女。因为早几年产后没有好好调养，患上了子宫下垂的毛病。后来情况越来越严重，平时走路腰都直不起来。再加上丈夫有了新欢，外婆郁郁寡欢而得了大颈围的毛病，也就是甲状腺肿胀。老人家信不过南洋的医生，怕西医动不动就要开刀，于是决定回唐山医病，而我外公也赞成，还叫二女儿陪着老婆回乡。

1935 年中，外婆带着她的二女儿刘丽娴，乘船回



到了潮安县意溪镇埔东乡自己的娘家，那年我母亲 14 岁。

埔东乡在潮州城以北一铺路，村庄四周皆为平原。乡里房屋比较整齐，跟桂坑乡比较起来，埔东乡显得稍微富裕一些。蔡家的祠堂和祖屋虽然并不堂皇，却也平平实实，小有规模。祠堂前面有一片池塘，里面养鱼养鸭。池塘里飘着一丛丛的浮萍，池塘边上长着紫色的牵牛花，还有不知名的橘色爬藤花。

外婆娘家的几间房子，就在蔡家祠堂的右侧，她的两个堂弟早几年也过番去了新、马，因此祖屋里只有几个远房的亲戚，人事比较简单。外婆带了些钱回去，不过她生性节俭，不舍得花钱坐轿子，常常和母亲走路到府城去看病。母女俩每天要经过韩江上的湘子桥，湘子桥的中间一段是由十八艘并排绑在一起的木船搭成的浮动桥，走在上面摇摇晃晃的，煞是有趣。

母亲在陪外婆回唐山之前，在边佳兰自己家的私塾里已经读了一点书。回到埔东，没上学，倒是学会了刺绣。刺绣是潮汕的传统手工艺，绣工讲究精细，图案色彩讲究层次分明，一片花瓣从深到浅要配上三四个颜色。学绣花的姑娘往往也学抽纱，那是把绣布上的经线或纬线，一条条小心地抽出来，再用同色的线，把抽空的地方捆绑成整齐有序的小洞洞。潮绣产品包括手绢、枕头、床单和桌布等等，不论是绣大件或小件的产品，都十分费眼神，一般要年轻少女才学得来。母亲当时并



外婆娘家，潮安县意溪镇埔东村。

不知道，她学的这门绣花手艺，在她后半生竟大有用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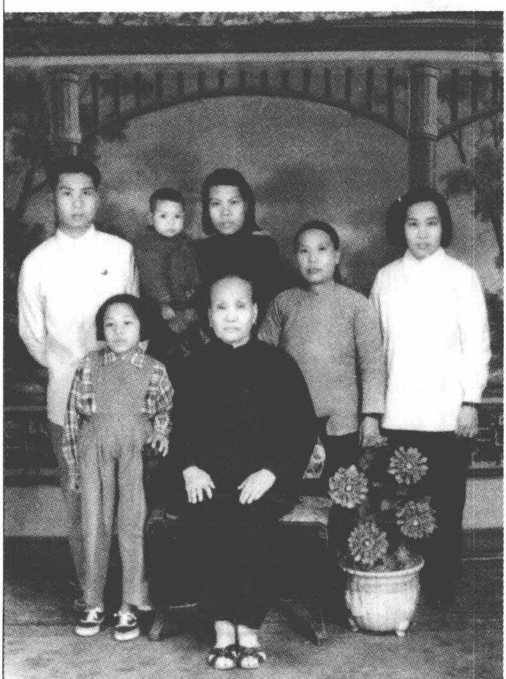
我的曾外祖父在老伴儿去世后意兴阑珊，什么也提不起劲儿。以往曾外祖母在世时，两老几乎是一见面就拌嘴、吵架，现在没有人在他面前唠唠叨叨了，老人家就像比武没有了对手，十分落寞。加上他又不小心弄伤了左眼，心里更不踏实了。于是，曾外祖父突发奇想，叫人找了个算命先生来给他算命。

那个算命的来到家里，看了相，一算，说，老人家，你没有多少日子了，有什么没完成的心愿，快去做吧。曾外祖父一听，决定回唐山老家终老，因为当时一般过番客的心态是，只要能力做得到，决不死在番邦，是所谓：落叶归根。



主意一打定，曾外祖父就和两个儿子商量：老二刘振标一家人留在边佳兰继续打拼，大儿子刘振荣一家人先回桂坑老家建房子买地。最重要的是，老人家百年之后，得有子孙在身边为他送终。刘家老二也答应，会按时寄钱回乡下，父亲和哥哥用不着担心生活问题。

1935年底，曾外祖父和他最小的女儿，19岁的刘玩香，以及他的大儿子刘振荣一家九口，陆陆续续回到桂坑乡的老家。刘家的祖屋在坪溪旁边的一个小斜坡上，是一栋宽和深都不过三米的独栋小屋子，里面只有两个小小的房间，实在不够住。



回返唐山的老伯母（前坐者）和部分家人。后排左起五舅熙祥、丽娟姨、惜娟姨、丽霞姨。

老伯一家于是在祖屋后面的小山坡上盖了栋新房子。围墙里面有两房一厅，前面是一个五六米宽的长形天井，旁边还有一个厨房。曾外祖父也买了几亩地，让自己的两个弟弟耕种。这一来，对于赤手空拳



刘家于桂坑乡的新屋建在老屋后面



新屋院内

到南洋打拼了三十多年的曾外祖父来说，也算是衣锦还乡了。当然，当年备受欺负的朴房，这时也没人敢欺负了。

隔年秋天，曾外祖父就病逝了。正如他所预见的一样，为他送终的儿孙不少，有老大刘振荣夫妇，七个男女孙子。长孙刘熙深早几年已经娶了媳妇，这时有一个两岁的女儿惠君，因此曾外祖父仙逝时是四代同堂，福





桂坑村曾外祖父墓

寿全归。

曾外祖父的墓地选在桂坑乡旁一座小山头上，坐北朝南，靠山面水，风水很好。墓碑上写着曾外祖父刘正彬和曾外祖母蔡清娥的名字。事实上，蔡清娥葬在马来亚的边佳兰，与老伴儿隔洋相望，免得到另一个世界里仍拌嘴吵架。

曾外祖父的墓地，就像刘家在桂坑乡的祖屋，蔡家在埔东乡的祠堂，以及朱家在潮州城里的五间祖传大宅一样，直到 2009 年仍有迹可寻，外表保存完好。

［注］
1 公司山：公共墓山。

7

叛逆少女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枪声响起，日本开始了对华的全面侵略。陪着外婆在埔东乡医病的母亲，刺绣功夫刚刚开始上手，听说打仗了，也不知道这仗要打多久，会不会打到潮州来，于是和外婆匆匆忙忙地回到了马来亚。



母亲刘丽娴17岁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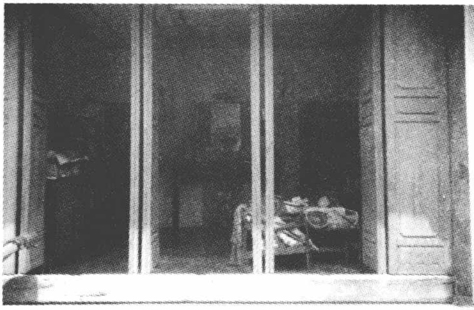
在刘家老大刘振荣回桂坑乡建房子的同时，在南洋的外公也请了位唐山来的师傅，在边佳兰二湾的椰园里离海边一百多米处，建了一座坐北朝南，格局跟潮汕一带传统建筑“驷马拖车”相似的房子。

不过，外公白手起家，凡事都非常节俭，建房子的事也不例外。新房子的建筑材料除了洋灰地板和几根石料大柱子之外，墙壁用的都是木板。而屋顶用的是锌版，下雨时雨点打在屋顶上，咚咚咚地响。屋子的外观十分朴素，进入大门后是前厅，是会客和账房所在。隔着两片雕花木门是个三米见方的天井，天井两旁各有一道一米半宽的廊道。天井之后是上厅，上厅的门由八片木门组成，上厅两边有东西厢房各两间。上厅的后面还有一道窄窄的后廊，是储藏拜神用的香纸蜡烛的地方。

天井东边的廊道有一扇门，通往另一个有两个小天井的院落，那里有厨房，饭厅和储藏间。房子的前后左



老家前厅，看报纸者为成舅（摄于80年代）。



老家上厅

右，环绕着大片的椰林。屋子的四周种下桑树、龙眼和木棉，那都是外公托人从唐山带回来的树种。

没多久，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枪声响起，日本开始了对华的全面侵略。陪着外婆在埔东乡医病的母亲，刺绣功夫刚刚开始上手，听说打仗了，也不知道这仗要打多久，会不会打到潮州来，于是和外婆匆匆忙忙地回到了马来亚。

没回唐山之前，母亲在自己家的私塾里读了几年书，那是外公请了一位从潮州来的李姓老师到家里来授课，课堂就设在二湾椰园里的一间亚答屋。

按照当时马来亚英殖民地政府的规定，12人以下的私塾不用注册。李老师教的是刘家五六个适龄的孩子，膳宿由外公提供，还包洗衣。刘家有一大群孩子排着队要读书识字，李老师不愁没有学生。不过，外公还是允许李老师多收几个附近甘榜里的孩子，这样，老师一个月就有十七八元的收入，在当时的马来亚，这算是很不错的了。

后来，刘家的私塾又换了一位同样姓李，叫李友心的老师。外公的教育政策是：男孩子可以多读几年书，女孩子只要将来出嫁后能写信就行了。因此在私塾里，男孩子上国文、算术和英文，准备小学读完之后去新加坡上中学。女孩子只读国文和算术，外公没打算让她们升中学。

母亲16岁从唐山回来，一方面帮忙做家务，天天得洗一家大小十几口人的衣服，一方面花两年时间在自家的私塾读完了小学课程，会看巴金的《家》、《春》、

《秋》这几本当时非常流行的小说。或许是由于到中国走了一趟，眼界比较开阔了，或许是学刺绣让她体会到靠手艺过活的艰辛，母亲完成了小学课程之后，多次向外公提出要到新加坡上中学。

外公那时生意做上了轨道，对内是一家之主，掌握着一家十几口人的生计；对外则热心社会教育，捐款兴建乡村小学。除了过年过节为应酬一些上门来的地方官员得摆出一副笑脸之外，外公脸上很少有笑容，在家总是沉默寡言，十分威严。家中妇孺要跟外公说个什么事儿，总得看看外公那天的心情如何，才敢开口。但是母亲仗着外公平时十分疼爱她，多次要求让她出坡去上中学，说话从不先看看父亲的脸色。

有一天，母亲在前厅向外公旧事重提，要出坡去上中学。平时十分温顺的外婆，这时也在旁边为女儿说了几句好话。那天，外公心情极度不好，因为战争一爆发，橡胶价格节节败退，一泻千里，刘家受到的冲击不小。另外，前一天，外公远远看到母亲在园子里帮几个家里的长工干活儿，竟有样学样，抽起烟来。外公看在眼里，气在心头，当时没有立刻发作。

旧气未消又再火上添油，外公在盛怒之下把母亲拉到屋外一棵大树底下，用绳子绑住她的双手，再把绳子绕上树丫，把人吊起来，拿起藤条就猛抽。口里骂道：

好啊，我让你去上学！你没上学已经学会抽烟了！你快要变成“三星婆”（女流氓）了！我养这么一大家

人已经很不容易了，你还要上学！女孩子上什么学？

母亲痛得不停地大哭、哀号。外婆实在看不过眼，心里其实早就怨恨丈夫宠爱二外婆生的孩子，于是拼了老命扑上前去，抱住母亲，对外公说：

你要打死阿妮（母亲的小名），就先打死我吧！你先打死我吧！



母亲离家逃跑到马来亚加影读书

外公这才住了手。经过这一场毒打，母亲病倒了，在床上躺了好几天。外公有点内疚，想想或许自己出手太重了，就给了母亲10元，让她出坡去看医生。这正中母亲的下怀，有机会实现她想了很久的逃跑计划。

离开边佳兰之前，母亲拿了外婆给她买的一个金牌。到了新加坡，她先到密驼路（Middle Road）常常给刘氏家人看病的严医生的诊所，看了病，医药费却挂了账。母亲又找到了在新加坡工作的得炎老舅，告诉他

蔡得炎老舅一家50年代合影



母亲与她的舅舅蔡得炎



自己要到吉隆坡附近的加影（Kajang）华侨中学去读书。

得炎老舅是外婆的二堂弟，30 年代初跟他的哥哥得胜过番来到新加坡之后，读的是“红毛书”，也就是上的是英校。他考到剑桥九号文凭后，还进修其他会计之类的课程，在当时的新加坡，这是挺高的学历了。

得炎老舅那时在“山仔顶”（North Canal Road）的一家洋行里打工。他身材略胖，生性乐观，爱说笑话，总是笑呵呵的像是一尊弥勒佛。得炎老舅对母亲这个外甥女向来疼爱，看到母亲竟然为了要读书而逃跑，十分欣慰。

母亲：舅，这个金牌就放在你这里，如果我的钱用完了，麻烦你寄点钱给我。

得炎老舅：行！你去吧，你走后，我会告诉你爸爸，说他的女儿跟人私奔了。

母亲：什么？我私奔了？

得炎老舅：哎，吓吓他！等他气消了，我才告诉他你的下落。

母亲花 2 元买了一个皮箱和一些日用品，就和早已联络好的两个女朋友，林淑娟和林惠芳，乘火车北上了。母亲终于上了中学，多年后还记得当时加影华侨中学的校长叫胡一声。

母亲是从刘家的私塾老师李友心那里知道马来亚有这么一所学校。在胡一声的领导下，加影华侨中学除了教授一般的中学课程，教师们经常给学生分析国际形势，进行民主教育。学校图书馆里的图书，也多是进步的报刊和书籍。当年在马来亚，加影华侨中学是出了名

的左倾学校，不过，很少人知道来自中国的校长胡一声，其实是个地下共产党员。

50 年代末期，母亲在广州又与胡一声和李友心相遇，这是后话。

到加影华侨中学不久，母亲写了封信回家，大意是说她出走只是为了升学，她相信女孩子有知识有能力有学问就能自立等等。几天后，外公收到信，坐在屋子前面的长木椅上读给外婆听。外公一边读一边流眼泪，说，没想到阿妮能写这么长的信，说这么多大道理，明明她没做错什么，不是跟人家跑了……外婆嫁给外公那么多年，从来没看过平时威风八面的丈夫为了一封信而如此动情。

外公常常为了生意的事进出新加坡，不久，他去见得炎老舅，说，哪天你有空，带我去看阿妮吧。后来，外公虽然因为生意忙没去成加影，但是他托老舅寄钱给母亲，也转告母亲说，还是回来新加坡读书吧，随便你选哪一所中学，学费我给。

1939 年末，在加影读了一个学期后，母亲回到新加坡。她先去报考南洋女中，当时南洋女中的校长是刘韵仙。母亲满怀希望慕名去投考南洋女中，结果她的中文和算术都及格，英文却不行。南洋女中不收一个英文不及格的超龄生，母亲十分失望。

1940 年上半年，母亲又去报考南华女中，南华女中当时的校长叫冯依湄。冯依湄认为母亲的英文虽然几乎是零分，但是她相信刘丽娴只要日后加倍努力就可以跟上。南华女中收了刘丽娴，让她插读初中二。母亲老

年在谈到这一段往事时，总是对刘韵仙拒绝收她的事轻轻地带过，对冯依湄则是怀着十分感恩、十分仰慕的语调，她也屡次提到冯依湄是画家司徒乔的妻子。

冯依湄对我来说是个相对陌生的名字，母亲对她的敬仰引起我的好奇心。不久前，在一本母亲收藏的冯依湄著的《我的丈夫司徒乔》里，我终于了解到冯依湄是一位能诗能文的大才女。她是广东惠州人，早年在上海求学，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曾留学法国，也在中山大学教过书。她婚后为陪伴画家丈夫司徒乔，帮助他描绘大时代的缩影，在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中走南闯北流离颠沛，到过东南亚的缅甸，槟城和新加坡。他们夫妇俩的命运，与战火、贫穷、疾病、艺术和文学紧紧地交织在一起。

冯依湄与新加坡的缘分其实很短，她是在 1940 年初至 1941 年底担任南华女中校长，前后不到两年。但在她与母亲的短暂接触中，她那有教无类的慈爱胸怀，以及对于一个超龄女生能够克服困难的信心，使母亲得以踏入中学的门槛，让母亲感激一辈子。

这时候，母亲的两个同胞弟弟，二舅刘熙成和三舅刘熙茂都已经在华侨中学上学，一个上初三，一个上初二。当时的华中校长是著名教育家薛永黍，而当年在潮州城担任城南小学校长的黄学良，这时也辗转来到新加坡，出任华侨中学的训育主任。

1941 年 12 月 8 日，刘家三个孩子在新加坡不同的课室里上课时，日本皇军的飞机在新加坡投下了第一颗炸弹。

8

文艺救国

“武汉合唱团”于1938年12月14日抵达新加坡。同年12月18日，在新加坡各侨团学校组织的欢迎会上成功试演，获得好评。接着，合唱团正式在首都戏院演出，连续八晚，每场都爆满。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开始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保卫国土的呼声响彻云霄。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经过反复磋商，决定继北伐之后第二次合作，联手抗日。

同年 8 月 19 日，上海共产党地下党员在海尔登剧院召集文化界、影剧界两百多人的集会，由复旦大学戏剧教授洪深主持，左翼的文化人，如中国著名戏剧家夏衍、剧作家田汉、文学家郭沫若等都出席了。大会成立了 13 个救亡演剧队和 5 个战地服务队，奔赴各战区从事抗战宣传，演出和救护工作。其中的“第二救亡演出队”，由洪深担任队长。出任副队长的，是当时在中国大受欢迎的电影《夜半歌声》的男主角、红透半边天的演员金山。著名影剧明星王莹则出任队委，队员中还有后来创作了《黄河大合唱》的著名音乐家冼星海。


上海演艺界才女王莹

故事到这里要先岔开一下。

在“第二救亡演出队”成立前的一年，上海演艺圈里刚刚发生过一场不太小的风波。当时夏衍写了一出话剧《赛金花》，以清末名妓赛金花的传奇事迹，来讽刺清朝对列强侵略的软弱无能。剧本出来后，上海影剧圈里有一个叫蓝苹的女演员，与王莹争当女主角。两人争得不可开交时，编剧夏衍想出了一个勉为其难的方法，就是话剧的主角有 A、B 两组，王莹和金山是 A

组，蓝苹和赵丹是 B 组。但是蓝苹不屑于充当 B 角，她坚持赛金花应当由她来演。

这批演员原来都属于“业余剧人协会”。后来，金山和王莹宣布“独立”，成立了“四十年代剧社”。这个新剧社也暗中与戏院签订了合同，于 1936 年 11 月 19 日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演《赛金花》。

蓝苹、赵丹等“业余剧人协会”成员，在《赛金花》演出前四天，举行记者招待会，向报界陈明《赛金花》的主角纷争经过。然而，“四十年代剧社”还是照样上演了《赛金花》，女主角为王莹，男主角李鸿章由金山饰演。《赛金花》上演后，连续二十场，场场爆满，观众达三万人次以上，轰动了上海。

蓝苹在争演《赛金花》女主角的纠纷中败北。接着，各报竞相登载“赛金花纠纷”公案，蓝苹又成了闹剧中的主角，从此蓝苹恨透了王莹。王莹当时做梦也想不到，她与蓝苹，这个后来改名叫江青的女人的这一段过节，三十多年后要了她的命。

回到 1937 年。

“第二救亡演出队”首先在苏（江苏省）北、皖（安徽省）北、豫（河南省）东、鄂（湖北省）北等中原前线的战场和乡镇，展开抗日宣传活动。这时，日本已经占领了中国东三省达六年之久，许多东北人民被迫逃离家园迁往南方，过着流离颠沛的生活。“第二救亡演出队”的节目中，有一首王莹唱的《我的家在东北



松花江上》。这首歌一响起，往往引起观众的共鸣，“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回老家去！”“向日寇讨回血债！”的口号此起彼落，响彻云霄。

“第二救亡演出队”的另一个经典剧目是《放下你的鞭子》。《放下你的鞭子》原本是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填词家田汉，根据德国作家歌德的长篇小说改编而成的独幕剧，后来被改编成抗战街头剧。它讲述卖艺父女二人，因家乡被日寇占领，离乡背井的痛苦经历。抗战期间，这出戏被许多剧团演出过，红遍大江南北。一位曾看过这出戏在户外演出的观众，这样描述它的感染力：

一个绿荫覆盖着的场地上，传来声声锣鸣：哐、哐、哐！惊奇的人群，循声来到这里。只见一位老人，嘴上满是胡子，头上戴着秃毡帽，手上拿着铜锣，边敲打着、边引导着人们围成一个大圆场。他口里琅琅说着那时代卖艺人常要说的开场套话：“老少爷们！有钱的，帮个钱场子，没钱的，帮个人场子。”哐、哐、哐！……

把人群逐渐安定好，静下来以后，老人拿一把胡琴，拉起小曲儿来。他呼唤一个年纪轻、体形俏、面貌俊的姑娘：“来！你伺候老少爷们一个小曲儿，唱上一段！”他拉起琴曲，似泣如诉，幽幽咽咽。姑娘应声唱道：“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杀人放火真是凶，杀人放火真是

凶，中国的军队，有好几十万，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

忽然，姑娘剧烈咳嗽起来，上气不接下气，唱不下去了。老人抱拳向四面观众哀求道：“这姑娘是我亲生女儿！我们是在东北沦陷后，逃亡到关内来的。没饭吃呀！她是饿的……”


徐悲鸿（右）和王莹，与徐的画作《放下你的鞭子》。

群众一阵凄楚、一阵叹息，纷纷掏出些铜元往场心掷去，表示同情和支援。老人在作揖打躬，连连道谢之后，接着又操琴，又要小姑娘唱下去。几声琴音，几句叙唱，依然是姑娘因饥饿过甚，不能成声。

老人一再呵斥，他怒了，拿起长长皮鞭将女儿狠狠抽打。女儿柔弱不支，躺倒在地。

忽听一声断喝：“住手！放下你的鞭子！”

只见观众中，有两三个爱国青年，由于正义的热血全身涌动，愤慨地站起来，冲向场内，冲向老人，护住姑娘。全场惊呆！

姑娘边哭边诉，边护住老父，她说：“我们东北叫鬼子占领之后，可叫凄惨哪！无法生活，只有流浪、逃亡，无处安身，没有饭吃，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

一时间，全场青年情绪鼎沸，像开了锅，激荡不已。不由得高呼起来："我们不当亡国奴！""打回老家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声、高吼声、震动群山，回荡高空，有如向苍天大地长吼！

"第二救亡演出队"后来的动向，跟国民党的两位军阀李宗仁，白崇禧有很大的关系。在一本金山著的《金山戏剧论文集》里，他这样写道[1]：

当时国民党的地方实力派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同蒋介石"叫劲"，双方都以抗战派自居。李、白故作"高姿态"。贴出"招贤榜"，邀请各界知名人士到国民党所辖第五路军战区，为桂系的抗日战争作宣传，或者到桂系老家桂林去办文化宣传等事业，以张其声势。我和王莹同志也被邀请（当时洪深先生已离队任国民党军委政治部第三厅第六处的戏剧科科长）。李、白除了邀请我和王莹去战区，还愿出路费请我带队到南洋群岛去向华侨宣传抗日救亡运动。

早已是共产党员的金山，本来一直想到延安去，他当时想，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到国外我能不能宣传八路军抗日，如果不能，我去干什么？……不过，他还是立刻向他的领导，也就是已经出任国民党军委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汇报了这一项邀请：

副主席（周恩来）想了又想，又对我进行了一次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还叫我把眼光放远些，站高些……（周恩来）很慢地说了十六个字："工作紧张，

生活严肃，态度灰色，经济清楚。”我一个字一个字记在心里，反复默诵，唯恐遗漏或忘记。

在金山的著作里，他这样解释这十六个字里的“灰色”：

“灰色”就是既要坚持党的原则立场即抗战到底的立场，又不要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或者说，“灰色”就是“保护色”；也就是对自己的一言一行必须十分谨慎而恰当……

“救亡演出二队”于是改名为“中国救亡剧团”，全团 20 多人从桂林出发，经过广西、广东等地，于 1939 年 4 月辗转到达香港。

在“中国救亡剧团”出国之前，另一个中国的文艺团体“武汉合唱团”，已经抢先一步踏上征途，以文艺救国，为抗战筹款。“武汉合唱团”全团男女 28 人，由陈仁炳领队，夏之秋任团长兼指挥。演出以歌咏为主，话剧为辅，主要团员有电影演员项坤、江心美，歌唱家田鸣恩等。

该团自筹旅费，先到广州、香港演出。在香港时，

“武汉合唱团”完成新马演出后与陈嘉庚合影



团里派出两位代表与新加坡的爱国侨领陈嘉庚接洽，商讨到南洋演唱的事，获得陈嘉庚的大力支持。双方约定合唱团团员的膳宿由陈嘉庚领导的“南洋筹赈会”负责供应，团员每人每日零用费二角。

“武汉合唱团”于 1938 年 12 月 14 日抵达新加坡。同年 12 月 18 日，在新加坡各侨团学校组织的欢迎会上成功试演，获得好评。接着，合唱团正式在首都戏院演出，连续八晚，每场都爆满。合唱团又在新加坡的大世界、新世界、快乐世界三个游艺场轮流演唱三个月。1939 年 3 月继续北上柔佛、马六甲、森美兰、雪兰莪、霹雳和槟城，直到 1940 年 4 月演出结束。

“武汉合唱团”在马来亚一年多的巡回演出，到处掀起献金高潮，总共筹得叻币二百多万元[2]，显示出海外华侨支持祖国抗战的力量十分庞大。“武汉合唱团”的成功，成了“中国救亡剧团”的学习榜样。

［注］

1《金山戏剧论文集》中《往事》一章，P. 419。

2 参阅陈嘉庚著《南侨回忆录》上册 101 页。

9

新中国剧团

1939年9月，王莹带领5位团员率先抵达新加坡。当时，英法两国已经对德国宣战，英殖民地政府不许他们上岸宣传，搞筹款演出。后来，王莹获准上岸交涉，像“武汉合唱团”一样，王莹找到了侨领陈嘉庚，请他帮忙。在陈嘉庚的努力下，终于使六位团员都上了岸。



“新中国剧团”在香港

“中国救亡剧团”在香港的演出并不顺利，金山在“金山戏剧论文集”里写道[1]：

正当港澳各界同胞热烈欢迎“中救”在港举行抗日救亡演剧的同时，日本军国主义者驻港的特殊势力公然向香港当局施加压力，不许“中救”演出抗日戏剧，还派遣浪人跟踪“中救”男女团员特别是女团员，而其目标当然是“中救”的负责人（据说这种浪人都是身藏匕首——是一尺来长的尖刀——随时刺杀）；更有甚者，他们竟然送了两颗炸弹到演出的后台（香港利舞台），以示“警告”。与此同时，香港当局以种种借口多方留难，阻止我们作抗日宣传。我们只好想尽办法以多种形式反映中国人民遭受苦难的情况，勉强做了些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

那时，父亲是香港《申报》港版记者，采访“中国救亡剧团”的演出是他的任务。看了几次该团的演出，访问了几位该团的主要人物，父亲深受他们刻苦耐劳、忘我投入的精神所感动。他也认为该团的剧目，特别是《放下你的鞭子》宣传效果很大，对于团结人民

齐心抗战，有很大的贡献，于是充满激情地写了好几篇特写在报上发表。

完成了香港的演出任务之后，“中国救亡剧团”又要到法国殖民地越南去。这时候，父亲开始考虑参加剧团，成为他们的一员。

其实，父亲当时对“中国救亡剧团”的政治立场有些疑惑。首先，剧团的团员多数是进步的、左倾的。他也观察到剧团和夏衍、廖承志等中共党员的关系密切，特别是跟夏衍的关系更深。不过，该团又是受到桂系军人，也就是国民党的资助才得以出国，剧团的随行顾问林枢是白崇禧的代表。剧团演出的布幕上，有大字标出：“中国救亡剧团出国纪念。李宗仁、白崇禧敬赠”。父亲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以为这样是为了出国宣传的方便，因为当时多数海外华侨在政治立场上还是十分传统的，他们尊重孙中山，效忠国民党。

无论如何，当时国、共正处于一个合作期，父亲认为只要是为了宣传抗战，就是好的。当时剧团里有一位来自南京的青年叫徐蕉萌，是摄影记者，也负责音响和拍摄有关演出的电影纪录片。徐蕉萌战后从事独立电影制作，落户新加坡。1994 年他接受我的访问时，回忆起 55 年前的往事：

你父亲当时是一个报馆记者，来采访剧团，跟我们有接触，久了有感情，我们需要一个像他一样的人。当时我们的薪水一律是每个月三块钱，吃、住都由团里

包。你父亲是高薪，两边的待遇差得太远，但是他自动参加，我们被他的热诚感动，一拍即合。

当时香港一共有四名记者被邀请加入“中国救亡剧团”，父亲是其中之一，职位是团里的宣传部副部长。另一位香港报人陆浮则担任宣传部部长。

从一个月入一百多元的报社记者，一下子变成吃大锅饭，每月只领三元零用钱的剧团成员，父亲觉得物质生活虽然谈不上了，但是新的工作关系到为抗日筹款，能为自己祖国的主权完整作出一点贡献，父亲不但毫不犹豫地加入了，而且还干得很起劲，很兴奋。

剧团接着又到越南西贡去，在西贡的堤岸，也就是唐人街演出。他们抵步时，受到当地爱国华侨的热烈欢迎。金山在《金山戏剧论文集》中写道[2]：

我以为这次在越南可能比香港的处境好些。哪想到第一天义演《台儿庄之战》就出了问题。开幕不久，一个法国殖民军官手执皮鞭，率领六七个法国士兵和安南士兵，气势汹汹地冲上舞台，勒令停演，并把“中救”负责人和导演叫去问话。身居殖民地的观众在台下鸦雀无声。殖民地军官当众宣布禁演，并驱散会场观众。

我们遭此突然袭击，十分窘困。党支部决定依靠全团群众，依靠当地爱国侨胞，继续奋斗。越南呆不住，就另开码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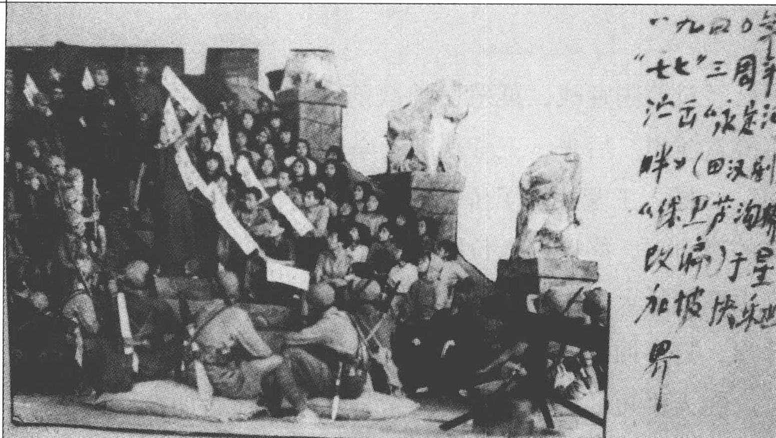
剧团出国的第三个演出地点是新加坡。1939 年 9 月，王莹带领 5 位团员率先抵达新加坡。当时，英法两

国已经对德国宣战，英殖民地政府不许他们上岸宣传，搞筹款演出。后来，王莹获准上岸交涉，像“武汉合唱团”一样，王莹找到了侨领陈嘉庚，请他帮忙。在陈嘉庚的努力下，终于使六位团员都上了岸。但是第二批由金山率领的大批人马就没有那么好运气了，他们被拒绝登岸，只好回返西贡。

在人手短缺的条件下，王莹等六个人在新加坡积极展开筹赈演出，演出时一个人担负起三四个角色，还兼顾各种剧务和联络的工作。当年10月中旬，一行人在新加坡一处广场上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现场观众纷纷把钱币、首饰、手表扔向场内。这时，观众当中有一个中年画家，正在画板上迅速地勾画着，把王莹演出的精彩画面记录下来。这个人，就是当时旅居新加坡，鼎鼎大名的中国画家徐悲鸿。

徐悲鸿后来用10天的时间完成了这幅几乎与真人同样大小的油画，送给了常常帮助他的新加坡华侨黄孟圭。2007年4月，这幅油画在隐身了50多年后出现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并以7200万港元的天价被买走，创下徐悲鸿画作的最高拍卖价，这是后话。

1940年中，金山化名为赵洵，与其他团员以化整为零的方式，辗转从云南，经滇缅公路到仰光，再乘船到槟城。经过化装的金山，躲过了一位曾经拒绝他在新加坡上岸的“华民政务司”的洋人官员的眼睛，顺利在槟城登岸，再从陆路来到新加坡。“中救”的两批人



新中国剧团在新加坡快乐世界演出《永定河畔》

马终于团圆了，住在金炎路中正中学的校舍里。为了便于展开抗战宣传工作，剧团再次改名为“新中国剧团”，等待机会在新加坡演出。

这个时期，中国另一位著名文人郁达夫也在新加坡。郁达夫自 1938 年 12 月起就受聘于新加坡星系报业机构，担任《星洲日报》《晨星》版及《星洲晚报》《繁星》版的编辑。

有一天，金山、王莹邀请郁达夫到南天酒楼会面，目的是请这位他们在国内早已认识的郁先生支持爱国宣传工作。父亲与金山、王莹一起出席了会面。茶叙间，王莹谈到来新加坡义演的工作计划，郁达夫义不容辞，回报社马上写了一篇“又见王莹”的文章，四周圈了个大花边，在显要新闻版位上登出，掀开了剧团在新加坡宣传的序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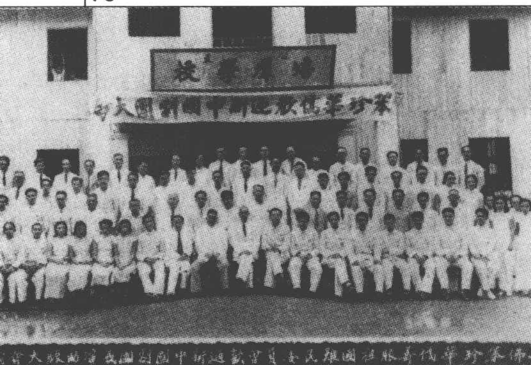
这次会面，父亲也认识了陪郁达夫一起赴会的一位《星洲日报》的记者蔡建奕。蔡建奕与父亲是潮州金山

中学前后期同学，父亲是学长。蔡建奕在1937年来到新加坡，1939年进入《星洲日报》工作。当时他要看好多外国报纸，时常看到朱奇卓写的介绍潮汕文化的通讯，因此知道他的名字。两人认识以后，因为彼此都是潮州人，又是校友，很快地熟络起来。父亲为“新中国剧团”发宣传稿时，常常到罗敏申路的《星洲日报》找蔡建奕聊天。剧团在维多利亚剧院和快乐世界的演出，父亲也送票给蔡建奕，邀请他来观赏。

“新中国剧团”在新加坡的第一次正式公开亮相，是在维多利亚剧院（Victoria Theatre）演出阳翰笙编剧、王莹领衔主演的《塞上风云》，公开地为英国战时灾民筹款，这也是剧团为了取得英殖民地政府的演出许可而做出让步的一场演出。

《塞上风云》表面上是一个爱情故事，其实是通过坚贞的爱情来宣传抗战的精神，王莹在剧中饰演一个藏族牧羊少女，金山饰演一个汉族青年，蓝马饰演日本特务扮成的喇嘛。该剧布景堂皇美丽，是一出颇有水准的话剧。当时很多新加坡的学生参加了这场演出，包括南洋女中和华侨中学的学生，男男女女有近一百个临时演员。

其实，在《塞上风云》演出之前，“新中国剧团”内部闹了一个不小的风波。团员们都到了新加坡之后，由生意人林枫领导的本地一个业余戏剧社“晨光社”，想邀请大名鼎鼎的电影明星金山去为他们排戏，金山没有空，就由另一位演员蓝马顶替。当时，马来亚共产党



笨珍华侨筹赈会欢送新中国剧团



新中国剧团在马六甲，前排左一为父亲。

在新马一带十分活跃，马共有些成员在这个剧团里活动，由此也认识了蓝马和其他“新中国剧团”的人。当马共知道“新中国剧团”要为英国难民演出第一场戏时，他们极力反对，认为英、德都是帝国主义，剧团不应该为他们的所谓难民筹款。他们通过蓝马告诉金山，但是金山、王莹不管马共的意愿，决定照演。

马共于是鼓动蓝马等七个团员反对演出，后来蓝马干脆罢演，找了个借口就离开了剧团。蓝马是戏中一个主要的角色，他以为自己一离开，戏就演不成了。金山没办法，临时找了一个搞灯光的团员，形象还不错，连夜开夜车背台词，排戏排到半夜，结果《塞上风云》如期在大钟楼，也就是维多利亚剧院演出。

这一来，马共气坏了。于是在演出前，马共分子在剧院附近的马路上遍贴“不看王莹臭戏!”“以手榴弹对付!”的标语，搞得气氛十分紧张。英殖民地政府听说马共要来捣乱，加倍提防，动用警车把演员们送到大钟楼，附近马路全部戒严。在剧团许多亲中共的团员眼

里，马共很左，但是缺乏策略。

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跨过了为英国难民演出这个门槛，“新中国剧团”得以展开在新加坡和马来亚的演出计划。剧团接下来在快乐世界演出的剧目还包括：田汉编剧的《永定河畔》（原名《卢沟桥》）、《放下你的鞭子》、《为自由和平之战》、《台儿庄之战》，《民族万岁》和《九一八以来》等。

1940 年 8 月起，“新中国剧团”北上马来半岛，到新山、哥打丁宜、巴都巴辖、麻坡、昔加末、吉隆坡、马六甲等地巡回演出，到处反应热烈，大受欢迎。作为剧团台柱的王莹，也因此被报章称为“马来亚情人”（Sweet Heart of Malaya）。

就像“武汉合唱团”一样，爱国华侨也在演出现场通过献金和拍卖花篮的方式踊跃捐献。一位曾在柔佛昔加末观看演出的观众记得，有一位老先生曾以 5000 元的最高出价，捧走了一个王莹主持拍卖的大花篮。在战前，一般人的工资只有十几二十元，5000 元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在场献金的有小贩、店员、家庭主妇等，各行各业的人都有，有些小朋友还把自己五分、一毛地存起来的零用钱献出。这些场面令王莹和团员们感动得热泪盈眶。

在南洋筹赈会的领导之下，“新中国剧团”所有演出的收入，作为筹赈义款交由筹赈会汇回中国做抗日用途。筹赈会负责剧团的日常开支，包括每个团员每月 6 元叻币的零用钱。

可惜好景不长，由于剧团的影响力太大，招致日本领事馆的妒嫉。而团长赵洵就是曾经被禁止登岸的金山，也成了公开的秘密。英殖民地政府在日本政府的压力下，下令赵洵（金山）必须在1940年12月底之前离开新马，“新中国剧团”不得不停止继续北上的计划，回返香港。

在新马的半年多里，“新中国剧团”一共演出了80多场，为祖国抗日筹得了一百万坡币，折合国币七百万左右，在那个年代，这不是一个小数目。从1940年中到1941年初的半年多里，父亲一共随团写了65篇特写，每一篇都在《南洋商报》刊出，如今还存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的缩微胶片中。

回到香港之后，父亲在戏剧家夏衍的介绍下，进入了由共产党办的《华商报》，担任编辑。可以这么说，“新中国剧团”使一心抗日救国的父亲接近了共产党，倾向于共产党，虽然当时团里没有一个人公开承认自己是共产党。

七八个月后，也就是1941年8月，父亲在老师黄学良的邀请下回到新加坡，担任华侨中学的副训育主任。工作包括管理住宿生，也教“公民”一科。但安稳的日子没过多久，三个月后，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隔一天，日军开始了对新加坡的轰炸，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南太平洋被战争的浓浓硝烟所笼罩。

[注]

1《金山戏剧论文集》中《往事》一章，P425。

2《金山戏剧论文集》中《往事》一章，P426。

10

新马沦陷

乡里有些人不想去新加坡，要躲到附近的森林里去。外公却认为：死，也要做饱鬼，去新加坡有得吃……

1941 年 12 月 8 号，日军在泰国南部和马来亚北部登陆。两天后，两艘英国军舰“威尔斯太子号”（Prince of Wales）和“击退号”（Repulse）在开赴关丹途中被日军炸沉。接着，日军一路南下，英军节节败退。

这时候，马来亚共产党向英殖民地政府提出武装人民，实行全面对日战争的建议。随着局势的吃紧，英国殖民地政府被迫改变了其一向镇压马共的政策，答应马共参与抗日的要求。不久，英殖民地政府释放了近 200 名与马共有关的政治犯，训练和武装他们，让他们参与抗战。马共派出 165 名精英分子，分四批前往新加坡“101 特别训练学校”接受短期军事训练，这批马共成员后来成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骨干。

随着马来亚半岛战情的日益紧张，12 月 17 日，新加坡总督汤姆斯（Sir Shenton Thomas）要求华社领袖陈嘉庚，出面呼吁人民在全岛挖掘防空壕。接着，又要求陈嘉庚召开新加坡华侨总动员大会，协助抗敌。陈嘉庚多次推辞，最后被说服并承诺领导华社展开三项工作，即：组织义务警察维持治安；组织宣传队，到各处宣传抗战；以及代政府雇临时工人。12 月 28 日，总督在新加坡总统府召集两百多位华社领袖，宣布由陈嘉庚出来组织抗敌机构。

临危受命的陈嘉庚在 12 月 30 日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召开侨团大会，成立“新加坡华侨抗敌后援会”，动

员马来亚华人的人力和财力，协助英殖民地政府对日寇作战，展开上面的三项工作。不过，在一位刚被释放的马共分子黄耶鲁的提议以及其他热血青年的附和下，大会也成立了“民众武装队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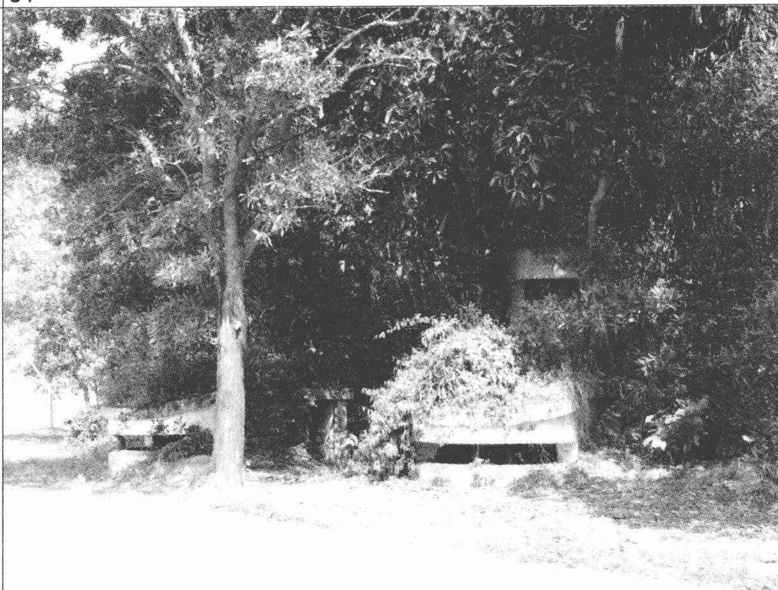
“新加坡华侨抗敌后援会”的成员既有爱国华侨，也有中国国民党党员、马共党员，以及无党派人士。在组织上，大会主席是陈嘉庚，属下的劳工服务部主任是林谋盛，副主任刘牡丹；保卫团（义务警察）部主任是郑古悦，副主任黄奕欢；宣传部主任胡愈之；民众武装部主任是林江石（马共党员），副主任是王吉士（国民党党员）。紧接着，民众武装部迅速组建“星华义勇军”，准备与盟军，也就是包括英军、印度步兵旅、澳洲步兵旅和旁遮普军团，一同投入新加坡保卫战。

1942 年 1 月 31 号，日军已经逼近柔佛南端，盟军只好炸毁新柔长堤，退守新加坡。

2 月 1 日，日军占领柔佛，开始进攻新加坡。

2 月 8 日，只经过仓促的突击训练和配备简陋武器的“星华义勇军”一千多人开赴前线，他们在裕廊、巴西班让和武吉知马，与日军展开血战。配合盟军一起作战的还有一支一千多人的马来军团，他们在新加坡西部奋勇抗敌。

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英军认定日本人会从海路进攻，因此在马来亚半岛柔佛州南端的边佳兰，新加坡樟宜的山丘上，圣淘沙岛和其他一些地方，都建筑了



边佳兰码头附近的小堡垒

碉堡，安置了大炮，准备两面夹攻从海上来犯的敌人。直到今天，边佳兰码头附近的山上，仍旧可以找到几个废弃了的英军营寨和碉堡。其实当年，驻守这里的英军没向日军发射过一枚炮弹，就投降了。

英国人当时也假设，日军受到英军的两面炮轰，会在边佳兰一带的海边登陆。英军准备以“焦土”政策来对付日本，让敌人即使登陆了也看不到一个人影，找不到一点粮食。大约是 1942 年 1 月初，英军下令边佳兰一带的居民，统统疏散到新加坡去。

边佳兰实际上包括了一连串的沿海甘榜（请参阅第 14 页的边佳兰简图），每一个甘榜都有一两条店铺较多的街道，当地人叫街场。从新加坡乘船最先抵达的是

边佳兰码头（Tanjung Pengelih），沿着公路往东去，最先到达的甘榜是边佳兰街场（Kampung Pengerang），接下去是头湾（Kampung Jawa），二湾（Kampung Telok Ampang），大湾（Kampang Sungai Kapal），三湾（Kampung Sungai Buntu），然后就到了四湾（Kampung Sungai Rengit），也就是边佳兰最大的一个市集。继续往东走还有五湾、六湾等等。二湾是刘家所在地，五湾一带俗称“红石山”，出产可以提炼铝的红石矿，九湾也就是近年来的旅游热点迪沙鲁（Desaru）。在公路靠内陆的一边，是连绵不断的树胶林、热带雨林和山丘。

对于英殖民地政府的紧急疏散令，边佳兰沿海居民没有选择，外公一家人开始准备逃难。那时，刘家大本营包括了好几个家庭：外公和两位外婆，加上十个排起

边佳兰战壕入口



队来像梯级般的孩子；早几年已经从唐山回到边佳兰的老伯刘振荣和他的大儿子刘熙深一家；再加上外婆的堂弟得胜老舅一家。此外，还有多位在家里干活儿的叔伯辈亲戚，一家男女老幼一共三十多人。

这时，乡里有些人不想去新加坡，要躲到附近的森林里去。外公却认为：死，也要做饱鬼，去新加坡有得吃。为什么这么说呢？自从12岁过番以来，外公认识的新加坡就是一个非常繁忙的海港，世界各地货物的集散地。新加坡河口数不清的舯舢（Tongkang）船，天天把米粮、面粉从停泊在红灯码头前的大轮船上卸下来，送到岸上，又把一大捆一大捆的树胶，一大袋一大袋的香料运到大轮船上去。

新加坡河两岸以及美芝路（Beach Road）上的各类出入口商号，多得数不清。与外公交情很深的一家粮油批发商"顺茂号"就在美芝路附近，他们的栈房里永远堆满了高及屋顶的油盐米粮。外公每一次"出胶"，也就是把一百几十担熏好的胶片，用家里的船运到新加坡的"南商树胶店"卖掉之后，都会到"顺茂号"去，买回一船的粮食和日用品。

边佳兰老家旁院里的储藏间，总是堆满了来自"顺茂"的大米、食油、汽油、绳索、饼干、汽水等等。新加坡，代表的是刘家粮食和日用品的源头。当然，最重要的是，外公相信了英国人说的：新加坡是攻不破的堡垒。

疏散前一夜，外公和两个最信得过的亲戚，一个叫秋炳舅和一个叫八叔的，把家里的一些金银首饰、钱币和值钱的东西装在咸菜瓮中，趁天黑埋在老家水井边的一个鸡寮里。秋炳舅和八叔在南洋都没有家小，因此准备留下来看家。

临疏散前，家里所有女孩子全剪了短发，做男孩子打扮。外公又让两位外婆为十个年龄介于2岁到20岁的孩子的贴身衬衣都缝上一个小口袋。然后，外公拿出一沓钞票分给孩子们，每人200元。一边说：奴[1]啊，藏在身上，如果万一失散，这点钱可以用。另外，他再给每一个孩子一条高丽参，说：如果没有东西吃，高丽参可以活命。

几个年纪比较大的孩子都记得，那时气氛很紧张，没有时间啰嗦，更没有时间啼哭。当时外公的脑海里出现的是怎么样的画面呢？逃难途中，炸弹落下，大人全被炸死了，有的孩子侥幸生还。在废墟中，孩子在父母的尸体旁号啕大哭。

终于得离开边佳兰了。外公一行人带上简单的包袱，上了家里一艘平时载鱼用的大摩哆船。二湾甘榜的乡亲闻讯，也都要跟着刘家一起疏散到新加坡。于是，他们的小船挂在大船后面，整整十艘船连在一起，浩浩荡荡地开向新加坡樟宜码头，那一段平时只要45分钟的海路，在那一天显得特别漫长。

接近樟宜码头时，刘家船队给英国海军给盯上了，

他们以为是日本人来了，差一点就要开炮射击。后来英军舰艇靠近刘氏船队，发现原来是逃难的百姓。但他们也不敢掉以轻心，把整个船队连人带船全部扣留，男女老幼都关进樟宜附近的一个警察局里。凑巧，樟宜警察局附近有一排小店，其中一家杂货店是“顺茂号”的亲戚，他们认识常常乘船出入边佳兰的刘振标，于是赶紧打电话通知了“顺茂号”东主木顺伯。木顺伯很着急，叫樟宜的自家亲戚快快送些饼干给刘家一行人。几铁桶饼干很快地送到警察局，刘家大小逃难的第一天才不至饿肚子。

入夜，空袭警报突然大响，英军迅速让外公等人躲到附近的防空壕里。警报过后，一行人又回到警察局，里里外外东歪西倒地倒头睡觉。这时，一个华人警长前来问话，要再次证明这些人都是逃难的良民，不是日本间谍。母亲当时 20 岁，剪了个男孩子头，脸上抹了灰，身上穿着男人衬衫，那警长过来捏了母亲的脸一把，也就走了。

第二天一早，刘家一行人被放行。那时，比母亲大 4 岁的大姨婵卿已经出嫁，嫁给“顺茂号”的经理许江松，小两口那时已经有了三个幼龄的小孩，一家人住在小坡连城街的一个店屋楼上。那种楼房，怎么说都是钢筋水泥的坚固房子，外公于是带着妇孺老幼投靠大女儿和大女婿去了。

谁知一行人刚刚在连城街住下，日本飞机来轰炸

了。一时间，新加坡市区的警报大响，炸弹一颗接一颗地落在人烟稠密的大坡和小坡。刘家大人小孩匆匆忙忙从楼上下来，三步并作两步躲到底层的楼梯底下。外婆殿后，一手抱着两岁的外孙许永源，一手牵着自己最小的3岁女儿刘丽芬，三人正在楼梯上，“轰”的一声震天巨响，一颗炸弹不偏不倚掉进隔壁的后院，漫天火光黑烟，楼梯旁整片墙壁被震得塌了下来，外婆一把把两个孩子搂在怀里，用身体挡住纷纷落下的砖瓦横梁。一阵惊叫啼哭后，尘埃落定，两个孩子竟然都没事，外婆肩膀被压伤，幸好没有伤到筋骨。

大人们急忙查看孩子们的情况，母亲9岁的妹妹刘丽梅额头被砖瓦击伤，流血不止；大姨的二女儿许舜英和母亲的七弟刘熙昆当时都还在襁褓中，两个宝宝睡在楼上的沙笼里，没来得及抱下楼。众人上楼一看，熙昆掉在地上，他命大，没事儿。舜英被埋在瓦砾中，被挖出来时脸色苍白，还好，她也命大，被救活了。

日军轰炸过后，有救护车到现场救人，外婆和丽梅都被载到美芝路的曼舞罗戏院旁敷药包扎。

看到新加坡市区随时会遭空袭，外公马上带领全家人搬到如今双林寺附近，俗称“乌桥”的树胶园里。离开边佳兰时，刘家的船上载了一些建筑材料，外公派人去取了材料，在胶园里建起一间面积颇大的木板屋安顿家人。同时，他又找人在屋子后面挖了一个可以容纳60多人的防空壕。当年11岁的三姨刘丽芝和当年3岁

多的表姐许舜洳都记得，当日军空袭警报响起时，一家老少匆匆忙忙沿着防空壕的黄泥梯级跑下去躲警报的狼狈情形。警报解除后，大家掀开覆盖在防空壕入口处的枝条树叶，回到木板屋里。这样慌慌张张躲警报的日子没过多久，日本人登陆新加坡了。

2 月 13 日，日军已占领了新加坡多个地点，英军下令解散“星华义勇军”。

2 月 15 号，驻守新加坡的十万英军在司令白思华的带领下，向三万名日军投降，新加坡沦陷了。

[注]

1 奴，潮州人对晚辈的昵称。

11

铁蹄下的边佳兰

母亲那一阵一直做男孩子打扮，剪了个男孩子头，身穿黑裤和宽松的男装衬衫，一副邋邋遢遢的模样。

一个日本兵看见了母亲，起了疑心。他趋前去端详母亲，问阿顺，怎么这个男孩没有喉结？

新加坡沦陷几天之后，日本人搞了一场大检证。新加坡所有成年男性华族居民都得带上几天的干粮，到二十几个指定地点去集中，接受检查。检证开始之前，谁也不知道被检出来的人会有什么下场。

外公听人家说，日本人的目的是要抓读书人。因此去检证站之前，家里两个已经上了中学的男孩子，16岁的二舅刘熙成和13岁的三舅刘熙茂都尽量打扮得土里土气，像没有读过书的粗人。


险遭检证的刘熙茂

据成舅的回忆，到了检证那一天，外公、成舅和家里其他男人一个个顺利过关。过了关的人，手臂上都被盖上一个“检”字。轮到茂舅时，13岁的茂舅虽然身材瘦削，一副仙风道骨的模样，但他浓眉大眼，目光炯炯有神。一个日本军官看了他一眼，怀疑他是抗日分子，立刻把他推到一边，等候发落。外公回头看见儿子被扣留了，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这一幕，让一个过了关的边佳兰乡亲看到了。他认得检证处的一个台湾人，就转回头去跟那个台湾人说，这孩子是我们自己人，放了他吧。台湾人于是低声下气地去向日本军官求情，日本军官犹豫了一下，吆喝了几句什么，挥挥手，让熙茂过关。

后来人们知道，凡是被汉奸指认为抗日嫌疑分子的，都被叫上罗厘车，下场是被拉到海边枪杀或活埋。

日本人狠狠地报复了新加坡华人曾经筹集巨款给中国政府抗日的举动，以及“星华义勇军”在沦陷前夕对日本侵略者的顽强抵抗。在占领新加坡后的两个多星期里，日本人杀害了数以万计华人。对茂舅来说，这一场九死一生的经历，或多或少影响了他后来的人生观。

新加坡沦陷后，海上交通被切断，粮食供应开始紧张。一个月后，一向胆子很大的大舅刘熙深，也就是母亲的大堂兄，开船回到边佳兰想搬一些桌椅家具出来，发现原来回家的海路通畅无阻。于是，外公赶紧带领全家男女老少，迅速回返边佳兰老家。

众人回家后才知道，原来英殖民地政府在沦陷前的疏散工作只做了一半，只有边佳兰街场、头湾和二湾的百姓被迫疏散。后来局势紧张，英国人自己也溜了，大湾以东的甘榜居民，根本没离开过自己的家。

外公回到二湾一看，虽然有秋炳舅和八叔留家看守，逃难前堆放在一间小亚答屋里的一百多担椰干，被人偷剩下三百多斤。屋子旁边一个高高的鸽子笼里的一百多只鸽子，只剩几对。家里养的七八条狗，也不知溜到哪儿去了。所幸疏散前，家里已经没有囤积的树胶，大部分鸡、鸭、猪也卖了。众人回家后，椰林里有了人气，厨房升起炊烟，不久，大狗小狗全回来了。刘家逃难到新加坡头尾一个多月，反正新马两地都沦陷了，在家好过到处流浪。

生活似乎恢复原状，只是人人时时刻刻提心吊胆，

怕日本兵闯到家里来。

根据成舅、母亲和三姨丽芝的回忆，日本兵来时，多的时候来八九个人，少的时候来一两个人。他们的吉普车还没到篱笆门口，狗群已经开始狂吠。这时，家里年轻的女人和男人赶快放下手中的工作，奔到上厅后面的窄廊里，那里有几块活动的木板，抽起板就可以钻出屋子，逃到屋后一人多高的草丛里。

日本兵来了，看到的是一个良民模样不断哈腰点头的外公，两个一瘦一胖穿着黑裤蓝衣脑后梳髻的老太婆以及几个稚龄小孩。家里一个会说一点日本话的长工阿顺，就会恭恭敬敬地陪日本人到处看看。日本鬼总会咿咿哇哇指手画脚地要鸡要鸭。于是，阿顺给他们抓鸡捉鸭，如果日本人要鸡蛋，他就会把原本要卖的鸡蛋装满一篮，双手奉上。

有一回，日本兵又来了，门口几条狗叫个不停。其中一个日本兵发怒了，从剑鞘里刷的一声把剑抽出来，要砍那条带头狂吠的黄狗。外婆赶紧上前求情，用潮州话说：别杀它，鸡、鸭、蛋，随你拿，咯咯给，咯咯给……日本兵似乎听懂了，但是，剑已出鞘，以日本人的习惯，就非得杀生不可。他环顾四周，结果一刀砍向屋前一棵木瓜树，眨眼间，一棵结实累累的木瓜树只剩一根光秃秃的树干。外婆到 80 多岁时，还记得自己当时不知哪里来的胆量，竟然还会跟日本兵讨价还价。

又有一回，日本兵来得太快，母亲来不及躲。那时

母亲20出头，是家里未出嫁的女孩中最大的。两个比较大的妹妹，14岁的丽芝和12岁的丽梅，都躲在厨房里。母亲那一阵一直做男孩子打扮，剪了个男孩子头，身穿黑裤和宽松的男装衬衫，一副邋邋遢遢的模样。

一个日本兵看见了母亲，起了疑心。他趋前去端详母亲，问阿顺，怎么这个男孩没有喉结？母亲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在旁边的外公更是一颗心差点从嘴里跳出来。阿顺机灵，忙说他是男孩，有病，还没好。为了分散日本人的注意力，阿顺带他们去屋后的猪寮，说，你要，就挑一头去吧。

这时老伯在猪寮旁边喂猪，没看见刚才惊险的一幕，见到日本兵要来抓猪，忙用潮州话说：不！不！不！那个日本兵怒了，凶神恶煞，一手紧握佩剑，准备出手。阿顺和外公连忙上前求情，好说歹说，才让日本兵绑了一头母猪带走。

不久，风声又紧了，听说日本人要抓边佳兰一带读过书的女青年。母亲受过一次惊吓，又知道自己是边佳兰唯一到过新加坡上中学的女子，可能躲也躲不掉。于是，在外公的安排下，赶快让家里掌船的老二舅，趁夜色用舢舨载她到新加坡勿洛一带上了岸。母亲第一次离家出走是为了求学，这一次，却是为了逃避日军的魔掌。

日据时期，边佳兰一带的确有一些热血青年参加了马共，拿起武器，匿身森林，与侵略者展开游击战。马



大舅刘熙深（右一）、大妗（右二）和他们的孩子们，摄于二战后。

共武装力量虽然规模不大，武器也不够先进，但还是能时不时给日本人一些致命的打击。躲在森林里的马共分子需要粮食、药物和建立自己的联系网，他们往往会趁夜阑人静时潜伏到百姓家中要求援助。对于那些胆小怕事而拒绝合作的村民，马共曾经以武力对付。外公和几个年纪较大的舅舅们都听说，附近有人因明哲保身，不愿帮助马共分子，结果被马共分子拉到海边一枪干掉。

外公家是边佳兰的大户，后来也被马共看上了。马共分子摸黑而来时，不管是出于对日本侵略者的憎恨，或是出于对马共武力报复的惧怕，外公会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送粮送药。有一回还冒着极大的危险，把一个受伤的马共用自家渔船送到新加坡治疗。

不久，日本人开始怀疑这个外表老实的土财主刘振标，是不是在暗地里接济马共分子。有一天，一队新调来的日本宪兵队开进了刘家的篱笆大门，不由分说把外公抓走，推上军车，送到哥打丁宜的宪兵总部。

接下来，日军对刘振标反复审问，严刑拷打，灌水，各种刑罚无所不用其极。日本人要外公供出马共的藏身之处和联络方法。当时 44 岁身材略胖的外公被折

磨得死去活来，反复地说，我一家几十口人要养，我怎么有能力接济别人？他一口咬定自己不认识马共，无从招认。

当时刘家第三代排行老大的刘熙深，看到叔叔被抓去多日没回来，长途跋涉地到离二湾约 90 多公里的哥打丁宜（Kota Tinggi）宪兵总部探望叔叔。结果看到一个遍体鳞伤、被灌水而身体变了形的半死了的人。28 岁的大舅回家转告众人时，泣不成声，泪流满面，说想不到日本人会凶残到这个地步。两位外婆听后除了放声大哭之外，唯一能做的是不断地烧香拜佛，要老天爷保佑自己的男人吉人天相，保住性命。

后来大舅托了许多人，花了不少钱，才把外公保出来。当然，如果日本人能找到任何一丝外公里通马共的证据，早就一枪把他给毙了。

刘家回到边佳兰后，原来住在新加坡市区的大姨婵卿一家，觉得山芭地区可能比较安全，于是大姨带着三个稚龄孩子回到边佳兰，在靠近娘家的二湾甘榜，向一位福建嫂租了她的浮脚楼的一个房间住下。大姨丈许江松这时留在新加坡打工，时常进出边佳兰。1944 年中的一天，大姨刚刚产下许家的第四个孩子许永光，突然甘榜里的狗

母亲与她的大姐婵卿（左）



狂吠，日本人又来找花姑娘了。

当时27岁的大姨婵卿立刻把刚生下的宝宝搂在怀里，把奶头塞进孩子的嘴巴，盖上被，头上放了条湿毛巾，一副病到奄奄一息的样子。房东福建嫂年轻漂亮，慌乱之间跳入厨房外面四个盛雨水大缸中的一个。几个日本兵掀开大姨房间的窗帘，看到个病人，走了。日本兵接着东翻西找，没去掀水缸，没找到姑娘，就撤了。

事后，大姨发现躺在身边的初生宝宝已经被捂得脸色发黑，差一点断了气。福建嫂从装满七八分水的水缸里爬出来，差一点就透不过气来。两个女人连忙上香，感谢大厅上供着的大伯公保佑自己，保住孩子一条小命。

除了担心日本人随时会来之外，边佳兰的百姓在日本占领时期，大都没挨过饿。许多人自己种番薯、木薯和蔬菜。海产也十分丰富，总有捕不完的鱼虾。后来，竟连大米也不愁了。

原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日本的海上交通被盟军干扰，日本商船被皇军征用，往日的货运线路停顿了。这时，头脑转得快的日本商人与边佳兰本地人成立了一个公司，名为“浪公司”，专门组织新加坡的舯舢船主，沿着马来亚半岛东岸往北去暹罗湾去买米。回程时，浩浩荡荡的一百多艘船，就在四湾下锚避风休息，等待有胆识的人，用电船或汽艇把大米一船一船地拖到新加坡去卖。因为当时，新加坡四周布满了水雷，商船

都不敢靠近。

俗话说，赔本的生意没人做，杀头的生意有人做。答应拉米去新加坡的亡命之徒要求的报酬不是钱，而是要米。一个人要上五包十包米，马上就扛到四湾街市去卖。另外，公司请的搬运工人也会乘机“偷插”。搬运货物的苦力一般都用一种巴掌大的双爪铁钩，一只手把铁钩往米袋上一插，另一只手一提，就把麻包袋扛上了肩。如果苦力有意无意地多插几下，大米自然哗啦哗啦地漏出来，一包米从这一头搬到那一头，就从 160 斤变成 120 斤。

因此，边佳兰一带的人民，包括马来人，战时还能吃到白米。家家户户除了自己养牲口，也懂得屯粮。他们担心万一英、日两方又打起来，家里起码有半个月到一个月的粮食。

日本占领新马之前的一段日子，外公的生意做得挺顺利。三年八个月期间，树胶没有了买主，家里的树胶生产完全停顿。不过四个分布在头湾、二湾和大湾的奎笼，依然运作。每个奎笼上有三个人，一共有十二个人负责捕鱼，每天收获不少。此外，外公也请了四个人在岸上养鸡，养鸭，养猪，还有两个人是掌船的，负责把鱼虾运到新加坡来卖。

这期间，有些原住在新加坡的朋友来投靠外公，其中包括黄学良一家。战争爆发前，黄先生是华侨中学的训育主任，刘家第三代的熙成和熙茂都是他的学生。熙


外婆与他们的子女们。左起：熙茂、丽芬、熙成、外婆、丽娴。

成一向很敬重黄先生，大家一直保持联系。

沦陷后，黄学良在新加坡以教家教为生，但经济上越来越窘迫。黄学良从他华中的同事林绿野那里学会了用炉灰做肥皂的方法，于是想搞点家庭工业。黄学良联络上熙成二舅，问他边佳兰有没有空置的亚答屋，如果将来做成肥皂，赚了钱，利益大家均分。在外公的同意下，黄学良在离老宅不远一个叫“中池”的地方搭了一间亚答屋，养鸡养鸭，同时用土方法生产肥皂。

当时的山芭，遍地是椰壳和枯枝野草。他们先把椰壳烧成灰，加水浸成碱水，碱水煮到某一个浓度，再加入椰油，肥皂就做成了。因此日本占领时期，逃难边佳兰的人不但没挨饿，还有一点额外的收入。

那时，每天在二湾老家吃饭的有四十多人。家里的厨房是由能干的二外婆主理，她的几个女儿们都分头帮忙，用的是最大号的大锅大灶。在沦陷后期，边佳兰二湾的老家总是炊烟袅袅，显出偷安一隅的平静和安详。

12

逃亡苏门答腊

日本人终于走了，大家很高兴，就想庆祝一下。于是，几个人七手八脚地杀鸡炒菜，很快乐。饭菜做好了，结果谁都吃不下。

1941年12月底新加坡沦陷之前，陈嘉庚在英国人要求下成立的“新加坡华侨抗敌后援会”，属下设有好几个部，其中一个是宣传部，由胡愈之领导。

事实上，胡愈之等文教界人士早在12月上旬已经成立了一个“星洲文化界战时工作团”。这个简称“文工团”的文人团体，主要的工作有两项，第一是组织口头宣传队、流动戏剧队和歌咏队，到群众密集的地方去宣传抗战。第二是成立“青年干部训练班”，简称青训班，目的是在短时间内训练青年政治工作人员，准备一旦民众武装起来，可以在民众武装队伍里执行政治训练工作，类似中国武装部队里政治指导员的角色。

“星洲文化界战时工作团”的团长是郁达夫（星洲日报），副团长是胡愈之（南洋商报），张楚琨（南洋商报）任组织部长，王叔旸（书业界）任宣传部长，庄奎章（教育界）任训练部长。

胡愈之是何许人？这里需要介绍一下。

胡愈之（1896－1984）是浙江省上虞丰惠镇人，是二三十年代中国一位著名的作家、政论家、翻译家、出版家。他精通英语、日语、世界语，曾经留学法国，访问过莫斯科。胡愈之是第一个主编《鲁迅全集》的人，也是斯诺（Edgar Snow）的《红星照耀在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的中文主要翻译者，取名为《西行漫记》。自1933年起，胡愈之就是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但从未对外宣布，公开身份是“民主同盟会”的负责

人。1938 年 5 月，胡愈之在武汉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第五处处长，受周恩来直接领导。

1940 年，言论立场偏向共产党的新加坡《南洋商报》，要物色一位政治立场与报馆同步的总编辑，正好当时该报副刊编辑张楚琨，以特派员身份回国采访抗战新闻。张楚琨到重庆见到周恩来时，以试探的口气提出了邀请胡愈之到《南洋商报》来的意愿，没料到不久

父亲在南洋



后，胡愈之果然被派到新加坡，与他的三个同僚张明伦、王纪元和刘尊棋一起参加《南洋商报》的工作。在新加坡，胡愈之以无党派人士的面目出现，以《南洋商报》为阵地，按中共中央的指示，开辟海外宣传阵地。胡愈之学问渊博，办报经验丰富，颇受南洋文化人的敬重，许多人称呼他为胡愈老。

新加坡沦陷前夕，父亲在华侨中学教书。他和新中国剧团时期的老同事徐蕉萌，都加入了“文工团”，并成为青训班的讲师。

青训班一共招收了两次学员，正式开课是在1942年1月上旬，地点是金炎路南侨师范学校。第二期学员招收后不久，战局日趋严重，战线日渐逼近新加坡，日军的轰炸也日渐频繁，影响到日常训练课程。学校当局最后不得不将全体学员一百多人分成四个战时工作中队，分驻在后港、梧槽大伯公、爱同学校等几个地方，就近进行宣传组织工作。当时，父亲是第二中队的其中一个队长，他的老朋友徐蕉萌和林枫，则是第三中队的队长。

1942年1月底，日军已经抵达长堤彼岸。这批文化人见大势已去，就向英政府要求：如果新加坡守不住，这些抗日团体的成员应有撤退的保障。但是，英军这时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他们不答应。就连陈嘉庚这个临危受命登高一呼的侨领，他们也不打算保护。陈嘉庚与胡愈之等人商量之后，认为不能指望英国人了。新

加坡一旦沦陷，他们只会成为日军第一个对付的对象，白白送命。

为了保存实力，1942年2月3日，陈嘉庚等人先乘船离开新加坡，前往爪哇。2月4日，胡愈之等一批文化人，包括郁达夫、邵宗汉、王任叔、张楚琨和汪金丁等28人，乘船撤退到苏门答腊，打算到了印尼之后，转往澳洲或印度，再回重庆。

剩下的人，由当时的《南洋商报》记者吴柳斯负责安排逃亡。1994年，我请吴柳斯回忆当时的情况，他说：

胡愈老他们先走，我们还有很多人。胡愈老在2月1号跟我说，你是本地人，土生土长的，你想方设法保护文工团的骨干。真的没有办法时，撤退到石叻班让（Selat Panjang）去，想办法把这些人带走。

后来我租了两艘渔船，当时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大家凑钱出来，大概两艘船租了两千多块钱。一起走的有30多人，包括林枫、朱奇卓，还有徐蕉萌、徐侠都在船上。大家2月9号晚上集中，10日离开新加坡。

新加坡文化人分批到达印尼苏门答腊东岸的小岛石叻班让，不久，原是荷兰殖民地的印尼，也向日本人投了降。为了避开日本特务对抗日分子的追捕，他们分散开来，有的投靠自己在印尼的亲戚，有的得到当地热心华侨的帮助，在偏僻的小岛、小乡镇里埋名改姓的隐居

下来。

当时，一位《星洲日报》记者薛残白的岳父，家在石叻班让。好几个新加坡文化人，包括父亲、诗人杨骚和文学家王任叔（笔名巴人），都躲到他岳父家对面的一个叫阿沙汗的小岛的硕莪园里，靠捕鱼和种菜为生。

后来，父亲又转移到离石叻班让以北不远的浮罗巴特（Pulau Batek）。在那里，他与徐蕉萌等人一起生产肥皂和拜神用的银纸。徐蕉萌记得，当时曾发生过一件令他们难忘的事。他说：

有一回，日本人去搜查我们在 Songgai Pingneng 的肥皂厂和纸厂。我们的厂是设在山芭里。但在港口，我们有一个情报站。

一天，大家正工作时，有一个小孩骑了脚车来，拿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他们来了！我赶快拿了一个麻包袋，把胡愈之等人留下来的证件、文件全收在麻包袋里走出屋子，想丢在森林里。不巧，一出门就碰上当地一个马来警察，他问我要做什么，我说，我去寄东西。警察问，寄什么？我说，哎呀，明天你来拿钱啦！就这样蒙骗过去。

日本人来了，到处搜查，翻箱倒柜，连我原来收藏文件的地方也被日本人用刺刀狠狠地捅了几下。那时，我的大女儿刚刚出世，从新加坡回到印尼不久，我紧紧地抱住她。

我们这批文化人里，有一个叫张明伦的，会说一点日本话，就跟日本人有一句没一句地应酬几句。日本人终于走了，大家很高兴，就想庆祝一下。于是，几个人七手八脚地杀鸡炒菜，很快乐。饭菜做好了，结果谁都吃不下。

除了那一次的惊险，还有过一两个日本宪兵前来突击检查，但都平安无事，虚惊一场。

再往后的一段日子，父亲跟陈仲达等人，回到石叻班让开了一间小饼厂做硕莪饼，兼售卖杂货。父亲专门负责推销，常常带着几十铁桶的硕莪饼，乘船到附近的小岛去卖，主要是卖给吉艾店，也就是杂货店。

父亲的同乡蔡建奕，在日本占领时期没有离开新加坡，幸运的逃过大检证。有一回，他弄了一张通行证到印尼的硕顶去，并从当地人那里知道父亲刚好来卖饼，住在市区一家金店的楼上。一天，蔡建奕在那金店的楼梯口，叫住了正要上楼的父亲。

蔡建奕：奇卓兄。

朱奇卓：建奕，是你。你怎么来了？

蔡建奕：我想来这里找份工作。

朱奇卓：你要小心，你刚来就暴露了你的身份，说你在新加坡是做报馆的，是人家告诉我的。

蔡建奕：哎，有华侨问起嘛……

朱奇卓：你要小心，这里的日本人很注意新加坡逃来的文化界人士。我看，你最好还是先回去新加坡。

后来，蔡建奕在印尼的工作没谈成，就与父亲一起乘船经浮罗巴特到石叻班让，再回返新加坡。在这两个地方，他们见到不少新加坡文化人。

事实上，苏门答腊当地华人都渐渐地知道了这批新加坡文化人的真正身份，只是大家心照不宣，更不会让日本人知道。另一方面，日本人在印尼的驻军不多，统治手段比较放松，不然的话，这些抗日分子恐怕早就凶多吉少。这批文化人过后分析，其实就连日本人，也都早就知道这批文化人的底细，只是一直没有什么行动。

1945 年 8 月 14 日，也就是日本宣布投降前一晚，有朋友通知父亲这一批人，当晚千万不要回家。那天晚上，果然有一队荷枪实弹的日本人前来，咚咚咚地狂敲饼厂大门。没人应门，他们破门而入，翻遍整个屋子都找不到人，只好空手而归。

父亲他们事后猜测，如果当晚不是得到风声先躲避起来，可能就会像郁达夫一样被人拉去。据说，日本人早就挖好了一个大坑，打算要活埋这批文化人。

有关郁达夫逃亡印尼并客死异乡的文章，他的亲密战友们多有著书叙述。

离开新加坡不久，这些文化人当中的中坚分子，胡愈之，他的太太沈兹九、郁达夫、王任叔、张楚琨、邵宗汉等先后到了苏门答腊西边北甘巴鲁（Pekanbaru）的巴亚公务（Payakumbuh）。

逃难印尼时，郁达夫 47 岁。没来南洋之前，他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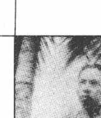
中国已经是出了名的颓废诗人、文学家。他性格旷达不羁，浪漫、热情。由于早年留学日本，郁达夫说得一口很标准的日语。在前往巴亚公务的途中，他不小心泄露了自己会说日语，后来就被日本人拉到离巴亚公务30公里的武吉丁宜（Bukit Tinggi）日本宪兵部当了七八个月的翻译。而郁达夫也利用日本人不懂得印尼语，本地人不懂得日语的优势，为当地人民做了许多好事。

为了使流落印尼的新加坡文化人有所掩护，郁达夫出面申请了一个酒厂执照，在当地爱国华侨的资助下，办了一家叫“赵豫记”的酿酒厂，当起老板来。酒厂管账是胡愈之，经理是张楚琨。

其实，这几个文化人原本都不会酿酒。张楚琨从当地华侨那里了解了一些土方法，自己再拼命的钻研书本，加上多次试验，终于找到了用米来酿酒的方法。后来，汪金丁、吴柳斯也到了那里，当起推销员和酿酒师。胡愈之的太太沈兹九早年也曾留学日本，她为酒厂的产品起了两个很日本的名字，叫“双清”和“初恋”，后来这两种牌子的白酒销路都很好。

然而大约一年后，为了躲避来自新加坡的特务的追踪，这批人后来又分散到苏东的棉兰（Medan），北部的马达山（Brastagi），和苏南的南榜（Lampung）和巨港（Palembang）去。但是，郁达夫、张企程和汪金丁等人，则留守巴亚公务。

林枫、张楚琨、高云揽、杨骚、温平和洪丝丝这几



个人，在南榜和巨港开肥皂厂做肥皂，方法是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理化专业的方君壮发明的。张楚琨还发明了用香蕉来做酒。日本投降以前，这批文化人靠做酒和做肥皂，赚了一些钱。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8 月 29 日晚上，在巴亚公务的郁达夫，被人从家里叫出去，就没有再回来。

日本知名郁达夫研究专家铃木正夫费时二十多年，多次走访实地，寻访了不下一百个曾在南洋与郁达夫有过关系的当事人和知情者，调查郁达夫战后的下落。最后作者找到嫌疑最大的宪兵班长 D 氏。经过多次拜访，时年已 75 岁的 D 氏终于在 1985 年承认，是他发出杀害郁达夫的命令，1945 年 8 月 29 日由两宪兵执行，勒死郁达夫。过后，两个执行命令的宪兵离队逃亡，下落不明。

13

缘系狮城

1945 年中，日军对新加坡的控制逐渐宽松，有一天，李家老二李肇汉说要给母亲介绍一个刚从苏门答腊出来的文化人，叫朱奇卓……

1942 年新马沦陷后不久，母亲从边佳兰只身来到新加坡，为的是听说日本人在边佳兰搜寻读过书的女青年和马共分子。母亲虽跟马共毫无关系，但她在新加坡读过中学却是事实。在边佳兰那样的偏僻乡村，目标似乎太明显了。那时大检证已经过去，一些日本商家开始在新加坡开门做生意，要找份工作做不算太难。

母亲跟一个南华女中的同学，在竹脚巴刹附近一间旧式排屋的楼上租了个房间住下，再到五马路（Queen Street）的一家学店读日文。上完三个月的速成班，学会了日语基本会话。接着，母亲在美芝路（Beach Road），也就是如今黄金戏院附近的一家日本人开的“南方造船厂”（Nanpong Motoryama）找了份文书的工作，负责听电话、打算盘，登记往来的木材吨数等等。除了一份微薄的薪金之外，公司每个月配给 15 斤米，还配给几尺布，定量的白糖和盐。在当时物资匮乏百物腾涨的新加坡，这是一份令人羡慕的差事。

有一天，母亲下了班回到家正在休息，楼下有人喊道：“丽娴，有人找你！”母亲下楼，只见篱笆门外站着一个年轻姑娘，定睛一看，是老家边佳兰四湾的一个熟人，母亲着实吓了一大跳。

那时候，替日本人工作的一般都被看成是汉奸。但母亲为日本人打工是逼于无奈，没办法中的办法。这个姑娘是个远房的亲戚，是马共的同情者。这之前，母亲也听说过马共杀死汉奸的事。母亲想，惨了，她是不是

要来对付我了。还好，这个姑娘只是有事相求。原来她有一个住在新加坡的朋友，一大家人没有粮食吃接近饿死，她请母亲为这家人的 18 岁女儿佐妮找份工作，母亲一口答应。

第二天，母亲去见她那两个一胖一瘦的日本老板，说，我有朋友要找工作，日本老板正缺人手，很爽快地答应了。于是佐妮就开始跟母亲在同一个公司上班，不久，母亲也搬到佐妮位于阿里哇街（Aliwa Road）10 号的家，跟他们住在一起。两个少女每个月有 30 斤白米往家里搬，日子比较好过了。每当吃晚饭时，佐妮的妈妈为一家人煮粥，总是先捞起一碗干饭给母亲吃。乱世见真情，大家互相帮助，互相扶持。这段往事，母亲到老年时还常常挂在嘴上。

另一方面，外公家奎笼的捕获，并没有因为战乱而减少。那时，负责掌管渔船的是大舅熙深，他每天把几个奎笼的收获，从边佳兰运到吊桥头（Elgin Bridge）的新巴刹来卖。母亲时常到船上跟大舅拿些鱼虾，有时还叫大舅从家里抓一只鸡来，送给亲朋好友，生活总算安定下来。

母亲开始认真地对待父母挺为她着急的一件事，那就是找对象。潮州有句老话说：十七、十八红株柑，十九、二十破布篮。母亲那时已二十出头，以传统的婚嫁年龄来说，她已经超龄了。外公和外婆很了解他们这个素有“三星婆”雅号的女儿，她是决不会听从父母之



命媒妁之言的，所以，他们也从来没想过要为女儿物色婆家。

日本人来了之后，外公最担心日军到处糟蹋良家妇女。母亲在边佳兰时，有一次差一点被日本人识破她是女儿身之后，外公快快把母亲送出新加坡，不止一次地告诉她，只要不是姓李的，谁都可以嫁。原来姓刘的和姓李的不知几代前在潮州桂坑乡结了怨，祖宗发了毒誓不能结亲。外公甚至戏谑地对母亲说，猪啊，狗啊，你都可以嫁。

玩笑归玩笑，外公外婆只希望这个二女儿早点觅得自己喜欢的对象。

外公在南洋谋生一辈子，有很深交情的朋友不多，除了顺茂号的木顺老伯，就数同是潮州人的裕香茶庄的李家了。裕香茶庄在美芝路上，母亲在新加坡工作后时常在李家出入，跟李家几个儿子都很熟悉，彼此以兄妹相称。


朱奇卓与刘丽娴

1945年中，日军对新加坡的控制逐渐宽松，有一天，李家老二李肇汉说要给母亲介绍一个刚从苏门答腊出来的文化人，叫朱奇卓。



结缘

听到这个名字，母亲有点印象。原来1940年母亲在南华女中读书时，有一天，校长冯依湄请了两个人来演讲，给学生们分析当时中国抗战的形势，其中一个人就是当时“新中国剧团”的随团记者朱奇卓。当时，朱奇卓大约是二十八九岁，一表人才，在台上滔滔不绝，给母亲留下挺好的印象。

日本占领新马的三年八个月里，华侨中学的训育主任黄学良避难到边佳兰外公家，母亲经常回家，跟黄学良熟络之后，也跟他谈到自己的志向。母亲说自己不喜欢教书，因为自认没有丹田力，不能说话说个不停，还是比较喜欢新闻工作。母亲也说自己性格好动，比较冲动。黄学良突然想起他的学生朱奇卓，说，你的性格跟朱奇卓很相似。闲聊当中，黄学良也提到朱奇卓的家庭

背景，说他家庭贫寒，个性积极，教书认真。因此，朱奇卓这个人对母亲来说，并不是完全陌生的。

但是，当母亲被正式介绍见到朱奇卓时，这个曾给母亲留下美好印象的文化人，刚刚历经了三年多流离颠沛的逃亡生活，显得苍老而憔悴，牙齿也因烟抽多了而发黄，跟五年前在南华女中礼堂里演讲的那个意气风发的记者，大不相同。

据潮州老家多位亲戚的回忆，父亲年轻时在潮州教书，前后有过两段"美丽"的罗曼史。"美丽"是由于故事的女主角都是当时潮州城里的美女，其中一段还达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但是两段感情都因缘分未到，或是父亲家里太贫寒而没了结果。而母亲在这之前也交过男朋友，却因彼此个性和教育程度有差距，交往了一阵就告吹了。

俗话说，姻缘前生定。刘丽娴与朱奇卓的年龄相差整整十岁，但彼此见面算是十分投缘。朱奇卓常常带他新交的女朋友到老朋友蔡文玄家里去，蔡太太洪芳娉是父亲潮州金山中学的同学。那时蔡文玄在邵氏电影公司做事，他们一家就住在大坡大世界旁。蔡家那时有几个孩子，其中一个女孩叫蔡亮，她还记得父亲当时喜欢穿白色及膝短裤，爱说笑话，说话声音洪亮。

父亲从苏门答腊出来时暂住在裕香茶庄，为的是替朋友办一点事，事情办完了原本还想回去印尼，因为与母亲"拍拖"而拖延了。后来母亲建议他不如像黄学

良一样，到边佳兰的山芭里住下。但没多久，日本就宣布无条件投降了，那是1945年8月15日。

和平后，母亲曾带父亲和李肇汉等人到边佳兰的老家玩，当然也是让外公看看这位有可能成为他的女婿的人。那时外公和另一位长辈得胜老舅，私底下都嫌朱奇卓的年龄太大，不过考虑到他有学问有才干，而母亲年纪也不小了，也就没有反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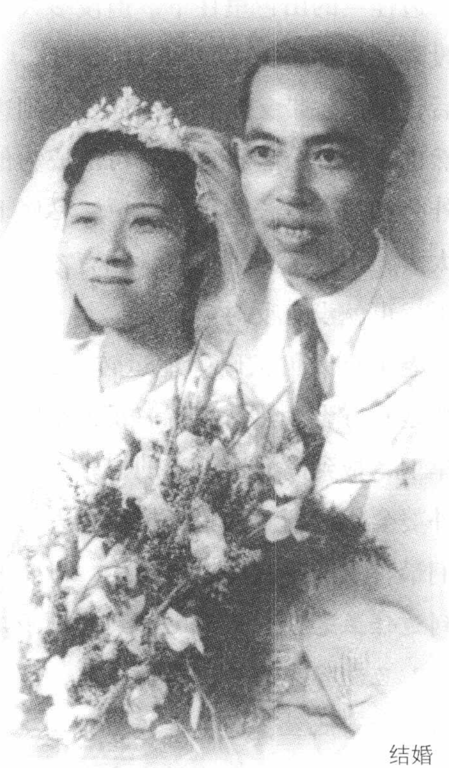
边佳兰老家每天忙忙碌碌地运转着，有客人来时，外公外婆总是想方设法热情招待。每天小船从奎笼收了鱼虾回到岸上，拖到离海边不远的一张大木台上进行筛选，外公外婆会用最新鲜的鱼虾招待客人。

客人们最喜欢的是在海边吃鱼生。母亲回忆说：

> 大家到边佳兰老家，用刚刚抓到的小西刀鱼做鱼生吃。怎么做？鱼洗净先去鳞，起出鱼肉，吊起来晾干后切薄片。然后切黄瓜丝，加花生碎、甜酱、醋；再加一点南姜末、豆酱油。你父亲吃得津津有味，我觉得很奇怪，咦，怎么朱奇卓喜欢吃的东西，跟我阿公喜欢的一样？

1945年11月12日，我的父亲和母亲在新加坡注册结婚。

外公做东在南天酒楼摆了几十桌茶会，父亲身穿一套白色西装，母亲一身白色西式婚纱，蔡文玄夫妇充当证婚人，刚从印尼回来的胡愈之沈兹九夫妇充当主婚人。不知是谁出的主意，婚宴上还请来两个7岁的小女


结婚

孩充当花童，一个是母亲最小的胞妹刘丽芬，另一个是母亲大姐的大女儿许舜洳。许多跟父亲一起逃难印尼的朋友，都出席了他们的难兄难弟在和平后办的第一桩喜事，几百人济济一堂，热闹非凡。

在受邀参加父母亲婚礼的嘉宾中，有一对英国人安德鲁（P. H. Andrews）夫妇，父亲称他们为干爹干妈。安德鲁年轻时曾在武汉教过书，对中国有一定的好感。战前，安德鲁是麻坡的警察总监，他比较同情进步的左

倾分子，支持海外华侨的抗日筹款工作。安德鲁曾经让“武汉合唱团”在麻坡顺利演出，不久，他以同样的热诚迎接“新中国剧团”。剧团在别的地方不能上演的一出暴露日军暴行的话剧《胎妇》，在麻坡得以顺利上演。父亲在他的随团特写中，也曾盛赞这位给予他们大力协助的国际友人。

新马沦陷时，安德鲁夫妇被日军逮捕，关进集中营，饱尝铁窗之苦。和平之后，他们夫妇登报找寻“武汉合唱团”和“新中国剧团”的老朋友，父亲与几个剧团的朋友终于与他们重逢，分外高兴。因此父母亲结婚时，也邀请他们出席盛宴。这一段往事，后来在新中国，成了父亲的政治包袱。每当父亲需要写自我检讨时，总要极力澄清自己与安德鲁夫妇的关系，极力说明自己没有因为与这对英国警长夫妇的交往，而干出任何对不起人民的事。

结婚后，父母亲的新居设在密驼路（Middle Road）24号三楼。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在二战之前和日本占领新加坡期间，密驼路和它周边的几条横街，有许多日本商号，是日本人的商业大本营，也是日本的谍报中心。

密驼路24号店屋是战争结束时，一个华中学生占用的“敌产”。二楼整层是华侨中学的校友会会所，三楼就借给父母亲住。三楼常常是十分热闹的，因为父亲的一班朋友们时常到我们家来开会，讨论重建新马的文



化事业。

当时以胡愈之为首的进步文化人，正紧锣密鼓地进行几件事：一是筹办新南洋出版社；二是出版《风下周刊》，由胡愈之（笔名沙平）亲自主编；三是出版《新妇女》杂志，由沈兹九主编；四是设立中国国际新闻通讯社（简称国新社）的新马分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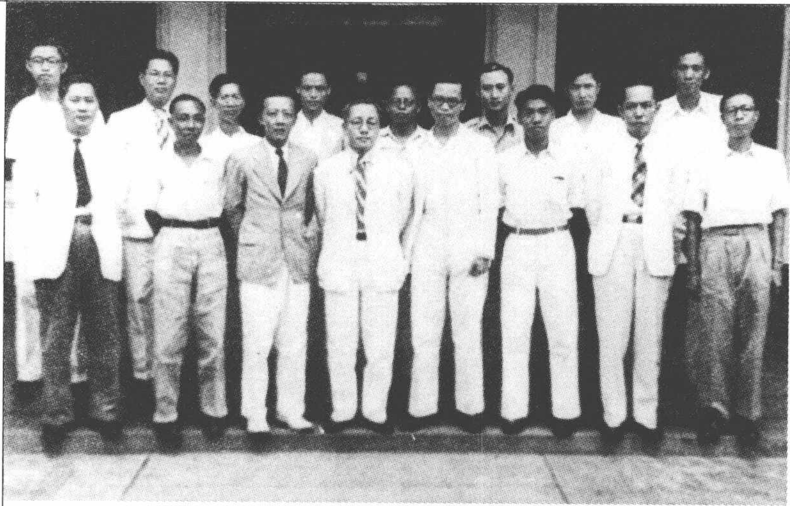
不同于中国共产党办的新华社，国新社可以算是一个民间组织，1938 年在周恩来的参与策划下，由进步文化人范长江、胡愈之等人发起成立，但实际上也是由中共直接领导。1940 年之后，国新社不容于国统局（国民党政府的特务组织），这批文化人于是转移到香港，设立了国新社香港分社。

除了在新加坡迅速建立亲共的舆论平台之外，在胡愈之的调度安排下，那一批曾避难印尼的文化人，也分散到其他东南亚国家去。其中，王任叔、邵仲汉和蔡馥生留在棉兰办《民主日报》；黄声则去泰国办报。1945 年 12 月底，方君壮、洪丝丝，以及彭友真，要到槟城为《现代日报》复刊，邀请父亲前往。于是，新婚不久的父母亲把房子退了，把家具送给了亲戚，收拾了包袱就上路了。

14

《南侨日报》

在出入我们家的许多同事朋友当中，母亲清楚地记得有另一位年轻的《南侨日报》记者，他曾是华中学生，也是马共成员，叫方壮璧。



1946年9月1日，星华记者公会在中华总商会举行就职典礼后合影。前排左起：王哥空、朱绪、王仲广、英倚泉、胡伟夫、陈灰曼、朱奇卓、薛残白。后排左起：彭友真、吴柳斯、吴广川、蔡建奕、罗若雪、李金泉、陈羊羽、黄思。

战前，新加坡的华文大报主要是《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

《南洋商报》是1923年由殷商陈嘉庚独资创办的。陈嘉庚17岁从中国福建省南来新加坡，协助父亲经营米店。后来自己创业，生意从黄梨种植业迅速扩展至黄梨罐头厂、米厂，到树胶种植等行业。在1925年前后，陈嘉庚成为新马一带最大的树胶种植者之一。陈嘉庚在1910年就参加了孙中山发起的同盟会，坚信封建懦弱的中国要强大，就必须信奉三民主义，也就是要实现民生、民权和民主。《南洋商报》打从创刊之日就旗帜非常鲜明：爱国，抗日，反对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21条辱国条约，抵制日货。

1937年日本发动对华侵略，同一年，陈嘉庚的企业受世界经济萧条的影响而宣告破产。《南洋商报》的产权后来转给李玉荣、李光前家族，不过，陈嘉庚对《南洋商报》仍旧有很大的影响力。同一年，“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在新加坡成立，陈嘉庚被推选为主席。他不遗余力地发动筹款运动，援助中国国内抗战，《南洋商报》很自然的成为筹赈会的喉舌。

像当时绝大多数南洋的华侨一样，陈嘉庚一直是当时中国的执政党国民党的忠实拥护者，《南洋商报》报馆里以及怡和轩俱乐部，都挂着国民党委员长蒋介石的头像。

1939年初，日军几乎切断了中国沿海的物资供应线，陈嘉庚响应国民党政府的呼吁，征召南洋各地会开车、会修车的青年，到刚刚修建好的滇缅公路上去，把战备物资从缅甸运往大后方的昆明。当时共有来自星、马、泰、印尼和沙拉越的三千多名热血青年报名参加。他们抛开南洋舒适的生活，组成南侨机工大队，分9批前往昆明。经过短期的军事训练，南侨机工投入工作，面对敌机疯狂轰炸，路险翻车以及疟疾肆虐的三重生命威胁。

1940年3月，66岁的陈嘉庚与他所发起的“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到中国各地视察国内抗战情况，同时要了解南侨机工在华的生活。他到战时的首都重庆，会见蒋介石等国民党要员；也到共产党的延安根据地，与毛泽东、朱德等中共将领长谈，后来在重庆又

与周恩来会面。陈嘉庚在国内走遍十二个省份，亲身观察体验国共两党的政治理念和领导作风。当年12月中旬，他在槟城侨领庄明理等人的陪同下，沿滇缅公路经缅甸回返南洋。在国内这10个月里，陈嘉庚看到了国民党政府奢侈浪费和腐败的一面，也看到了共产党言行一致、真诚抗战的一面。

回到新加坡之后，陈嘉庚开始反蒋和宣传共产党，这一来，就遭到国民党势力的群起攻击。1940年12月，来自国内的胡愈之出任《南洋商报》主编之后，《南洋商报》拥护共产党政策的立场就更为鲜明了。

《星洲日报》是万金油大王胡文虎胡文豹家族众多“星系”报纸中的一员，创刊于1929年。胡文虎也爱祖国，不过据老一辈的报人说，《星洲日报》的言论立场忽左忽右，取决于当时谁是总编辑。抗战时期，《星洲日报》的总编辑是中国著名报人俞颂华。

两家报纸由于历史背景不同，加上同业间的竞争，向来不但对立，而且斗得很厉害。不过，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星洲日报》的总编辑俞颂华与《南洋商报》的胡愈之，在报纸上的言论却一样是同仇敌忾，相互呼应的。两位总编辑个子都矮小，当时在《星洲日报》编副刊的郁达夫曾笑言，说胡愈之和俞颂华两人和孙中山、列宁一样，都是矮小的大人物。

日本投降后，《星洲日报》和另一份“星系”报纸《总汇报》很快的以《联合报》的面貌复刊了。而《南洋

商报》战时被日本人占据，出版了《昭南报》，由于股份的变迁和编辑班子的改变，经理换了人，胡愈之等人无法重返《南洋商报》，也就少了一片重要的言论平台。

1946年中，国共内战在东北和华北爆发，新马华人也分裂成两个阵营，一个支持中国国民党，另一个以陈嘉庚为首的支持中国共产党。当时胡愈之等人已经出版了《风下周刊》和《新妇女》杂志，中国国际新闻通讯社的新马分社也开始运作。为了开辟一个规模较大的舆论阵地，拥有自己的宣传喉舌，陈嘉庚和胡愈之等人，决定要办一份自己的报纸，以集资的方式办《南侨日报》。据当时在《南侨日报》担任印刷社经理的林枫说：

我们搞了一个有限公司，大老板是陈嘉庚。张楚琨、高云揽、陈岳书都投了很多钱下去，我也投了一些钱。陈嘉庚为首，拉了很多股份，当时经济很困难。

张楚琨在他的《陈嘉庚与南侨日报》一文里写道：

胡愈之很快组成一支出色的突击队，编辑主任胡伟夫和编辑罗曼罗、胡佗、陈灰曼，自愿抛开《星洲日报》较优厚待遇来参加这草创的民主事业；另一部分是从印尼归来的患难朋友吴柳斯、张明仑、蔡高岗、朱奇卓、陈仲达、许侠；还有老报人彭世祯、张逸灵、黄诚、吴广川、王式民、黄叶生、彭友真、石韫真以及青年朋友黄祥坤、郭建成等，是个不到20人的小班子。

事实上，父亲战后先去槟城担任《现代日报》编辑，前后大约7个月。1946年中，当母亲怀着哥哥，

大腹便便时，两人又回到新加坡。父亲加入《总汇报》和《星洲日报》当编辑，在胡伟夫手下工作。当胡伟夫率领一批《星洲日报》同人跳槽《南侨日报》时，父亲是其中之一。

母亲始终保留着新加坡沦陷前外公给她逃难应急的200元，这时候，也拿出来投入《南侨日报》，数目虽小，也算一种精神上的支持。

当时，新加坡的几家大报，《星洲日报》、《南洋商报》和英文《海峡时报》的报馆，都集中在罗敏申路(Robinson Road)。《南侨日报》在物色地点时，正巧，位于罗敏申路转角，吉宁街（Cross Street）口的马共报章《新民主日报》被封收盘，《南侨日报》顺利地顶下了那两幢三层的楼房。

父母亲与哥哥华华



那年农历八月十五，当这批文化人风风火火地准备办报时，母亲到五马路一个印度医生 Dr Summy 的诊所，产下了一个 8 磅重的胖儿子，我的哥哥。这个时候，在中国潮州老家的伯父已经有了两男两女，伯父给他们都取了重名。父亲乐得跟随哥哥的做法，一方面大概是爱国爱到骨髓里去了，于是为儿子取名华华。

哥哥两个多月时，《南侨日报》创刊号面世，那是1946年11月21号。林枫记得当时的参与者都十分兴奋、激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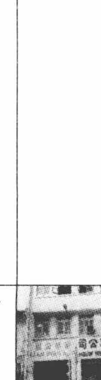
> 印象最深的是，第一天晚上，4版报纸出版了，已经差不多天亮了，我们到大街上，喊“南侨报！南侨报！”

《南侨日报》开业之后，由于政治局势的影响，其经营和维持并非一帆风顺。当时海外华侨受正统思想影响较深，也就是支持当时仍掌握政权的国民党的人比较多，加上比较胆小怕事，对公认是倾向中共的《南侨日报》敬而远之，这样就给组稿、采访、登广告、发行等带来重重困难。广告不多，报纸的生存就受到威胁，《南侨日报》在开始的一两年，可以说是举步维艰。林枫记得：

> 那时候经济很困难，很紧张，经常没有钱发工资。第一个春节（1947年初），我们减薪一次。大家拿得很少，拿100多块钱。那时得看广告部有没有钱，广告部想种种方法去找钱，有时还发不出薪水。

故事到这里需要简略的介绍一下当时《南侨日报》的生存环境，也就是英殖民地政府、民主人士、和马共之间的共生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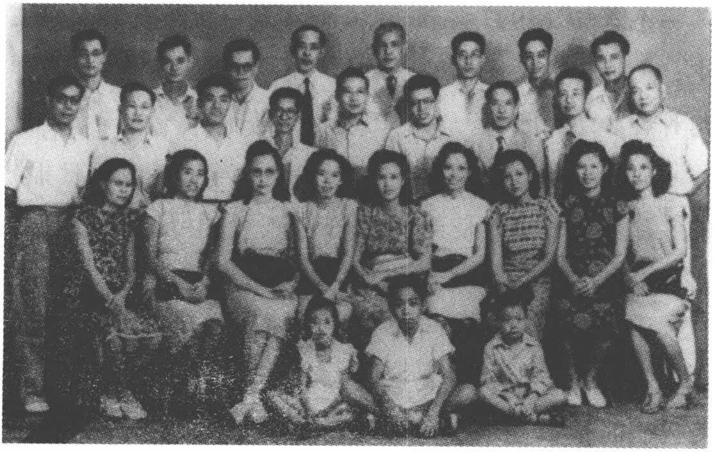
中共和马共开宗明义是反帝国主义，反殖民地的，因此在战前，中共和马共在新马为英殖民地政府所不容，当时他们的活动是非法的。由于马共领导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在抗战期间有功，战后的两年半里，马共属于合法在新马活动。《南侨日报》成立之前，马



共在新加坡是合法组织，有大约300个党员，拥有自己的《新民主日报》。

另一方面，追随陈嘉庚和胡愈之办《南侨日报》的一批进步文化人，大多数是“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的盟员。“中国民主同盟”源自中国，是一批主张抗日和民主的人士，于1941年在重庆成立。草创时包容了“三党三派”，那就是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后改称民主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以及其他无党派人士。

自从胡愈之在1946年中，在新加坡成立了民盟马来亚支部之后，短短的两年里，新马三百多万华侨中有两千多人成为民盟盟员。《南侨日报》里许多员工，包



南侨报同仁，二排右一为母亲，三排右四胡伦，右六吴广川，右七陈灰曼；后排右一林醒凡，右五父亲，右六胡伟夫，右七石蕴真。

括我的父亲，都是民盟的盟员。

民盟的民主人士和马共成员，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但始终维持着一种友好的关系。

《南侨日报》开张后，父亲先后担任过编辑、采访主任。而母亲也在《南侨日报》当校对，圆了她自幼想从事新闻工作的梦。《南侨日报》面世后的第二年，报馆又出版了《南侨晚报》，一个不到20人的编采班子要同时兼顾两份报纸，工作压力不轻。

当时，在一群年轻记者当中，有一位父亲在华中教过的学生，叫郭建成，他从学生时代就深受父亲的影响，他回忆说：

我战前在华中读书，朱先生是副训育主任。

当时校长薛永黍是兼容各家各派的教育家，那时在华中，对一个青年学生的影响，有三方面，一个是马共的；我的班主任国文老师，是比较倾向国民党的；还有进步的，比如朱老师。对于接受文化，我是从国文老师那里接受来的；但是对于人生道路应该怎么走，我最后还是跟着朱老师。

他有一个特点，他也不同意马共，但他有爱国心，对青年的成长比较重视。我有一点什么能力或优点，他总是尽力培养我，鼓励我。我投稿，是他鼓励的，我参加青训班，也是他鼓励的。后来朱老师还介绍我到《南侨日报》工作。

朱先生在《南侨日报》时是外勤主任，有时也编

一编本坡版，我是记者，他跟我的工作比较密切。当时《南侨日报》有两摊，一个是日报，一个是晚报。任务他安排给我们，我都是向他学习。

一般商会开会，都是我去的，但最重要的投票，竞争很剧烈时，往往是他自己去采访，回来就写特写。那一年，刚刚是商会竞选，当时有两组人在争领导权，一部分是亲国民党的，有一部分是我们陈嘉庚派的，像孙炳炎。这样的场合往往是朱先生自己去，他写特写观点比较鲜明。

父亲在《南侨日报》工作时，他的学长蔡文玄工作的邵氏电影公司也在罗敏申路。蔡文玄常跟他的两个好友到老巴刹吃午饭，时常碰见父亲和朋友也在那里吃饭。1994 年，蔡文玄还记得：

奇卓最喜欢叫的是“猴鱼”（石斑）一条，炒面两盘，肉枣（五香肉卷）一盘。煮炒摊的伙计就会说：知道了，你们就是喜欢吃这几样！

1947 年中秋节前后，母亲的第二个孩子快出世了。临生产前几天，父亲难得陪母亲到离家不远的政府大厦前草场（Padang）去散步，说产妇多散散步，生产的时候比较容易，两人也商量好了，到时请医生来家里接生。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母亲阵痛开始了。父亲正要上班，在工作与私事之间，父亲显然认为前者比较重要。母亲这一口气，居然憋了几十年：

我叫你父亲快去五马路请医生，你父亲说，我去发



密驼路 74 号



四口之家

了稿再来。发了稿再来？肚子实在痛得不得了，我只好叫带你哥哥的老妗去找住在楼上的一位同事，请她去把 Dr Summy 请来。医生来了，说时候未到，又回去了。晚上医生和护士再来，到半夜才把你生出来。

我生于中秋节之后两天，当晚月亮又圆又大又亮，父亲为我取名亮亮。

刚从槟城回到新加坡时，父母亲原本借住在吴柳斯于芽笼 6 巷的家的前房。工作安定之后，他们又回到小坡的密驼路，在密驼路 74 号租下了二楼一层房子。74 号的楼下是厚兴鞋店，三楼住的是一位姓黄的裁缝一家。74 号对面是著名的“达开尔”照相馆，因此父母亲想拍家庭照时非常方便，下楼只要过一条马路就行了。我们 74 号二楼的家隔成前后两块，前面对着大街的是父母的卧房，后面是客厅，再往后是厨房和浴厕



哥哥朱华华（左一）与表哥们在边佳兰



顽皮的华华

间，我们一家在这里住了好几年。

由于父母亲工作忙碌，母亲请了两个远房的亲戚来照顾哥哥和我。看顾我的铭荣妗是大妗（大舅母）的嫂嫂。许多年之后，铭荣妗还津津乐道于我小时候很听话，她常在小客厅的地板上画上一个圈圈，给我一块饼干，我就会乖乖地坐在里面。

如今密驼路那一排店屋都被拆了，厚兴鞋店的具体地点，大约就是今天洲际大酒店（Hotel Intercontinental）面对国家图书馆的停车场入口处。

由于地点适中，常常有同事来找父亲，或来我们家开会。在出入我们家的许多同事朋友当中，母亲清楚的记得有另一位年轻的《南侨日报》记者，他曾是华中学生，也是马共成员，叫方壮壁。

在一本2006年出版的方壮壁的著作《“马共全权代表”方壮壁回忆录》里，我惊讶地发现，方壮壁详细的记录了他与父亲一段往事。书中第72至73页这样写道：

一天[1]，我（方壮壁）漫无目标地走进薛（永黍）校长在大坡工作的办事处，仅仅是借着拜访以表示后辈

对长辈的关心和尊敬。校长自从被迫退出华中之后，免不了会感到寂寞无奈吧。

怎知我刚一进门，后头就有人尾随而来，回头一望，原来是前华中的副训育主任朱奇卓老师。

朱奇卓老师是人如其名，既奇特又卓越。他思想敏捷，浑身是劲，总是对周围散发一种朝气蓬勃、青春活跃的感染力。我一直十分敬佩和喜欢他。一见到是我，他竟放开了薛校长，对准我发话："好呀，好呀，你在这里……"不等我稳定情绪，他又转口对着薛校长："李光前不是来要这个人吗？……"老成持重的薛校长仅是微笑点头，未置可否。

我这时已稳定过来，及时反应："有这样的事？我可是从李光前先生那里闹翻出来的……"

没想到我心目中的这位"潮州才子"朱老师，却

父母与一岁三个月的我



越过“议程”提出另一个议题来：“既然你不去那边，不如就到我这边来吧。”

他当时在《南侨日报》负责工作，如真的能去报馆，那可是求之不得的。我马上动心起来。

校长似乎也站在朱老师那边，支持他的主意。老人家望着我口气温和，慢条斯理地说：“这要看壮壁放得下那边的工作吗？……”我顺口回答：“走得开，我本来就打算改换工作的。”

说干就干，朱老师马上采取主动。他举手往我肩膀一拍，用那种江湖好汉“一言为定”的方式说：“行，你到报馆来……”

校长这时对朱老师说：“那好吧，先让他办好离开那边的手续，我会打电话与丝丝兄联系，正式谈谈这个问题。”（丝丝兄指的是当时主持报馆笔政兼负责经理的洪丝丝先生。朱奇卓老师当时是报馆的广告主任，也同时负责主持一些国内外大事件的采访工作。）

《“马共全权代表”方壮璧回忆录》中第75页也写道：

朱老师的“一言为定”，要我到《南侨日报》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当时，报社正缺人手，特别是新闻采访部门。这样，按照我当时的“资历”，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安排到三楼的编辑部去了。

[注]

1 这一天应是1948年6月之后，原《南侨日报》广告部主任吴柳斯已被捕，父亲接任广告部主任。

15

燃烧岁月

对于一次又一次架在脖子上的刀，报馆里的同仁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对英殖民地政府稍作让步，争取生存；另一种是坚定报馆的立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每一篇与报馆立场对立的广告送进来，登或不登，都得经过“社务委员会”开会决定。

《南侨日报》从创刊的第一天起，就紧跟国内战局和国际形势，旗帜鲜明地报道解放军的胜利和国民党军的溃败，反映民主运动的发展和挫折，抨击美帝国主义的干预。它的社论往往是一针见血，敢怒敢言，与英殖民政府政策相对峙，为新加坡华侨仗义执言。因此，被看成是一份中共在海外的“喉舌报”。

比如《南侨日报》1947 年 12 月 24 日的社论《论冬季战局》写道：“蒋政府崩溃的日子，不会很远的了。”报纸也公开支持马来亚华人的民主斗争，赞扬马来亚人民用休业罢工来反对英国御定的“马来亚宪法法案”。报纸还发表文章警告英国切勿干预中国内政：“今天美国成为中国独裁贪污政府的唯一保镖者，因此就不免成为中国人民之敌。反之，对中国国内问题采取善意中立态度的英国，才不失为真正的中国人民之友。”

陈嘉庚也在《南侨日报》发表了许多专论和讲演词，如《论美国救蒋必败》《蒋介石的“最大错误”》《中国内战何日告终》等等。

当然，国民党和亲国民党派对《南侨日报》恨之入骨，而英殖民地政府也对它怕得要命。但是在民主的大前提下，在还没找到什么可以对付《南侨日报》的把柄之前，他们让《南侨日报》在严密的监视下生存下去。

一位当年《南侨日报》的编辑吴广川，在 1994 年回忆道：

英殖民地政府一向看《南侨》为眼中钉，他们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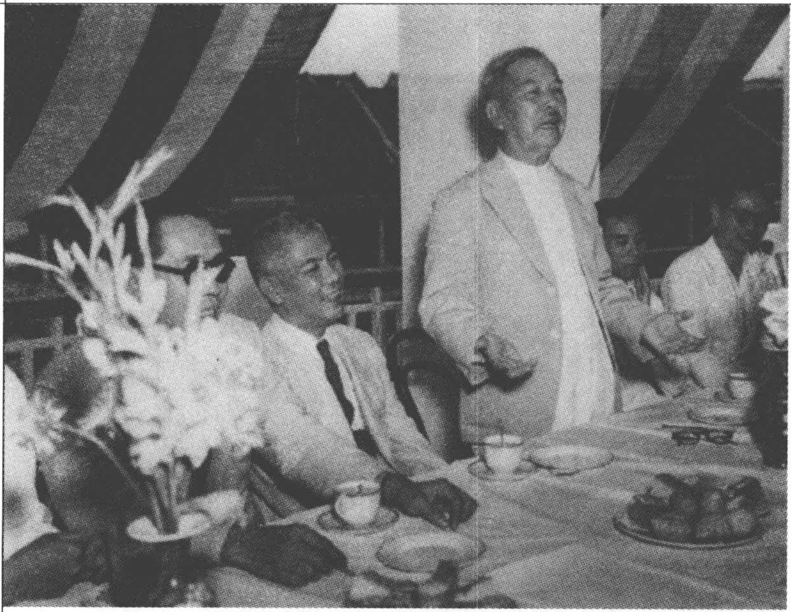


1949 年 4 月，《南侨日报》同仁欢送陈嘉庚归国。前排中为陈嘉庚，左一为庄明理，左三为王源兴，二排左一为母亲，后排右二为父亲。全版相片现存于厦门集美学村的陈嘉庚纪念胜地。

别注意我们，他们派了一个暗探来，打进《南侨报》，经常来，假装同情《南侨》，目的是要消灭《南侨》，他常坐在董事经理刘牡丹的办公室，《南侨》能生存这么久，是英殖民地政府还要挂民主招牌，没有借口。

《南侨日报》立场鲜明地拥共反蒋，虽然得到一部分华侨的支持，但也使到另一些人惶恐不安。早年赏识和提拔过父亲的黄学良，战后仍在华侨中学教书，当时就曾经拒绝《南侨日报》的采访。他回忆说：

奇卓在《南侨日报》时是有名的记者，他到华中



陈嘉庚在欢送会上发言（徐蕉萌摄）

来找我，说要给我写一篇特写，把我过往做的事全写出来。我说千万不能，我的特写在《南侨日报》登出来，我的后半生就不知怎么过了。我知道这个报馆，等到新中国政府成立，一定统统要回去，新加坡殖民地政府一定不容的，政治情形非常微妙。

日据时期曾在印尼与父亲偶然相遇的朋友蔡建奕，战后，有一个短时期同父亲在一起筹办“中国国际新闻通讯社”。后来，蔡建奕到国民党官方办的通讯社“中央社”当记者，同时又在《南洋商报》兼职。由于各自报馆的立场不同，使到两个同乡又同行的朋友，有时见面竟大吵起来。蔡建奕清楚记得当时的一些细节：

奇卓见到《南侨日报》后，路线跟我差不多一样，

也是跑领事馆、总商会。但立场不一样，他左，我“中央社”和《南洋商报》是非常右的，甚至《中兴日报》（国民党的报章）记者不够，我也复印一份给他们。所以两个人立场不同，两个人的新闻时常打架。

当时在商会里，一半是左的，比如庄奎章，也有右的，比如郑古悦，左的我就写少一点，右的我就写多一点。

有时在林应标的药店里喝茶，常常当着许多人的面，奇卓兄骂我，蔡，你像什么话？这样的人也值得捧？或者说，新闻怎么能这样写？我说，算了算了。因为算起来，他是长辈。

有时为了会场升旗，应该升五星旗或青天白日旗，我们辩论得一塌糊涂，或者为了新闻处理，两个人争得

父亲朱奇卓在欢送会上发言（徐蕉萌摄）



面红耳赤。

父亲生性爱憎分明，直肠直肚，在《南侨日报》的编辑方针之下更是如虎添翼，敢怒敢言，言无不尽。当时，新加坡三郊联合会会长，把劳资和约改写成“资劳和约”。父亲曾询问为什么，该会的秘书回答说是会长定下的。父亲于是写道：“劳资做资劳，这（该会会长）是一个违反时代的人物。”

父亲不只报道，他也批评。有一回，国民党派了一位军长俞英奇到潮汕去剿共，俞写了一封信给南洋侨领，潮州八邑会馆的会长，问今后如何剿共请大家提意见。父亲把新闻稿照发，标题打的是“聪明假糊涂，剿共问侨领”。

《南侨日报》最后的命运，跟马共战后的发展息息相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人撤出马来亚时，马来亚经济在饱受战争摧残之后百病丛生，这包括失业率高，工资偏低，粮食不足，粮价高涨。因此，从1946到1948年，在马来亚和新加坡，罢工事件频频发生。

这时，卷土重来的英殖民地政府急切的要振兴马来亚经济，因为马来亚的两大支柱产业——锡矿和树胶，对英国本身的经济复苏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英殖民地政府用强硬手段对付罢工者，逮捕工潮领袖，或者把他们驱逐出境。当时的中国是国民党当权，把亲共的左翼分子遣送回中国，几乎等同于判他们死刑。

与此同时，马共企图通过和平途径，参与未来马来亚联合邦的制宪谈判，或通过让自己的党员参加其他政党，以进入未来的国家议会的努力，都被英殖民地政府拒于门外，毫无希望。这导致示威罢工逐渐升级，以至最终演变成暴力事件。

1948 年 6 月 16 日三个欧洲籍树胶园经理在霹雳州被杀害，英殖民地政府于是在 1948 年 6 月 20 日颁布了"紧急法令"（The Malayan Emergency）。在"紧急法令"之下，马共和其他左翼政党，顿时成为非法组织。警察可以在不需要审讯的情况下，拘捕马共成员和亲共左翼分子，拥有武器弹药的马共分子，则面对死刑。马共在吉隆坡的《民声报》被封了，中共的"新华社"和《新华周刊》停止活动，"民主同盟"也被宣布是非法组织。

在这种局势下，当时担任马共总书记的陈平，决定带领马共退入森林，成立马来亚人民解放军（Malayan People's Liberation Army，MPLA），进行游击战，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

"紧急法令"颁布后的第四天，《南侨日报》发表社论《论拘捕嫌疑分子》，公开抨击"紧急法令"。社论说："如果滥用紧急权力法令，滥捕无辜人士，久不审问释放，形成一种风气，那就难免腐蚀政治机构。记得在马来亚沦陷时期，日本宪警因为有任意逮捕人民的权力，法律束之高阁，法庭则门可罗雀，致使敲诈诬陷

之风盛极一时，弄得天怒人怨，这是英国当局所应鉴戒的。”这也许是全新马报界对“紧急法令”的唯一反应。

这样的社论，显然是写给英国人看的。自从《南侨日报》面世之后，英殖民地政府不但派人到报馆走动，也时常要了解报馆的社论内容。当时，负责把社论翻译成英文给官方看的，是一位莱佛士书院的毕业生，叫余柱业。余柱业在这段时期两度加入《南侨日报》，担任过报馆的英文秘书，记者兼翻译[1]。

看来，这篇在虎嘴上弄须的社论对英国人没有起任何作用。紧急法令实施后的第十天，《南侨日报》广告部主任吴柳斯被拘捕了，英殖民地政府首先要打击的是报馆的经济来源。吴柳斯说：

我本来是当记者的，胡愈老要我出来做第一任广告主任。我们那时能招到一些广告，靠的是我过去的一些关系，靠一些爱国的华侨，因为大家要民主、要团结、要建设一个好的中国。紧急法令是6月20日颁布，他们第一个抓我，那是48年6月30日。

在这之前的一两个月，《南侨日报》总编辑胡愈之已奉命回返中国，北上筹备召开新政协会议。洪丝丝原是《南侨晚报》主笔，顶上总编辑的位置。吴柳斯的广告部主任的位置，则由父亲接替，父亲也是社务委员之一。

蔡建奕时常在不同的场合常见到父亲，知道他身兼

数职，他说：

奇卓兄那时很忙，他的公事包里，又要写稿又要招广告，又要编《华侨经济》；还要拉稿，订报份；胡愈之的《风下》杂志，他也帮忙。

事实上，更棘手的是“紧急法令”颁布之后，《南侨日报》感受到来自英殖民地政府的压力越来越大。吴广川回忆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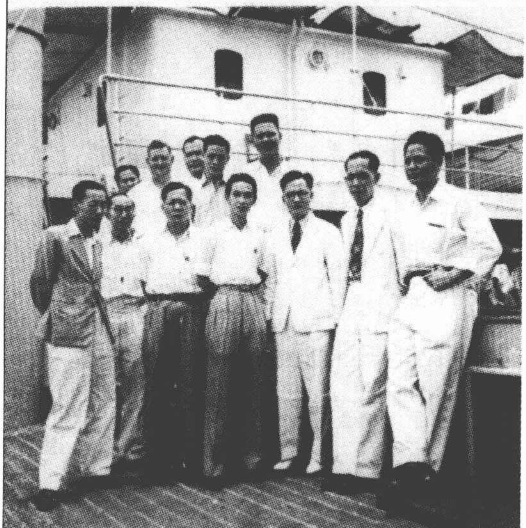
紧急法令颁布，英政府要消灭马共，那时也利用它来对付《南侨日报》。英政府起初寄了新闻稿给《南侨日报》，是反马共的。《南侨日报》有发表一二篇，有些我们不发表，有些我们跟他改头换面，敷衍一下，这样他就对我们恨之入骨。

父亲留下的一些回忆录，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写道：

《南侨日报》的政治环境一天一天恶劣，经济也一天一天困难。这中间，我们曾经被迫登载“公众联络部”所发的“如此共产主义”的反动文章，也曾被迫刊登反动的广告。

对于一次又一次架在脖子上的刀，报馆里的同仁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对英殖民地政府稍作让步，争取生存；另一种是坚定报馆的立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每一篇与报馆立场对立的广告送进来，登或不登，都得经过“社务委员会”开会决定。

新中国在 1949 年 10 月 1 日成立。隔年，一艘国民



报界同仁慰问“海玄轮”，前排左一蔡开祥，左三起尧襄才、傅子樵、何真民、朱奇卓、王文灿。后排左三起卢光平、蔡建奕、陈憨生。

党招商局的商船“海玄”轮，由红海载运日商的工业用盐开往日本，途经新加坡时宣布起义，船上升起五星红旗。由于当时新中国还没跟英殖民地建立外交关系，船上人员就找上了《南侨日报》报社，寻求道义上的援助。

这艘船是招商局向美国人租的，结果美国人告上新加坡法庭，船被扣留。案子在新加坡处理和审讯期间，《南侨日报》自然给予这个事件[2]充分的跟踪报道。这时，一些新加坡进步的团体，如学生团体和工会，纷纷组织会员上船慰问起义船员，《南侨日报》也曾组织了慰问团，并带了一些书报送给他们。当时报馆同仁在“海玄”轮上合照留念，成了颠簸岁月里许多人都不会忘记的一件事。

就在这风风雨雨的岁月里，1949 年底，《南侨日

报》三周岁了。远在北京的新中国主席毛泽东为庆祝《南侨日报》的生日题了词："为侨民利益服务。"新中国的总理周恩来题的词是："为宣传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而奋斗，为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而奋斗。"此外，毛泽东还有一幅"书告侨胞"，内容是"侨胞们团结起来，拥护祖国的革命，改善自己的地位！"

不久，报馆又收到英殖民地政府的一篇广告："马共杀人放火，英政府替难民造屋。"登？还是不登？经"社务委员会"开会通过：登！不过，第二天，《南侨日报》在这一则广告的旁边，紧挨着登出一则广告部启事，告诉读者那是英政府的广告，向读者表示歉意。

1950年3月8日，父亲在《南侨晚报》上发表一篇短评，论华侨学校应该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规定的"六一"儿童节，不应该纪念台湾规定的"四四"儿童节。这篇短评后来被人送交官方，英殖民地政府认为找到了朱奇卓"煽动行为"的把柄，于是，3月10日上午，CID（刑事侦查局）警探到报馆把父亲逮捕了。

同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出兵朝鲜，并命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同日，联合国安理会在美、英等国的影响下通过决议，联合国会员国要派兵随从美国军队进入朝鲜。刹那间，东北亚硝烟四起，炮火冲天，对于刚刚站起来的新中国，是极其严峻的考验。

《南侨日报》不理睬英国是"联合国军"的成员

国，谴责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要求“侵略者从朝鲜滚出去”。这一下，《南侨日报》与英殖民地政府之间的脸皮全撕破了。

1950 年 9 月间，英殖民地政府又发了一篇“戡乱”的广告，也就是向马共招降的最后通牒，要《南侨日报》刊登。当天晚上，《南侨日报》编辑部的五位主将，包括胡伟夫、洪丝丝和吴广川开会讨论这件事。吴广川记得：

有些人主张，要保存报纸就登，有些主张绝对不能登，因为登了，我们的立场就完蛋了，中国有句老话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两种意见，怎么办？第二天，他们就打一个电报给胡愈老，那时他已在北京了，他是在紧急法令实施前走的。胡愈老说绝对不能登，要坚持我们的立场，不能登。

第二天晚上，英殖民地政府终于查封了《南侨日报》。吴广川记得：

我们那时编辑部分两班工作，一部分做到 12 点，一部分到 11 点，我是编马来亚版，11 点我就回去了。英殖民地政府派了几部吉普车，100 多人的镇暴队，包围南侨报，搜查，抄每一个柜筒、抽屉。

他们要抓方壮壁，一个外勤记者，没有抓到；那些被抄到有文件的，都被抓去，抓了胡伟夫、洪丝丝、彭友真、吴西冷等。

一场雷厉风行的查封之后，英殖民地政府宣布通缉

《南侨日报》里的两个马共成员：余柱业和方壮璧。

其实，当晚方壮璧在报馆三楼的编辑部工作，当他正准备回家时，警察冲入报社，并在一、二、三楼设岗把守，方壮璧机警地通过层层把关，从容地离开报馆[3]。至于余柱业，在警察突击《南侨日报》之前，他因为与马共越来越接近，已经离开《南侨日报》转入地下工作[4]。至于其他当晚不在场的报馆员工，多数能从容避开被捕的厄运。其中有些人收到胡愈之代表共产党中央汇来的旅费，潜往中国。

《南侨日报》从 1946 年 11 月 21 日创刊，到 1950 年 9 月 20 日被封，一共生存了三年又十个月。

现在回头看《南侨日报》当年的生存，就像一根蜡烛，明知会烧尽，仍拼命的燃，拼命的烧；明知会撞壁，会撞得粉身碎骨，仍拼命地往前冲。正所谓“春蚕至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巧的是，《南侨日报》的主脑，备受南洋文化人敬重的总编辑胡愈之，在 1948 年上半年英殖民地政府开始逮捕《南侨日报》人员之前，已被传召回国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另一方面，英殖民地政府要以广告方式，在《南侨日报》刊登向马共招降的“戡乱”广告，在编辑部内部的讨论，已经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最后竟选择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下策，令人不解。回顾“新中国剧团”1940 年初到新加坡时，也面对着要不要弯腰讨好英殖民地政府，为英国战时难民先演一场戏的



矛盾。当时立场强硬的马共，企图影响剧团不要妥协。但金山和王莹这两位中共地下党员，选择了委曲求全。结果是，退一步海阔天空，新中国剧团顺利达到来南洋筹款的目的。

资料显示，胡愈之、金山、王莹的最高领导都是周恩来。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总理周恩来日理万机，或许，他根本管不了千万里外一份亲共报纸的存亡。也或许，《南侨日报》的关闭或被封，早已在预计之中。因为1950年，新中国已经成立，《南侨日报》已经完成了它在国、共争夺政权的生死搏斗中，在南洋制造亲共舆论，散播革命种子的目的。

回顾这一段历史，犹如看人下了一盘棋。士卒车马干得轰轰烈烈，赴汤蹈火，一再闯得头破血流，前仆后继，但下棋人心中，或许早已有了结局。

[注]

1 参照陈剑主编的《浪尖逐梦　余柱业口述历史档案》，第147页。

2“海玄轮”事件，《浪尖逐梦　余柱业口述历史档案》148至149页有详细记录。

3 参阅方壮壁著的《“马共全权代表”方壮壁回忆录》第91至93页。

4 参照陈剑主编的《浪尖逐梦　余柱业口述历史档案》。

16

驱逐出境

1950 年 3 月 10 日上午，父亲被警探从《南侨日报》社带走，当天下午，又被押回客驼路 74 号的家的时候，母亲没有太大的惊讶。

自从《南侨日报》出现了一则“马共杀人放火，英政府替难民造屋”的广告，又同时出现了一则广告部向读者道歉的启事之后，父亲预感到英殖民地政府对他的容忍或许就要到头了，他曾把自己的隐忧告诉母亲。因此，1950 年 3 月 10 日上午，父亲被警探从《南侨日报》社带走，当天下午，又被押回密驼路 74 号的家的时候，母亲没有太大的惊讶。

警探们在我们家翻箱倒柜，属于父亲的书桌、抽屉、橱柜，全被仔细地搜查。警探拿走了一些文件，其中有一封信，是成舅从边佳兰寄来，请父亲为边佳兰头湾一所小学物色一位校长的。

原来，外公自从生意上了轨道，常常出钱出力，帮助边佳兰几个村落办小学，这样就成了那里两三所小学的董事长。外公年纪大了，逐渐把学校董事长的事，交给了大儿子刘熙成。学校董事长为招聘一个人，写信给在新加坡文化界工作的姐夫，请他推荐适合的人选，合情合理。

父亲最初被关押在丝丝街（Cecil Street）的 CID。所有的盘问、审讯，都企图证明他是马共分子，或者协助马共分子进行反政府的武装斗争。当然，所有莫须有的罪名都无法成立。

那一阵子，英殖民地政府也在柔佛南部大肆扫荡马共分子。有一天，一个英国籍外号红须（红胡子）的警长和几个部下到了边佳兰，因那天当地警察局的车子

坏了，一帮人到二湾的刘家借车。成舅于是驾着家里的吉普车陪他们到处去查案，彼此算是有了一面之缘。

抗战时期，确实有马共的武装成员在边佳兰一带活动，不过许多老百姓对他们都敬而远之。1948 年紧急法令颁布后，英殖民地政府十分重视当地的情况，曾经调动雇佣兵“辜加”兵到那里围剿马共。

借车事件过后大约一个星期，红须和一帮手下突然又出现在二湾的老家。他一见到成舅劈头就问：

红须：你的名字叫刘志毅？

成舅：那是我的学名，平时我用刘熙成。

红须：哪一个房间是你的？

成舅：上厅左边后面那间。

于是，一行人进入成舅的房间搜查。搜查结果，找到一封朱奇卓寄来的信，内容是他已经找到了一个适当人选，可以来担任头湾培正学校的校长。接下来是更仔细地盘问。

红须：你认识朱奇卓？

成舅：他是我姐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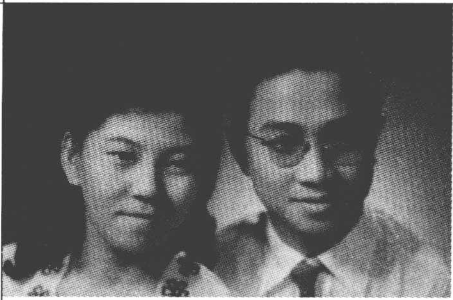
红须：你们有没有来往？

成舅：有，假期姐姐、姐夫常回来玩，有时我出坡去也住在他们家。

红须：你在他那里干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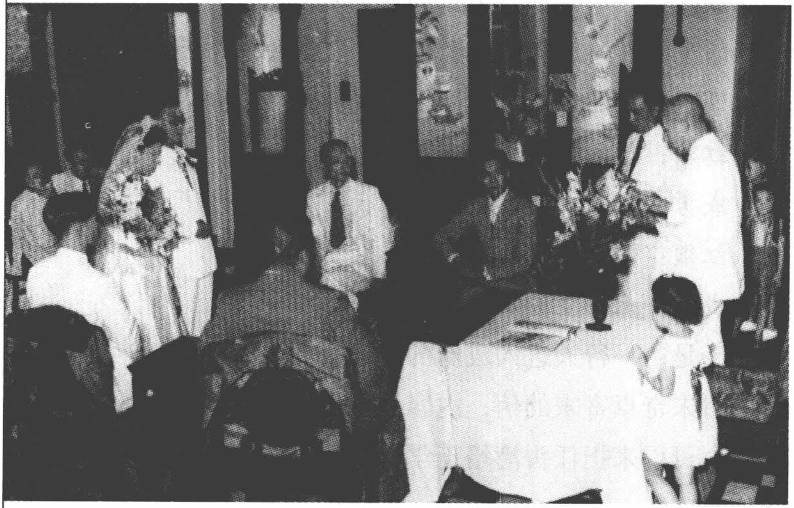
成舅：我去看戏，看电影。

红须：你知道他在做什么？



成舅刘熙成与成妗杨英芬

成舅婚礼由华中校长薛永黍（右一）主持，父亲在旁协助。



成舅：我知道他教过书，现在在报馆工作。

红须：请你和令尊，跟我回警察局一趟。

那时成舅刚刚新婚不久，太太杨英芬来自印尼廖内群岛的娘惹家庭，曾在新加坡的私立小学教书。一听说警长要带走家里的两根支柱，家里妇孺都不知如何是好。在红须的催促下，外婆和成妗分别为自己的男人收拾了几套衣服，外公和成舅穿戴整齐了，还穿上平时难得一穿的皮鞋，跟红须上了车，开往新山中央警察局。

他们被关押在新山中央警察局的拘留所，里面三教九流的人都有，很拥挤，又脏又臭，许多人共用一个粪桶。还好那里好几个小警察曾经在边佳兰四湾工作过，认识成舅，知道这父子两人是冤枉的，晚上还偷偷地买夜宵给他们吃。

在新加坡，母亲带着三岁多的哥哥，几乎天天都去丝丝街的CID探望父亲。一天，赫然发现自己的父亲和二弟也被关在里面，母亲惊呆了！她回忆说：

> 外公和成舅都被抓了，也被问话，原因是怀疑你父亲与马共有关。我当天只带了吃的给你父亲，没想到阿爸和二弟也被抓，回家有眼哭不出眼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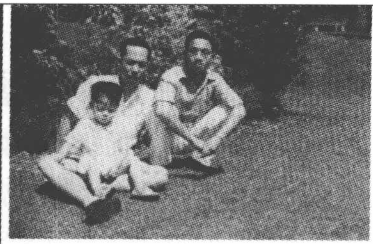
母亲当时的懊恼与悲伤是可以理解的。丈夫一个人摇笔杆摇出来的事，竟连累到自己的父亲和弟弟被捕。想想刘家从一无所有，到今天一家大小有得吃有得穿，靠的是外公多年的努力打拼和一家人的刻苦耕耘。而成舅在和平后回华中继续升学，结果高中没毕业就回家帮父亲做生意。刘家两根支柱被抓入衙门，生意全停顿下来，真不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

隔天，外公和成舅又被送回新山，不过这次是扣押在警察总部，与暗探们住在一起，情况好多了。这时，边佳兰许多人去为外公和成舅求情。母亲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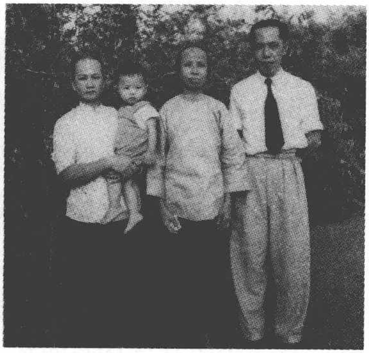
> 边佳兰整条“巴龙”（边佳兰所有的村庄）的人都去求情，要把阿爸和成弟保出来，说他们没有参加马共。







父亲、华华与成舅



两个丈夫被关在监狱的女人，母亲和成妗。母亲手抱刘宏俊，旁为华华。

左起：名荣妗与我、外婆、父亲。

外公和成舅两人被关押了两三个星期后，红须大发慈悲说，可以放一个人回去做生意，于是外公先被释放了。成舅后来又被送到哥打丁宜附近的一个集中营。在集中营，成舅多次被调去CID问话，由于早先与红须认识的关系，他没有受到什么严刑拷打，顶多是半夜里被叫去审问。成舅知道自己运气好，因为听说红须以火爆、残酷著名，很多马共嫌疑分子都曾被他严刑毒打过。

父亲被捕半个月后，被送往新加坡南部圣约翰岛（Saint John Island）上的旗樟山集中营。这个岛，有史以来就是新加坡外来移民的检疫站。集中营里有两个牢房是专门用来关押政治犯的，集中营四周的铁丝网都通

了电。另外，约两人高的岗楼上有荷枪实弹的军警昼夜站岗。

接下来的几个月，母亲除了工作，还得南北探监两头跑。一会儿乘船去旗樟山看父亲，一会儿又陪着身怀六甲的成妗，乘车去哥打丁宜看二弟，路途颠簸，心力交瘁。

一向疼爱外甥女，爱屋及乌也连带器重外甥婿的得炎老舅，自父亲被捕后，想尽办法托人去政治部说情。受英文教育的老舅认为，英殖民地政府既然没有证据证明父亲是马共分子，就应该尽早释放他。

另一方面，《南侨日报》自从父亲被捕后，一连 14 天刊登有关的新闻，《南侨日报》读者纷纷向报馆表达慰问，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也播出有关消息。1950 年 5 月 8 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简称中国记协，打电报给新加坡总督詹逊（Sir Franklin Charles Gimson）提出抗议，电文如下：

我们抗议新加坡英政府无理压迫《南侨日报》，并要求立即释放已被拘禁两个月之该报广告主任朱奇卓。

同时，北京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以何香凝主任的名义，向英殖民地政府提出的抗议，电文说：

抗议无理逮捕我《南侨日报》广告部主任朱奇卓。

何香凝与丈夫廖仲恺，是孙中山搞革命成立同盟会时期的亲密战友，在中国国民党以及共产党里，都享有很高的地位，备受尊敬。几番抗议之下，一个报馆广告部主任的被捕，被提升到牵涉中、英邦交的高度。得炎



老舅看到这则新闻，告诉母亲说，这个“我”，使得甥婿不红也得红了，变得人小声音大。一切奔走搭救，都徒劳无功了。

当年9月20号，《南侨日报》被查封，更多人被捕。包括第三任经理洪丝丝，记者兼英文秘书彭友真、广告部主任吴西冷。开始时，他们被关在山仔顶（North Canal Road）的警察局。母亲在照顾丈夫和弟弟的同时，也照顾这些刚刚被捕的难友。母亲说：

有人介绍我认识了一个狱卒，住在珍珠坊一带，我晚上就穿上唐式衫裤，脚拖木屐，去找他。给他一些钱，请他照顾我们《南侨日报》的人。给他们吃好一点的，同时带消息出来，看看他们有没有被打，或者有什么转移的动静。

在柔佛州，成舅被关入集中营好几个月后，终于等到上法庭的一天。当时，警方还为他请了一位律师，成舅记得当时法官问了一个无厘头的问题。

法官：你有没有打电话到新加坡给朱？是白天打？还是晚上打？

成舅：我们那里从来就没有电话。日本占领时期有，和平后全撤掉了。

法官：你们那里没有电话？好，你可以回集中营了。

两三个月后，成舅在有条件下被释放。条件是不能回边佳兰，不能去新加坡，只能住在马来半岛的其他城

市。外公的老朋友“裕香茶庄”在柔佛新山设有分行，李家不计风险，愿意收留成舅。

于是成舅在新山租了一个房间，白天到“裕香茶庄”去帮忙店员们包茶叶，三餐都在茶庄解决。每天晚上7点到隔天早上7点不能出门，还要按时到警察局报到。那时候，一般市民对在“紧急法令”下被拘捕的人士，敬而远之，逃之夭夭，就像现在的人看到艾滋病患者一样。“裕香茶庄”的李家，对外公一家肝胆相照，雪中送炭，母亲和成舅常常提起，始终不会忘记。

另一方面，被关在旗樟山集中营的父亲，渐渐意识到自己前面只有两个选择：一是继续坐牢，二是要求回返中国。两个选择不停地在父亲脑海里滚动，各有利弊。

乖乖继续坐牢的考量是：

1. 英殖民地政府找不到朱奇卓是马共成员的证据，也许不久就会释放他。

2. 妻子从小在资本主义社会长大，比较适合留在新马。

3. 岳父一家都在新马，有做生意的经验。自己出狱后纵使不再从事新闻工作，也可像妻子所建议的，仿效一些逃难印尼的文化界朋友一样，转行做点小生意。

要求回返中国的考量是：

1. 在“紧急法令”下，监禁可能无限期，英殖民地政府也可以随时把自己驱逐出境。要求回国能够比较主动地控制自己的前途。



2. 为了自己的左倾言论，岳父、妻舅受到牵连，岳家生意受到严重影响。自己回国之后，岳父与家人可以免受折磨。

3. 新中国刚成立，自己一向追随和拥护的共产党当家做主了，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是一股难以抗拒的吸引力。

1950年6月间，沦陷时期与父亲同到苏门答腊避难的中国著名作家王任叔，回国后被周恩来总理派到印尼，出任第一任中国驻印尼大使。王任叔夫妇上任前经过新加坡，住在莱佛士酒店。母亲去见他们，请他们帮忙解救父亲。当时王任叔向母亲建议，设法先让父亲回国，然后，他再设法让父亲调到印尼，这样，一家人就可以团圆了。母亲在探监时把王任叔的建议向父亲说了，父亲脑海里的两种选择开始倾向后者。

《南侨日报》被封之后，父亲要回国的想法更坚定了，他请母亲去进行这件事。母亲于是大着胆去求见当时的新加坡总督詹逊爵士。母亲听说，詹逊总督在日据时期曾在香港被日军抓入监狱达3年8个月，因此，他应该对铁窗生活十分了解，也应该会同情做妻子的要解救丈夫的苦心。母亲说：

我要求让丈夫回国，总督问，那你和孩子怎么办？我说，我做衣服来养孩子。总督是个好人，申请很快就被批准了。你父亲就被转移到四排坡监狱（Outram Park Prison）。

母亲始终保留着英殖民地政府发出的一纸通知。上

面写着父亲被驱逐出境，前往中国，一辈子不得重返马来亚，日期是 1950 年 12 月 2 日。

如果母亲不去见总督，不去要求早日让父亲回返中国，父亲是不是会被驱逐出境呢？据说，当时也有一些被拘捕的左倾人士，被关押两年后无罪释放。母亲晚年常常自己提起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回答，就像许许多多历史谜团一样。

父亲被遣送回中国成了定局，接下来的问题是，母亲与两个孩子怎么办？

母亲可以选择留在新加坡，希望有一天丈夫能回来，或到附近其他国家，一家再设法团聚。母亲也可以选择跟着父亲回中国，一家人在一起。但前面的路对母亲来说是个未知数，况且她也清楚，自己是一个满脑袋“资产阶级思想”的人。

在这种关键时刻，外人或许都不便出什么主意，这时，外婆的想法起了作用。自从母亲嫁了个文化人之后，外婆时常出坡来，在我们密驼路的家小住。她看到女儿女婿相敬如宾，收入不错，家里还请了两个保姆来带两个孩子。夫妻俩有空时，会推着婴儿车，带孩子到政府广场前去散步，心里很是欣慰。碰到至亲好友称赞她好福气时，外婆会伸出一只手，偷偷地告诉他们说，两夫妻收入一只手呢！意思是说他们一个月有 500 多元收入。

外婆其实也不知道该不该让母亲和两个外孙回中国，只说了一句：唉，人家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母子三人回马证相片

母亲于是开始做全家回国的准备。

首先是要把一些重要的证件理清楚。母亲出世时，外公为她报生的出生证上竟然没有名字，为了申请回马证，外公特地到哥打丁宜的法庭去宣誓，把母亲的英文名字 Liu Lee Shian 加入她的出生证。

接着，母亲带两个孩子去牛车水的“胡再坤诊所”打预防针，办好了母子三人的回马证。然后买船票，又买了许多她认为会用得上的春夏秋冬四季的布料、毛线，大大小小行李装了13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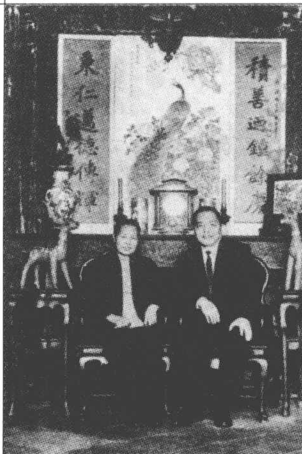
离开新加坡的前一晚，父亲被释放。他的几个最相知的朋友，包括开药材店的林应标，他的师长黄学良，裕香茶庄的李锦汉等，在“潮安联谊社”开了个茶会欢送他。父亲在答谢时，十分激动，热泪盈眶。

1950年12月5日，我们一家四口上了渣华邮船公司开往汕头的万福士轮船（Van Heutsz）。得炎老舅出钱，为外甥女一家买了两个头等舱房间。那一年，哥哥4岁，我3岁。那天上船的情景，是我最早的记忆，如今还清楚地记得当天的一两个画面。

17

归国华侨

中国解放后，由于受了一些马列思想书籍的影响，大堂哥日渐左倾，他形容自己：当时左得一塌糊涂。他还一厢情愿地把叔叔朱奇卓塑造成一个近乎“神”的形象。当朱奇卓带着家小出现在汕头的码头，彼此又有了近距离的接触后，大堂哥才渐渐认清了现实。



潮州的伯父伯母



我们与伯父一家

我们一家四口乘“万福士”轮船经香港抵达汕头，那是1950年12月中旬，冬天。

当时，汕头市负责侨务工作的副市长黄声，亲自到码头接船。黄声抗战前在新加坡曾参加“青年干部训练班”的工作，与父亲同事，后来大家一起逃亡印尼苏门答腊。日本投降后，黄声到泰国工作了一段时候，1949年解放前就回国参加解放战争。黄声安排了一艘大型摩托快艇到轮船旁接我们，由于是副市长亲自出马，一切通关，行李检查都顺畅无阻。

父亲后来担任汕头市政治协商会秘书长，兼民盟汕头市副主任委员，一年后又兼任汕头华侨中学副校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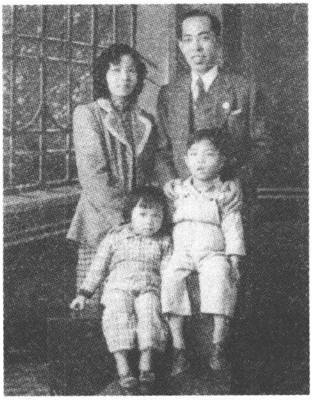
在汕头安顿好之后，我们一家回到父亲的老家，离汕头咫尺之遥的潮州城探亲。我们住在朱家老宅的对面，兴宁巷11号的“白鹿精舍”。这是母亲婚后初次踏入朱家大门，第一次见到丈夫的妈妈、伯母、哥哥、

嫂嫂，以及四个侄儿侄女。

我父亲已经有十多年没有回家，尤其是抗战八年期间，家里没收到过他的片言只字。祖母自然思念小儿子，每到吃饭的时候，总是取下挂在厨房墙上的竹筷筒，用力地摇动里面的筷子，一边摇一边随着筷子嚓嚓嚓的跳动声念道：阿卓回来，阿卓回来吃饭了……祖母相信，这样一摇会产生心灵感应，父亲就会知道家人在思念他。

每逢过年过节拜神时，祖母会按照传统的为不在场亲人祈福的做法，取出一套父亲旧的米色西装，手拿钱纸，在衣服上来回摆动，叫做“净身”，一边口中念道：老爷保佑，阿卓在外面身体健康，遇到贵人，挣到钱，寄钱回家。

然而，1951 年，我们这个自海外归来的小家庭与朱家老宅的近亲，经历了一段彼此互相适应的磨合期，说得俗气一点，就是彼此看不顺眼。



一家初抵潮州



于兴宁巷 11 号白鹿精舍前，左起伯母、伯伯、老伯母和祖母

从祖母的角度，她固然很高兴见到离家多年的二儿子携眷归来，但是生活习惯上的隔阂，却是始料不及的。首先，二媳妇不太会做家务，也不太会管教孩子，回到潮州就找了个年轻妇女来帮忙带孩子。祖母一生刻苦，大半辈子为人帮佣，受尽委屈，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家里需要请佣人。于是老人家常常念叨着：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祖母觉得两个孙子虽然活泼可爱，但是二儿子二媳妇太放纵他们了。祖母无法理解儿子媳妇多年在海外生活，接受了新思想，相信教育孩子要用诱导和讲道理的方法，而不是高压的手段。那时哥哥四岁多，正是男孩子最好动最顽皮的时候，常常拿着一支玩具枪跳来跳去，一边嘴里还砰、砰、砰地制造音响效果。一天，哥哥跳上神台，把上面的香烛银纸全扫到地上。祖母终于忍不住了，喊道：阿卓，你为什么不打孩子？祖母与父母亲之间不但有了代沟，而且是两个时代、两个社会之间难以填平的鸿沟。

从母亲的角度，她面对着棘手的经济压力。自父母结婚后，在新加坡的远房亲戚已经写信回老家报告，说阿卓哥在南洋娶了个有钱人家的女儿。于是不久后，老家伯父来信，说他在朱家老宅的对面，买了一个价钱合理的小院落“白鹿精舍”，但钱不够，希望弟弟和弟妇拔刀相助。母亲很了解丈夫自小得到他哥哥的资助才得以完成学业，于是二话没说，从嫁妆里拿出一笔钱寄回

潮州。不久，伯父又来信，说一辈子与人打工，很想拿一点资本与人合作开布店，母亲又寄了钱去。后来布店生意没做成，伯父用这笔钱买了两副金手镯，送给了祖母和老伯母，母亲也没敢说什么。

我们全家回国前，母亲知道在新中国不时兴戴首饰，于是把自己的一点金器首饰卖了，钱通过新加坡一个相熟的商号，汇到伯父打工的潮州吴祥泰宝号。这时伯父认为弟弟发财归来，要用这笔钱来宴请亲朋好友。母亲却认为前面的路还很遥远，自己要自食其力，不想在有急难时向家里伸手要钱，终于鼓起勇气说不。后来，为了缓和彼此间的紧张气氛，母亲同意用其中一部分钱，买了些布料送给亲朋戚友。母亲与伯父之间开始有了芥蒂。

从伯父的大儿子朱铮铮的角度，他心目中的“偶像”怦然倒下。大堂哥朱铮铮初中毕业后，觉得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想要“实业救国”，于是14岁那年到汕头一家百货公司当学徒。大堂哥自小对叔叔朱奇卓的认识来自家人的口述，到了念初中时，他开始与叔叔通信，了解叔叔一路来都在做爱国的工作。父亲在《南侨日报》时，曾鼓励朱铮铮写一些有关国内的所见所闻，寄到新加坡，发表了有稿费可拿，那时他认为叔叔是个“革命者”。

中国解放后，由于受了一些马列思想书籍的影响，大堂哥日渐左倾，他形容自己：当时左得一塌糊涂。他

还一厢情愿地把叔叔朱奇卓塑造成一个近乎“神”的形象。当朱奇卓带着家小出现在汕头的码头，彼此又有了近距离的接触后，大堂哥才渐渐认清了现实。朱铮铮回忆说：

在汕头的码头上，我见到你们一家，与我心目中革命者的形象有很大的差别。婶婶穿的是旗袍，太资产阶级了！叔叔开口一点马列主义的味道都没有，嘻嘻哈哈的，特别是对孩子更是纵容！当时我心目中的革命者，应该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明。

1994 年当我为写书而采访朱铮铮时，他把当时的这一段心路历程，阐述得非常清楚，并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他当时是患上了“左倾幼稚病”。

当时，患上“左倾幼稚病”的人可能为数不少，父亲在回国后不久，就被人告了一状。事缘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新的制度和社会风气正在形成，最先启动的全国性政治运动是“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接着就是“三反五反”。三反，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是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经济情报。全国各地成立了“三反五反”运动领导办公室，开始了以坦白、检举、揭发、斗争为主的“打虎”斗争。

父亲在汕头开始工作后，他的一个姓戴的老同学常来家里找他。戴先生解放前是外国公司的买办，后来成为殷实商人。他害怕政治运动，希望父亲能帮他避过一





李家朋友来访，坐者为李肇汉及太太，和他们的大儿子守义。

母亲与李锦汉太太

场可能降临的劫难。这时，有个近亲为了要争取加入共青团，去向有关部门告状，说朱奇卓屁股坐在地主资本家的那一边，同情他们。结果，父亲被令暂时放下手里的工作，去武汉的武昌中原大学政治研究班学习一年。

投入祖国的怀抱，进入一个全新的政治环境，父亲做梦也没想到，第一个向他放暗箭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近亲。

初抵国门，令父母亲很高兴的是遇见了他们的媒人，新加坡裕香茶庄的李肇汉，还有他们家族的多位成员。原来，李家老家在潮州城的义井巷，与朱家老宅只有一巷之隔。李锦汉、肇汉兄弟在潮州的母亲在 1947 年初重病，于是南洋的李家成员纷纷回国，以便送老人家最后一程。怎知老人家逃过劫难，逐渐康复，李家众人就暂时在潮州住下。这一住，新中国成立了，回返新加坡不像以往那么容易。直到 50 年代中期，李肇汉才离开潮州前往香港，李家妇孺也分批陆续回返新加坡。

回潮州探亲完毕后，母亲开始在汕头侨务局上班，每天骑上自行车到局里，有时需要到船上去接待归国华

侨。像大多数新马的华人一样，由于在边佳兰以及后来在新加坡市区生活过，与不同种族不同籍贯的人往来，母亲能说华语、马来话，以及潮州话、福建话、广东话和客家话等多种方言，因此工作上很方便。有些被她接待过的朋友回到新加坡向外公报告说，你的女儿回国后很能干，她的接待工作做得很好！外公觉得很是安慰。

这时，另一个在国内同时进行的政治运动“土地改革”，直接冲击到多位刘家的成员和亲戚。“土地改革”就是废除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政府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同时也分给地主应得的一份，让他们自己耕种，自食其力。但是，这个政策在地方上执行的时候，出现了许多问题。

1952 年土地改革期间，外公老家桂坑村的亲人只剩下我的老伯母（老姆），她的两个女儿惜娟和丽霞以及最小的儿子刘熙祥。刘家当时有五亩田地[1]，四亩分给两个叔叔去种，收一点租，自己种一亩。1936 年刚从马来亚回乡时，老伯一家盖了栋新房子，加上祖屋里原有的两间小房，在桂坑村，刘家这就算是有钱人了。

土改开始时，政府本来有政策说华侨地主不在被斗之列，但后来在划成分时，刘家被划成地主。这时老伯的小儿子熙祥已经到附近的官塘去读书，家里只剩下老伯母和她的两个女儿。熙祥舅回忆说：

我母亲和两个姐姐被土改工作队斗得很惨，她们被绑起来，跪在批斗会上。他们说我们剥削劳动力，叫那

两个种我们的地的叔叔上前，打我母亲。我们平时对那两个叔叔挺好，他们不愿意打，后来被逼得没办法，上前刮了“地主婆”几巴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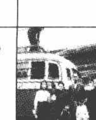
批斗会不是一次就完，是常常开，常常斗。邻乡开批斗会也把她们拉去，日夜的批斗。不批斗的时候就叫她们去劳动，种树。

强房的人本来就习惯欺负我们朴房，这下趁着土改的机会作乱，说日本占领时期，他们来跟我们借钱，借不到，害到他们饿死，这也是一条罪状。我母亲和姐姐被斗得好几次想自杀。

其实当时老伯母一家人的生活，主要还是靠她的大儿子刘熙深从南洋寄回去的侨汇过日子。1954 年，局势有所扭转，批斗地主的力度缓和下来，毕竟，国内的侨眷就像会生金蛋的母鸡，不断地吸引外汇回去。老伯母一家于是赶紧申请去汕头居住，乡里领导也乐得做个顺水人情，批准了。土改过后，还有乡政府人员到汕头向老伯母道歉，并归还了她们的房子。但是，田地已经被分掉，抄家时被拿走的所有细软，都没了踪影。

不久，老伯母回返马来亚，发誓再也不回唐山。她最小的儿子和女儿也先后设法到了香港，只有最大的女儿滞留汕头。

我外婆的大堂弟蔡得胜，于 1932 年前后过番来，先在边佳兰二湾的刘家大本营帮工。和平后，他的弟弟蔡得炎出资，让哥哥在四湾经营汽油站和大米生意。得



胜老舅的太太，也就是我的老舅妈，早已经在马来亚住下，平日养鸡养鸭日子过得很舒服。后来得胜和得炎两兄弟的生意都做得不错，赚了钱。中国解放前夕，老舅妈带了些钱回国，在意溪镇埔东村的老家买了十亩地，分给乡亲去耕种，被人笑称为“地主婆”。

收租的日子才过了一年，土改的大潮就到了。老舅妈和小儿子蔡楚雄正在埔东村，听说共产党要对付地主了，就想尽快去汕头乘船回返马来亚。这时风声越来越紧，村里有人反对他们离开，但乡长和村里一个米铺商人出面担保“地主婆”不会逃走。老舅妈母子匆匆从埔东村经潮州到了汕头，在父母亲的帮助下及时上了开往新加坡的轮船。

然而，担保他们离开的乡长和米商，过后被指为同情“地主婆”，站在敌人的一边，两人被土改工作队抓起来，活活斗死。母亲晚年，每当回忆起这件事时，都会重复地叹息道：“那两个人给人弄死了，那两个人给人弄死了。”一种深深的内疚，如同套在母亲脖子上的枷锁，挥之不去。

在汕头的那几年，哥哥与我都进入幼稚园上学。我大约 5 岁时，有一天，被老师拉去演练如何向参加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叔叔献花。

我与另一个被选出来的小男孩，被带到某处一个大礼堂，在老师的指导下，练习如何从大礼堂中间的大门，跑过长长的走道，然后上台，把花献给站在台上最

中间的人。老师嘱咐，千万要记得，如果志愿军叔叔接过花，把你抱起来，你必须回以一个拥抱。

献花的日子到了，我记得那时的场面跟演练时完全不一样。礼堂里黑压压的坐满了人，雄壮的音乐响起，气氛庄严而热闹，台上站着一排身穿军装胸前戴着一朵大红花的年轻人。我与另一个男孩，在老师一声令下后开始跑，手抱鲜花，跑过长长的走道，跑过人海，跑上台，献花。志愿军叔叔果然把我抱起，我回以一个拥抱。

中国人民志愿军自1950年10月开赴朝鲜战场与美军作战，直到1953年7月底停战为止，前仆后继，死伤无数，是一场敌强我弱的惨烈战争。当年在汕头那个大礼堂里接受我献花的志愿军，后来是战死沙场？还是凯旋归来？我无从知道。

[注]

1 一亩=666.67平方米=7173.36平方英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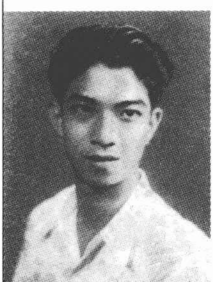
18

三剑客

三个在资本主义社会成长的年轻人，准备了些冬衣，又听说国内交通都靠自行车，又各自买了一辆自行车，在1952年4月10号，登上了一艘开往汕头的挪威轮船。

母亲有两个同父同母的胞弟，刘熙成和刘熙茂，我的二舅和三舅。

刘熙茂，学名刘逸林，日本占领新加坡初期，差一点在大检证时被检去。还好，他命大，没有被日本人载到海边用机关枪扫射而死。据估计，当时日本人杀害的新加坡华人达四五万人之众。


三舅刘熙茂

刘家众人在新加坡沦陷不久回到边佳兰，茂舅无所事事，学会了打麻将。他不但会打，而且打得很好，打得很着迷。茂舅可以说是外公十六个儿女们当中最聪明，脑筋转得最快，外表最沉着的一个。他在求学时期功课很好，最拿手的科目是数学和英文。茂舅饱读中国古典小说，十分崇拜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和司马懿。

就拿打麻将来说，茂舅有过目不忘的本事：其他三个牌友打过什么牌，吃过什么牌，他都十分清楚；他的牌友们在等什么牌，做什么牌，他从他们的脸部表情上一目了然；自己接下来要摸的一张牌有多少机率能随心所愿，他都能根据记忆和桌面上的牌推算出来。因此当他在等牌时，每拿一张牌都是用右拇指摸一摸朝下的牌面，往往不用翻过来看就把牌扔出去了，眼睛像是有 X 光似的。

总之，茂舅认为打麻将是斗智商，斗情商，斗计算或然率的一个游戏，十分有挑战性。就因为麻将的巨大

吸引力，茂舅可以连打三天三夜不回家，间中除了撒尿喝水，不用吃也不用睡。往往打到其他三个牌友已经换了好几轮，打到人家的钱都被他赢光了，他会把钱还给人家，请求人家留下来继续打。

外公外婆对这个儿子，好话坏话都说尽了，还是屡劝不听。有时外婆看茂舅好几天没回家，叫人骑自行车载她到头湾或大湾或四湾的街场去找人，因为赌博一般是在街场的某一个店屋后面进行。通常，外婆还没下车，往往已经有人往里面通报。有时大家看在“事头婆”亲自出马的分上，快快作鸟兽散。有时是茂舅从牌桌上起身敷衍母亲几句，说打完这一轮“北风”就散场，你先回家吧，结果什么话也没兑现。

外公也被茂舅气得半死，曾经拿着一根大木棒，要去把儿子赶回家，说如果他继续沉迷赌博，一定要打断他的狗腿。但是，往往是外公从店屋的前门进，茂舅已经从后门溜走了。茂舅疯狂赌博的情况一直延续到日本投降。1945 年底，当父母亲要到槟城《现代日报》工作时，外公外婆要母亲把茂舅也带上，希望他远离赌穴，改邪归正。

茂舅随姐姐姐夫到了槟城，进入那里颇有名气的钟灵中学。果然，赌博戒掉了，一年之后顺利初中毕业。

1946 年，随着我父母亲从槟城回到新加坡工作，茂舅也到新加坡华侨中学继续上高中。然而，一回到新

加坡，回到他熟悉的地盘，茂舅又开始找机会打麻将。在华中上学时他是寄宿生，常常从武吉知马路的华中校舍溜出去，到如今汤申路陈笃生医院一带的咖啡店赌博。假期回到边佳兰老家就更糟了，就如潮州话所说的“放猴归山”，赌得几乎从人间蒸发掉。

外公没办法了，曾请求华中的教务主任到赌场去劝茂舅，但是也没有什么效果。就这样边读书边赌博，茂舅竟也完成了高中课程。

那时，华中高中毕业班同学拍了一张毕业照，这张集体照，一直挂在边佳兰老家上厅后廊的墙壁上。许多年后，我找到这张尘封的珍贵相片时，竟发现相片中站在茂舅身边的一个高个子非常面善。仔细一看，再翻看了相片后面的同学签名，才证实原来他就是 1980 年代初期曾任新加坡广播局主席，又在 1990 年新中建交后出任新加坡驻中国第一任大使的郑东发先生。

同一个起点的两个年轻人，当年在同一个课室上课，一起拍毕业照时，决不会想到分道扬镳之后，人生道路竟有天渊之别。

高中一毕业，茂舅成了一头没有人可以控制的野马，生活中什么都没有，只剩下打麻将一件事。

茂舅的滥赌成性，外婆一直以一种慈爱，甚至溺爱的态度来包容他。每当茂舅从赌场回家，外婆的气就消了一半，还叫他快快去睡觉。在外婆的心里，造成儿子如此好赌的原因，就是被日本人的大检证吓坏了，以至

自己控制不了自己。

以现代医学的观点来看，疯狂赌博其实是一种精神病。病人的特点是全心沉迷于赌博，愈赌愈大才感到痛快，病人也不能适应日常的工作和学习，对其他事物完全失去兴趣。茂舅那时其实需要看心理医生，他需要治疗，但是50年代初的外公外婆没有这方面的知识。

新中国成立后，外公听到了一些宣传，说：新中国能把鬼变成人，因为，新中国是不允许赌博的。同时，新中国也出台了一些欢迎华侨青年回国升学的政策，比如广东省政府公布了《广东省优待侨生回国升学暂行办法》。根据这一办法，各类学校在录取新生时，都放宽尺度来接纳华侨子弟。为了接纳更多的侨生，他们还增办了几所华侨中学，对报考未被录取和归国后赶不上参加考试的华侨学生，还特地为他们开办了归国华侨学生补习班。

外公于是通过书信，跟母亲商量让茂舅回国升学。在刚解放的头几年，新中国一派新气象，城市里的治安、秩序都不错，归国华侨的工作基本上得到合理的安排。再加上当时新加坡和马来亚没有华文大学，因此父母亲都赞成让茂舅回国。他们计划让茂舅在1952年初动身，第一站先到汕头，然后上北京考大学。

没想到，茂舅要回国升学的消息传出之后，有两个



六舅刘熙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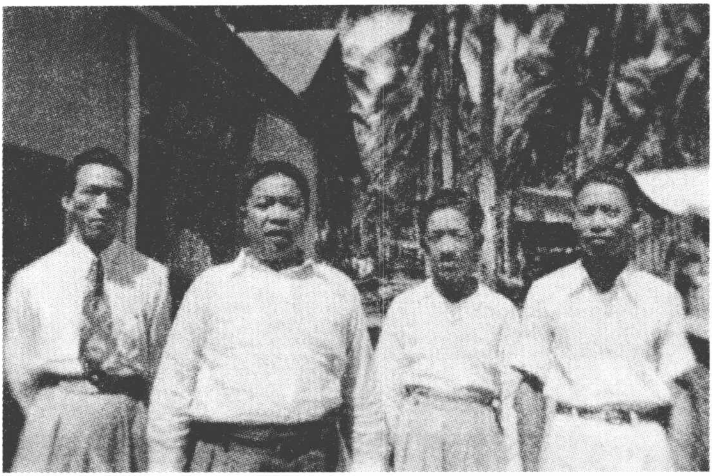


邻居儿子黄智佳

年轻人也动了心。一个是母亲的同父异母弟弟，17 岁的刘熙灏，学名刘逸民，我的六舅。另一个是边佳兰二湾甘榜黄姓邻居的儿子黄智佳，18 岁。那时，刘熙灏在新加坡中正中学上初二，黄智佳则在公教中学上初二，两个人都寄住在成舅位于密驼路的家。原来成舅受父亲的牵连在紧急法令下被拘捕，有条件释放后在柔佛新山住了一个时期，到了行动完全自由后，成舅一家选择在新加坡住下，租的就是我们原来住的密驼路 74 号二楼。

刘熙灏和黄智佳在中学里接触了一些进步书刊，也受到边佳兰私塾老师李友心的影响，向往中国共产党提倡的新民主主义，希望回国升学，毕业后直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于是，他们两人悄悄地做回国的准备，直到船期近了，需要向家里拿钱买船票时，才各自向自己的父母亲抛出一颗炸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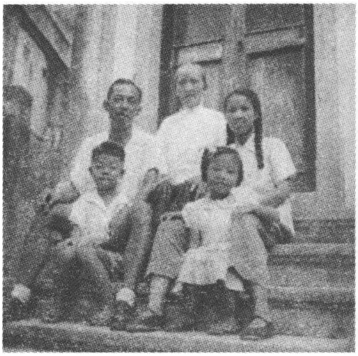
外公知道熙灏也想回国，简直是气炸了。那时，他的大儿子熙成因为有眼疾和从小比较老实，家里人给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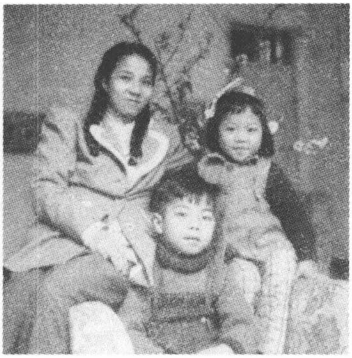
外公（左二）反对熙灏（左三）回国

起了一个外号叫“白仁”，就是“傻子”的意思。这个外号叫惯了，外公也就认为老大不聪明。二儿子熙茂十分聪明，但滥赌成性，屡教不改，没人敢指望他。老三熙灏看起来还不错，有望将来接过做生意的棒子，负起养家的重担。于是外公对熙灏说：只要你肯留下来，家里的生意交给你去打理，老婆，我也帮你娶一个。可是熙灏不为所动。最后，外公大骂了熙灏一顿，丢给他几百块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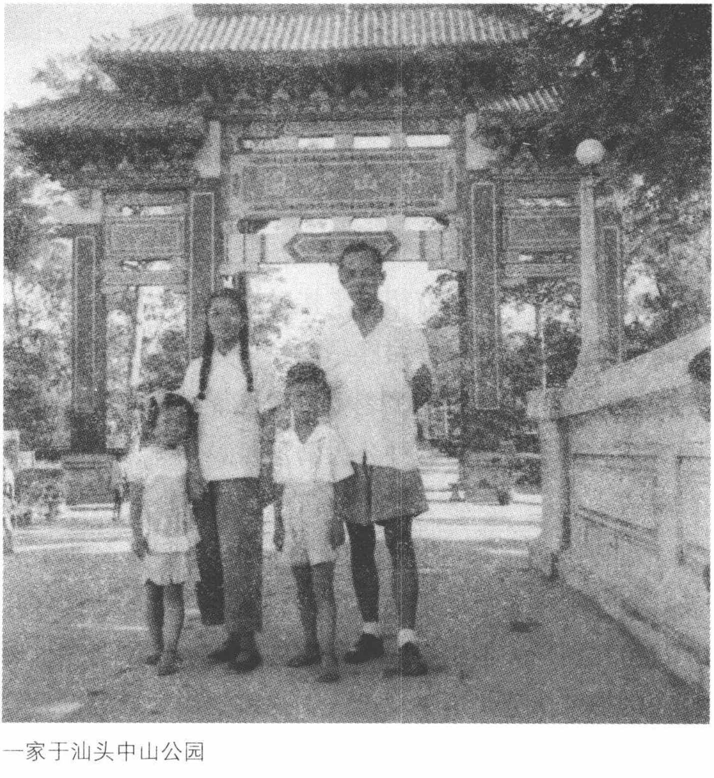
黄智佳的父亲一样反对儿子回国，父子大吵了一场。智佳本来每逢周末都回边佳兰老家，这下赌气好几个月留在新加坡他姐姐的家不回去看父亲。黄老先生看儿子的态度十分坚决去意已决，挽留不住，最后也只好让步，掏钱让孩子上路。



祖母（后）到汕头小住



母子于汕头家中



一家于汕头中山公园

于是，三个在资本主义社会成长的年轻人，准备了些冬衣，又听说国内交通都靠自行车，又各自买了一辆自行车，在1952年4月10日，登上了一艘开往汕头的挪威轮船。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社会主义的新形象和良好的社会风尚，形成了一种时代的感召，吸引了东南亚成千上万的华侨青年回国升学。他们满怀理想和爱国激情，历尽险阻义无反顾地投入祖国的怀抱。在这股回国的浪潮里，刘熙茂、刘熙灏和黄智佳在1952年4月18日抵达汕头。

三剑客来到我们位于汕头市共和路同益西巷18号的家，母亲叫我们称呼他们：茂舅、灏舅和智佳舅。在我20多年前写的一篇散文《一树玉兰》里，回忆了那栋房子以及这三位舅舅给我留下的印象。其中第一段是这样的：

那年我们举家北上，落足在汕头一个短时期。住的房子是借来的，听说是"三反五反"前一个什么大官僚的私宅。洋楼有三层，底层是大厅，二楼有好几个卧房，三楼还有六个小房间。我们抵步不久，几个舅舅也相继北上，住在三楼，一人一个房间，还住不满呢。

不久，茂舅率先北上，在北京华侨补校补习了几个月，被分配到天津的河北水产学校。灏舅和智佳舅在汕头停留了四个月，在父母的努力争取下也到了北京，后来被分配到天津南开中学，继续读初中三。他们选择南

开中学，因为那是中国总理周恩来上过的学校。灏舅记得当时他们班上 64 个学生，其中 50 人都是归国华侨。

1953 年中，父亲完成了在武汉的一年政治学习，在他的要求下，被调到北京中国新闻社工作。父亲离开后，母亲也向侨务局提出要到北京工作，与丈夫团聚，但是等了几个月，一直没有消息。母亲索性不等了，带了两个孩子和一个佣人，到银行提了钱，买了火车票，全家浩浩荡荡地就进京了。

后来，母亲这种擅自搬迁的举动，被她的领导批评为：无组织，无纪律！

19

王大人胡同

有一回，父亲手上提了一块用草绳系着的猪肉，正要踏入一家饭馆，一个头戴白色清真帽的师傅把父亲给拦住了，说，你拿着这东西，不能进来。


初到北京

1953年10月的一个晚上，父亲到北京天安门广场旁的火车站，接到了远道而来的老婆和孩子。

我们一家四口，加上母亲从汕头带来的中年保姆阿伲，以及十几件大大小小的行李，分成好几辆三轮车，浩浩荡荡地向京城东北角的北新桥王大人胡同奔去。离开火车站，从三轮车遮帘的缝里，我看见四周漆黑，街灯稀疏，不远处就是巨大而庄严的天安门，在黑暗里像一座沉睡中的堡垒。路很长，天气很冷，母亲紧搂着我。踩三轮车的人使出了浑身力气，使劲儿地踩，轮子咯噔、咯噔地转，那是我对北京的第一印象。

王大人胡同，是一条东西方向的胡同，现叫北新桥三条。据说，王大人胡同一号，原是明朝末年崇祯皇帝的太监大总管王承恩的府邸，胡同里其他的房子，住的都是他的亲属和随从。胡同里的十号，原来的正门是在南面的报恩寺，是一个带跨院的两进四合院，坐北朝南，四合院最深处有一个大花园。不知什么时候，十号来了个“向后转”，把大门开在王大人胡同。于是，我们一进入十号大门，首先看到的是花草稀疏的花园，假

山假石和圆形的拱门，园里还有几棵枣树，几株丁香。

我们抵步的时候，十号大院儿里面已经住了几十户人家，大多数的是归国华侨。其中最大的院子的三间北房，住的是新加坡归侨卢心远一家。卢心远战前是《南洋商报》的主笔，战后在中正中学和华侨中学教书，是父亲的旧识。我们住在他们西边跨院的一间北房，屋子长而窄，母亲用家具把屋子隔成里外两间。

王大人胡同的最东端，有几个政府机关。最东边靠北的一号，是华侨事务委员会的大院。侨委大院的面积颇大，里面有礼堂、篮球场、食堂、好几栋办公楼，还有一些小院落。附近侨务系统机关的职员，每天中午都到侨委大院的食堂去吃饭。

紧挨着侨委大院的三号，是个总有警卫站岗的红色大门，那是何香凝和她的儿子廖承志的住宅。何香凝当时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廖承志当时也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换句话说，何香凝是新中国主管华侨事务的一把手，廖承志是二把手。

王大人胡同东端靠南的二号，是一栋新建的四层楼中国新闻社大楼，父母亲就在那里面上班。中国新闻社简称中新社，是当时中国仅有的两家通讯社之一。以历史的悠久和知名度来说，新华社是老大，是纯官方机构；中新社是老二，是半官方机构。中新社于1952年9月14日正式成立，里面容纳了许多归国的华侨文化人，

主要任务就是向海外宣传新中国。中新社规模不大，大约有三百多名员工。父亲在新加坡报界工作时的同事和朋友回国后，除了一些在广州之外，多数都在北京中新社工作。

父亲所在的中新社图片组，专门负责拍摄、冲洗和发布一些宣传新中国动态的相片。发稿对象包括香港《大公报》、《文汇报》，新加坡《星洲日报》、《南洋商报》，以及印尼的《生活报》。母亲的工作是校对和抄稿，每天要查看有多少篇中新社的稿件被刊登出来，因此有机会看到海外的报纸，自然对新马的动态特别留意。

我们逐渐适应新的环境。哥哥满 7 岁时，上了离家不远的太保街小学，我则进入了王大人胡同里的一所托儿所。那是一家全日托的学校。每天除了上课、游戏、午餐之外，孩子们中午还在学校午睡。有一天，老师在放学时告诉来接我的阿伲，说我有点发烧，回家让家长带去看医生。北京的老师说的是一口像唱歌一样的京片子，南方来的阿伲没听懂，回家什么也没说。半夜，我高烧不退，母亲连夜带我坐三轮车赶往医院。因此，北京留给我的第二个印象，又是黑夜，颠簸奔驰的三轮车，外面一片漆黑，母亲搂着我，不时摸摸我滚烫的前额，心急如焚。

我们家保姆阿伲，晚上住在十号大院儿里的一个保姆间，也因此交了许多新朋友。母亲回忆说：

王大人胡同十号的主人们，有些是高级干部，他们觉得我们家阿伲比他们请的缠脚的北方保姆利落、勤快，于是都打她的主意。因此，阿伲后来常常“为人民服务”，不太管你和你哥哥，让你们两个人在家打架，我下班回来就得做裁判，看谁对谁错。

阿伲不久就离开了我们家，到薪金更高的地方打工去了。

我满7岁时，上了离家稍远的“二中心小学”。每天，我跟两个邻居的孩子结伴儿走路去上学。我的两个同学，一个是十号大院里的卢迈，是卢心远的儿子；还有一个是叫叶连成的北京小孩。冬天时，地上结了冰，我们三人各自找了一片小竹片，右脚踩在竹片上，左脚一蹬一蹬的，一路滑到学校。

回想起来，新中国刚成立的那几年，社会治安确实相当好，父母亲让7岁的我每天自己走半小时上学，走半小时回家，从来都不担心。

由于工作上的需要，父亲常常需要安排拍一些主题相片。有一回，我被他拉去当小模特儿。那是一个春天，北海公园里桃花盛开，柳树点点绿，小山丘上还有些许残留的白雪。相片的前景是两位年轻的女画家在北海写生，后景是两个小孩在桃花林里看花、爬树。两大两小的模特儿按照要求作出不同的姿势，任照相机咔嚓咔嚓地响。这几张相片向海外发出时，解说词是：归国华侨在祖国的美好生活。



宣传照一：归国华侨在祖国的美好生活



宣传照二：左一为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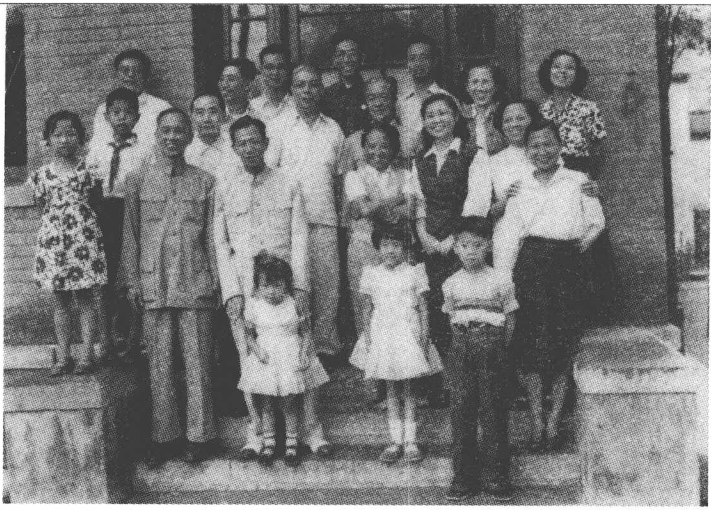
宣传照三：哥哥和我在颐和园游泳

另一个夏天，父母亲带我们到颐和园去玩儿，那时候颐和园昆明湖的一角围起来，可以让人游泳。母亲为我们带了泳衣泳裤和救生圈，其实也说不上游泳，哥哥和我就是浮在水面上玩儿水。父亲用自己的相机拍了几张相片，其中一张后来也向海外发了。

父亲年轻时就喜欢话剧，偶尔也在舞台上客串一个小角色，这个嗜好他一直没有放弃。有一回，他带我和哥哥去王府井的人民剧场看儿童歌舞剧《马兰花》。记得那场演出让我大开眼界，演员们的服装色彩十分鲜艳，有歌有舞有剧，舞台布景和灯光也都十分讲究。有一幕坏老猫害死了勇敢的小鸟和善良的小兰，马郎和朋友们上天入地要把它捉住，于是老猫到处窜逃，众演员从台上追到台下，在观众席热热闹闹地绕了一大圈，观众跟着喊杀喊打，都乐坏了。

在我们简朴的生活里，偶尔也有比较“奢侈”的时候，那就是父亲带着一家人上馆子，去的多数是北新桥附近的小饭馆。冬天的晚上，天黑得很早，我们通常是在北新桥的副食品商店买了些糖炒栗子、烤白薯，或者冰糖葫芦之类的东西，然后才去吃饭。有一回，父亲手上提了一块用草绳系着的猪肉，正要踏入一家饭馆，一个头戴白色清真帽的师傅把父亲给拦住了，说，你拿着这东西，不能进来。父亲抬头一看招牌，原来这是一家清真饭馆，连忙说，对不起，就带我们到附近另一家饭馆吃饭了。





到胡愈之家聚会，二排右四是沈兹九，她后面是胡愈之。二排右一和右三分别是母亲好友李金玉和洪宁。后排右一为母亲，中排左一和左二为我和哥哥。前排左一穿中山装者为林芳声，他的右后方是李铁民；胡愈之左侧是黄叶生，胡的右后方是洪丝丝。

在北京，父亲偶尔会带我们到老朋友的家坐坐。记忆中，我们去过温平在魏家胡同的家。那是一个单家独院的小四合院，温家还有两个跟我年纪相近的小女孩。温平的太太是新加坡上海书局老板的女儿，日本占领新加坡之前，温平跟父亲都参加了青训班的工作，后来也同样逃亡印尼。

另一个我们常去的是林芳声和他太太洪宁阿姨的家，在王大人胡同 18 号，也是一个四合院。林芳声早年在吉隆坡当过马共报章《民声报》的主编，后来曾主编《南洋商报》经济版，也在《南侨日报》工作过。

去胡愈之和沈兹九夫妇在北京的家，是比较隆重的

事。胡愈之是父亲在新加坡时的老领导。回国之后，他被付以重任，在他许许多多的官位职衔中，包括民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胡老不时邀请一些南洋的归国报人，特别是民盟的盟员到他家聚餐。凡是碰上这样的邀请，母亲都会先带我到王府井东安市场的“稻香村”去，买一些糕点或卤味之类的带去。胡老的家比较大，众人吃喝谈笑之余，也喜欢拍张照留念，而父亲往往因负责拍照而不在镜头里。

母亲工作之余会给我们做衣服，用的是她从新加坡带回去的布料。由于布料的颜色花草都比较特别，加上母亲总会在设计上变些花样，不是东绲边西绲边，就是在肩上或裙脚加上一绺波浪，让一件简单的裙子看起来跟商店里的不一样。我在母亲无心的包装下，穿着跟别人略有不同，在学校里得了一个外号，叫“小华侨”。

在王大人胡同十号住了两三年后，中新社在胡同里又找了一片地，盖了新的宿舍大楼，大家叫它 60 号黄楼。我们也搬到黄楼旁边，骆驼脖胡同 13 号一个很小的四合院。父母亲被分配到两间北房，我们终于有了一房一厅。

母亲想念南方的小菜，有一年，竟自己动手做起潮州的酸咸菜。她不知去哪儿买了许多芥菜心，洗干净晾干了，就在院子里摆起了洗衣服的架势。她坐在一张小板凳上，把芥菜都放进一个洗衣服的大圆桶里，撒上一把粗盐，然后使劲儿的翻呀、搓呀、揉呀，直到芥菜都

软了。然后再把芥菜放入一个大陶缸，加入南姜和白糖，加盖封好。十天半个月之后，就成了美味可口的酸咸菜。

在外表上，母亲极力的把自己“本土化”，她不再烫头发，把长发梳成两根大辫子。她也做了一些像别人一样的深蓝色的外套，整天穿得灰灰蓝蓝的。母亲甚至把她那听起来挺资产阶级的名字“刘丽娴”，改成“刘华亮”，取自两个孩子的名字，又爱国又容易记。

每天早上，我们一家四口，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下午我们放学回来，通常在院子旁边的空地上和别的小孩子玩儿。有时踢球，有时跳绳，或跳猴皮筋儿。北京话猴皮筋儿，指的是橡胶圈（rubber band），当时在北京不容易买到。在新加坡的成舅，不时会给我们寄一些国内买不到的东西，有一回寄了好多不同颜色的橡胶圈给我。我把五颜六色的猴皮筋儿一个套一个地接起来，然后找两个小朋友一人牵一头，另一个人就可以跳了。大家边跳边唱：一个脚，踢八踢，马岭开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

傍晚，我和哥哥提着饭盒，到侨委会大院儿的食堂去打饭。有时我们俩也到父亲的办公室去玩儿一下，或者跟父亲到大楼后面的暗房，看人家冲洗相片，闻一闻刺鼻的药水味。

哥哥在太保街小学上学时，开始学踢足球，到了四五年级时，已经是校队的中锋，左右脚都能射门，功夫

了得。不过，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回，哥哥在家旁边的一条干涸了的小水沟里，架起一根横木，横木上再架上一块木板，就和邻居的小朋友玩起跷跷板来。哥哥手里还抱着个皮球，木板左右摆动，一个不留神，哥哥的右手撞上了竖在水沟旁一根直插着的木桩，失去平衡摔下，结果右手脱臼骨折，疼得脸青唇白。后来邻居通知了母亲，把哥哥紧急送往医院。

哥哥右手打上石膏，吊着绷带过了好一段日子。等石膏拆了，母亲第一件事是看看哥哥两只手臂是不是还一样长，我记得哥哥听话地伸出双臂，让母亲检查。还好，哥哥的两手看不出有什么长短。

20

毛主席的好孩子

一片闹哄哄的敲锣打鼓声，不仅仅来自我们学校的每一个角落，附近的工厂、民宅，一样喊杀喊打。偶尔飞来的一群麻雀，都吓得魂飞魄散，屁滚尿流，整个北京城没有它们歇脚的地方。


二中心小学同学郊游，前排左六为我。


我上学去

我上的第二中心小学，是北京东城区的一所重点小学。学校的范围很大，有两个大操场，课室都是平房，分散在操场四周。

我们一班 40 多个同学，被灌输的是“努力学习，天天向上”，要做毛主席的好孩子。二年级时，我们班上的同学全都进了少年先锋队，脖子上戴上了红领巾。中国少年先锋队，简称“少先队”，是中国少年儿童的群众组织，教育少年儿童听党的话，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努力学习，锻炼身体，为建设现代化的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到了四年级时，品学兼优的卢迈已经是少先队的大队长，我是班上几个中队长中的其中一个，负责班上的文娱活动。少先队的大、中、小队长，分别以左手臂上别上一个有红色的三杠，或两杠，或一杠的小布章来区别。

在中国，一个孩子从小到大，以能加入少先队、共青团和共产党为至高的荣耀。不过这三个团队的入门门槛，一个比一个高，归国华侨，特别是1949年10月1日以后回国的华侨，即使是穷其一生为祖国为共产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到头来也不一定能成为共产党员。

记得我们当时的学习并不紧张，放学回家也没有什么功课。从二年级时起，我们开始写作文。第一次作作文，老师出的题目是“快乐的一天”。刚巧，就在不久前，父母亲工作的中新社组织员工去北京近郊的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参观，我们一家都去了，那天玩得很开心。也许我们那时太小，对于一个个的山洞，展览厅里的北京人头盖骨，各种化石，以及北京猿人在人类进化史里的地位没有太多的认识，但是那荒凉的山区，天高地厚的空旷，以及一条清澈见底布满鹅卵石的涓涓小溪，给予一个城市孩子的惊喜，却是深刻和难忘的。

游周口店经卢沟桥留影



我把自己所见所思所想写进了作文。后来，老师在课堂上读了我的“快乐的一天”，我十分惊讶，当然也十分得意。从那一天开始，我从不觉得写作有什么困难。回想起来，摇笔杆的基因或许早就存在于我的血液里，只是自己不自知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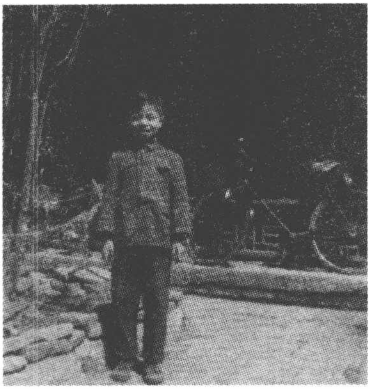
除了课堂上所学的，我们家也有很多很多“小人儿书”。这些每一页都有精美图画的连环图，比课本好看多了。那个时候我看了许多《红楼梦》《三国演义》和《聊斋》的故事。其中也有一些是现代的故事，比如有一本叫《飞车搞机枪》，说的是铁道游击队员如何在抗日战争中，跳上行驶中的火车，扒开车门，把日军的枪支弹药搞到手的事迹。

那时在北京的中小学里，流行看苏联作家尼古拉·阿历克塞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所写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对一个三四年级的孩子来说，可能是太深奥了一点，但是，我们似乎人人都能背诵这本书的男主角保尔·柯察金所说的一段名言：

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致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致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上学、看小人儿书之外，我最喜欢跳舞。

住在王大人胡同十号时，邻居卢迈的姐姐卢嘉教我跳“新疆舞”。“新疆舞”最难的一关是“动脖子”，就是脖子在肩上平行地左右摆动。卢嘉为了教我，叫我靠墙站着，然后把我的肩膀贴墙按紧，再叫我左右摆动脖子。几经练习，我竟学会了。


哥哥华华于王大人胡同10号大院

跳新疆舞时唱的歌是：那天我打从你门前过，你正提着水桶往外泼，一泼泼到了我的皮鞋上，街上的人们笑咯咯，你什么话也没有对我说，你只是提着水桶望着我……

我们搬到骆驼脖胡同之后，周末常有一些南洋归侨到我们家来玩儿，母亲就以炒米粉招待客人。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位年轻漂亮的印尼华侨郭阿姨，回国后，加入中央歌舞团成为舞蹈员。

或许是这位郭阿姨送的票，我们一家曾去看她们的演出。当晚的演出重点是中央歌舞团的一个新节目“荷花舞”。只记得布幕拉开，台上几十位穿着绿色薄纱舞服、裙脚缀满了立体荷花的舞蹈员，从舞台两边轻飘飘地滑出来，形象实在是美极了。我于是立志要当个舞蹈演员，开始留长发，打算小学毕业就去投考北京舞

蹈学院附中。

到了三四年级时，少先队的辅导员也教我们跳舞。我学了铃鼓舞，蒙族的挤奶员舞和拔萝卜舞。没想到的是，这些很简单的舞蹈，后来大有用途。

我们学校最大的操场边上，有一个长方形跟桌子一样高的水泥讲台，校长训话时就站在上面。下课的时候，同学们争先恐后地跑到那里，在讲台上用两块红砖和一根木棍搭起一张简陋的乒乓桌，打起乒乓来。

校里喜欢打乒乓的人太多了，往往轮不到我们这些低年级的，于是我们放学后就到同学李大慈家里去打乒乓。李大慈个子不高，梳着两根小辫子，鬼灵精怪的。大慈的家，在离学校不远的前肖家胡同，是个两进的四合院。大慈的父母亲都是医生，他们家的前院里摆了一张乒乓桌。我们几个同学到她家去，可以打乒乓打个痛快。

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也喜欢上汪玉的家去。汪玉是我们班上个子最高最斯文的女孩子，说话总是细声细气的。汪玉的妈妈是老师，他们家在学校附近的大格巷，是个蛮大的两进四合院，后面还有一个大花园。同学们最喜欢去汪玉家的花园，因为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果树，有桃、杏、梨、苹果、海棠、葡萄和核桃，几乎什么季节都有果子采。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学在汪玉家玩儿，我爬上了核桃树，下来时不小心右边脸颊擦破了

皮，流了一点血，吓得要命。那天回家躲不过大人的眼睛，让母亲骂了一顿。

我们班上有一个男同学叫王凯宁，他家住国子监街。这条街跟附近的几条胡同比起来，宽敞整齐得多了。国子监是元、明、清三个朝代，中国管理教育的最高行政机关和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换句话说，国子监相当于国家的教育部和大学研究院。

上四年级时，学校里发生了几件挺好玩儿的事。

有一天，学校里来了好多金发蓝眼睛的外宾，听说是在北京读书的苏联留学生。那时中苏关系还没恶化，中国老百姓都很尊敬苏联人，称他们为苏联老大哥老大姐。我们小时候常常唱的许多歌曲，譬如《莫斯科郊外的夜晚》、《三套车》、《喀秋莎》、《山楂树》和《纺织姑娘》，都是苏联民歌，可见苏联对新中国影响之深。

那天，学校特地让同学们在大操场上围起了个大大的圈子，安排了一些唱歌跳舞的表演项目。其中一个节目是王凯宁一个人站在那水泥讲台上唱京剧。王凯宁从二年级起就拜名师唱老生，他那天唱什么我们都不记得了，但是他不但不怯场，而且唱得有板有眼，唱做俱佳，老气横秋。他一唱完，苏联老大哥老大姐们连连鼓掌，同声赞好。

这一来，学校老师受到了启发，京剧国粹如此受欢迎，应该赶紧发扬光大。于是，第二天，级任老师来到

我们班上，眼光一扫，点了同学张圆和我，说："张圆，朱亮亮，从明天起，每天下课去学吊嗓子去。"

王凯宁会唱京戏，就表示他班上的女同学都能唱？都是可造之才？这两个绑着两根小辫子的小姑娘喜不喜欢唱戏？愿不愿意学？这都没关系，也用不着请示家长，我和张圆就开始了吊嗓子唱青衣的日子。

教我们唱京剧是一位会拉二胡的中年老师孙老师，每天下课时间，我和张圆就乖乖地到教员休息室跟孙老师上课，我们的启蒙曲目是《二进宫》。

京剧《二进宫》通常是和另外两出戏《大保国》和《探皇陵》一起演，《二进宫》是第三部分，讲的是明朝宫廷里争夺王权的内幕。唱词是这样的："李艳妃，坐朝阳，自思自想，想起了老王爷，好不悲伤……"

我和张圆的京剧课程只学了这几句就没了下文，但是王凯宁始终坚持学唱京戏。40 年后我们再相见时，京剧中的生、旦、净、末、丑，除了旦角，王凯宁什么都会唱，还拉得一手非常专业的二胡。

1958 年 4 月的一天，第二中心小学的学生们，直接参与了新中国的一项政治运动：打麻雀。为什么要打麻雀？因为麻雀是"四害"之一，跟老鼠、苍蝇和蚊子一样，应该被彻底地消灭。当时《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

老鼠除了传播疾病以外，还大量损耗粮食，破坏衣

物、房屋以及田埂堤坝。同老鼠一样，麻雀也是农作物的大敌。消灭苍蝇、蚊子、老鼠、麻雀，是我们征服疾病和消灭危害人类的害虫害兽害鸟的一个重要步骤。在这一斗争的过程中，我们要大大提高人民的卫生水平和健康水平……

当时，全国各地还为消灭“四害”定下了时间表：

截至目前为止，据不完全统计，提前实现“四无”的省和直属市，已经有北京定为两年，河南定为三年，上海定为三至五年，江苏定为四年……

记得那天早上我们到学校之后，都不用上课。有的爬上课室的屋顶，有的爬到树上，或站在高处，手拿竹竿、旗子，或从家里带来的脸盆、水壶，各种能制造声音的器皿。一有麻雀飞过，同学们就摇旗呐喊，敲盆敲罐，好不高兴，兴奋极了。

一片闹哄哄的敲锣打鼓声，不仅仅来自我们学校的每一个角落，附近的工厂、民宅，一样喊杀喊打。偶尔飞来的一群麻雀，都吓得魂飞魄散，屁滚尿流，整个北京城没有它们歇脚的地方。

根据记载，那年 4 月 19 日，北京有 300 万人参加了打麻雀运动，单单那一天，全北京市累死、毒死和打死的麻雀共有八万三千多只。从全国的范围来说，那一年，中国的麻雀几乎全被消灭殆尽。然而，麻雀被消灭了，稻田里的害虫没有麻雀来吃，结果害虫大量繁殖，肆无忌惮，造成更大的农业灾害。

1960 年，麻雀终于从“四害”中除名，因为毛主席说：麻雀不要打了。臭虫取代了麻雀，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我们始终是毛主席的好孩子，毛主席说打麻雀，我们就努力地打，使劲儿地打；毛主席说不打了，我们就住手。

似乎从来没有人质疑为什么要打麻雀？应不应该打？当然，后来人们也都知道，是不能对毛主席的主张提出质疑的。

21

申请枪毙

茂舅不适应新中国的体制已经到了极限，那时他唯一的诉求是回新马，回到他生长的地方，回到他熟悉的社会。不能回家，不如一死。但是要离开当时的中国，谈何容易！

在北京平静的生活中，茂舅掀起了一阵风暴。

在没回国读书之前，茂舅除了沉迷于打麻将，也喜欢跟朋友出海钓鱼，特别是对钓西刀鱼，颇有心得。因此，1952 年秋天他进了河北水产学校，开始时上学上得蛮开心。水产专业的学生有机会出海实习，有机会跟随大捕鱼船出海捕鱼虾，令他十分满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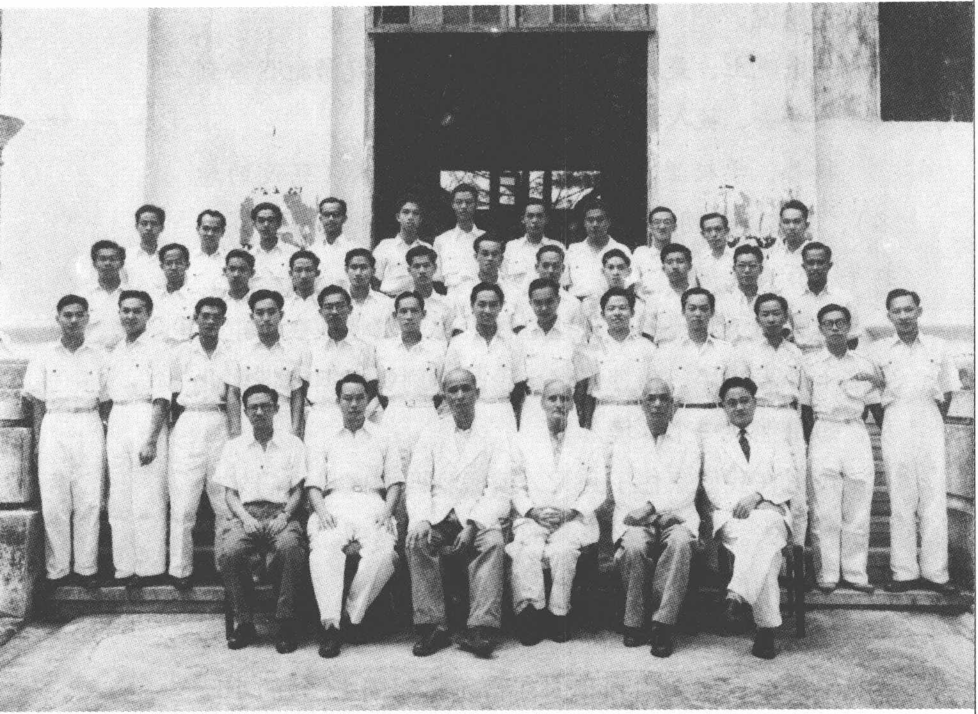
不幸的是，一年多之后，河北水产学校不知为了什么缘故解散，学生都被分配到其他院校，茂舅被转入天津师范学院数学系。茂舅自小数学很好，学习上没什么问题。不过，茂舅开始交上了一些性格桀骜不驯的印尼归国华侨，那些打扮得有点像流氓的富家子弟。接着，他开始不遵守校规，白天不上课，晚上沉迷于武侠小说，特别崇拜小说里的英雄。

那时同样在天津求学的熙灏六舅记得：

三哥（熙茂）在水产学校的时候，开始模仿教授的作风，学资产阶级，摆阔气，因此受到批评。我想当时校方的教育方法也有问题，没有对症下药。当他不听话时，就用批判、恐吓、打压的方法，越搞越糟，结果各走极端。

天资聪颖的茂舅原本就比较内向，孤芳自赏，新中国的高压教育模式显然不适合他。也许是出于对权威的反抗，也许是出于对求学梦的放弃，茂舅的举止行为开始有些怪异，熙灏说：

那时我和智佳在天津南开中学上学，1954 年他来



1948 年新加坡华侨中学高中毕业班合照，后排左五为茂舅（刘逸林）。

看过我们。他打扮得古里古怪的，很邋遢，神态异常。

就在茂舅的言行举止日渐偏离正常的生活轨道时，他的一个印尼归侨朋友突然失恋了。这位男主角与女朋友交往了一阵之后，女方突然不理睬他了。这位印尼华侨非常痛苦，茶饭不思，不能自拔。茂舅知道了，很替他的朋友打抱不平。于是自告奋勇地说：把你写给她的信拿来，我帮你拿去。

根据母亲后来了解，茂舅自告奋勇去充当英雄时出

了事，她说：

一个晚上，是寄宿生自修的时间，你茂舅把信拿到女生宿舍去，被人捉到，说他图谋不轨。

接着，学校里搭起大棚，狠斗刘逸林（熙茂的学名），罪名是企图强奸那个女生。斗得很惨。唉，众狗扛羊，百口莫辩呀。

母亲为了茂舅的事火速赶往天津，发觉他在重重压力之下外表憔悴，精神恍惚，于是立刻要求把他带回北京，想给他换一个环境。

茂舅在我们家住了几天，就搬到西城区阜成门外的华侨补校去。但是，接下来的情况越来越糟。他会跑到王大人胡同的中侨委大门外，头戴三角帽，双手叉腰，闹事骂人。他大喊，我要见毛泽东！毛泽东在哪里？我要见毛泽东！他会跑到我们在骆驼脖胡同13号的小院子，站在院子里对着我们的屋子破口大骂。骂父亲，骂母亲，骂所有他认识的人。有一天他来到我们家门口，大声说：我一手申请枪毙，一手申请回马来亚看望高龄的母亲。不让我回去，就枪毙我吧！枪毙啊?！死何足畏！人生自古谁无死！

现在回想起来，茂舅不适应新中国的体制已经到了极限，那时他唯一的诉求是回新马，回到他生长的地方，回到他熟悉的社会。不能回家，不如一死。但是要离开当时的中国，谈何容易！

除了叫骂，茂舅不断地向母亲要钱，每天三四十元

人民币都不够花。那时，父母亲两个人的薪水加起来，每月也不过一百五十多元，无法满足他。茂舅几乎把自己的东西全卖光了，包括他从新加坡带回去的自行车、手表、毛衣，最后连唯一的一个皮箱也卖了。

母亲没了办法，在众人的建议下，决定把茂舅送进北京东直门外的精神病院。那天，母亲向单位借了一辆汽车，骗茂舅说要带他去见毛主席。母亲说：

你茂舅上了车，车开到精神病院门口，他看到大大的招牌，说，咦，不对，怎么是精神病院？我只好骗他说，毛主席在里面。

他在精神病院住下后，我去看他，他一直吵着要回家。开始时医生说他没什么，只是有点夸大狂。再过几天去看他，他的神情有点不对了，医生说要给他打胰岛素。

医生也向母亲解释，打胰岛素有两种可能的结果，一是病况受到控制，二是有生命危险。母亲不敢做主，赶紧写信回新加坡请示。外公在难过伤心之余回信说，你们在那里瞧着办吧。

胰岛素打过之后，茂舅安静了下来，目光呆滞，不说话，好像换了一个人。

1956 年夏天，三剑客中的另外两人，熙灏和智佳，在天津南开中学修完了高中。智佳的成绩比较好，考上了河南医科大学医学系，很快就到开封上学去了。

熙灏向往当外交官，认为搞外交要斗智斗谋，是

一门很有挑战性的艺术。不过，他也听说华侨学生不够资格读外交，你成绩再好也进不了外交专业的门槛。熙灏年轻气盛不信邪，在升学表格中只填写了一个志愿：北京外交学院的外交专业。很快的，校长找他去谈话。

校长：刘逸民（熙灏的学名）同学这样不行呀，一个专业一个志愿，不行呀。

熙灏：不行？为什么不行？

校长：万一他们不录取你，你上哪儿去？不行呀。

熙灏：好，不行我再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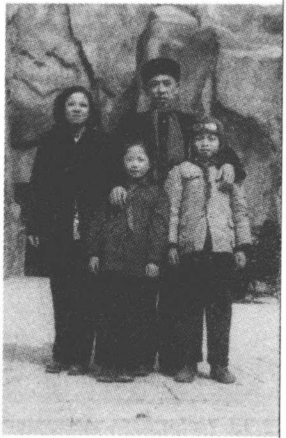
熙灏又填了北京大学法律系，还有北京外语学院。

其实，外语，法律，军事这三个专业的政治条件要求都很高，因为翻译、律师和军事人员三者都会涉及到国家机密，学生非根正苗红不可，华侨根本是读不上的，但熙灏硬是要碰一碰。结果学校分配熙灏去干部学校读政治，是两年的大专课程，培训之后可以当政治教师。熙灏不想去读政治，决定先回华侨补校，等待分配更理想的大学。

几个月后，1956 年底，华侨补校动员学生到云南的西双版纳去，口号是“去当祖国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而实际上是去原始森林开荒。熙灏当时是学生当中的积极分子，十分努力地动员别人去云南，结果自己也被自己动员了，决定去领略一下开荒的滋味。他说：



北京动物园，后排左一为熙灏，右一为熙茂。



1956 年全家于北京动物园

西双版纳在云南和广西的交界，我们 350 多个华侨补校的学生，浩浩荡荡就出发了。

到了那里，才知道车停下也不能下车去解手，因为到处都是狼群，非常荒凉。我三天三夜睡不着。女同学们，那些华侨小姐们更苦，就写信回家报告。家长们于是写信给国务院，说我的子女是回来读书的，结果到西双版纳去受苦，过那么苦的生活……

不久，学校当局说，同学们都锻炼好了。我们在那里一年两个月就回来了，那是 1958 年 3 月。

西双版纳的浪漫之梦破灭之后，华侨学生们要上学的回到学校，要工作的分配了工作。熙灏最后被分配到云南昆明工学院机械系，1959 年秋天，24 岁的他终于进了大学。

在北京，茂舅从精神病院出来后，在我们家休养。



1956年春天，茂舅算是痊愈了。熙灏那时还没去云南，我们一家四口加上两位舅舅，到北京动物园玩儿了一天，留下几张难得的全家福。

我们那时并不知道，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

22

引蛇出洞

你父亲去东北之前，好多次对我说，即使把我烧成灰，我的骨灰里也找不到一点反党反革命的东西。

1957年夏天，康复后的茂舅正式申请出国，等待批准。他住在我们家的客厅当厅长。

由于闲着没事干，茂舅常常会在我放学的时间，到二中心小学去接我。当我们班的同学们排着两行队伍从校门出来时，茂舅就会一边陪着我走向方家胡同，一边用舌头摆弄着他下颚的一排假牙，一下子吐出来，一下子弄回去。我的同学们没见过像他这样变戏法的，都乐得呵呵直笑，还说，再来一个！再来一个！茂舅也就乐得再三表演他的小戏法。

回家之前，茂舅往往会带我到北新桥的副食品商店，去买点糕点，或山楂片，或云片糕。他也教我如何在一堆冰冻猪肉或冰冻鱼虾里，挑选比较新鲜的。偶尔，茂舅会帮妈妈做一两个菜，比如用猪肉或排骨熬一锅大白菜，或者炖一锅冬菇鸡汤，或者红烧一条黄花鱼。这一来，加上从食堂买来的饭菜，晚餐就丰盛多了。以茂舅的话说，就是我们今晚有“好料”吃。

然而那一阵子，晚上一家人吃饭，即使桌上有“好料”，父亲总是很沉默，往往一句话也不说，母亲也不大说话，一种怪异的气氛笼罩着我们，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有一天，我跟哥哥提着饭盒去侨委会大院儿的食堂打饭，时间还早，哥哥到篮球场看人家打篮球去了。篮球场旁边是一整排的布告栏，上面贴满了大字报和漫画，我凑上前去看热闹。

那一张张大字报的内容我已不记得，但是我理解到大字报在攻击好几个人，说他们是右派分子，说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其中一个名字就是我的父亲朱奇卓。

最令我难忘的是一张漫画，画的是一个像地下室或防空壕一样的地方，有两个人在一张桌子前做指挥状，另外有两个人已经来到防空壕的门口，一个腰间插着几枚手榴弹，另一个手里拿着一个令牌。两个人的前面那一个，画的就是我的父亲。因为那个漫画家确实高明，把父亲的脸部特征：额高、眉浓、眼大都捕捉得很精确，然后再加以艺术加工，极尽丑化之能事。

后来据我向父亲的朋友们了解，这幅漫画的主题是“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意思是这几个人是一个秘密的反党反革命集团，伺机向共产党开火。在指挥桌旁的两个人，一个是槟城归侨方图，一个是新加坡归侨彭友真，两人都是中国民主同盟的盟员，资深报人。

看完了大字报，我回家一句也不敢提，假装什么也不知道。父母亲也不主动跟我们谈，或许因为我们还太小，况且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孩子”。

或许，父亲根本不打算向孩子解释这件事，因为他自己也搞不明白，他半辈子跟随共产党，相信共产党，拥护共产党，歌颂共产党，在新加坡时还因为言论太“左”，太亲共而被英殖民地政府扔进了监狱，现在怎么就变成了“右派”？而且还成了反党、反革命？父亲



心里肯定有许许多多的问号。

那时在中侨委和中国新闻社，许多跟父亲一样出身一样背景的党外人士，特别是民盟的成员，都被打成了右派。有些党内人士，提出意见或为右派说了几句公道话的，也被打成右派。而一戴上右派的帽子，你马上成了众人唾弃、鄙视、疏离和践踏的对象，成了社会最底层的贱民。

父亲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被扣上了右派的帽子呢？这还得从后来各种各样的文献，以及父亲同事的回忆里，为反右运动梳理出来的一个进程表谈起。

父亲的一位同事，菲律宾华侨王明爱回忆说：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全国各个方面都取得巨大进步。胜利使毛泽东冲昏了头脑。骄傲自满、急功近利，藐视人民的权益，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在共产党和政府的干部中滋生。共产党政策本来就“左”，执行者为表现“党性”坚强，则“左”得更离谱。全国城乡，各界各阶层，都传出对共产党和政府的不满的声音。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要在艺术上百花齐放，要在学术上百家争鸣”，要人民向党提意见。

当年2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秘密报告，题目为《个人迷信及其后果》，谴责他的前任斯大林为“历史上最凶暴的罪犯”。全文被公开

后引起全世界轰动，尤其是各国共产党。

6月，波兰发生工人因要求减税加薪而爆发的“波兹南事件”（Pozna Riots）。随后苏、波两国共产党对抗，波兰政局发生巨大政治变动，被称为“波兰十月革命”。10月，匈牙利也发生了反对共产集权统治的罢工和游行示威，后来苏联出兵干预，酿成流血镇压，死亡和逃离的匈牙利人超过20万。

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对政权日益巩固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个警示。

1957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发出了整风运动的指示，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并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运动，帮助中共整风。在毛泽东言辞恳切的反复邀请下，昔日的自由主义者们，终于提出他们所看到的中共的一些弊病，其意见往往是击中要害，一针见血。

这就是后来毛泽东十分得意的“引蛇出洞”。

回顾历史，在大鸣大放时，职位高权力大的民主党派人士提出的是大意见。例如后来被中国官方列为头号右派的民盟副主席，当时的交通部部长章伯钧，提出他一向主张的中国政府应该有“政治设计院”，也就是效法欧美，实行参众两院制。反右的积极分子把它推而论之，说他是要求与共产党“轮流坐庄”。

第二号右派，另一位民盟副主席，当时的森林工业

部部长罗隆基，提出成立“平反委员会”，以便检讨在“三反”、“五反”和“肃反”中的失误和偏差，让大家申冤诉苦。

另一位民主人士，《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则批评共产党是“党天下”。

一个多月后，1957 年的 6 月 8 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社论尖锐地指出：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等等。

以这篇社论为标志，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开展的整风运动戛然停止，中共反击右派的行动正式开始。

接着，《人民日报》社论与党内指示一篇接着一篇，要求深挖党内的右派、文艺界的右派、新闻界的右派、司法界的右派。有人比作“十二道金牌”，有人比作“五日一小比，十日一大比”，各个单位都下达了要抓多少右派的指标，也就是按在职人数的百分之几的比例来抓。运动展开一年多，挖出了 55 万右派分子，比毛泽东最初估计的 4000 多人多了百倍以上。

至于中国新闻社的整风情况，当时，王明爱是中新社整风领导小组的秘书，他说：

开始整风时，大家都觉得，哎呀，提了也没用，不提也罢。于是有人提议请方方来。大家希望他来参加整风会议，听听党外人士向共产党所提的意见，但他一直

不来，架子很大。

中新社当时是由华侨事务委员会领导，华侨事务委员会的主任是何香凝，副主任是何香凝的儿子廖承志。由于何香凝年事已高，廖承志又忙于外交事务，因此侨委会和中新社的日常领导工作是由中侨委副主任、革命老干部方方负责的。

有一天，方方终于参加了中新社一个部门的整风会议。那天，众人提出的意见，归纳起来有两点：

第一，中侨委不能领导中新社，因为它是一个专搞侨务工作的政府机关，不是新闻总汇，消息不灵通；中新社应由中共中央的宣传部或新华通讯社来领导才合适。

第二，中新社的人事部门应该改革，主要是那里的干部，认为自己是最受重视、最被信任的人才能在那里。他们态度很了不起，对人不能平等看待，动不动就摆出面孔教训人。

实际上，当时中新社人事部的干部除了出身好，所谓根正苗红之外，文化水平、知识水平和业务水平都偏低，加上纪律、作风也有问题，是一个早该整顿的部门。王明爱回忆说：

方方实际上已经心中有数了，他那天上午去开了个高层的会议，知道上头要反击了。他知道毛主席说的是阳谋，不是阴谋，知道要枪打出头鸟！他于是就拍案而起说，既然你们说侨委不能领导你们，那还请我来开会

做什么？这一下子大家都不开口了。

方方是一个主任，共产党来请党外人士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你是主人，提意见的是客人，主人来拍桌子，这算是什么呢？

我其实没参加那次会。我当时是负责把各部整风会议发言整理出来，出快报。我是主编，就写了一篇评论员文章说，方方同志不应该发脾气。这就是我被划成右派的主要罪状了。这叫为反派辩护，为反派张目。

作为民盟的一员，父亲还得参加民盟中侨委支部的整风会议。许多民盟盟员，都是经历过国民党统治，看过国民党贪污腐败弊病的，他们希望共产党好，所以才愿意提一些意见。但是民盟里的共产党员和非党“左”派积极分子，却是虎视眈眈的希望民主党派人士多说一些话，好把他们统统打下去！

父亲在整风会议上的几段发言，被抄录下来，成为被划成右派的罪状：

1. 有党员同事到我家借钱买收音机，而我家的钱是准备补贴生活用的外汇；又看到某归国华侨林某，家里生活艰苦，感到归侨生活下降，国内干部生活上升。

罪状：这是诬蔑党的华侨政策，挑拨归侨对党不满。

2. 有人觉得组织上光照顾归侨，而归侨又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自己和其他几个归侨能力资历差不多，但职位高低有差距，这是组织上没有掌握个人

的历史材料所致。干部之间的鸿沟，是领导上造成的，是中新社干部政策的失败。

罪状：攻击党的干部政策。

3. 平时看到某些党员怠工，讨价还价，工作不积极，觉得看不惯。我们能力强，对华侨情况比较熟悉，工作比较负责，我们不靠历史吃饭，可以提出和一些党员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罪状：与右派分子互相配合，要与党争高低。

4. 我本是图片组组长，又派党员王某来。领导说两个人都是正组长，而不是一正一副，派王来是否就是加强党的领导？我看这是宗派主义。

罪状：反对党员当领导。

当时的推论逻辑是这样的：党通过具体的人来领导你，你说领导不对，就是反对党；反对党就是反革命，就是反社会主义，反人民，你就是反革命分子！

很明显的，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是一个骗局。除了少数事先得到通知而三缄其口的人之外，其余的都像出了洞的蛇，由人践踏，任人宰割。

据说当时中侨委的一个副主任，侨领庄希泉老先生看到这么多归侨被划成右派，气愤地说：再划下去，我不干了！这一来，另一位归侨新闻人洪丝丝才幸免于难。

1958 年，中共中央对划定的右派分子，按照罪行的轻重作六类处理，由重到轻依次为劳动教养、监督劳

动、留用察看、撤职、降职降级和免于行政处分。凡是党员、团员一律开除党籍、团籍。

父亲受到的处分是免掉领导职务，级别连同工资降4级，建议开除民盟盟籍，接受劳动教养。

这个时期，父亲在家里一直十分沉默。后来从两个人口中，我略略了解了他当时的心态。

一个是我的大堂哥朱铮铮。当时，大堂哥已经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四年级学生。他一向很积极，在大学预科时，是学生会预科分会主席；进入本科后，当过工程经济系共青团总支宣传委员。是个锋芒毕露的年轻人。

我们全家在北京时，父亲曾鼓励朱铮铮给中新社写稿。朱铮铮记得：

中新社的稿费是每篇20至30元，在那个时候是很多的。那时我们家里每个月给我3元，那时一双布鞋才4元，一套衣服才5元，一件衬衫才2元多。

我拿到稿费很高兴，可以买一件西装上衣，吃小馆子，帮助同学，买一副眼镜等等。我前后给中新社写了六七篇稿子。

反右前夕，朱铮铮在长春汽车制造厂实习，被召回学校参加反右运动。但是他对同学们批斗教授的行为很反感，班上的干部因此散播对他不利的言论。后来他被“架空”，变得有名无实，也就是“靠边站”了，情绪十分低落。

1957年夏天，朱铮铮趁回潮州探亲之便，到北京

看我们，在我们家住了三天。他记得：

我每天早上到中侨委的食堂，买了馒头擦花生酱吃，然后骑了自行车到处去玩。晚上回来，吃了饭，跟叔叔谈自己的事，自己的郁闷。叔叔反复地跟我说，共产党如果有错，相信他会改，你要相信他会改。你不要到处乱说，应该跟着共产党走。

我听不进去。我后来才知道，叔叔当时正在挨斗，这说明他至死不渝，相信共产党是对的。

看来，父亲那时很清楚自己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里的一个受害者，他无力反击，只能默默承受。他心中的委屈，只能向母亲倾诉。母亲说：

你父亲去东北之前，好多次对我说，即使把我烧成灰，我的骨灰里也找不到一点反党反革命的东西。

最令父亲痛苦和沮丧的是，他多年的老朋友在政治运动中向他发出致命的攻击。母亲说：

你父亲去北大荒劳改，临走前告诉我，以后回来，谁都可以做朋友，就是刘某不能做朋友。

刘某是父亲的旧识，曾在新加坡工作，甚至在外公边佳兰的老家避过难。他后来也回了国，在中新社工作。一个无话不说无所不谈的老朋友，在政治运动中为了自保，在反右会议上对父亲落井下石，父亲是不会原谅他的。

1958 年 4 月的一个早上，天气还很冷。母亲，哥哥和我，送父亲到王大人胡同一号的侨委会门口。父亲



下放大队经厦门游集美



离开北京前赠给同学的小照

着简单的行李，跟其他三十几个侨务系统的“右派分子”，上了一辆开往火车站的大汽车，开始了他们的北大荒之旅。

离别的心情虽然沉重，但并不悲伤，每一个人都相信这是一个短期的锻炼，很快就会回来。

两个月后，中新社部分职员也要“下放”，去农村体验劳动人民的生活，为期一年半载。在几个地点中，母亲选择了福建云霄的常山农场，原因是常山农场离潮汕很近，母亲可以把我们带到潮汕寄托给亲戚，这样一来，母子三人就能常常见面。

1958 年 6 月初，我们随着中新社的大队人马离开了北京，在我送给同学汪玉的一张小照片上写着：

送给：中队长汪玉同学，再见。朱亮亮，1958. 6. 2。

23

北大荒噩梦

父亲去世那天，母亲在福建常山农场，哥哥、我和茂舅在潮州。一个家庭里至亲的人，都不知道他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1958年4月初，几十名“右派分子”，在北京前门火车站上了开往哈尔滨的列车。他们来自中侨委及其属下的不同单位，包括华侨事务委员会、中国新闻社、华侨服务社、华侨补校、侨务干校。


父亲经哈尔滨前往北大荒

火车向北奔驰，到达黑龙江省省会哈尔滨，一行人在当地招待所过了一夜。第二天，再乘火车往东南前进，过牡丹江市后折向东北，经鸡西市到达密山火车终点。在密山镇，他们借用当地学校的课室打地铺住了一宿。隔天，大队人马再转乘汽车，继续向东北挺进。经过几个小时的颠簸，终于到达虎林县的铁道兵850农场二分场。

850农场二分场的具体位置，已经非常接近中苏边境，距离边界线上的虎头镇，只有60多公里。

北大荒的黑土地



当时东北的冰雪刚刚开始融化，气温在摄氏零度以下。

那天早晨，拖拉机把中侨委这几十名老右们的行李运走。在刺骨寒风中，老右们徒步往山上走去。他们只顾东张西望那长满红桦、黄桦、白桦、柞木和核桃木的老林，也不知走了多少时间，终于到达半山腰的一个山窝上面。往下看，那里有几栋木头房子，就是850农场二分场锯木厂的宿舍。远远望去，这个宿舍的前一批住客，一批刑事犯正鱼贯离开，由佩枪的军人押着。

盘旋而下到达山窝里，他们发现这里已经有不少先来的同志，他们即将与中侨委的老右们编成一个队，成为生死与共的“五七战友”（1957年反右运动）。先抵步的战友们来自商业部、外交部、林业部、军委总参二部和最高检察院，他们原来的职业是记者、编辑、作家、俄文翻译、新闻发言人、检察官、司长、处长、科长、科员等等，年龄从二十出头大学刚毕业的小伙子，到四五十岁的老革命。此外，锯木厂的老右队伍里面也有不可划为右派的工人，以及并未划为右派但被人陷害而送来的教师。

老右们在木房子里安顿下来，他们的第一项考验是伐木，伐木一向被视为是重量级的体力劳动。

锯木厂所在的完达山，处处是古木参天的原始森林。砍伐大树有一套特定的操作方法和安全规则，否则十分危险。偌大的树动辄几百上千斤，树压死人、蹶死

人的事件时有所闻。当时老右们用的伐木工具十分原始，是斧头和两人对拉的手锯。

一棵大树伐倒后，要先锯掉树梢，砍掉枝丫，然后把五六米或更长的树干，由四个人或八个人扛到山上的集木点。集木点设在山崖上，再利用山沟当滑梯，把原木一根根推溜到山脚下。山脚下是横七竖八一堆堆的树干，有专人在那里把木材分类，然后运走。

除了伐木，还有其他“锻炼”右派的方法，王明爱回忆说：

我们吃的粮食一般是用拖拉机从山下运上来，可能是为了锻炼我们这些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知识分子，安排我们从锯木厂扛锯好的板材下山，然后背粮食上山。当时也没有那么多布袋之类的，但大家积极性很高，发挥聪明才智，用自己的长裤，把两个裤脚用绳子扎紧，粮食装在两根裤管里，就这样把粮食挂在脖子上或肩膀上，一步一步地运上山。

上山伐木不到一个月，老右们被调去附近山谷里的“五一水库”工地运土。后来又被调去参加云山水库的建筑工程。他们从锯木厂搬到离水库不远的云山畜牧场，住在新建的有洋瓦屋顶的奶牛棚，成为水库工作队。

在侨务系统的右派分子当中，有一位来自北京华侨服务社的缅甸归侨朱其桂，是父亲的远房堂弟。他记得队伍没到达畜牧场之前，有人说他们将入住牛棚猪棚，引起一些议论，他记得：

奇卓兄向来心直口快，喜欢说笑，苦中作乐嘛。他看到我们的新宿舍，就说，哦，我们变成猪了。为了这句话，晚上开会时他被批评，叫他以后说话要小心。

云山水库是一项不小的工程，主要是筑起一道2.5公里长的堤坝，当年5月份开工，计划要在11月严冬之前建好。参加建筑水库的，除了北京来的原来分配在不同分场的老右们之外，主要是参加抗美援朝回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复员军人。

各队的主要工作是送土上坝，这之前得锄土挖土，再用柳条筐一人挑或两人扛到坝上。上坝后，有人稍加耙平，再由履带式小拖拉机来回碾压。

刚开始时，从没干过粗活儿的知识分子们双手磨出水泡血泡，肩膀压破出血，皮肉黏着衣服的事天天发生。慢慢地手皮粗了，长出厚厚的茧子，肩膀厚了，长出一层肉垫，情况才好一些。

父亲当时46岁，在一行人当中算是年纪偏大，身体状况比较虚弱的。父亲被分配到的工作是烧一个一人高的锅炉，为一百多人提供开水，工作地点就在坝上。至于烧锅炉用的柴火，父亲得自己想办法到堤坝两边就近捡拾，摇身变成了捡柴郎和火头军。

云山水库在赶工的时候，足足有好几千人同时在挖土、运土、筑坝，干劲冲天。为了加快建库速度，调动人的积极性，各个连队之间也展开劳动竞赛，争“放卫星”，也就是创新纪录。但是老右们一向都埋头苦

干，从不虚报土方进度。经过半年多的奋战，云山水库终于建好了，他们脚踏实地的工作态度也得到了肯定。王明爱说：

筑坝时，有些队“玩臭”（即投机取巧），利用竞赛前一两天休整的时间，先把土抬到坝前，竞赛那天可以近距离运土上坝，当天每人平均完成土方数大增，就叫放卫星。或有些报大数，记工员是复员志愿军。按工程要求，坝心必须用粘土，不能用冻土和草皮。11月很冷，土地已经上冻，我们七天七夜赶工，不离开工地。困了在坝上背风处草堆里胡乱闭一会儿眼。第二年春天，志愿军复员小伙子负责的工段坝心“翻浆”，也就是融化了，变成烂泥，决堤事故发生了。老右的名声响了起来。



北大荒排水渠

云山水库堤坝完工，锯木厂老右们即刻收拾行李，连夜开拔，背着背包徒步到二分场第六队的住宿地，改编为“850农场二分场排水连”，排水连干的是真正的排水活儿。在六队，他们把住宿安排停当后，就投入了排水的工作。

北大荒大体上是一望无际的平原、荒地，但到处是水草，也就是沼泽、湿地，像当年红军长征走过的草地一样。水草地上到处是一个草疙瘩一个草疙瘩，叫草墩子。水草地上有些地方走上去摇摇晃晃地像是浮在水面，下面就是泥浆，当地人称它为“大酱缸”。若不小心掉下去就起不来了，越挣扎越往下沉。所以，如果不幸掉下去，就必须保持镇静，伸开双手增加浮力，等别人来援救。王明爱说：

我们就是在这一类地方劳动，要开运河，把湿地的水排干好变成庄稼地。一般运河很宽，9米宽，2.5米深，要把水排到穆棱河再流入乌苏里江。运河其实就是排水主干渠，光有运河还不行，还得有不同大小的支渠、斗渠、毛渠，交织成一个排水网络，就是干这个活儿。劳动的地方范围很大，从这一头看到那一头，全是平平的，一望无际，连一棵树也没有。

排水连居无定所，营地则随着运河工程进展而向远处迁移。排水连每天天还没亮就离开营地，晚上天黑了才收工，名副其实的披星戴月地服役。

老右们在心力交瘁、万念俱灰之余，唯一的安慰是

收到远方亲人的来信。他们每十天有一个休息日，这一天除了洗洗衣服，搞搞个人卫生之外，就是给亲人写信。开始时，有些家属还能通过邮局，寄一些衣物、罐头到北大荒，随着城市里的物资越来越缺乏，这样的接济也越来越少了。

北大荒除了荒凉，也十分美丽。但这批知识分子已是惊弓之鸟，纵有才情万千，一肚子墨水，也不敢露出还有欣赏自然界美景的心情。王明爱记得：

我们早上黑咕隆咚就出去，晚上八九点钟黑咕隆咚才回来，我们往往不知道我们住的地方是什么样子的。

那里到处都是一垄垄的垡，犁头把泥翻过来的土块叫垡。冬天时，垡上的草一根根竖立着，上面的露珠晶莹剔透，闪闪发亮，煞是好看。天地一片漆黑，点点荧光在四周眨眼，我们好像置身于神话世界。当然，成群的人在一起会觉得一切如此美妙，如果你是孤零零一个人，肯定会害怕。

在北大荒，落单是很危险的。那里狼很多，狍子（鹿一类的动物）也很多，有时清晨在上工路上，夜色未尽，晨雾朦胧，突然几只狍子急奔而过，也够吓人的。王明爱说：

有一回，有一个队友晚上走着走着，迷路掉了队，到河边有一个捕鱼人的地窝，蹲在里面躲起来。晚上狼群就在附近不停地嗥叫，吓得要命。

在农忙季节，排水连还要干农活儿，帮忙割麦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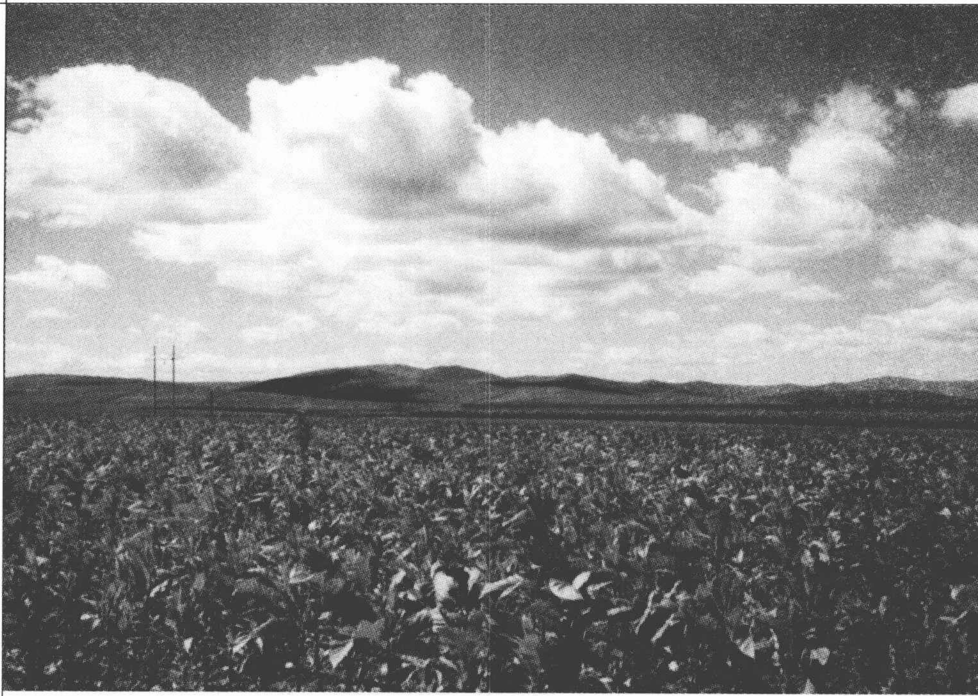


农场场房

北大荒当时在名义上已经机械化了，拥有一些苏联制造的斯大林 100 号拖拉机和脱粒机。但是这些机器大而笨，在土地潮湿时很不好用，但在寒冬腊月冻土遍野时，还是能大显身手的。王明爱说：

斯大林 100，就是 100 马力的履带式拖拉机，就像个大坦克，非常非常重！脱粒机，庞然大物却只有一个小轮子，所有的重量都集中在这个轮子上，常陷在地里动弹不得。播种机也不好使，播种时还是要用人力，收成时也往往要靠人力，我们得参加这些劳动。

一垄麦子，从一早干到中午还不一定割到头，地真



北大荒的夏天

是太大了。

不论是在伐木场或六队的大本营，老右们的宿舍基本上是一样的，那就是一间屋子一边留一条走道，另一边是土坯（即泥土做成的砖）砌成的炕，人睡在大炕上，炕底下烧柴火以取暖。睡这种炕得特别注意防火安全，炕面上哪个缝隙没堵严，就会烤焦褥子，形成暗火，一见风就可能蹿起火苗，酿成火灾。

老右们初到锯木厂和建造“五一水库”堤坝时，正值全中国大搞“人民公社大食堂，放开肚子吃饱饭”的狂潮。伙食虽然极其简单，但是还有馒头吃。王明

爱说：

那时候，半斤一个的白馒头，一个个像小枕头，副食虽少，还有点肉，有的人一顿可以吃三个馒头。

不过，随着新中国“大跃进”的失败，以及官方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而其实是人为灾害的逼近，北大荒劳改人员的粮食供应情况每况愈下。

老右们的体力每天大量地消耗，但是粮食越来越紧张，最初时每人每个月有半斤油，后来只剩下一二两，有时还供不上。主要粮食是玉米，依磨细的程度叫大碴子、中碴子、小碴子、棒子面。王明爱记得：

我们的劳动量很大。伐木和挖土方被定为重劳动活儿，粮食定量供应每月为每人 32－34 市斤，一市斤等于半公斤。而坐办公室的人员一般为每月每人 26－28 市斤（男性）。冬天冻土一两米深，得抡重磅大镐，也就是两头尖的鹤嘴锄，才对付得了。见到泥土时，要用长锹一锹锹把泥土甩到运河两岸。但是每天早上出发，发给你一个棒子面饼、一片腌白菜帮子，也就是白菜叶中部白色那段，这就是工地午餐。

还有一种工地午餐是由右派炊事员挑到工地的，是玉米面窝窝头，冻硬得像石头。菜没送到嘴边，已经结成冰，金属汤匙一触嘴唇，就粘住了。晚上是吃“糊涂”，就是棒子面再加点面粉煮的，像糨糊。很稀、不耐饱，都是水分，大家都用小脸盆般的大菜盆盛着，喝糊涂，胃被撑得越来越大，看起来斯文扫地，可谁也不

笑谁。

在那种情况底下，很多知识分子，有最高检察院的检察长，有外交部新闻司的司长，有林业部的俄文翻译，到了那里，又能怎样。

在北大荒劳改的知识分子，年龄差别很大，体质差别也很大，但长期睡眠严重不足，劳动量超出负荷却是一样的。到了1959年底1960年初，不少人营养极度不良而消瘦、衰弱、全身浮肿，不得不送医院就医。有的饿倒在工地，就永别了。

北大荒土地肥沃，处处生机，若要让这些处于半饥饿状态的知识分子吃得饱一点是没有问题的。然而，规章制度并不以人为本。王明爱说：

北大荒盛产大豆，十月一日前都必须收完大豆，否则大雪一埋就完了。大豆株先要集成垛，等土地冻得够硬了够深了，然后笨重的脱粒机才能下地到垛边脱粒。我们说狗咬耗子，多管闲事，那里的狗真是咬耗子的。因为那些豆垛下面都是耗子，这些是田鼠不是家鼠。我们在收割的时候，免不了会掉一些豆子，如果有耐心捡的话，可以捡到不少，但是我们都在服役劳动，不得离队捡豆子。

我们只好在等待脱粒的大豆垛附近去挖老鼠洞，是狗带我们找到老鼠洞的。老鼠洞深藏地下，有多条地道通到地面，多数是交通用的，少数用于输送粮食，输粮道比较垂直，老鼠从地里叼粒豆子从输粮道洞口一放，

滚下去，就落在粮堆上。一个洞里有时能挖出一铁桶大豆。

不过，后来或许是由于粮食、食油、副食确实是太紧张了，复员军人出身的指导员要求场部拨一些大豆给老右磨豆腐，改善伙食。场部不同意，指导员回来后把场领导臭骂一通，大发牢骚。王明爱说：

指导员、队长都同情我们，甚至佩服我们。队长会抓鱼，自己还有鱼网，后来也组织我们去抓鱼。北大荒的鱼平时很少看到人类，如果你晚上放下钩，早上收起来，保证能丰收，我们就这样改善生活。

夏天你看到的小水塘，冬天都结上一两米厚的冰。我们就去凿个冰窟窿，把它凿到底露出水了，不一会儿，水面从外围向中心慢慢地结冰，像一个脸盆，中间有个洞。这时候就出现奇迹了，底下的泥鳅，都从洞底钻上来了，你就去扤鱼吧。

鱼一扤上来，立刻结成冰，所有的泥鳅都结冰了，像一根根尺把长的铁棒，你把它放在麻袋里拿回家，放进水里，又活了过来。以现在的话说，就是速冻！

由于排水连挖沟开渠的地点离开大本营越来越远，父亲再次得到照顾。他的工作是留在六队场部，负责到处去捡柴火，供应厨房。据说，父亲常常去的是六队宿舍后面的一片榛子林。

1959 年 2 月 2 日，严冬。北大荒当时的气温，是零下 30 多度。那天早上，父亲出事了。王明爱记得：

那时我们是在运河工地，老朱在六队。后来听医生说，那天早上他照常到后山去捡柴火，回来就在宿舍休息。中午要吃饭的时候，六队厨房的人看他没来拿饭，就去宿舍叫他，一叫，怎么还在睡觉？就去摇他，发现他已经没有反应。

他们就赶快跑去工地叫我们回去，我们两三个人回去，朱其桂也去了。我们队里只有个卫生员，虽然我们叫他做医生。不过二分场有医生，卫生员就去叫医生。医生来会诊，说是突发性的心脏病。打了强心针，但是没有用了。

父亲在没有人知道的情况下，静悄悄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如果他患的真是突发性心脏病，病发时，没有人在宿舍里，没有人可以给予他援手。

父亲没来得及留下任何遗言。后来，我能找到的是他刚刚到北大荒不久，寄往潮州给祖母和伯母的一封短信，写在一小片稿纸上。

母亲，嫂嫂，

两个孩子回到老家，有你们照顾一切，我很放心。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入学，不知有没有困难？念念。

对孩子，不要溺爱而疏忽了教育。家用费用，须从简安为。每星期须督促他们写一次信给父母。祝阖家平安！

奇卓。(1958年）六月十一日

父亲的后事，由他的战友们在六队大本营，就地料理了。王明爱说：

我和朱其桂就简单地为他擦身、更衣、入殓。我们用木板钉了个棺材，我们四个人抬出去，在六队后面的小山坡上，那片小树林里，选好地方，挖好坟坑。我们埋好后，立了个木头墓碑，写了老朱姓名及去世年月日。最后行三鞠躬，寄托我们对同命运者的哀思。

父亲去世那天，母亲在福建常山农场，哥哥、我和茂舅在潮州。一个家庭里至亲的人，都不知道他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24

大跃进

母亲跌跌撞撞地到附近的小店里买了几瓶烈酒，一口气全喝下，她承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她只求一死。

1958年6月初，父亲去北大荒的两个月后，母亲带着哥哥和我，跟随中新社的下放大队离开北京。我们先走京沪铁路，到了上海停留一个晚上，再沿着鹰厦铁路到了厦门。接着，转乘汽车南下，直达福建云霄的常山农场。

这是哥哥和我懂事之后第一次到真正的农村，感觉很新鲜。只见蓝天白云青山绿水，连绵不断波浪起伏的农田，世界突然间开阔起来。靠近母亲工作队的宿舍附近，是大片大片的桃子林。6月，树上桃子结实累累，让人兴奋不已。

母亲安顿好自己的事情，向带队的领导请了假，送我和哥哥到汕头去读书。于是，母子三人连同一大堆行李，又乘汽车到了汕头。

那时母亲的两个堂姐妹，惜娟和丽霞，在土改时保住了性命，已经从乡下搬到汕头。靠着熙深大舅从新加坡寄回去的侨汇，她们买下了汕头市小公园附近永和街的一幢两层店屋，姐妹俩住在楼上，等待申请批准就回新加坡。母亲把我们寄在两个阿姨的家，又为我们办好了到汕头市“正始小学”上课的手续，就一个人回常山农场了。

我们的两个阿姨，那时一个30多岁，一个20出头，都没打算在国内结婚，平时去工厂里拿些刺绣活儿来做。我在上课之余，也跟她们学习刺绣，弄了个圆形的花绷子，绷上一块白纱布，似模似样地绣起来了。

在汕头才呆了两三个月，我们又搬家了。因为当时台湾的蒋介石政府仍不放弃“反攻大陆，消灭共匪”的希望，时不时派几架飞机来沿海一带捣乱。汕头常常响起空袭警报，虽然没有真的投下炸弹，但是气氛紧张人心惶惶。母亲知道了，又匆匆忙忙赶来，把我们带到离开汕头只有 40 公里的潮州老家。潮州离台湾海峡稍稍远一点，这样一来，母亲心理上会觉得安全一些。

当时潮州老家有 78 岁的祖母、伯母和最小的堂哥朱铿铿。我们住的兴宁巷 11 号白鹿精舍是个精巧的小院落，在朱家老宅的对面，是解放前伯父和母亲合资买下的。11 号的入门处正对着一个旁厅，连同通往大厅后面的廊道，一起租给了一家教书先生。左边一道拱门通往院子，小院子里种了些盆栽的花花草草，一个大陶缸里长满了睡莲。八扇雕花木门构成大厅的门，我们兄妹住在东房，堂哥朱铿铿住西房。

至于我们的饮食，母亲跟伯母的安排有点奇怪。我们两兄妹的粮票交给伯母，不论喝粥吃饭，我们跟大家同甘共苦。但是，我们吃的菜却由我们自己买，伯母帮我们煮。现在回想起来，伯母或许觉得我们比较娇贵，吃不惯老家的粗茶淡饭，如果把伙食费交给她，恐怕日后会有误会或摩擦，因此不愿意操这个心。不管是出于什么理由，母亲后来把一些钱交给我们，让 11 岁的哥哥和 10 岁的我，每天放学后到附近的菜市场买点青菜豆腐，交给伯母煮。

1958年下半年，全国粮食开始紧张，我们每天吃的是加了番薯块的粥。我自小不喜欢吃番薯，总是把粥里的番薯挑出来，宁愿只吃碗里的白粥，祖母看了总是摇摇头说：奴啊，要吃，要吃一点。我把番薯块推给哥哥，请他代吃。父母不在身边，哥哥和我小心翼翼地花钱，几乎天天买些便宜的青菜让伯母煮。

那时我们两兄妹都不会说潮州话，祖母和伯母不会说普通话，沟通起来往往是一只鸡一只鸭，有时比手画脚，或者得麻烦堂哥来当翻译。记得有一回，祖母看我们两人常常只买青菜，担心我们营养不良，就说：奴呀，去大街尾的熟肉店买一点鸭肉、烧肉吃。哥哥和我听了，果然在太平路的南端找到一家熟肉店，以后也懂得常常买点肉吃了。

我们到潮州两三个月后，茂舅也从北京来了。茂舅病好之后，放弃学业等待出国。在50年代，回国容易出国难，什么时候会得到批准，真是老天爷都不知道。茂舅看到我们一家三分，姐夫在北，姐姐在南，两个外甥在他们并不熟悉的老家，干脆跑到潮州来与我们相依为命。

茂舅的乒乓打得不错，哥哥对足球和乒乓都很着迷，我也能陪他们乱抽几板，甥舅三人有打乒乓这个共同嗜好。朱铿铿记得：

茂舅来了，带来乒乓板，他说原来已在北京报名参加一个什么全国比赛，没来得及打就南下了。当时潮州

的乒乓桌极少，我带你们到处去找地方打乒乓，我们曾经去文化宫打过。华华的乒乓板很特别，还用塑胶绳把乒乓板柄扎得满满的。

茂舅当时靠外公寄回去的侨汇过日子，每天在不太大的潮州城里逛来逛去，如果在那里吃到什么“好料”，第二天就会带哥哥和我去吃，日子过得很轻松。

我们在潮州上的是开元寺旁边的“开元小学”，我上五年级，哥哥上六年级。那时全中国开始“大跃进”，八亿人民在伟大领袖的领导之下，进入了一个浪漫主义的、吹牛说谎的、一切都乱了套的阶段。美丽的远景包括：在15年里，中国的钢铁产量要超英赶美；一天等于二十年；粮食产量的目标过不了多久就要翻一番等等。当然，我们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也都跟着瞎忙。

记忆中，我们没有上多少课，我们炼钢。学校的篮球场上建起了几座砖块和水泥砌成的有一人多高的“高炉”，学生被发动到处去找废铜烂铁，作为炼钢的原料。我们上学放学时，都低着头忙着捡铁钉、铁片。偶尔捡到一个小铜钱或生锈的铁钉，就如获至宝。到后来，家里金属的锅碗瓢盆都捐了出来。不久，家家户户大门上的铜环，窗户上的铁条都拆了下来，交给老师。

我们也跟着老师到韩江边去挑沙，有力气的一个人挑两小筐，没力气的两个人抬一小筐。小学生当中没几个人有挑扁担的经验，回到家腰酸背痛，肩膀起泡手掌流血。一筐筐的沙，是用来建高炉的。

哥哥记得，有一天去韩江边挑沙，天气炎热，汗流浃背，十分口渴。正巧路边有棵杨桃，树上结实累累，一班同学于是停下来采杨桃吃。那天回家后，哥哥肚痛如绞，不停地上吐下泻。从此之后，哥哥再也不敢吃杨桃，几十年后谈起，仍心有余悸。

除了挑沙，老师每天还分给我们一些拳头般大小的耐火石，回家用小铁锤一锤一锤地锤成粉，明天上学带回去交。耐火石粉据说可以做砖块，做水泥。

再后来，学校每天给我们每人带几根木薯回家。木薯切成薄薄的木薯片，第二天带回去交。据说，学校把木薯片晒干磨成粉，可以做成木薯饼，不晓得跟炼钢又有什么关系。

最后学校有没有炼成钢？学生们都不清楚。

资料显示，在1958年的最后四个月里，全中国土高炉由3万座增加至数百万座。土法炼钢，练出来的大多数是废钢，而且来源多为从各家各户搜集的锅盆铁器。

经过一番突击蛮干，1958年12月19日党中央宣布，提前12天完成钢产量翻一番的任务，钢产量为1108万吨，生铁产量为1369万吨。实际上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所炼300多万吨土钢、416万吨生铁根本不能用。估计炼钢铁在全国约损失200亿元。

许多农村地区因没有煤可烧，就伐木砍树供“高炉”炼钢。树砍光了，山林变得光秃秃，对环境生态造

成巨大的破坏。

炼完了钢，就轮到大跃进了。

1958年底至1959年初，学校老师在党的领导下，晚上常常要到街头去宣传大跃进，宣传人民公社好，宣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虽然当时在潮州城里，一般市民的工作或生产，不太可能动不动就翻一番，也不像农村里搞什么人民公社，吃大锅饭。

街头宣传一般是几位老师带上十几个学生，在潮州最繁华的太平路上某处停下来，点上一两盏汽灯，以学生的歌舞表演开始。等人群渐渐围上来，围成一个圆圈了，带头的老师就开始宣传演讲了。人群渐渐少时，再来一轮歌舞表演，如此重复，直到老师认为当晚的任务完成为止。

母亲当初到潮州“开元小学”为我们办入学手续时，没忘了告诉老师说我喜欢唱歌跳舞，或许是希望学校若有什么这一类的课外活动时，把我也算上。结果，11岁的我被叫去参加这些晚上的街头宣传，常常要一个人当众跳“新疆舞”。那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舞蹈服装，我把头上的长发梳成八根辫子，戴上一顶维吾尔族小帽子，就当众边舞边唱地“卖艺”了。

我在北京学过的几支舞蹈，只有“新疆舞”可以独舞，加上“动脖子”在南方比较少见，因此有一定的号召力。那时，潮州城里的路灯很少，入夜的兴宁巷

更是漆黑一片。每一回表演完一个人从太平路上转入兴宁巷，的确有点害怕。还好，茂舅总是站在11号门口，拿着一盏煤油灯等我回家。

在福建常山农场的母亲，从下放一开始，就由于身体虚弱被分配到厨房工作，每天负责三十多人的伙食。她每天3点多就起床，蒸番薯，煮粥，让队员们吃了早饭下地干活儿。午餐、晚餐加一个炒菜，有时也到田里帮忙，工作不算太重。

当时，粮食短缺是全国性的，福建省也不例外。每个人只分配到四两油，完全没有肉。不过母亲炒菜时喜欢用猛火，调味少用盐而多用鱼露，因此她做的饭菜得到队友们赞赏。

1959年3月15日早上，母亲到常山农场三队的医务所去看病。母亲的病，其实是因为她在北京时做过人工流产，后来发现子宫生瘤，打针电疗后一直没有痊愈。那天给母亲看病的女医生也是一位新加坡归侨，她给母亲的忠告是，应该尽快到厦门去看专科医生，否则子宫发炎，后果堪虞。医生给母亲开了证明，让她去厦门就医。母亲记得那天的情形：

我拿了证明从三队出来，在外面等车，邮差刚好来分信。有一封中央寄给我的信。拆开来一看，上面写道：刘华亮同志，我们怀着无限的悲哀转告你，朱奇卓同志已在2月2日去世……

“轰”的一声，我只觉得，天塌了下来。

母亲得到噩耗通知的那一天，父亲已经走了一个月又十三天。回到空无一人的宿舍，母亲大哭了一场。哭完了，百感交集，不知道如何面对今后的日子，她说：

你父亲那一段时候常给我写信，他不谈北大荒生活的艰难，倒是很关心两个孩子到了哪里？进了学校了吗？他的最后一封信里跟我说：一切偏劳了你。

母亲跌跌撞撞地到附近的小店里买了几瓶烈酒，一口气全喝下，她承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她只求一死。

25

天门一边开

母亲把父亲的死，归咎于他说了几句真话。她越来越清楚，对于归国华侨来说，这是一个令人窒息而且处处充满危机和陷阱的地方。

母亲自杀不遂。

她那天在常山农场喝下大量的烈酒后，不省人事。醒来时，整个长长的宿舍里上下铺的几十个队友围着她，关心她，安慰她。母亲说不出话，又号啕大哭。队友们见情况不对，赶紧去请了医生来，给她打了镇静剂。母亲过了几天昏天暗地的日子，唯一让她牵挂的是两个才十多岁的孩子。

母亲那几天想得很多。她很清楚自己出身资产阶级家庭，虽然在南洋时也跟着人家一样学进步，讲爱国，但是回国后，她一直都不能适应这个要把所有有点钱有点家产有点田地的人变成一无所有，要把头脑比较清醒有点学问有点良知的人变成白痴的政权。最让她反感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一波又一波的自我批评，自我反省，让人觉得自己的过去是落后的、可耻的、罪恶的，就像在教堂里向神父忏悔的教徒，要不停地自我否定自我洗涤，请求上帝的宽恕。母亲没有去深究，在忏悔室的另一边聆听你的自我批评的人，他有什么权力知道一个人不论巨细的所有过去，而进入个人档案里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字，都可能在下一个政治运动里成为自己再次被攻击的把柄。

母亲把父亲的死，归咎于他说了几句真话。她越来越清楚，对于归国华侨来说，这是一个令人窒息而且处处充满危机和陷阱的地方。

当年在汕头，母亲因为没有等到她工作的单位以及

父亲的工作单位的同意就擅自行动，带了孩子北上与丈夫团聚，被批评为无组织，无纪律，母亲打从心里就不服气。而后新中国的辉煌成就，毛主席伟大的功绩，也没使母亲一下子变成一个毫无思考能力的应声虫。

有一年，她被编入侨务系统的“十一”国庆日的游行队伍。队伍到达天安门广场时，几乎所有在她身旁的人都像发了疯似的歇斯底里地大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母亲喊不出来，她不信那个神，她也不愿意伪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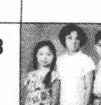
回国近 10 年，在工作上，母亲一直是父亲的配角，扶助父亲，照顾家庭，连自己本来倔强好胜的个性也快磨平了。现在主角背着一个右派的标签死了，共产党会善待她吗？共产党会善待她的两个儿女吗？想清楚之后，母亲不再自寻短见，她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要保护，她不能想象自己的孩子被人轻视、中伤、欺负，甚至虐待的情形。

巧的是，一两个星期之后，常山农场的中新社人员得到通知，下放结束，众人即将班师回北京。

母亲身体更虚弱了，脸色蜡黄，人就像个摇摇欲坠的空壳子。当时母亲才 37 岁，看起来却比实际年龄苍老许多。上级领导派了母亲的朋友，一起下放到福建的林芳声太太洪宁，陪母亲到潮州去带我们。

4 月初，两人到了潮州，面容憔悴的母亲不敢对任何人提起父亲已经去世的事，在家人面前强颜装笑。她说：

回到潮州看到你祖母，心里想，她还不知道她的遗



腹子已经走了。看到两个孩子，心里想，你们父亲已经不在了。我背着人时就哭，你茂舅看我不成人样了，就说，你看起来就要死了，还上去北京干什么？

母亲找了个亲戚，把行李都装好了。在国内这么多年，早年从新加坡带回去的布料、呢料、毛线，以及孩子们穿过的衣服，包括孩子小时候穿的肚兜儿，母亲一件也不舍得丢掉。因此，原来的13件行李并没有减去多少。一家三口加上茂舅和一大堆行李，在洪宁的陪同下，上了开往厦门的汽车。在厦门与中新社的大队会合后，众人沿鹰厦铁路去上海。领队特别照顾我们一家，分了一间软卧车厢给我们。

沿途，母亲又背着我们泪流满腮。茂舅见了，很心疼自己的姐姐，骂道，你只有半条命了，还回去干吗？茂舅当时真希望姐姐不要再上去北京了，最好是跟他一起申请回新加坡。母亲说：

洪宁看不过眼，终于对茂舅说，不要再骂你姐姐了，你姐夫已经没有了。茂舅一听，精神病立刻发作，变了一个人。他骂人，看到人就骂。他从火车头走到火车尾，又从火车尾走到火车头。没人抓得住他，我们真怕他跳车。

好不容易挨到了上海，大队入住国际饭店，母亲和洪宁立刻把茂舅送进了上海精神病院。医生观察了一两天后，说要打胰岛素，但是，经过了这一年下放南方的来回折腾，母亲手上几乎是分文全无了。

向新加坡的娘家求援看来是远水救不了近火，母亲于是去向一个住在上海的、同是新加坡归侨的文化界朋友借钱。没想到这个朋友婉转地拒绝了，理由是我们是右派家属，她不愿意与我们有任何关系。母亲伤心难过极了，初次尝到原来右派家属在别人眼里，跟瘟神差不多。

一天晚上，我们几乎连吃饭的钱都没了。我把自己的一点点储蓄，人民币 16 块多全拿了出来，母子三人买了些饼干、糕点，胡乱吃了一点。中新社的回京大队很快离开了上海，留下洪宁陪着随时会垮下去的母亲。洪宁知道母亲的窘境后，设法为我们解决了经济上的燃眉之急。

一两天后，北京中新社派了一位罗姓的人事科科长到上海来处理我们家的事。显然，这位科长对我们一家的掉队很不高兴，态度非常恶劣。母亲尝试解释是弟弟病发进了医院，等他的病况稍稳，我们就可以动身。母亲还记得那天他们之间的对话。

母亲：我弟弟住院了，可能要过几天才能归队。

罗：你弟弟在乡下不病到城市就病，现在不要你们上北京了，你们明天就去广州。

刘：我们不是要回北京吗？

罗：你丈夫已经死了，北京没你们的事儿了！

刘：我们去广州干吗？

罗：组织上已经决定了，你们去广东惠来乡下落户，劳动。你明天就得带你弟弟走！



刘：明天？我弟弟昨天刚刚打了胰岛素，今天还不能探病，明天走不了。

罗：我去跟医院说，他们就会让你领出来！

这番对话之后，母亲越想越害怕。她怕姓罗的下毒手，叫医院给茂舅打毒针，好把朱奇卓家属的事早日解决掉。母亲提心吊胆，一夜没合眼。

茂舅当时30岁，虽然他有很多让父母和姐姐头痛的缺点，但他毕竟是母亲的亲弟弟。况且，茂舅一向敬重搞文化工作的姐姐、姐夫，当年家里要他回国，让共产党把他“从鬼变成人”，他想到可以和姐姐一家在一起，也就欣然答应了。打从北京精神病院出来之后，茂舅就是我们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对我和哥哥疼爱有加。母亲不会放弃自己的弟弟，好歹要把他完好无损地送回新加坡。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抢先一步去医院，骗医生说，我弟弟的出国手续办好了，我要带他去广州，请让他出院。当时，能出国是一件天大的喜事，医生信了。他仔细地向母亲交待如何照顾病人，开了药，就让茂舅出院了。当天晚上，母亲与我们兄妹俩，带着精神还恍恍惚惚、嘴里胡言乱语的茂舅，上了开往广州的火车。母亲说：

那时危机四伏啊，他们要置我于死地。

我丈夫刚刚死了，我弟弟病发了，两个孩子还小。我怎么能去乡下？我从来没种过田，我拿什么来养我的孩子？

去广州，好！广州有许多老朋友。潮州有句古话说：天门一边开！

26

向命运说不

母亲那几天十分彷徨，近十年的生活使她养成了一种对权威的无比敬畏和恐惧。眼看就要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了，能不能不去农村？如何反抗命令？如何向命运说“不”？



2009 年的广州珠江



原中国新闻社广州分社

1959年4月间，我们一家在旅途上作了个大大的U转弯。原本要从厦门回返北京，但在上海住了几天之后却调头南下，沿着沪广铁路去广州。

在广州，我们落足于中国新闻社广州分社副社长胡伟夫的家。胡伟夫是父亲在《南侨日报》时期的老上司，他们当时住在康泰路附近一栋楼房的四层，地方很宽敞，有四个房间，胡家特地腾出一间房让我们住。在人人都怕和右派家属扯上关系的时候，胡老没有嫌弃我们。

胡伟夫有三个女儿，最小的胡云贝与我同龄，她还记得那年我们住在他们家的情形。她说：

> 我父亲说这是老朋友，有事暂时在我们家住下，但他不说是什么事。你妈妈利落、能干，常常跟你哥哥出去，把你一个人留在家里。你就在家里对着天花板唱：“美丽的花儿吐露芬芳……”我从你这里学会唱这首歌。

的确，到了广州之后，母亲忙碌起来。

母亲给在香港工作的伯父发了电报，告诉他父亲去世的事，请他速到广州来一趟。母亲也给新加坡的得炎老舅写了信，除了告诉他我们家的巨变之外，也请他火速寄钱过来。母亲没敢写信回家，怕外公外婆担心难过。

然后母亲四处奔走，向旧日的朋友们讲述我们家不幸的遭遇和眼下的困境。许多朋友，包括当时任广东省侨办主任的黄声，广州侨务局副局长的方君壮，在报界工作的吴柳斯，和在广州邮政局工作、早年是刘家私塾老师的李友心，都对我们十分同情。但是他们也生活在



同一个体制下，他们不怕我们是右派的家属，愿意跟我们谈话、接近我们，已经是十分难得，无法给予我们更多的帮助。

母亲一直把父亲已经去世的事瞒着我和哥哥。在广州，她带我们到朋友家去，往往把我们支开了才开始谈话。一次，两次，三次，我听头听尾渐渐猜到了真相。

不久，我们搬到泰康路中国新闻社广州分社办公楼的四楼，原来给出差人员暂住的宿舍。有一天，我向母亲追问父亲的事，她再也瞒不了我们，母子三人抱头痛哭了一场。这时，一包父亲的遗物从东北寄到广州。母亲打开包裹，看到父亲生前穿过的大衣、毛衣，用过的钢笔、杂物，又痛哭了一场。

伯父当时在香港的一家出入口公司“港大公司”当经理，经常往来于潮州老家，广州和香港之间。他到了广州见到母亲，表示自己的家小都在国内，任何可能冒犯到当局的事，他是绝对不会做的。对我们的困境，他没有办法，也无能为力。

50 年代在中国，一个人的工作单位不仅仅管你的工作，也管你一家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我们掉了队，吃、住马上成了问题。所幸，有老朋友愿意收留我们，但是，出外吃饭有钱还不行，到处都要粮票。

母亲年轻时在马来亚加影华侨中学读书时的校长胡一声，多年前已经回国，这时也在广州工作。胡一声见到母亲时，给了她一些比钱更难得的粮票，母亲才能常

常到广州华侨大厦的职工餐厅去吃饭。

这时，北京中新社人事部的信，一封接一封地寄到。母亲记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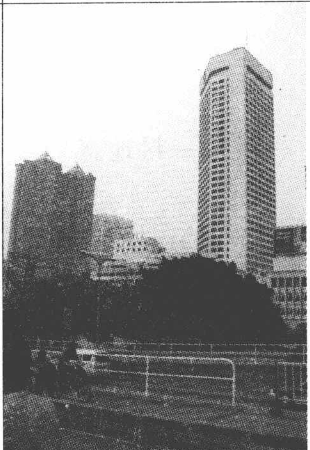
> 他们来信催我们一家去惠来。一封信，两封信，到了第三封信，是用打字机打的，那是最后通牒！

母亲那几天十分彷徨，近十年的生活使她养成了一种对权威的无比敬畏和恐惧。眼看就要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了，能不能不去农村？如何反抗命令？如何向命运说“不”？该怎么进行？他们如果不答应，后果又会怎么样？还有孩子的学业怎么办？弟弟的病怎么办？母亲在重重叠叠的压力下，精神极度衰弱，思路十分混乱，没了主张。

无巧不成书。自 1957 年起，每年的春秋两季，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举行，许多海外的商贾前往看货订货，住在海珠广场才落成不久的华侨大厦。有一天，母亲吃了饭经过华侨大厦门口，迎面看见一个熟悉的面孔，是新加坡商人林焕熙先生。林先生是得炎老舅的好朋友，在新加坡经营药材生意。1956 年，新马的英国殖民地当局下令取消树胶出口到中国的禁令，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组织了一个由新马企业家组成的大型代表团访问中国，林先生是其中一员。代表团在中国各地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访问，到北京时，父母亲接待过他们。

母亲记得当时她与林先生站在华侨大厦门口的对话：




原广州华侨大厦在高楼左下方

母亲：林先生，你怎么会在这里？

林：我来参加交易会。你怎么会在这里？

母亲：我们……一言难尽。

林：你舅舅托我来看你们，我还想交易会完了就上去北京找你们。

母亲：我们到广州好几天了……

母亲不敢多说，十年被洗脑、漂白，她只觉得跟“资产阶级”接近是错误的，是羞耻的，是罪恶的。

过后，母亲跟还在广州的伯父提起碰见林先生的事。伯父的第一个反应是，既然是你的舅舅托他来看你们，你可以请他帮忙。伯父在生意场上打滚了一辈子，深知上面对所谓的海外影响，还是有三分忌讳的。

母亲后来把我们一家这一年里接二连三的不幸告诉了林先生，他马上为我们理出一个办事的头绪。母亲说：

林先生陪我到胡伟夫办公室，请他打电报给北京中新社最高领导，说，我的外甥女刘华亮（母亲后来在国内用的名字）遭遇如此不幸，新加坡的家人都非常难过。现在，她的两个孩子需要继续学业；她的弟弟需要入院治疗；她本人身体极度衰弱，目前不考虑工作，请给予协助。

很快的，北京批示下来，叫我们不用去乡下了，可以暂时在广州住下。接着，茂舅进了广州沙面精神病院。我和哥哥进了广州华侨新村的华侨小学，是寄宿学校。我继续上五年级，哥哥上六年级，那时，离学期结束还有两个月左右。我们在短短一年里换了三所学校，由北京，到汕头，到潮州，到广州。母亲是名副其实的孟母三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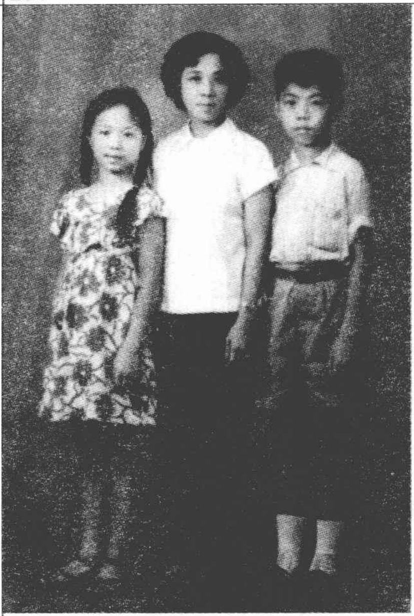
接着，母亲向组织上申请带生病的弟弟出国，到香港治疗。母亲又把收藏了多年，仍保存完好的两个孩子的新加坡出生证，用双挂号寄回新加坡，请成舅和外公为我们办理回新的手续。

令许多人没想到的是，1959 年底，右派问题突然有了转机。王明爱叔叔记得：

1959 年底，毛泽东的“三面红旗”都出了问题。这三面红旗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全国大饥荒，到处大量饿死人，有些重灾区真的村村只有鬼唱歌。

翻新后的广州华侨小学





母子三人离开广州前

于是，在北大荒挨饿中接受改造的老右们，开始被摘掉右派帽子。摘帽后称为“摘帽右派”，仍然是“右派”，摘帽而已。他们分批陆续回北京，我属于最早离开的那些人。

于是，在广州的多位好朋友的指点下，母亲写信到北京中新社要求恢复父亲的政治名誉。北京中侨委的实际领导人方方立刻回了信，说：摘掉朱奇卓的右派帽子。那是1959年11月，至于对右派的“改正”，也就是推翻所有当年加诸于父亲的各种罪状，就要等到20年之后了。

父亲的右派帽子一被摘掉，广州的朋友们就能在各方面名正言顺地帮助我们，而不用担心惹祸上身了。

1959年12月，母亲和茂舅的出国申请批准了。12月的最后一天，我和哥哥到广州火车站送走了母亲和康复了的茂舅。他们是从广九铁路，经罗湖到香港。

母亲常说，火车抵达香港那一刻，她真正体会到什么是大难不死，逃出生天！她也暗自发了毒誓：即使是当娼当妓，我也要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

27

罗湖桥惊魂

我迈开沉重的脚步，每一步都是那么吃力，十几米的桥就像几十公里一样长。许多念头在脑际闪过：哥哥过得来吗？如果过不来了，我一个人怎么去香港找母亲？罗湖到香港还有一段火车车程，我一个人如何上路？哥哥一个人回广州吗？近一年里，哥哥和我在广州相依为命，这一分开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

母亲和茂舅离开广州之前，对两个孩子的生活作了相当周全的安排，因为她不是十分肯定母子什么时候能团聚。哥哥和我都在寄宿学校上学，十多件行李寄放在方君壮位于华侨新村的家，她吩咐我们周末可以去广州市中心的李友心家相聚，生活费则直接寄到学校给我。

在 50 年代，归国华侨要离开红色中国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首先要申请出国，这就要经过至少两道关卡。第一是你工作的单位，包括它上面的层层领导机构；其次是公安局。如果你的工作单位，或者它上面的层层管理体系里有人不同意放你走，你的申请根本到不了公安局，也就永远别想出国了。

如果有幸像中了马票一样走了出来，你还要有侨居国的入境许可，要不然，就只好永远滞留香港了。

十年前我们全家回国时，母亲其实是办好了母子三人的回马证的，但是事隔多年，证件早已过期。因此母亲在广州时，就请新加坡的亲人着手办理我们母子三人和茂舅的新马入境手续。

至于出国，母亲从广州各方朋友那里了解到，她到了香港之后，我们兄妹俩有机会申请去香港探亲。但是母亲不敢对我们明说，担心我们从小在红色中国长大，是毛主席的好孩子，不愿意离开中国，不愿意去十分罪恶的、黑暗的、落后的、好人都被欺压，地主、恶霸、资本家都骑在老百姓头上的资本主义国家。

哥哥那时已经小学毕业，进入广州师范学院石牌附

中上初中一。我则升上了六年级，仍旧在华侨新村的华侨小学。

华侨新村在广州近郊，是一个宁静幽雅的洋楼别墅区。住在里面的多数是来自印尼、泰国、马来亚、菲律宾和世界各地的归国华侨。他们在海外刻苦奋斗了一辈子，晚年带了子女和积蓄回国，在这里建一栋房子安享晚年。也有些是自己继续在海外拼搏，先把孩子送回国内读书的。

华侨小学当年是在广州侨务局副局长方君壮的领导下，发动海外侨胞、归国华侨、侨眷及港澳爱国人士捐款建成的，是广州面对海外侨胞的一扇窗口。华侨小学建在华侨新村中间，学校专收归国华侨的子女，校舍、师资、生活条件各方面都比本地学校优越。学校有一个U字形两层的课室大楼，后面是一个大礼堂，礼堂两边各有一栋三层高的学生宿舍。

我记得我的宿舍在三楼，是一个两边有窗的大堂，靠窗各有一排双叠床，中间还有一排床。每两张双叠床靠在一起，四个人组成一个小单位。房间的末端是个人存放衣物的橱柜，再进去就是浴室和厕所。

我的下铺是一个不知什么国家来的姓麦的女孩，她似乎天生就是个女高音歌唱家，每天一回宿舍就大唱特唱，都是当时新中国最流行的歌曲。我在她的日夜熏陶之下，也能把电影《上甘岭》的主题曲《我的祖国》，又名《一条大河》，唱得热情澎湃，热血沸腾。几十年



后，我仍熟记它的歌词。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学习上，我不记得有什么大问题，只是在北京和后来在潮汕都没学过珠算，到广州之后，上珠算课时不知所云，开始时跟不上。

哥哥就读的广州师范学院石牌附中离市区较远，是个规模颇大的中学。升上中学后，哥哥有两门新学科，一是外文，学的是俄文。中苏虽然当时开始交恶了，但学校里还是照老习惯，教俄文而不教英文。二是政治课，从13岁开始。

每逢周末，哥哥来华侨小学找我，要走很长很长的路。他记得：

那时公共汽车很少，要等半天，有时车来了也挤不上去，因此多数是走路。从我们学校到华侨新村，要经过白云机场、黄花岗烈士陵园，得走差不多一个小时。如果是要到广州市区，可能得走两小时。

星期天，我们常常一起去方君壮的家，有时是因为换季节了，需要从母亲寄放在那里的皮箱里，找一些薄一点或厚一点的衣服。有时是母亲从香港寄了虾子面来，让我们拿到方家泡开水吃。

有时，我和哥哥也去广州市中心海珠大桥旁的李友心家里过周末。李友心的大儿子李向明当时在华侨小学上一年级，几十年后，向明还记得我带着他一起挤公共

汽车回家的情形。他也记得，学期结束时，高年级的大姐姐们在联欢会上表演“拔萝卜”，那个在台上带领爷爷、奶奶、小猫、小狗，努力地把大萝卜拔出来的女孩就是我。这支舞蹈的主题是人多力量大，符合毛主席说的人多好办事，自然是政治正确，屡跳不厌。

1960 年，粮食越来越紧张，城市里的感受更深刻了。副食品商店里几乎什么都没有，商品架子上空空如也。当时也正是我和哥哥长大拔高的时候。

记得在华侨小学，情况还不太糟，至少没有饿肚子的时候。我每天特别盼望的是早餐时刻。早餐时，我们排队到厨房，每人领一盘蒸热的用酱油拌过的河粉，然后回到餐厅自己的座位上。桌子旁边已经有一大木桶稀粥，每人可以按自己的食量去拿。每天如此简单的早餐，总是让我觉得美味无比。

母亲从香港寄钱到学校给我们，凭着一张外汇领款单，我们可以到华侨商店去买一些饼干或白糖之类的东西。除了食品，生活日用品也非常缺乏。记得那时我看到有同学穿了一双最简单的日本拖鞋，很新颖特别，就写信给母亲请她给我寄一双来。我穿上日本拖鞋去上课时，班上同学们都羡慕极了。

1960 年暑假到来之前，母亲已经在多封信里告诉我们，要提前向学校申请到港澳探亲。7 月 24 日，我从华侨小学的负责老师那里，拿到了“往来港澳通行证”。有效日期是一个月，从 1960 年 7 月 27 日到 8 月



27 日。哥哥的申请迟迟没批下来，我于是到方君壮家去收拾要带去香港的衣物。

母亲再三在来信里说，你们到香港探亲之后，还要回广州上课。回想起来，有两个原因，一是怕我们不愿意走，二是母亲见过鬼怕黑，担心有人检查我们的信件，那她让我们回新加坡的全盘计划就泡汤了。因此，我打开箱子只拿了一两件自己比较喜欢的裙子，以及哥哥吩咐我拿的他多年收集的几本邮票簿。其他的冬衣、棉袄，母亲早年在新加坡穿过的旗袍、许多相簿，以及整卷整匹的布料呢料，我都原封不动地上锁，封箱。

哥哥的“港澳通行证”终于拿到了，但是，有效日期只有一个星期，从 1960 年 8 月 8 日到 8 月 15 日。这也显示广州公安局对待华侨小学和本地学校的申请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哥哥拿到“港澳通行证”那天，已是有效期的第一天。第二天，他赶紧先把自己学校里的铺盖杂物送到李友心家里，回头到华侨小学来帮我搬东西。我们两人把我的衣物、脸盆和铺盖，冒雨搬到华侨新村村口的汽车站时，夜已经很深了。公共汽车久久不来，也许我们已经错过了最后一班车。我们十分焦急，狼狈万分。最后决定把东西搬回学校，告诉值班老师说过几天会有一位李友心太太来取，然后兄妹俩连夜走路，走到了海珠大桥旁李友心的家。

第三天，我们去买火车票，只能买第四天的票。

第四天，我们两人带着简单的行李到了广州火车站，走不了。因为前一天大雨，造成铁路被淹，火车不通。

第五天，8 月 12 日，我们终于上了广州开往罗湖的火车。

在罗湖，我们得先过中国边防检查一关。在一个房间里，一位公安老兄把哥哥几本邮票簿一页一页地翻，一张一张地看。时间一分一秒地过，我们身旁其他行李被检查的人已经换了好几批，他老兄一点也不着急，慢条斯理地翻，认认真真地看。

终于看完了，他抽出其中一张，说，这张邮票，反动，不能带出去。那是一张清朝末年的邮票，小小的四方形，印着一只橙色的龙。两个分别是 13 岁和 12 岁的孩子能说什么，顺从地合上了邮票簿，谢谢他终于让我们通过了检查。

接着，到了真正的边境，一座大约十多米长的罗湖桥，横跨在深圳河上。桥的这边是中国，有中国公安把守，桥的另一边是香港，有香港警察站岗。我们两人来到一位站岗的中国公安面前，他看了看我的证件，让我通过。没走出两步，我听到他跟哥哥的对话。

公安甲：你还剩下 3 天，去香港做什么？

哥哥：我去看妈妈，今天去，后天就回来。

公安甲：真孝顺。在这站着！

我回过头去，一脸错愕，不知如何是好。哥哥把手



中装着我们两人简单行李的旅行袋一把塞给我，叫我快点过去桥的那边。

我迈开沉重的脚步，每一步都是那么吃力，十几米的桥就像几十公里一样长。许多念头在脑际闪过：哥哥过得来吗？如果过不来了，我一个人怎么去香港找母亲？罗湖到香港还有一段火车车程，我一个人如何上路？哥哥一个人回广州吗？近一年里，哥哥和我在广州相依为命，这一分开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

我终于走到了桥的另一端，一位中年的香港警察让我过了关，还用粤语指点我去前面买前往九龙的火车票。我没有动。我用蹩脚的广东话告诉他，我哥哥还没过来，我要在这里等他。他没有为难我。

天开始下毛毛雨。

密密麻麻的雨丝，冉冉飘下，天空一片灰灰蒙蒙，桥那端的景物开始模糊。远远地，我看见哥哥站在那位中国公安身旁，为他撑伞。

中年香港警察好心地叫我到他们的亭子间去避雨，我移动脚步，却又开始担心自己的安全。过去老师曾提起过香港治安如何的不好，女孩子如何容易被人非礼等等，可怕的念头一个接一个地闪过。

雨，下个不停。哥哥撑了一阵雨伞，另一位公安出现了。哥哥记得两个公安之间的对话：

公安乙：这孩子怎么啦？

公安甲：剩下3天，怎么可以过去？

公安乙：哎呀，刚才有一个也是剩3天的，给他过吧。

于是，第一个公安接过哥哥手里的雨伞，说，走吧。哥哥从桥的那一端走过来时，我已经担心得泪流满面。

我们每人只能兑换20块钱港币，兄妹俩买了前往九龙的火车票，剩下的钱，刚好够一人买一个面包，一瓶绿宝橙汁。我们对于香港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小店里摆满了吃的喝的用的，什么都有，跟广州的店里空空的货架，成一个强烈对照。在我这个毛主席的好孩子的脑海里，冒出了踏上邪恶的资本主义土地后的第一个问题是，香港有什么不好？

在九龙火车站，母亲在那里已经足足等了三四个小时。所有迟到的原因母亲都假设过，就是没想到我们让一枚小小的邮票和哥哥只剩下三天的“港澳通行证”给耽误了。

我和哥哥从火车下来，母子三人抱成一团，是悲，是喜，尽在不言中。

十年前，我们一家四口，满怀憧憬满心欢喜地投奔新中国的怀抱。十年后，母亲千辛万苦地把我们拽出了虎口，四口一家只剩下三人全身而退。

后来的事实证明，如果她当时不是那么坚决的向命运说不，如果当时不是有我们的亲人和挚友出钱出力鼎力相助，我们很可能就被踢到了广东的乡下。而右派的



家属捱不过后来的十年浩劫，死在更加疯狂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比比皆是。

这个时候，我那三个对未来满怀希望而回国升学的舅舅，一个发疯了，提前一步到了香港；一个在云南上大学，一个在开封读医科。18 年之后，他们最终也选择离开中国。

28

回巢

外公外婆当年希望这第二的儿子能“从鬼变成人”，万万没想到到头来，人倒还是人，但是一个病人。在后来的岁月里，凡是有什么喜事、悲事，或者足以刺激到茂舅的事情发生，他就旧病复发，多次进入新加坡板桥精神病院。



初回新加坡与成舅一家。前排左起：刘心玲、刘宏锜、外婆、刘宏俊和我。后排左起哥哥、茂舅、成妗、成舅、表哥许永光。

刘家二女儿当年自由恋爱嫁了个文化人，刘家众人，特别是外公外婆都十分欣慰，因为大家庭里多了个有学问的人。尽管父亲生前不是一个什么大人物，只是一个有知识有进步思想，更有满腔爱国热忱的新闻工作者。成为刘家的女婿后，父亲还连累岳父和妻舅饱尝铁窗之苦，但无论如何，女婿算半个儿子，外公一家对二女婿的骤然去世十分震惊和哀伤。

然而，逝者已矣，悲剧既然已经发生了，刘家众人开始分头行动，要把女儿、两个外孙和得了精神病的儿子救出苦海。

新、马两地自古以来是一体，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加坡这个具有战略性位置的小岛，成为英国

的直辖殖民地。随着东南亚各国一步步摆脱殖民统治的政治演进，两地渐行渐远，最终分属两个不同的国家。60 年代初，柔佛州是 1957 年独立的马来亚联合邦的一部分；新加坡则刚刚在 1959 年成为一个独立的自治邦。除了国防和外交以外，新加坡掌握在人民行动党手上，李光耀是新加坡的首任总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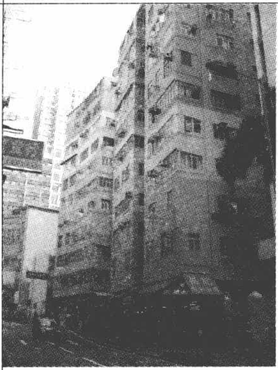
母亲和茂舅是边佳兰出生的，申请回马的手续由外公和成舅出面去办。哥哥和我是新加坡出生的，回新手续落在刘家当时唯一的新加坡公民，成妗杨英芬的肩上。

在外公和成舅的多方努力之下，茂舅的回马申请获得批准。1960 年 3 月间，茂舅顺利地从香港回返马来亚。经过母亲在广州和香港近一年的悉心照顾和调养，茂舅乘飞机抵达新加坡时，身广体胖，精神稳定。接机亲友见他西装笔挺，白白胖胖，很难想象他在回归祖国的 8 年里，饱经折磨，精神严重受创，进出过中国三大城市的精神病院。

外公外婆当年希望这第二的儿子能“从鬼变成人”，万万没想到到头来，人倒还是人，但是一个病人。在后来的岁月里，凡是有什么喜事、悲事，或者足以刺激到茂舅的事情发生，他就旧病复发，多次进入新加坡板桥精神病院。

哥哥和我的回新申请，在成妗的奔走下也顺利通过。1960 年 11 月的某一天，与母亲在香港团聚了几个




香港西环大楼，母亲住所。

月后，我们兄妹俩登上了海皇号轮船，回返新加坡。

5天后，轮船在新加坡红灯码头前的海面上下锚，哥哥和我在甲板上等待前来接我们的亲人。远远地，几十艘小船迅速朝海皇号驶来，要抢载人载货的生意。船队靠近时，我们看到了与我们分开将近一年的茂舅，还有仅在相片里见过的成妗的身影。这一天，也标志着我们与成舅一家人一起生活的日子正式开始。虽然接下来的日子并不富裕，但是成舅一家视我们如己出，从没让我们挨饿吃苦。

母亲的回马申请，像许多她那个年龄在50年代初期回返新中国的人一样撞了壁，滞留香港。她在香港先后送走了弟弟和两个孩子，剩下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幸好，在香港讨生活的除了伯父还有两家近亲，大家时有往来，母亲的生活才不至于太孤单寂寞。

一个是母亲的堂妹刘丽辉，他们一家解放前就离开大陆，丽辉姨丈在香港做出入口生意，生活不错。另一个是早一两年离开汕头的母亲的堂弟刘熙祥。熙祥五舅在丽辉姨丈参股的餐馆“潮州酒家”任收银员。当时香港比较地道的潮州餐馆不多，“潮州酒家”生意非常好，常常座无虚席，熙祥舅的生活也不成问题。

像母亲和这两家亲戚一样滞留香港，又能在这个由

英国人掌管的弹丸之地上讨生活的人，后来越来越多。

回顾历史，香港和九龙自从在19世纪40年代和60年代先后割让给英国之后，广东省和香港之间人民的进出往来，本来不受限制，边境界线也十分模糊。内地人到香港工作经商，或者香港居民逢年过节返乡省亲，都是很平常的事。即便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两年，香港的大门也没有对广东设限，内地人照例去香港谋生，汇钱回家供养妻小，海外华侨也取道香港回祖国参加建设。

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香港加入西方国家的贸易禁运，粤港交通被封闭，大陆居民往来香港开始受到严格的出入境限制。从这时起，大陆非法移民成为中国和港英政府的头痛问题，广东也出现了“逃港”这一特殊名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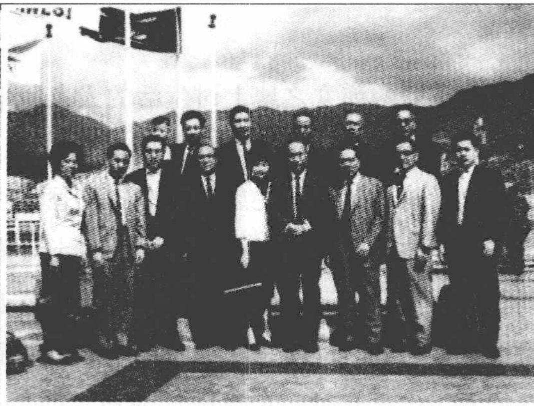
母亲初到香港的60年代初，受大跃进和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从广东省各地非法偷渡到香港的内地人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峰。据统计，从1961到1963年，“逃港”的人大约有16万人。

逃离大陆的人不用担心他们到了香港的居留问题，因为港英政府从1961年3月开始，实施了新身份证申请政策，俗称“抵垒政策”。新政策规定，那些可以成功抵达市区而又有亲戚朋友接济，加上本身具有工作能力的人士，香港政府可以给他们签发香港身份证。这样一来，解决了香港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劳动力短缺的问





母亲毕业于香港珍妮女子裁剪学校



母亲与大地公司同仁，前排左四李锦汉，左六陈友川，后排右一伯父朱衡孙（朱其灿）。

题，也相当于变相地承认了非法移民的“合法”身份。

不管是合法的走过罗湖桥，或是非法的偷渡、泅水，跨越边界铁丝网，从中国大陆成功抵达香港的人，只要肯放下身段，刻苦耐劳，对工作不挑剔，就能堂堂正正地活得像个人样。

为了能在经济上独立并抚养两个孩子，母亲初到香港时就到铜锣湾的“珍妮女子裁剪学校”上课，有系统地学习专业裁剪功夫。从中级班到高级班到机绣班，母亲学会做各式各样服装，包括西装、旗袍等等。她少年时期在潮州学习过的刺绣功夫，以及后来在新加坡学过的基本裁剪，为她后来朝服装业发展打下很好的基础。

不过，母亲认为当一个裁缝，为人一件件地做衣服太耗时间，太耗体力，她一直努力地想开一家小型的制衣厂。

当时伯父在香港打工的“港大公司”，专门采购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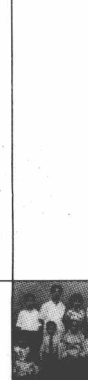
港和大陆生产的百货，诸如床上用品、服装、鞋袜等输往新加坡的总公司“大地百货公司”。“大地”的股东里面，有几位是父母的旧识，比如李锦汉、黄学良、陈友川和曾子崇。在他们的帮助下，母亲开始生产成批的衣服卖给“大地百货公司”。

母亲的小小制衣厂，地点就在她租的西环大楼3楼一个面对大路的小房间，面积不超过十平方米。她自己当老板，集设计、采购、画图、裁剪于一身。母亲把裁床摆在房间中央，把一匹布来回地叠好，再使用大大的电剪，按画上去的纸样裁剪，然后分给住在附近的熟练女车工去车。她做的男女装睡衣和女装绣花衬衫，通过香港“大地”销售到新加坡来。

尽管制衣业竞争十分剧烈，订单也不稳定，母亲一个人得干好几个人的活儿，但是没有了种种思想上的钳制，作为一个头脑和手脚一样自由的人，母亲活得十分忙碌也十分有尊严。母亲和我们常常通信，几乎每个星期就有一封，我们母子无话不谈，谈无不尽。母亲努力工作的最大动力是赚多一点钱，实现丈夫的遗愿，一定要让两个孩子上大学。

在新加坡，在成妗的努力下，我们很快地进了加东的中正中学总校。由于在国内没有学过英文，哥哥降了一级，读中一，我很幸运的没降级，也读中一。

那几年，我最盼望的是放假到边佳兰去。每一次到樟宜码头上了开往边佳兰的小船，我总有一种身心舒畅的回



家感觉。或许是因为边佳兰是母亲的出生地，或许是因为我两三岁时，母亲常常让保姆带着我回边佳兰小住。

1961 年的边佳兰。

在柔佛州边佳兰码头上岸，汽车沿着唯一的一条公路朝东开去，大约 20 分钟就到达二湾外公的家。在一片椰林当中，耸立着外公在 30 年代建的面向大海的传统老宅。站在园林中，只听到椰树婆娑起舞婀娜摇曳发出的沙沙厮磨声，和海浪有节奏的懒懒地拍打沙滩的合奏曲。偶尔传来鸽子回巢咕噜咕噜的低诉，以及母鸡下了蛋的咯咯叫声。天蓝，海绿，沙白，海的尽头可见几座小山头，那是有一千多个大小岛屿的印尼。

老宅的前方，左右各有亚答屋一排，是屯放树胶和饲料的地方。近篱笆门处有车棚、鸽子笼。老宅后面有一排猪寮，五六个鸡寮，左边有一个碾压生胶的作坊，一栋熏胶房，右边有一个椰干制作间。

当时已经 60 多岁的外公，依然是边佳兰刘氏企业的统帅。不过，随着树胶价格的不断下滑，海上捕获因往来的大轮船越来越多而日渐减少，刘家这时的情况跟鼎盛的 40 年代比较，已经大不如前。外公身材发胖，在家喜欢穿浅蓝色宽松的短裤和白色有袖汗衫。他平时不苟言笑，说话声音洪亮，家里人都十分怕他。外婆和二外婆都健康，只是外婆年轻时的子宫下垂问题后来越发严重，导致她腰越来越弯，瘦瘦小小的外婆，走路时几乎就像一只虾米了。

刘家的男丁里，成舅自己在大湾和四湾经营露天戏院，每天晚上放映从邵氏或国泰或荣华电影公司租来的影片。从中国回返老家的茂舅在家助外公一臂之力，做一些记账打杂的工作。其他几个年纪比较小的舅舅，有的在新加坡上中学，有的在边佳兰上小学。

刘家的女儿中，母亲有两个妹妹已经出嫁，剩下四姨丽梅和六姨丽华是外公的得力助手。身材圆胖的四姨可说是女中豪杰，出外能开罗厘扛大秤做生意，在内主理一家十几口的伙食。六姨则负责喂养家中饲养的十几头猪，一千几百只鸡以及一群狗。

每逢放假，外公的几个在新加坡上学的孩子和多个内外孙，包括成舅的三个孩子：刘宏俊、刘心玲（1971年度新加坡总统奖学金得奖人，目前是胜科工业园执行主席）和刘宏锜，还有哥哥和我，都陆续回到边佳兰，老家就热闹了。

每个月月初收购树胶的日子，是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光。

看到四姨拿着车钥匙走向车棚，大家就会蜂拥而至，争先恐后地爬上罗厘，随着她到处去吃风去。罗厘所到的农家，总有些红毛丹、芭遮厘、番石榴、酸杨桃之类的水果可采。当罗厘上装满了一捆捆的树胶往回开时，我们的肚子里也装满了各种各样的水果。

那时外公家只剩下一个规模比奎笼小的虾笼，在离二湾不远的海面上。每天负责拉网的马来人从虾笼回来





母亲在边佳兰老家。前排左起母亲，成舅夫妇。后排左起哥哥，嫂嫂，他们的孩子朱聪，朱谦；后排右一表妹刘心玲与她的两个孩子（1994）。



60 年代在边佳兰的外婆

时，孩子们又乐了。大家七手八脚地帮他把几个竹畚箕的鱼虾倒在岸上的一个大桌台上，用树枝把鱼、虾、水母和魔鬼鱼分类。除了拿去卖的和拿去喂牲口的，晚餐桌上总有非常新鲜的鱼虾和沙东。

傍晚时分，是收鸡蛋的时候。我们提起篮子，一个一个鸡寮去收。鸡窝一般挂在鸡寮的壁上或柱子上，伸手往窝里一摸，就是一个还有余温的鸡蛋。所有鸡寮走一遍，往往能收到一二百个鸡蛋。阿姨们说，这比起 50 年代初，每天能收六七百个蛋已经逊色多了。

傍晚 6 点，是外公收听新加坡广播电台的福建话树胶行情的时间，那也是外公一天里最严肃的时刻，在屋子里的小孩子都不敢出声。收音机按一号烟花、二号烟花、烟屎等等的买卖价一个接一个地报，外公会仔细记下每一级树胶的收购价，以便在时机最好的时候“出胶”，也就是把家里囤积的几百公斤熟胶片，一起装上

大摩托船，运到新加坡去卖。树胶行情报完了，到了胡椒行情时，外公就把收音机关了。

边佳兰那时没有电，天快黑时，瘦瘦高高的茂舅就蹲在天井旁点汽灯。三盏汽灯全点好了，他就拖着一双木屐，达拉达拉地在前厅、上厅和饭厅各挂上一盏。

吃过晚饭，大家又随四姨上了罗厘，开到大湾或四湾成舅的半露天戏院去帮忙卖票。如果时间还早，小孩们就在票房里拿出各种涂料，帮忙成舅画简单的宣传海报。电影一开演，孩子们溜进戏院各自找一个空位坐下。尽管时有蚊叮虫咬，下雨时到处湿淋淋的十分狼狈，但天天有电影看，确实不亦乐乎。因此，60 年代的邵氏电影，什么《江山美人》、《倩女幽魂》；60 年代的香港明星：尤敏、林黛、乐蒂、葛兰、王羽、林翠、赵雷、陈厚，我们那时都能倒背如流，如数家珍。

为了两间戏院每天晚上要演的片子，成舅几乎天天得进出边佳兰，忙得团团转。偶尔晚上有空，他会带上几个男孩子到森林里去打山猪。外公家有一支陈年猎枪，打山猪打鸟还是挺管用的。猎物被抬回家时，掌管厨房的四姨六姨总要唠叨个半天。那么大一头山猪，要清理、切割、生火、打卤，还要煮半天，也够她们忙的。

过年过节时，老家上上下下人人都披甲上阵。二外婆忙着做各种各样的发糕和红桃粿，蒸好之后，一竹屉一竹屉地搬上一个一人多高的红漆粿架。四姨六姨忙着杀鸡宰鸭，女孩子们被发动去拔鸡鸭的细毛，大家围在



水井旁洗菜拔毛，各自忙碌。男孩子们到海边去玩沙玩水，回返屋子前，老远就听到外婆用潮州话喊道："去洗脚！去洗脚！"逼他们先到水井边把脚洗干净了才准进屋。

一切都准备妥了，外公把鸡鸭糕粿摆在上厅的神台上，开始上香，祈祷；又把一些香拿到屋子外面对着天公念念有词，然后插在屋檐下的香炉里。香烟袅绕里，几十年不变的是老家大门上苍劲有力的两个大字：杏苑。

外公这时的经济情况已经大不如前，成舅的露天戏院也不是什么大生意，但是我们三餐不愁衣食无忧。我们的学费由母亲按时从香港寄来，大妗和成妗常常从买菜钱里省下一点塞给我们做零用钱。表哥刘宏贤、许崇益（永源）和许崇德（永光）是我们的义务英文补习老师，大表姐惠君常常为我和表妹们做新衣裳。几个父母亲往日的好朋友，过年过节见面就塞给我们特别大的红包。新加坡的亲人友人，尽他们所能，包容呵护关爱我们，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没什么忧虑和烦恼的环境里。

开学埋头用功，放假疯疯癫癫地玩儿，时间匆匆滑过。中四毕业后，哥哥和我转到当时好老师云集、高中会考成绩斐然的圣公会中学。两年紧张的高中生活又在眨眼间过去，1966 年中，我们参加了新加坡的高中会考，准备隔年升大学。

同一个时候，新中国正进入一个更疯狂的时代：文化大革命。

29

“文革”·平反

1979年初，在广东省江门市工作的堂哥朱铮铮写信给北京的国务院侨务办公室，针对父亲被错划成右派的事，要求落实政策，改正错误决定，彻底恢复朱奇卓的政治名誉。

当年4月，他收到中国共产党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党组发出的“对朱奇卓同志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复查情况和改正决定”。

1966年5月起，中国发生了一场自建国以来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疯狂阶级斗争，后来官方文献都称它为“十年灾难”或“十年浩劫”。

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无端端迫害的人不计其数，他们可能根本对国家是忠心不二唯命是听的，但是只要你有权，有学问，有名气，有资产，或者什么都没有但知道一些历史真相，那你就可能遭殃，甚至灭顶。

直接受“四人帮”领导的红卫兵到处去打人抄家，批斗“反动学术权威”。公安部还发布了《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规定警察不得干涉、镇压“学生革命运动”。1966年8月16日。毛泽东亲自在天安门接见全国各地来的红卫兵，把这场混乱推向高潮。红卫兵在全国范围内大串联，全国进入黑暗时期。

加诸于受迫害者身上的罪名林林总总。反动、反革命、里通外国、间谍等等罪名就像吐一口痰那样容易地加诸于一个无辜的人的身上，无法无天。在十年浩劫中被迫害死去的人包括中央领导人，如国家主席刘少奇、彭德怀元帅、贺龙元帅等，此外还有著名学者、作家、演员、作曲家、运动员等等，一般估计大约是40万人。

父亲生前的同事和朋友中，许多人被“文革”波及。被拉上台批斗、毒打、游街示众、关牛棚、蹲监

牢，妻离子散的已经是大幸；冤死病死，自杀的也不少。

王莹，那位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撑起了“新中国剧团”，与父亲共事过近两年的演艺圈才女，遭遇最悲惨。本书第8章《文艺救国》里提到，1936年，王莹与当时上海的三流演员蓝苹争演《赛金花》女主角，王莹胜了一局，埋下祸根。

“新中国剧团”结束了南洋的演出之后，王莹和她的爱人，另一位中共地下党员谢和赓，双双在1942年被派到美国学习。谢和赓在国共内战期间，曾潜伏在国民党桂系将领李宗仁、白崇禧身边，担任机要秘书。

王莹与谢和赓赴美、在美期间的学习以及全部活动、直至离美回国，都是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进行的，是中国共产党扩大国际反法西斯战线工作的一部分。出于更便于开展工作的考虑，他们对外隐瞒了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在美国期间，王莹曾经应美国政府邀请在白宫演出，受到罗斯福总统夫妇及驻华盛顿各国使节的欢迎。王莹还曾任美国东西文化协会的董事并兼该会中国戏剧部主任及中国剧团负责人。

1954年，王谢两人从美国回返中国。除了谢和赓在反右运动中被错打成右派，送到北大荒去劳动了一年多之外，夫妻俩住在北京香山附近，王莹专心写作，深居简出。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要除掉许多30年代知道她的底细的人，王莹是其中之一。1967年，她被“四人帮”诬陷为“三十年代黑明星”和“美国特务”，投入北京秦城监狱。接着，不断的审讯、毒打，使王莹在1970年下肢瘫痪，失去说话能力。1974年3月3日，一代明星不幸含冤惨死于狱中。

夏衍，这位备受父亲尊敬的中国戏剧大师，40年代曾到新加坡出任一个短时期的《南侨日报》的主笔，“新中国剧团”解散后，他介绍父亲到香港《华商报》工作。解放后，夏衍担任过上海市文化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还改编过创作《祝福》、《烈火中永生》、《林家铺子》、《革命家庭》等电影剧本。这位中国文艺界的泰斗，在“文革”中被监禁8年，被打断一条腿。

黄声，那位在沦陷前与父亲一起在新加坡的“青训班”工作，后来一起逃难到印尼的泰国华侨，回国后担任汕头市副市长。1950年底我们回国时，黄声亲自乘船去接我们一家。父亲出事时，黄声在广州担任广东省侨办主任，我们母子三人流落广州时，他一直给予母亲精神上的援助。黄声在“文革”中被无理迫害，1966年6月14日，他在广州跳楼自杀。

林枫，这位风趣幽默爱搞话剧团、自称出身是新加坡“阿舍”（少爷）的父亲的好朋友，回国后在广州话剧团工作。在“反右”运动中，林枫被打成右派，送

往白云山开矿，其间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文革”时，林枫被令靠边站，当作“死老虎”被批斗，被打，再遣往干校去改造。后来导演有戏找林枫演，领导不给他演。即使后来能演反派角色，演员表上也不能出现他的名字。

王任叔，这位曾同父亲一起在印尼石叻班让种过田捕过鱼的文学家，1950年出任新中国驻印尼第一任大使后，曾经想在他的能力范围内让我们一家尽早团聚。1960年，王任叔在“反右”运动中受批判，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隔年起，他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东南亚研究所编译室主任。1966年初，王任叔完成了160万字史学专著《印度尼西亚历史》初稿。在文化大革命中，王任叔遭到批斗和隔离审查，1970年3月被遣返家乡浙江省奉化市大堰镇大堰村，1972年病逝。

我在北京的小学同班同学，高中毕业时正好是“文革”开始的1966年。他们高考没考，学校停课，被卷入一场空前的社会大混乱。家境比较好的，特别是那些家有四合院的，红卫兵找上门来，他们的家人被毒打，被羞辱，被剃阴阳头。家里贵重的古董、字画、书籍全被抄走。我的一个同学记得，她的父亲当时头脑很清醒，偷偷地告诉她，文化大革命就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为了自保，有的同学后来也加入红卫兵，到处闹事、串连去。



1968年12月，毛泽东又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发动1966、1967、1968年的初、高中毕业生（后来称为“老三届”）上山下乡的运动。据估计，“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达到1600多万人。同学们或在各地农村，或在北大荒浪费了10年宝贵的光阴不算，许多在这期间找对象的，在当时政治挂帅的气候下，只敢找家庭成分好的，也就是找军人或工人嫁。有些夫妻因教育水平和思想差距太大，无法沟通，更无法长久相处，后来不得不以离婚收场。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不久，“四人帮”被捕，文化大革命宣告落幕。

1977年，邓小平恢复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刘少奇、彭真等大部分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领导人被平反。接着，在主要负责人胡耀邦的努力下，“文革”中的其他受害者也陆续获得平反。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否定文化大革命。

1979年初，在广东省江门市工作的堂哥朱铮铮写信给北京的国务院侨务办公室，针对父亲被错划成右派的事，要求落实政策，改正错误决定，彻底恢复朱奇卓

的政治名誉。

当年 4 月，他收到中国共产党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党组发出的“对朱奇卓同志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复查情况和改正决定”。

这份文件将 1958 年加诸于父亲头上的紧箍咒逐一解开，把当时的四大罪状一条一条地否定，并说当时根据朱奇卓这样的发言就划他为右派是错误的，是不应该的。

文件的最后一段说：

> 朱奇卓同志平时工作积极负责，能虚心地听取群众的意见。反右后，能正确地对待自己的错误，拥护党的各项政策，服从领导，靠拢组织，能揭发不良倾向。劳动主动踏实，不叫苦，能克服困难，情绪稳定。
>
> 综上所述，朱奇卓同志是属于不应划为右派分子而被错划了的。应于改正，现决定：
>
> 一、撤销 1958 年 3 月 3 日《对右派分子朱奇卓的处理意见》，撤销 1959 年 12 月 17 日《关于摘掉死者朱奇卓右派分子帽子的意见》，撤销朱奇卓同志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所有材料，撤销《建议民盟开除盟籍的决定》。
>
> 二、恢复朱奇卓同志的政治名誉。
>
> 中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党组
>
>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三日

真理来得太迟了，这时，父亲已经长眠在北大荒整



整20年又11天。

已经在70年代初回返新加坡的母亲收到有关父亲的平反文件时，平静的生活又起涟漪，多年埋藏于心头的委屈和痛苦再度被挑起。她从新闻报章中知道，许多在“反右”运动中和“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冤魂，获得平反的同时也获得了应有的尊敬和追思。母亲于是回信给国务院侨办，要求：

1. 将朱奇卓的骨灰运回新加坡安葬。

2. 在北京为朱奇卓开追悼会。

3. 补发丧葬费及抚恤金。

母亲的前两项要求都没有回音。原因很明显。第一，父亲的遗体埋在哪里？还有人知道吗？要花多大工夫去找？这么多在政治运动中冤死的人当年都是被草草埋葬，有些甚至暴尸荒野，尸骨全无，要找寻遗体重新火化，几乎是个不可能的任务。第二，朱奇卓不是刘少奇，不是老舍，他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不够资格在北京开追悼会。母亲后来收到国务院外事办通过国内亲戚寄来人民币五百五十元的抚恤金。母亲要全数捐给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被婉拒。

70年代末，国内侨务政策逐步放宽，允许那些真的想离开的归国华侨申请出国。这个政策在《人民日报》大幅刊登，让那些多年来只能在梦里回返出生地的华侨喜出望外。

据说，早在1972年，中共中央负责侨务工作的廖

承志就曾经说过，真正留不住的华侨，愿意走的可以走。但是侨务政策一向是内部掌握，不公开发表，许多华侨知道了，即使有心离开，也担心一旦申请不被批准或政策有所改变，就会落得个思想落后，向往资产阶级生活，甚至里通外国的罪名，往后的日子就更难过了。

这个时候，三剑客中的六舅熙灏在浙江温州的一家工厂任车间管理，黄智佳在郑州的一所医院当医生。两人当时都已成家立业，有妻儿子女，两人分别向自己的工作单位提出了出国申请。

华侨学生当年抛开海外舒适的生活，回国求学，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没有想到自己到头来只能当个二等公民。以智佳的情况来说，从1952回国就一直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在中学里他是三百多名华侨学生的组长，又是少先队辅导员，接下来就担任团支部书记，到了大学又被推荐当了两年团支部书记。反右时，他被



母亲与灏舅重逢

划为右倾机会主义者，被令靠边站，只差没有被打成右派。

那时华侨申请出国一定要有理由，最充分的理由是回家接受财产，或回家探望老人，或探望分离多年的亲人，需要附上海外亲人的来信。熙灏和智佳分别把这个情况写信告诉新加坡的家人，后来都收到写得十分动人十分有文采的家信，但不知道是谁写的。1978年，刘熙灏和黄智佳，终于先后携妻带子跨越罗湖桥抵达香港，从头做起，重新出发。后来他们俩在回新加坡探亲时，才知道当年的那封重要家书是我母亲写的。

母亲在1952年赞成并鼓励弟弟和邻居的孩子回国升学，又在1978年尽自己的所能协助他们离开中国。这一去一来竟是四分之一个世纪，不幸的是，这25年在历史的长河里，不偏不倚就落在了新中国动荡不安的头30年里。

根据资料，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地侨务机构一度被撤销，侨务工作、侨务政策遭到干扰、破坏，归侨、侨眷备受冲击。在这场毫无理性的自相残杀里，那些在抗战时没有死在枪林弹雨之下、抗战胜利之后留在国内的一千多名“南洋机工”（本书第14章）遭遇十分悲惨。许多被加以“国民党残渣余孽”、“历史反革命”和“外国间谍”的罪名，被整死的或自杀的，不计其数。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重申对归侨、侨眷“一视同仁，不得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的侨务政策原则，明确指出：“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





母亲含饴弄孙



吴柳斯与太太（前排左四左五）访新加坡



1986年母亲与北京的老朋友见面，左起：林芳声、吴江、洪丝丝、母亲、张楚琨、王明爱。

30、一封迟来的信

回到新加坡不久，我收到一封来自合艾的信，信末署名：李兵（方壮璧）。



泰南和平村



我们的摄制队在泰南和平村口合影。右一为编导邓炯才，左一为摄影师陈添源，左二为录音师 Mohd Radzi。

时光飞逝，在经济稳步起飞的新加坡，许多人早就忘了还有马来亚共产党这个名词。

1989 年 12 月，以陈平为首的马共中央派，在泰国合艾与泰国和马来西亚政府签署《合艾协议》，马共放下武器，结束长达 41 年的游击战。在这之前，从马共分裂出来的两支分支，马来西亚共产党第一分局和第二分局，早一步在两年多前走出了森林。

马共与马、泰政府签订《合艾协议》时，我担任新加坡广播局华文时事组总监，负责每周的时事节目《焦点三十分》、《星期二特写》和一些不定期的节目。

为见证马共结束武装斗争的历史性时刻，我向上司 Chandra Mohan 争取到让“焦点”派队前往合艾。在一番仓促的安排和申请拍摄许可之后，节目编导王连三和一支两人的摄影队及时上路了。这一趟泰南之行，他们不但捕捉了那重要的历史性签约画面，拍摄到消失于大众视线多年的陈平，还访问了多位在合艾的马共分子。

录像带依计划火速从合艾寄胜安航空（Silk Air）带回新加坡。我们把这些素材制作了两段节目，分两次在《焦点三十分》播出。结果反应很好，收视率飙升，新加坡三百多万人口中有四五十万人观看了这两个节目。

很明显的，节目大受欢迎的原因，主要是新加坡的华语观众里，许多家庭都跟马共有点千丝万缕的关系，即使家里没有人在森林里，也因早期受华文教育，不可避免的受了一些左倾宣传或书刊的影响，他们要知道这么多年来生活在热带森林里的马共，是如何走过这三四十年的岁月。

《合艾协议》签署一年之后，我们组的《星期二特写》想趁马共放下武器一年之际，制作一个比较深入的纪录片。我们打算故事从头说起，从马共在 30 年代的创立，一直谈到目前他们在和平村的生活。当然，我们希望访问到马共首领陈平，和马共全权代表，新加坡人方壮璧，也就是那位李光耀资政在他的回忆录里提到的马共神秘人物，The Plen。

由于节目性质比较敏感，一些历史事件需要向其他政府部门咨询和寻求资料。几经周折，最后上司决定要我亲自出马，与编导邓炯才带上二人摄制队上路。

我们乘飞机抵达曼谷，再包了一辆车连同两位泰国导游南下。到了合艾，才知道要进入和平村并不容易，我们要得到泰国军方的许可，也要得到马共方面的同意。在合艾的一家大酒店里，我们终于见到了泰国军方

的吉迪将军，那位一年前曾经帮助过王连三完成任务的重要人物。当时安置前马共人员的和平村有好几个，我们想去的是离合艾最近的和平第一村。我们的诚意，最终打动了这位本来要向我们说不的将军。和平村口当时有荷枪实弹的泰国军人驻守，没有正式的许可，谁都休想越雷池一步。

我们也接触了在合艾的前马共人员，由他们向组织上传达我们要进入和平村访问和拍摄的要求。经过一番考虑，马共方面也同意了，但是，没有人能告诉我们是不是会见到我们想见的两位关键人物。

在抵达合艾的好几天后，我们终于跳上了军方的吉普车，经过好几个小时曲折颠簸的黄泥路进入和平村。和平村建在一片靠山的原始森林里，处处是两三个人环抱的百年老树，枝叶浓密得几乎看不到天空。村中有一栋木头盖的比较大的房子，像是会所或活动中心，几十栋小木屋分散在周围。村里的人对我们十分友善，带我们四处参观，并介绍了他们把老远的山泉引到村里的竹筒水管。在会所看报下棋或看电视的村民，大大方方地接受我们的访问，语气不亢不卑，对马共的失败看成是历史的必然。

我们的摄影师一分钟也不敢浪费，摄影机不停地转动。天色渐黑，拍摄停止。我们一行人得到很好的招待，饱吃了一餐。负责安排我住宿的女村民把我带到一间小木屋里，扭亮煤油灯点上蚊香，告诉我要放好蚊帐

才离开。那一夜，我或许根本没睡着。原始森林里的虫鸣，蛙鸣，鸟叫，组成夜半交响曲。一种不知名的鸟，叫起来就像婴儿啼哭：哇，哇，哇……我担心的是，我们明天是不是能见到陈平，或至少，见到方壮璧。

第二天，拍摄才开始不久，一队荷枪的泰国军人开入和平村，凶巴巴地呼喝着要我们马上离开。任何解释都没有用，吉迪将军给我们的许可也不管用了。我们无奈地上了车，经过大约一个小时的颠簸，我们被带入一个戒备森严的泰国军营，走过长长的走廊到达一间宽阔的办公室。接见我们的军官并不友善，显然他不同意吉迪将军擅自作主放了我们一马，至于到底他和吉迪将军之间谁的官衔比较大，谁对和平村的事说了算数，我们无从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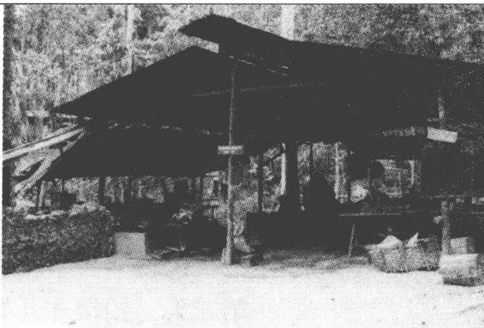
我们没能再次进入和平村。在合艾，我们继续采访已经出来市镇谋生的前马共队员。他们都十分合作，尽可能配合我们的拍摄。但是，直到我们离开合艾那天，也没见到陈平，听说他那时在北京，我们也没见到方壮璧。唯一值得安慰的是，我们从泰国当地电视台那里，得到了一些珍贵的画面。

回到新加坡不久，我收到一封来自合艾的信，信末署名：李兵（方壮璧）。内容如下：

亮亮女士：

这次你们来泰南，未曾见面，可惜。但原因很多，情况复杂，相信你会明白的。稍后，友人提起朱奇卓先


我访问前马共成员


和平村内厨房

生，这才使我大感遗憾，直到现在……

奇卓先生算我老师。当年在华侨中学，朱先生是副训育主任，我还是学生呢。在《南侨日报》，我在编辑部，朱先生是广告部主任，算上司吧。还有，双方都是潮州人。朱先生满口潮州腔，到现在我是“声犹在耳”的。

总之，旧的感情令我困扰，也不知该怎么说好。以下写的28个字，就是在这样的感情下产生的。

《红花》

（写给朱亮亮先生）

翠竹枝头红花开，
故地他乡叹英才。
黄河浊水滔滔去，
长江后浪滚滚来。

第一、二句，写“朱奇卓”三个字。“红”是“朱”，翠竹与红花，自然是“奇”，英才者“卓”也。

第三句“浊水”，当然是朱先生的不幸事件。

第四句“后浪”，是指亮亮先生的。

因恐写后人猜不出，故作简单说明。而其深切之情，则难于言传也。

女士母亲（令堂）是否健在。如在，请问候，请安，如不在，则当归入“浊水”之类的。

上面28个字的题目该怎么上？我反复地想（一时的，临时的）不知上什么好。最后还是取《红花》。未知尊意如何？

写此聊表对朱先生的怀念，也对亮亮女士的关切。

请代问候你的家人。

敬礼

李兵（方壮璧）

1991年5月4日。合艾

我读了来信，不胜唏嘘。方壮璧显然记得那个坐在密驼路74号二楼地板上吃饼干的小女孩。如果我当时交给合艾前马共人员的名片上，加上父亲的大名，也许，我们就不会失之交臂了。

母亲这时已经70岁，她看了信，重复地说：方壮璧，那个当年常常进进出出我们家的年轻人，怎么会躲在森林里那么多年？他怎么知道你父亲的死讯？

回首往事，父亲和许多血气方刚的海外华侨，当年都毫无保留地相信了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的理想，因此逆流而上，要为自己饱受蹂躏摧残的祖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什么是新民主主义？就是建立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和富强的新中国。毛泽东当

时广为流传的著作，除了《新民主主义论》，还有《论联合政府》。

事实上，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毛泽东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再也不谈什么新民主主义了。1956 年之后，新中国又宣布进入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而方壮璧笃信的是要在马来亚建立无产阶级社会的一套。马来亚社会跟中国 1949 年之前老百姓一穷二白的情况有很大的差别，老百姓没有闹武装革命的动力，革命因此革不起来。像父亲一样，方壮璧对自己的信念和理想，始终执着如一。不管环境多么险恶，道路多么崎岖，不管遭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即使得付出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甚至生命，也在所不惜坚持到底。

事过境迁，蓦然回首，你可以说他们天真理想，愚忠愚孝，但是他们追求各自己理想的那份坚持和固执，让我肃然起敬。

我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拍摄的泰南和平村影像，以及好多个内容丰富的访问，经过整理剪接后，终因种种原因，没有播出。

31

重返北大荒

母亲没做成的事，后来由我接了棒。我要把听来的、看到的和自己经历过的历史片段拼凑起来。我要知道，当年我们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寻墓大队：左起张淑绵、张伟杰、王明爱；右一庄钦华，与云山农场十四队诸领导。

80年代，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开始吸引四方游客。

母亲与成舅夫妇多次前往大陆，旅游探亲和拜访旧日朋友。在广州和北京，早年曾与父母亲在新加坡共事的朋友们，那些在"文革"中没被整死的，都衷心称赞母亲当年向命运说"不"的勇气，如果当时母亲稍一软弱听人摆布，今天也许连带两个孩子都已不在人间。

母亲在1986年受邀到北京，她旧日的工作单位中国新闻社，以一位归侨领导吴江的名义，盛情宴请她，并请来了许多父母亲的朋友，包括洪丝丝、林芳声和张楚琨等同桌叙旧。这几位当年在新加坡时叱咤风云的热血汉子，这时都垂垂老矣。过后母亲向中国新闻社提出要求，要去东北寻找丈夫的遗骸，以便重新安葬，但事

情没有下文。朋友们都劝她，遗体就别找啦，三十多年过去了，找不到的。

母亲没做成的事，后来由我接了棒。我要把听来的、看到的和自己经历过的历史片段拼凑起来。我要知道，当年我们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1994 年中，我向我工作的新加坡电视机构请了两个星期假，按照母亲提供的名单，先在新加坡，然后到潮州、广州、北京、香港寻找亲戚和父母早年的朋友同事，进行录音访问，做了初步的资料收集工作。

在北京，父亲生前的同事王明爱叔叔，把父亲去世前在北大荒的生活向我详细描述了。最重要的是，王明爱当年是埋葬父亲的四个人之一。据他推测，如果黑龙江虎林县没有什么重大的建设发展的话，父亲应该还是长眠于当年下葬的地点。

1995 年 8 月，我在赴北京与中央电视台的同仁一起搞“第二届国际大专辩论会”之前，写信给国务院侨办，提出要同王明爱夫妇到北大荒寻找父亲墓地的要求，请他们给予协助。国务院向黑龙江省侨务办公室下达了指示，要求各级侨办热情协助。

1995 年 8 月 29 日，热热闹闹的大专辩论会一结束，我在王明爱和他太太庄钦华的陪同下，踏上北大荒之旅。

我们从北京乘飞机前往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虽然只是一个多小时的航程，若换乘火车或汽车，也许要折腾一整天。牡丹江市是地区级市，虎林县归它管辖。市侨

办（当时已并入市外办）盛情接待了我们，派国外科女科长张淑绵承办这件事。她联系了虎林有关单位，之后就当起我们的全程陪同。张科长热心主动，她说她曾在850农场插队过，熟悉那边的情况，牡丹江市侨办也为我们买好了当晚前往虎林的火车票。牡丹江市开往虎林县的火车不设软卧车厢，最舒适的就是硬卧。火车经过一个晚上十个小时的停停走走，终于到达虎林县。

8月30日，虎林县侨办主任张伟杰女士一大早在火车站等候，接我们到政府招待所“虎林宾馆”吃早餐，然后入住“粮茂大厦”。安顿好之后，一辆三菱牌小巴载着我们向目的地850农场疾奔。张女士说原850农场已经被瓜分，我们所说的地方现在已属854农场。

虎林县，就像许多中国的小市镇一样，有几条热闹的大街，镇里房子高矮参差，路边的市集蹲着些摆卖蔬菜鱼虾的小贩。车子开出市镇，只见北大荒的天空特别蔚蓝，平原一望无际，土地果然像许多人形容的那样是黑色的。车子在笔直的公路上奔驰，穿梭于大片大片绿意盎然的菜田和结满黄澄澄稻穗的田地之间。北大荒，早已经变成了北大仓。

北大仓这个美誉，是千千万万的人为它流汗流血，甚至献上性命得来的。这包括了50年代反右运动时被“错划”了，而后来百分之九十九被“改正”而不是“平反”了的知识分子；包括抗美援朝归来的整师整师编制的志愿军复员军人；也包括了60年代更疯狂的

“文革”时期，那些上山下乡，到北大荒插队，然后在北大荒埋葬了青春岁月的学生。

当年，只有29岁的王明爱与父亲同批到达北大荒。父亲在1959年2月去世后，同一年年底，全国到处缺粮饿死人，北大仓也不能幸免。侨务系统底下各机关开始分批把右派调回北京，王明爱属于最早离开的一批。然而，北大荒的悲剧继续发生，王叔叔一路上告诉我，有另外两个侨务系统的难友，也像父亲一样再也回不来了。一个是原在中侨委工作的印尼归侨，20多岁的大学生张建森。王明爱说：

冬天被认为是搞水利和运输的大好季节。因为所有水域，包括湿地，都结厚冰，可以畅行无阻。

我们冬天更抓紧时间，夜以继日地开运河。初冬，冻土不厚，还是用铁锹（南方人叫铲）在那里挖土。挖土是每人分一段，从前面起，横挖，挖完一行，往后退再挖一行，直到最后一行，也就是挖了一层。这时就得走到起始的地方，开始挖第二层。而你会发现泥土的表面已结成近一厘米厚的冻土了。冬季天黑得早，我们在地里割草，烧火堆，不是取暖，而是借火光看清下锹的地方。为了加快进度，当冻土已经很厚的时候，就在冻土上挖炮眼，装火药，把冻土炸成块块，然后再把它往运河边扔的扔，抬的抬，这样功效提高多了，这叫“放炮”。

放炮是有危险的，有时导火线烧到尽头，却始终不炸，这叫“哑炮”。放炮一般是放哨警戒的。有一次晚

上警戒不够严密，出现哑炮，有个人就走过去看个究竟，怎知一靠近，“轰”一声，偏偏它就炸了。那人是分配到中侨委不久的张建森，大学生，印尼归侨，就这样死得粉身碎骨。

结果负责他的那个队的小队长就倒霉了，吃官司，抓去坐两年牢。

另一位出事的是越南华侨张式，原名张广标。他曾经用越南文翻译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民盟中央的候补委员。张式是中新社广播部的，办公室在新华社。他之被划成右派，可算是另一种传奇。王明爱说：

张式瘦瘦的，平时沉默寡言。有一天，张式到中新社看大字报，回新华社之后，同事向他打听中新社有什么新闻。他如实告诉他们说，看到中新社《整风快报》（把每天小组发言整理发表），有一篇叫《方方同志不应发脾气》的“本报评论员”评论（他并不知道是我写的）。好了，这下他的罪状就是“传播右派言论”，也被划成右派，充军北大荒。

在北大荒，张式或许看不到希望，身体疲惫不堪，精神备受折磨，心也死了。王明爱说：

听说，1960 年，有一次他从工地回我们排水连基地大本营（即第六队）拿东西。他穿着长筒胶雨靴上路，后来被人家发现趴在水草地上死了。水很浅，淹不死人的。我的判断是他精神崩溃，已经失去了生的意志，绊倒了干脆不起来了。

此外，有些人到了北大荒，还是看不穿政治运动的把戏，思想往死胡同里钻，想来想去想不通，就借酒消愁。王明爱回忆说：

有些人以酒浇愁，愁更愁。喝酒，喝白干。东北的酒是有名的烈，那时有钱还买得到。有个叫陈锡全的瘦弱的老同志，原在泰国《中原报》当社会新闻记者，是多干事少讲话的人。喝酒喝到胃穿孔，送去急救。救过来之后，送去北京，再送回广东澄海老家当农民去。我们是很熟的，但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被划为右派的，大概是出身和旧社会的经历被认为不好吧。

我们直奔854农场场部，场部的侯成国副书记和王秘书热情接待。午饭后，他们向一些当年850农场的老职工询问，找到已离休的汽车队队长老关，还有原850农场二分场五队的刘队长。刘队长认为不存在王叔叔说的六队，只有五队。可关队长则认为确有六队，不过建制时间短吧了。刘队长说，确实早年五队住过右派，也死过人。这一来，大家似乎都认为王叔叔说的当年的六队，就是刘队长说的现在的五队。于是侯、王、关、刘四个人加入我们的队伍，继续上路。

三菱小巴继续在无边无际的田野奔驰，正如王叔叔所说的，当年一望无际的北大荒平原上难得看到一两棵大树，更没有什么地标性的建筑物，很容易迷失方向。现在，当年他们在路旁种的树都已经长高，树木挡住视线，同样容易迷路。还好有当地人带路，三拐两转，到了现在

的“云山农场 14 队”，也就是原 850 农场五队的地点。

在该队居民点的村口，两个高高的粮仓和一些新建的房子模糊了王叔叔的记忆，究竟当年安葬父亲的小山丘在哪一个方向？在村口一排红砖仓库的后面，有一片直径大约 15 米的坡地，东边有几个土堆，像是坟堆，北边还有个土坑。王叔叔记忆中的小山丘上的树林没有了，到处长满了野草野花。他说如果树林还在，地形倒是有点儿像。

我们驱车向西南到居民点，向那里的负责人说明来意，年纪轻一点的似乎没听说过有什么埋葬人的地方。后来来了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听我们一番解释，才说：哦，你们找右派坟儿啊，就在村口红砖屋后面，那里埋了三个人。随行的刘队长说，这居民点北边原是一片荒地，荒地北边有间房子，屋后是一片林子，后来砍光了。经这么一说，王叔叔更认为那小坡上的土堆与居民点的距离和方位，很像是当年选择的安葬处。

但为慎重起见，我们想看看这里人说“原叫六队”的地方是什么样的。途中停车问路，有一个路人说他是“原五队”为右派做饭的，说右派就是住五队。不久，车到了被现在场员称为是“原 850 农场二分场六队”的居民点。王叔叔一看就觉得不像，居民点很小，只有 4 家外来的开荒户。居民点地势高，开荒户介绍说四周都是水草甸子，现在没有树，即使是多年前恐怕也长不了树。环顾四周，真的找不到可埋棺木之处。

天边起黑云，一下就盖到头上来了。下雨了，路况

不好，我们怕被困在居民点，赶紧打道回府。把四位陪同我们的干部一一送到家后，我们开快车回到虎林县城。

大家一起梳理这一天的见闻，认为王叔叔说的“850农场二分场六队排水连”经过30多年来农场编制的变更，很可能就是今天去过的“云山农场14队”。为慎重起见，决定翌日到原850农场场部所在地西岗，看看是否能再找到一些线索，如有可能也去看看父亲发配到北大荒时的第一个落脚点，云山畜牧场电锯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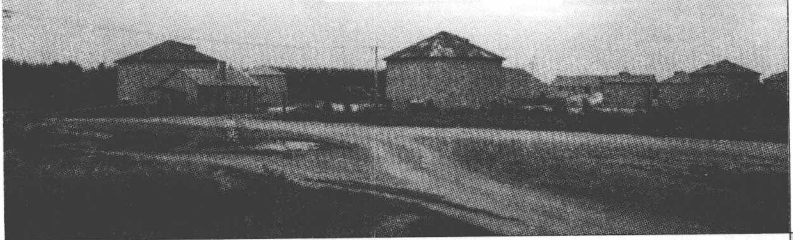
8月31日这天，虎林县政府车队的张队长亲自驾驶一辆吉普车，载着我们在黑土地上奔驰了近一个小时，目的是寻找父亲所在单位850农场二分场排水连指导员刘桂，了解当年情况。刘桂外出未归，我们先到电锯厂看看。以王叔叔的记忆，当年那里山路蜿蜒树林十分茂密，也许是采伐过度，如今只是几个几乎秃了顶的小山丘。

我们又到了不远处的云山水库，这是父亲他们当年

早期的六队在哪里?



原六队村口的粮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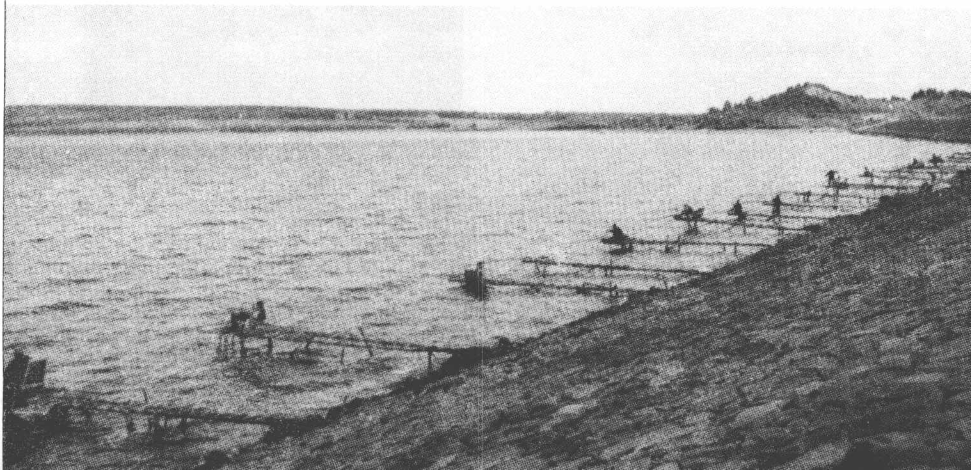


花了半年多时间修建的。水库看来一直都有人维修，长达两公里半的堤坝结实完好，沿堤伸出几十个六七米长的小码头，码头上摆着椅凳沙发。随行的人说，库区有人管理，进来得买门票，还出租码头让人垂钓。前来参观和垂钓的游人，大概没人会去想象 36 年前千万人在这里挑灯奋战，流汗流血修水库的情景。

那条长长笔直的堤坝，哪一段有我父亲的脚印？哪一段有我父亲的汗水？他曾在这里捡拾柴火，为挥动锄锹取土、挑筐抬土上坝的劳动大军提供开水。

我们回到云山水库西端，地名叫西岗的地方，果然找到了当年排水连指导员刘桂。刘桂家的相册里，还有王叔叔等一批摘帽子右派准备返京时的照片，背后写着：1959 年 12 月 1 日。刘桂是复员军人，曾经中过风，表情有点冷漠说话不多，不过记忆不错，他说自己是 1959 年 4 月才调到 850 农场二分场五队的。这也就是说，父亲 1959 年 2 月去世时他不在场。刘桂主动提起在他任内张广标的死，也证实张建森的事。还说另有两

云山水库





村口的红砖屋



找寻埋葬地

人在工地饿死，抬尸的人因饥饿都抬不动，但他不知道死人后来埋在哪里了。他还说张广标的遗骸，民盟中央早就派人取走，但说不出是哪一年。他提供的情况证明王叔叔所说的六队确曾改称五队，也就是现在的“云山农场 14 队”，这一点很重要。

这样，大家认定父亲的坟就在“云山农场 14 队”的坡地上，决定第二天再去勘察，尽可能确定坟头位置。9 月 1 日到了那片荒坡上，近前细看，确有三个土堆像坟头。王叔叔说当年为父亲坟头插了一支木制墓牌，现在什么也没有了。另两个坟是难友的吗？一样没有任何标志。三个土堆距离呈等边三角形。另有一个长方形废坑，与三个土堆形成等边菱形。最北边那个土堆紧挨峭壁，所谓“峭壁”只不过三尺来高，那是有人来这里取土造成的。



朱奇卓、张建淼、张广标墓碑

居民点的热心人拿来铁锹在靠近土堆的“峭壁”下部挖进，果然有些腐木似的东西，会不会就是棺木呢？

如果真的刨开这一大片地，这么多年了，如何辨认哪一具遗骸或白骨是父亲的呢？除非全送去做 DNA 检验，但其他两位难友的家属不在场，他们会有什么意见呢？经过一番考虑，反正都是叔伯辈难友，一起扫墓祭奠吧。于是我们到附近一家私人花圃买了一大束花，在这片高地的中央堆了个小土堆，献上花点上香烛，烧了银纸，加上几包父亲生前每天都离不开的香烟。我一边在这刚堆上来的土堆上洒酒，一边告诉父亲，我来看他来了，很抱歉，我没来得更早几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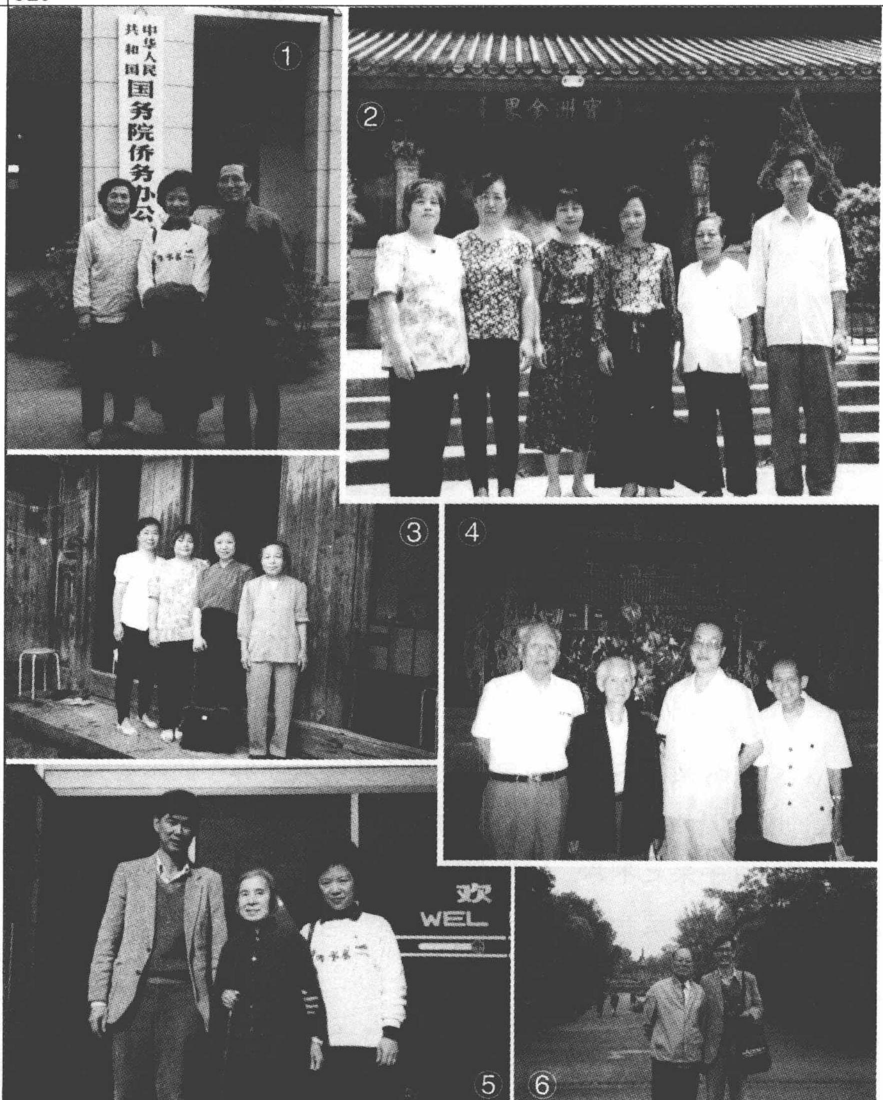
通过电话联络，在新加坡的母亲和哥哥也认为不要搬动父亲，让他继续在北大荒长眠吧。离开虎林之前，我们请张伟杰科长向这个生产大队的上层领导，也就是云山农场的党委，表达希望在这片高地上围建一个墓地立个石碑的愿望。

回返新加坡后，我一直跟张女士保持书信往来。当年 10 月中，她把围墓地立石碑的事都办好了，石碑上刻着三个人的名字：朱奇卓、张建淼和张广标。

哥哥、嫂嫂，以及我们兄妹的孩子们，多年来一有机会就会往北大荒跑一趟，去探望一位过早从我们的大家庭里消失的长者，去问候一位孩子们从没见过面的祖父和外祖父。我们在墓地前肃立默哀，向一个含冤而逝的英魂请安、敬礼。

32
后记

如果我不把这一段历史写下来，孩子孙子们不会知道他们的前辈走过什么坎坷的路。孩子们应该知道幸福的日子来之不易，而更加珍惜眼前的时光，好好地把握自己的命运和前程。



①1988 年在北京与王明爱夫妇合影。

②1994 在潮州开元寺与亲人合影，右一为堂哥朱铿铿。

③1994 在潮州，左起堂嫂林素貂，堂姐朱珠，右一堂姐朱楚楚。

④1994 在广州访问父母早年同事。左起吴柳斯、吴广川、林枫、郭建成。

⑤1988 年在北京与卢心远夫人江秋合影，左一为丈夫沈福基。

⑥1988 年，吴柳斯与沈福基在广州。

父亲一生的悲剧，加上母亲的刻意灌输，文字会闯祸这个简单又似是而非的概念自小牢牢地刻进我的脑海。我曾经设法避开与文字有关的工作，更不愿意重提那一段令我们家破人亡的历史。

然而年纪大了，许多看法想法都有了改变。能拿笔能讲故事是老天的一种恩赐，如果我不把这一段历史写下来，孩子孙子们不会知道他们的前辈走过什么坎坷的路。孩子们应该知道幸福的日子来之不易，而更加珍惜眼前的时光，好好地把握自己的命运和前程。

另一方面，近30年来，全世界见证了中国这个饱受折腾、伤痕累累的古老国家，如何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在经济上腾飞、崛起。中国空前的富强了，这近30年的进步，才是真正的大跃进，一日千万里。但是，请不要忘记海外华人为他们的祖国，或者他们的父母、祖父母的祖国的摆脱封建帝制，抵抗日寇的侵略，以及为新中国的建设所付出的力量，甚至枉死的生命。有智慧有远见的领导人，千万不能重蹈覆辙，重犯当年的错误。

正因为自己不是一个专业作家，加上写这段真实历史的工程不小，《追虹》的写作一延再延。

最早的资料收集工作始于1994年。我在新加坡录音访问了母亲、成舅、成妗，父亲亦师亦友的同乡黄学良、蔡文玄，父亲在报界的同事蔡建奕、薛残白和“新中国剧团”时代的老友徐蕉萌。然后我到广州，访问













①1994 在新加坡，母亲与徐蕉萌夫妇合影

②1994 在香港与黄智佳夫妇见面

③1994 与熙灏舅在香港见面

④1994 在北京见父亲老同事王庆祥

⑤1994 在香港与温平夫妇合影

父亲《南侨日报》时代的同事吴柳斯、林枫、吴广川和郭建成。那时，老报人胡伟夫已经年老体衰，坐在轮椅上，不过，他一知道我的来意，就重复地说：朱奇卓是个好人。

在北京，我访问了与父亲一块儿前往北大荒的王明爱，父亲在中国新闻社图片组的同事王庆祥，见到了小时候的邻居卢嘉一家人，以及好几位我小学的同学。在潮州老家，我访问了堂姐朱楚楚、朱珠、堂哥朱铿铿，和父亲年轻时在潮州城南小学教过的学生林盛传和林莹夫妇。在深圳，我与多年不见的堂哥朱铮铮彻夜长谈。在香港，我访问了父亲的老朋友，上海书局的温平，我也见到了三剑客中的其中两人，六舅熙灏和黄智佳。至于茂舅，在1960年回返边佳兰之后就过着简单而淡泊的日子，这个爱我疼我的数学天才，后来多次出入新加坡板桥精神病院，在1983年病逝。

跟这么多人做了录音访问之后，由于工作繁忙，我一直没有动手整理材料，也没写下一个字。2000年，三年派驻北京担任新加坡电视机构驻中国首席代表的工作结束之后，我成立了自己的电视制作公司，也开始写了《追虹》的前两章。但不久，又因为新的工作更加忙碌而停顿下来，这一停，就是8年。

2007年，我已经到了退休年龄。我告诉自己，如果不趁现在还有点精力有点冲劲的时候一鼓作气的把书写好，我可能会带着一个永远的遗憾离开人世。刚巧，

大女儿在2008年初被调到上海工作，我把自己的工作搁了下来，跟随她和两个可爱的孙子搬到上海，利用所有能利用的时间潜心写作。

我几乎天天上网找资料，对证历史背景。有时飞到北京、广州、潮州和香港更新自己的记忆。这期间，也看了多本跟这段历史有关的书。2009年10月，《追虹》三稿终于完成。在这一年10个月的时间里，我把许多人都“拖下水”，以助我一臂之力。

要感谢的人很多。

首先要感谢蜚声国际的新加坡多媒体艺术家陈瑞献，允许我用他的画作《西班牙彩虹》作为《追虹》的封面。我因工作关系认识陈瑞献多年，对他的诗、文、书法、寓言和其他许多方面的才华，只有恭敬仰望的份儿，没有欣赏的能力。对他的画，我以一个俗人的眼，也只能说我特别喜欢某些画的色彩和意境。当我终于鼓起勇气向瑞献提出这个唐突的要求时，他一口就答应了。我一方面受宠若惊，一方面万分欢喜，一个谢字无法表达我高攀他的艺术的感激。

在北京的王明爱和他的太太庄钦华，1995年8月不辞劳苦地陪我一起到北大荒寻找父亲的遗骸。近一年多里，又被我不停地“骚扰”，向他求证一些历史真相。王明爱叔叔不厌其烦地为我讲述当年事，翻找记录，甚至动手帮我梳理有关反右运动和北大荒噩梦的内容。王明爱叔叔还寄给我几本更令人震惊的有关右派遭

遇的书。新华社高级记者戴煌著的《九死一生》和杨显惠著的《夹边沟纪事》，让人读了心如刀刻，沉痛悲伤不已。

我老公沈福基的大学同窗好友陈宏达博士，多年来在美国工作定居。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看到我写的《追虹》初稿，给我提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包括书中应该多一些描述人物和地点的细节等等。正所谓当局者迷，经旁观者的提醒，我把原稿修改了一遍，增加了不少细节。二稿之后，他又仔细地为我校对。

我的哥哥朱华华只长我一岁，但我们俩自小相依为命，我总是把一些我会做，但他会帮我做的事推给他，他对我这个妹妹诸多包容，总是照做不误。哥哥仔细地阅读《追虹》，帮我校对，给我提意见。书中许多边佳兰的相片，都是哥哥专程去为我拍摄。

父亲的同乡蔡建奕老先生，今年 90 多了，但头脑敏捷记忆清晰，仍积极参与新加坡的文化艺术活动。2008 年底他应我的要求，校对了书中有关 40 年代新加坡报界风云的内容，并帮我查核一些旧相片上的人名。

我的亲戚朋友们，好多位在这一年多里，常常接到我莫名其妙的电话，问一些往事、年份，甚至场景。这包括我在新加坡的成妗杨英芬、表弟刘宏锜、三姨刘丽芝和表姐许舜洳；在边佳兰的九舅刘熙镒；在香港的五舅刘熙祥和六舅刘熙灏；在中国江门的堂哥朱铮铮，在潮州的侄儿朱铠铠，以及新加坡裕香茶庄的第三代李

仲容。

今年2月，我重返中国南方时，潮安县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温俊杰和潮州市意溪镇桂坑乡的刘利荣书记陪我找寻我曾外祖父的墓地；广州的胡云贝（胡伟夫的女儿）和石小娥（新加坡归侨石韫真的女儿），母亲的私塾老师李友心的儿子李向明，陪我重走当年在广州的几个落足之处。

《追虹》中有关刘家过番史的部分，主要是来自二舅刘熙成在1994年为我做的好几次录音。成舅一生劳碌，心胸宽广，自我们从中国回巢后就融入他们的小家庭，他与成妗视我们为己出。成舅晚年时，子女事业有成，老怀堪慰。很遗憾成舅在2002年就去世了，没来得及看到《追虹》的出版。

另一位我来不及向他道谢的是林焕熙先生。50年前在广州，是他及时伸出援手，搀扶了摇摇欲坠的母亲，帮我们一家拨开乌云逃出生天。

在此还要谢谢我的两位老师。

一位是1961年我在中正中学中一（A）班的华文老师陈乐异。陈老师当时从我的作文里知道了我们家的情况，非常关心我们兄妹什么时候能够和母亲团聚。1967年，我顺利进入南洋大学物理系，哥哥则进入新加坡大学数学系。哥哥的高中会考成绩优异，得到政府颁发的每年一千五百元的最高额助学金；我的会考成绩平平，所申请的几项助学金都没消息。这时陈老师的夫

婿郑衍通先生在南洋大学担任辅导处主任，在他们夫妇的努力和帮助下，我得到观音堂助学金，减轻了不少母亲肩上的重担。我们兄妹大学毕业后，陈老师又协助我们办理让母亲尽早回到新加坡的手续。陈乐异老师已经去世多年，在这里我要重申自己对她的感激和怀念。

另一位关爱我的是我的声乐老师苏燕卿。我自小喜欢跳舞和唱歌，母亲也一直希望有机会让我学习钢琴，然而当时的情况和环境决不允许。1967 年在南洋大学学生会主办的一个歌唱比赛上，我认识了当时担任比赛评判的苏燕卿老师。苏老师过后极力鼓励我学习声乐，并免学费收了我这个学生。我在苏老师的教导和影响下，几年后考获了英国皇家音乐学院 LRSM 演唱文凭。虽然我最终没有成为一个歌唱家，但苏老师开启了我对音乐艺术方面的认识和追求，这对我后来的工作有莫大的帮助。苏老师亦师亦友，每当我遇到挫折或沮丧的时候，她不断地给我加油打气。

母亲晚年过得轻松自在，常常为子孙们的成就而自豪。哥哥和我，都如她所愿完成大学教育。母亲的五个内外孙，都是新加坡政府奖学金或新加坡政联公司奖学金得奖人，其中两个还得到总统奖学金的最高荣誉，留学美、英顶尖大学。

母亲一向勤劳而独立，直到 80 多岁都是如此，但自 2003 年动过舌喉癌手术后，健康每况愈下，记忆力迅速退化。2008 年《追虹》第一稿一章章地在上海出

炉时，我请老公第一时间打印给她看，那时母亲大体上还能阅读，看得很专注。有好几次我回新加坡时，她总是问我，你怎么会知道那么多以前的事？母亲以88岁高龄在2009年8月31日走完她苦乐参半的人生，我赶不及让她好好地看一遍《追虹》，是我此生不可弥补的最大遗憾。

当然还得谢谢我的老公沈福基博士。我无论写长篇或短篇，老公总是我的第一个读者，他一字字为我校对，碰上历史事件还要为我翻箱倒柜地查证，任劳任怨。

我在1994年访问过的父亲的师、友和同事，许多都在这15年里相继过世了。在这里向他们说声：对不起，我把该做的事耽误了。

我要对所有呵护过、帮助过、关心过《追虹》的长辈，亲人和朋友们致谢！鞠躬！

朱亮亮

2009年10月26日三稿完成于新加坡

附录

1898 光绪二十四年，外公刘振标出世（1898－1969）。

1899 光绪二十五年，曾外祖父刘正彬考武秀才不中，过番到南洋。

1906 光绪三十二年，清朝正式废除文武科举考试。

1909 曾外祖母与虚岁12岁的二儿子刘振标到南洋。

1911 辛亥革命，父亲朱奇卓出世（1911－1959）。

1915 18岁的外公回乡娶妻（外婆蔡春娇1897－1980）。

1917 大姨刘婵卿出世。

1921 母亲刘丽娴出世。

1925 成舅出世（1925－2004）；老伯刘振荣夫妇带老大熙深和老二惜娟过番到南洋。

1926 外公娶二外婆庄银音。

1928 三舅刘熙茂出世。

1929 父亲朱奇卓18岁开始在潮州城南小学教书，至1930年6月。

1930 父亲去厦门大学读书，至1931年。

1931 8月，父亲回城南小学教书，至1934年8月。

1932 外婆蔡春娇的两个堂弟，蔡得胜和蔡得炎过番到南洋。

1934 9月，父亲在天津汉江交通职工女子小学教书，至1935年9月。

1935 曾外祖母去世（1872－1935），外婆与母亲回唐山看病。同年9月，父亲在惠州惠阳女子师范教书，至1937年10月。

1936 曾外祖父与老伯一家回唐山老家。

1937 7月7日卢沟桥事变，外婆与母亲回边佳兰，曾外祖父在桂坑乡去世。同年，父亲到香港《申报》当记者。

1939 4月，“新中国剧团”抵达香港；父亲后加入剧团，往越南演出。9月，王莹等六人到新加坡，其他人折返。

1940 上半年，母亲进入南华女中。年中，“新中国剧团”其他人抵达新加坡，为筹赈演出；至1941年2月团员陆续离开。

1941 2月，父亲在香港《华商报》工作，至1941年7月。8月，父亲回到新加坡，在华中任教。12月，日本攻打马来亚。

1942 2月15日，新马沦陷，众文化人于几天前逃往印尼。

1945 8月15日，日本投降。11月父母结婚，后去槟城《现代日报》工作。

1946 11月27日《南侨日报》诞生；华华出世，隔年我出世。

1950 3月10日父亲被捕，9月20日《南侨报》被封，12月5日全家回国，抵达汕头。

1952 4月刘熙茂、刘熙灏、黄智佳回国，到汕头后陆续北上。

1953 夏，父亲往北京工作；秋，母亲与哥哥和我北上。

1957 反右运动开始。

1958 4月，父亲去北大荒；6月，母亲带孩子下放到南方。

1959 2月2日父亲去世；4月一家回北京途中折返广州；12月31日母亲与茂舅抵香港。

1960 8月；哥哥和我抵香港，12月回返新加坡。

1961 我们在新加坡中正中学上初中一。

1967 我们上大学；文化大革命1966年开始。

1976 “文革”结束。

1978 父亲被改正，刘熙灏、黄智佳离开大陆到香港。

1988 第一次回中国旅游，与父亲的朋友们见面。

1991 往泰南和平村做有关马共节目。

1994 开始搜集《追虹》资料。

1995 同王明爱、庄钦华夫妇往北大荒，建父亲墓碑。

主要参考书籍

1.《南侨回忆录》上下册；陈嘉庚著，美国八方文化企业公司，1993

2.《回忆陈嘉庚》；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

3.《陈嘉庚与南侨机工》；林少川著，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

4.《往事波澜》；吴柳斯著，广东省归国华侨作家联谊会，1992

5.《流亡在赤道线上》；胡愈之，沈兹九著，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

6.《我的丈夫司徒乔》；冯伊湄著，香港上海书局，1976

7.《峥嵘岁月》一二册；区如柏著，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

8.《旧事拾遗》；林枫著，广州国立剧专在粤校友编印，1997

9.《风雨南洋历艰辛——记胡伟夫从事新闻工作的经历》；昭明著，广东人民出版社

10.《浪尖逐梦》；余柱业口述，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06

11.《方壮璧回忆录》；方壮璧著，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06

12.《卢心远自述》《卢心远文集》；卢迁、葛云生、卢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

13.《潮州通览》；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编，花城出版社，1999

14.《古城概览》；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编，2003

15.《史事考述》；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编，2004

16.《遗闻传说》；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编，2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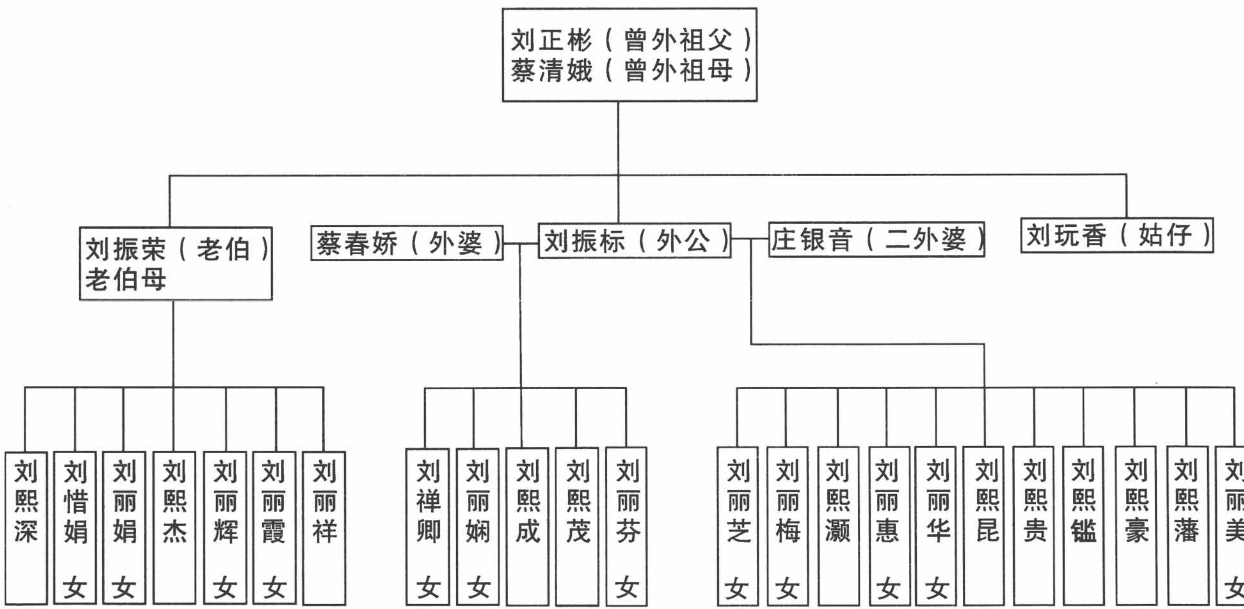
17.《海外潮人》；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潮州市外事侨务局编，2004

18.《香港今昔》；高添强编著，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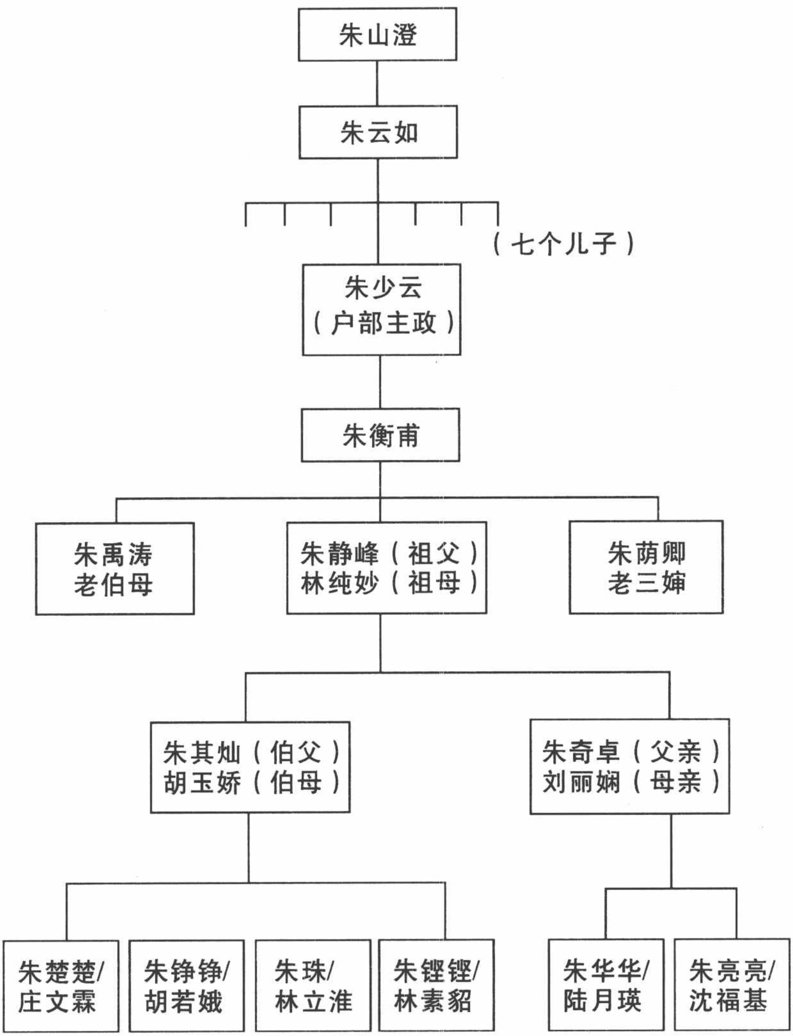
19.《红太阳的陨落》；辛子陵著，书作坊出版，2007

20.《金山戏剧论文集》；金山著，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

刘氏家系图


刘正彬（曾外祖父）
蔡清娥（曾外祖母）
刘振荣（老伯）
老伯母
蔡春娇（外婆）
刘振标（外公）
庄银音（二外婆）
刘玩香（姑仔）
刘熙深
刘惜娟 女
刘丽娟 女
刘熙杰
刘丽辉 女
刘丽霞 女
刘丽祥
刘禅卿 女
刘丽娴 女
刘熙成
刘熙茂
刘丽芬 女
刘丽芝 女
刘丽梅 女
刘熙灏
刘丽惠 女
刘丽华 女
刘熙昆
刘熙贵
刘熙鑑
刘熙豪
刘熙藩
刘丽美 女

朱氏家系图


朱山澄
朱云如
（七个儿子）
朱少云
（户部主政）
朱衡甫
朱禹涛
老伯母
朱静峰（祖父）
林纯妙（祖母）
朱荫卿
老三婶
朱其灿（伯父）
胡玉娇（伯母）
朱奇卓（父亲）
刘丽娴（母亲）
朱楚楚/
庄文霖
朱铮铮/
胡若娥
朱珠/
林立淮
朱铿铿/
林素貂
朱华华/
陆月瑛
朱亮亮/
沈福基

请不要忘记海外华人为他们的祖国，或者他们的父母、祖父母的祖国摆脱封建帝制，抵抗日寇的侵略，以及为新中国的建设所付出的力量，甚至枉死的生命。

——朱亮亮

从1899年到1995年，《追虹》一书涵盖20世纪，贯穿整100年一个家族四代人的故事。无论是在中国，还是东南亚，这都是一个风起云涌的世纪。这本书从一个家族的历史出发，为这个非常的时代，为中国和新马的一段历史，留下见证。

——郭振羽（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

我仔细读完《追虹》，深深为朱亮亮所描绘的情节所震撼。这书之所以能如此动人，是因为亮亮有一双新闻家的锐眼，一份历史家的情怀和一支文学家的健笔。她在书中细细地描述一个有才华、有理想的知识分子，为了报效祖国，建设民主，却化成了一只扑火的飞蛾……因为她用词平实，考证详尽，使得这一个家族的小悲剧，影缩了一个大时代千千万万个知识分子的大悲剧！叫人同声一叹，同声一哭。

——傅观成教授（美籍华裔学者）

《追虹》是朱亮亮写四代人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家族史。它不是小说，却写得比小说更加惊心动魄，更加叫人不忍卒读。

——邹文学（新加坡新闻工作者）

《追虹》网站：www.zhui-hong.com

上架建议·纪实文学

ISBN 978-7-5360-6021-0

9 787536 060210 >

定价：23.00元